

# 資深獄吏

THE SENIOR JAILER:  
KANG SHE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康生與「文革」(I)



羅織罪名的整人專家，  
文革路線的激進推手。

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殘餘，  
所以要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

——康生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 資深獄吏

THE SENIOR JAILER:  
KANG SHE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康生與「文革」(I)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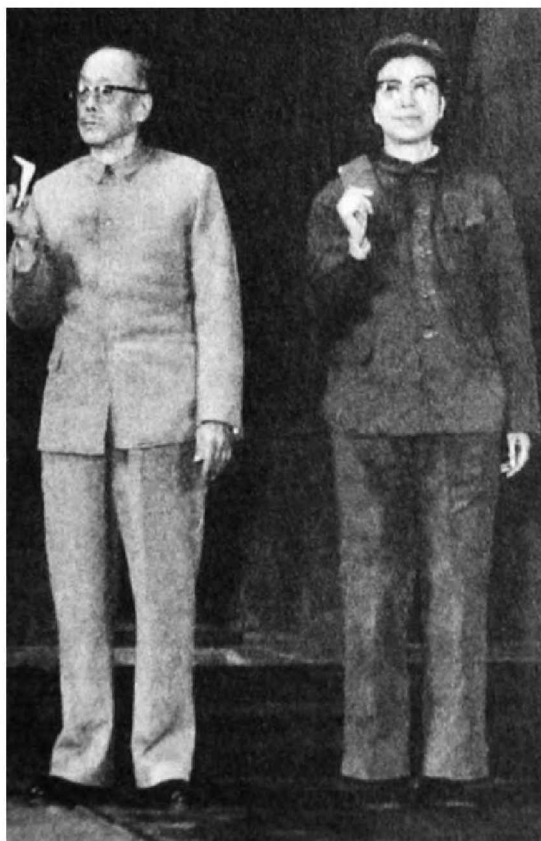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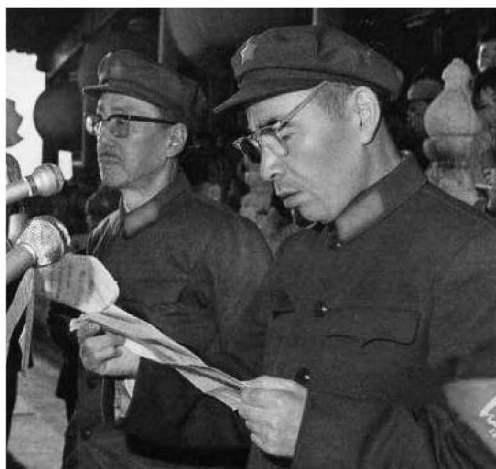
康生（1898—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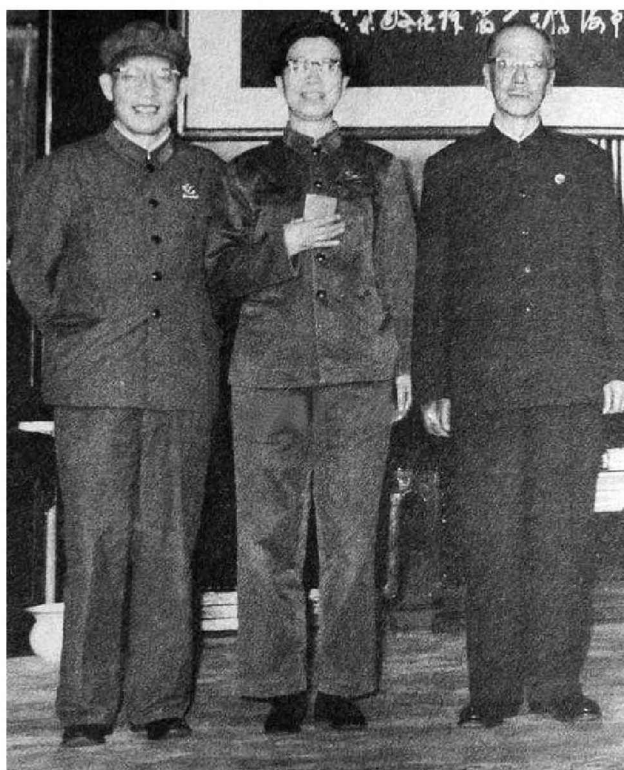
康生（右一）與江青



康生（左一）與江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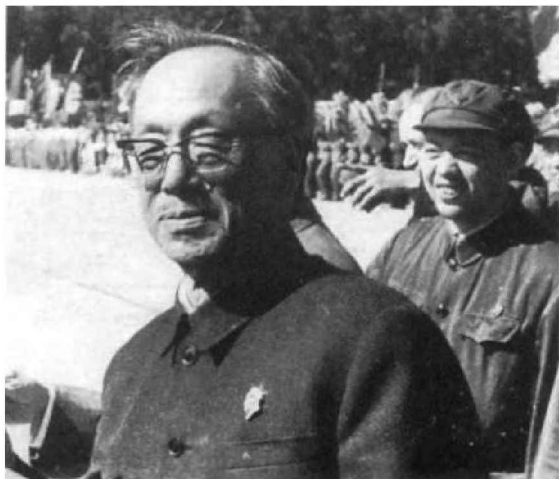


康生（左一）與林彪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康生（右一）與江青、張春橋





康生（左一）與姚文元



康生（右一）與姚文元等接見外賓



1967年，康生（居中）在北京火車站慰問印尼排華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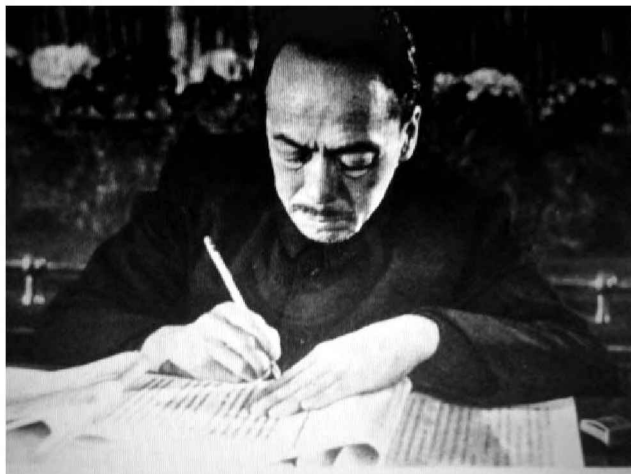
毛澤東、林彪、康生（左二）等接見越南外賓。



1970年8月，康生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上講話  
（《人民畫報》1976年第3期）



1973年8月，康生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人民畫報》1976年第3期）



康生在工作（《人民畫報》1976年第3期）



康生於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2月21日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人民畫報》，1976年第3期）



##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sup>1</sup>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

<sup>1</sup>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sup>2</sup>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sup>3</sup>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sup>2</sup>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sup>3</sup>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sup>4</sup>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sup>5</sup>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

<sup>4</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sup>5</sup>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sup>6</sup>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sup>6</sup>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sup>7</sup>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文件、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檔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sup>7</sup>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sup>8</sup>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文件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sup>8</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sup>9</sup>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sup>10</sup>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sup>11</sup>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sup>12</sup>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sup>9</sup>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科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sup>10</sup>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sup>11</sup>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sup>12</sup>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sup>13</sup>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sup>14</sup>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sup>15</sup>。《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sup>13</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4</sup>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sup>15</sup>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幹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文件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文件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文件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錄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 目次

##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13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7
體例說明.....	023

## 029 | 1966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5.）.....	031
康生對北京大學同學的講話（1966.6.5.）.....	035
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學全校辯論會上的講話（1966.7.25.）.....	035
康生接見八個高等院校的同學時的講話（1966.7.26.）.....	037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1966.7.27.）.....	040
康生在北京大學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7.27.）.....	047
康生接見部分學校來訪學生時的談話（1966.7.28.）.....	048
康生、陶魯笱對中國人民大學部分革命師生的講話（1966.7.29.）.....	051
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8.4.）.....	058
中央首長在來自全國各地革命師生歡迎大會上的講話（1966.8.16.）.....	066
康生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鬥爭林楓會的指示（1966.8.19.）.....	070
康生接見部分來京串聯同志時的講話（1966.9.8.）.....	071
康生給江蘇鎮江農機學院紅衛兵、赤衛隊的覆電（1966.9.9.）.....	076
康生、謝富治、楊成武與北京航空學院「紅旗」代表談話 （1966.10.6.）.....	077
康生對新疆少數派「紅二司」戰士的講話（1966.11.15.）.....	078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12.4.）.....	099
中央首長談工交系統文化大革命：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 李先念等首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1966.12.18.）.....	102
康生對某部一個學習簡報的批語（1966.12.21.）.....	105

## 111 | 1967

康生對北大學生崔子明等人兩封信的批駁（1967.1.3.） .....	113
中央首長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座談紀要（1967.1.4.） .....	116
康生與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青訓班的談話（1967.1.10.） .....	124
康生對青島市造反派談兩條路線鬥爭（1967.1.19.） .....	138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一）（1967.1.22.） （存目） .....	146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同體育界座談紀要（1967.1.23.） （存目） .....	146
康生陪同阿爾巴尼亞希斯尼·卡博與清華大學學生座談的講話 （1967.1.25.） .....	146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講話（1967.1.27.） .....	150
康生、王力接見中共中央某部機關革命造反總部代表的談話 （1967.2.2.） .....	151
陳伯達、康生、江青審查一九六六年國慶影片時的講話（1967.2.4.） ..	153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團時的談話（1967.3.2.） .....	156
陳伯達、康生談蕭華（1967.3.3.） .....	161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3.5.） .....	161
康生對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指示（1967.3.8.） .....	193
中央文革參觀八一學校「聯動罪行展覽」時的講話（1967.3.8.） .....	194
康生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3.10.） .....	196
康生接見安徽奪權代表時的講話（1967.3.17.） .....	202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3.18.） .....	203
中央首長第二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記錄（1967.3.21.） .....	209
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1967.3.24.） .....	219
周恩來、康生接見安徽各方代表的講話（1967.3.28.） .....	236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古黨委代表談話紀要（1967.3.30.） .....	242
中央首長與福建省赴京代表團的談話（1967.3.31.） .....	247
中央首長在四川彙報會上的講話（1967.3.31.） .....	253
中央首長接見宜賓地區代表時的講話（1967.4.1.） .....	254
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4.6.） .....	260
陳伯達、康生與呼和浩特市農民代表周文孝的談話（1967.4.7.） .....	267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駐軍及幹部群眾代表的講話（1967.4.7.） .....	272

中央首長第五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4.12.） .....	276
康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3.） .....	283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1967.4.13.） .....	305
康生、江青在接見四川赴京代表時的講話紀要（1967.4.17.） .....	322
中央首長在解決山西核心小組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67.4.22.） .....	325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1967.4.23.） .....	341
周恩來、康生等談山西問題（1967.4.23.） .....	352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代表時的談話（1967.4.25.） .....	354
周恩來、康生接見山東代表團王效禹、楊得志等人的講話 （1967.4.26.） .....	356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赴京上訪人員時的講話（1967.4.27.） .....	358
周恩來、康生接見國際關係學院代表時的講話（1967.4.28.） .....	388
康生研究文獻 .....	391
「文革」研究文獻 .....	399
後記 .....	423



1966

---



##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5.25.）

從去年十二月到現在這半年期間，羅被揭露出來以後又提出了彭、陸、楊。沒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學習。

在這個期間我聽到主席七次指示。第一次十二月二十日講到《海瑞罷官》問題要害是罷官。是與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有聯繫的，提出文化學術界必須從政治上批判，彭真在場說，作了調查，與彭德懷沒有聯繫，彭真出來後造謠說：主席說了兩個月以後作政治結論。（二月三、四、五日彭指出提綱，修改了四次。）

第二次二月八日到十一日，彭真搞出了提綱，拿到常委會上，匆匆忙忙的當場發了，叫許立群念了一遍，常委同志認為是向主席彙報過了，也沒有說明是作為文件向全黨發出，欺騙了常委。又到上海向主席彙報，說常委已通過，欺騙主席，主席問吳晗算不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彭說不能算，主席沒有說話，彭真就把文件改了，說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關鋒在一九六二年寫過幾篇雜文，彭要整左派的風，主席說三年以後再說，主席表示很不滿意，彭說主席批准了。在上海修改了一下趕快發出去了。

第三次，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常委擴大會議，主席說《前線》也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鬥，到底有多少馬克思主義。

第四次，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主席講到嚴慰冰這個反革命，他們是穿的一條褲子。講彭羅陸楊經常把主席講的話與自己要講的話分不清楚，把主席講的話與自己要講的話分不清楚，把主席的意思變成自己的，講到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

第五次，四月十八日到二十五日，主席又重複講到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當權的問題，一是出，二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還是早出好。搞的好可能不出。在中國出修正主義是困難的，講到書記處也是分化的，彭陸楊譚等當過書記處的書記，是不斷分化的，合乎辯證法，



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觀願望，中央有，各省也會有。

第六次，四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主席講到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彭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的，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歷史教訓並不是引以為戒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攻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衛「玉皇大帝」的人，彭是混到黨內來的渺小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個指頭就捅倒他，「西風落葉下長安」。告訴同志們「不要無窮的憂慮」。

「灰塵不掃不走，階級鬥爭不鬥不倒」。贊成魯迅的意見，經本不可不讀，不可多讀。不讀人家會欺負你，現象是看得見，本質也要通過現象表現出來，彭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要不要告訴阿爾巴尼亞的同志，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

第七次，五月十二日到十四日主席講彭，黨內矛盾是正常現象，有矛盾就要鬥爭，這是辯證法。彭經常把主席的指示歪曲了。我們要好好學習沒有形成文字的主席思想。「四大家族」的共同特點：（1）反對主席是偉大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2）反對主席是全面發展了馬列主義，是當代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3）完全反對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別不同意向全世界宣傳毛澤東思想。（4）活學活用主席著作是簡單化，庸俗化，貼標籤。

為什麼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一百多年來，可分為三個時期：（1）馬克思主義時期是資本主義時代，沒有出現社會主義。（2）列寧主義時期是帝國主義走向沒落時期。（3）毛澤東思想或者是毛澤東主義時期，毛澤東思想全面發展豐富了超過了馬列主義。

從馬列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來看：哲學大大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人的正確思想從何而來是馬列主義的精華，精神變物質，一般到具體（林彪同志插話：工人說學習主席著作要占工作時間，這是加法，精神變了物質，這是乘法。）主席批評恩格斯的三個公式：品質互變不對，否定之否定不對，是否定了又肯定，核心是對立的統一，不能三個

平列。列寧強調了對立統一，沒有批判恩格斯的斯大林搞成四條，主席否定了。概括為對立，統一，簡成一分為二，是主席第一個這樣講的，大大發展了超過了馬列主義，用矛盾論解決黨內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四大家族的解決也是矛盾論的運用，工農兵學習哲學把學習推向新階段是件大事。

政治經濟學。彭說有資本論就夠了，還能再提高？這是不承認主席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現在有這麼一個人正在寫資本論和帝國主義論。主席一開始就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了土地問題，農民問題，主席提出了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兩個中間地帶十大關係的理論，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經濟學，又是哲學，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奔向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政治掛帥，自力更生，群眾路線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的典範，經驗豐富的很。

科學社會主義。毛主席有獨特的創造。革命的一切問題是政權問題，槍桿子出政權，這是最高的概括，是萬古長青的，贊成還是反對這句話是革命派是與反革命派的分水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說有階級鬥爭，但列寧說的是社會主義初期，斯大林也說有，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有，到一九三六年只有因素，一九三六年以後就沒有了，到快死了又說有階級鬥爭，主席認為階級鬥爭是貫串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領域中。一九五七年主席說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不能建成共產主義。前人沒有回答的問題，主席作了回答，三月二十八日同日本人講話又發揮了。他說即使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打倒了，各個國家都成了社會主義，什麼時候建立共產主義還很難講。因為資本主義還要復辟。要經過長期的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

從上述來看，怎麼能說沒有超過呢？怎麼能說不是頂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呢？主席對農民問題發揮的很多，懂不懂農民問題，是能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問題，是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能不能鞏固政權的問題，特別是土地問題的理論是個大發展，這是能不能取得政權的問題，人民軍隊的理論是馬列主義中所沒有的，主席創造了與十月革命相

反的道路，是偉大的創舉，農村包圍城市有世界意義，有普遍意義。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理論是發展馬列主義很重要的部分。軍事問題恩格斯有著作，是唯武器論，沒有人民戰爭思想。列寧死的早，沒有講，斯大林有，但說的不清楚。林彪同志《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是很重要的。（伯達同志插話，對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要有批判態度，馬克思說，英國可以和平過渡到共產主義，因為英國沒有地主官僚制度，沒有軍國主義。這種說法不符合具體情況。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當時是正確的。這和他理論本身就是矛盾的。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中批判過，說不能和平過渡了。）英國有一教授來中國幾次，他說：主席大大超過了馬列主義，提出了四個來源，加上中國古代哲學，在中國辯證法從來沒有中斷過，（總理插話：中國武裝鬥爭從來沒有中斷過，中國的哲學與打倒是分不開的。）稱讚工農兵學哲學，他對京劇改革很感興趣，他說到希臘去宣傳。改革他的戲劇。這十年主席是反修旗手，反修的理論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論黨和黨的建設理論大大發展了，把黨的建設與馬克思的世界綱領結合起來。主席揭示黨內矛盾和解決矛盾的辦法，沒有矛盾就沒有鬥爭，黨的生命就要停止，這是深刻的。把矛盾的普遍規律運用到論黨和黨的建設上是有重大意義的，把黨性提高到哲學理論的高度。主觀主義是黨性不純的表現，是主席第一位提出來的，理論上入黨，思想上沒有入黨。解決黨內問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主席插話：在馬列主義中沒有說過。）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可以保證永不變色，超過了聯共黨史結束語，也超過了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的鬥爭。十中全會主席說：有人利用小說反黨，傳播輿論，這是他們的一個大發明。學校的歷史系不出歷史，文學系不出文學，哲學系不出哲學，要重新寫。我們要站在孫悟空這方面，支援左派，現在好像孫中山與康有為（保皇黨）的鬥爭，要建立起左派的優勢。<sup>1</sup>

<sup>1</sup>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 康生對北京大學同學的講話（1966.6.5.）

1966年6月5日上午10點左右康老到北大看大字報時，在學生三食堂門前對北大革命師生說：

同學們！我看了你們的大字報，很高興。有你們這些革命的同學，什麼牛鬼蛇神、什麼彭真、什麼陸定一、什麼羅瑞卿、什麼陸平、什麼彭佩雲都統統被打倒！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學全校辯論會上的講話 （1966.7.25.）

康生同志：

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來看你們，問你們好。我們受毛主席的委託，向你們問候。現在我介紹一下來的幾個同志。

副組長：江青、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姚文元、戚本禹。

文革小組辦公室：曹軼歐。

江青同志：

同志們，毛主席要我們做你們的小學生，就是說，做革命派的學生。革命派的同學，教職員工如果需要我們來，我們召之即來。我們小組如果有什麼不正確的，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直接寫信給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見他。我們是革命派的勤務員，革命的跟我們一快走，不

革命的走出去。

我聽說你們有幾派不同的意見，現在請他們來講講。我們聽聽。

康生同志：

江青同志講了，毛主席叫我們來向你們學習，這不是謙虛，因為主席說過了，一切革命的正確的領導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誰做呢？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靠我們，首先是靠你們，同學們，教員們。因此，我們想在這一偉大的文化革命中，運動中，學習、學習、再學習。

我聽說，同志們在若干問題上有不同意見，這是很好的現象，是正常的現象，是健康的現象，真理通過辯論更加清楚了。比如「六·一八」，有人說所謂「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有人說是反革命的，還有人說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對工作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工作組說成是黨中央派來的，毛主席派來的，你們別聽那一套！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你們的工作組是北京新市委派來的。從六月一日到現在兩個月了，工作組怎麼樣？聽說有各種意見，有的講是好的，有的講有一些錯誤，有的講有路線性的錯誤，有的講是路線錯誤。敞開思想講，什麼話都可以講，不要有顧慮。有的講工作組在這兒好，有的講工作組不在這裡的好。文化革命是靠你們來搞呢？還是靠工作組一手包辦？文化革命怎麼做法？陸平，彭佩雲怎麼鬥？翦伯贊、馮定之類怎麼鬥？怎麼做法可以辯論、研究。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

文化大革命你們是主人，不是我們，也不是工作組，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們告訴你們的重要的任務。我的話不多講。我們下車伊始，不能哇啦哇啦講，你們不是批評張承先的報告講了四個鐘頭嗎？要「精兵簡政」嘛！我的話就講到這裡。

（地六一黃玉生等三人記錄整理。）<sup>2</sup>

<sup>2</sup>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編第二集》，北京：1966.12；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

## 康生接見八個高等院校的同學時的講話 (1966.7.26.)

各校都有共同的問題，我還要吃飯，三點鐘還要開會，各校共同問題是工作組問題。今天只能答覆這一個問題。大家大概聽到了我們到過廣播學院、北大，昨晚到師大三校。中央文革小組曾向各校及市委提兩個建議：（1）撤銷工作組。（2）由革命學生教育自己，各校組織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及文革代表大會。

這兩個建議是真的，不是假的。為什麼這樣提的，因為中央有一個考慮，我們認為更好放手發動群眾，為更好地使革命師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進行革命，為了使革命師生把他們的高度革命熱情發放出來，自覺革命，更有利地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權威鬥，以及為將來更好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革命。考慮這些，現用派工作組的辦法，近兩個月的實踐證明這個辦法不能適應現在革命的要求，也達不到中央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決定所有工作組一律撤銷。

當時六月一日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把北京市以彭真為首的黑幫揭開了，這樣在北大把陸平、彭佩雲黑幫的面目公開了，因此北京各校革命運動到處爆發起來了，當然有些校黨委癱瘓了，垮了。各校向北京市委要求派工作組，當時根據農村四清經驗，覺得需要派工作組，因此北京市委從外地各方面抽調幹部，到各校去組成四清工作組。工作組去時，學生很歡迎，敲鑼打鼓（當時你們也敲了吧！）但兩個月的經驗證明，這種方法不適應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也不適應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目的。為什麼？因為我剛才講過，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有兩面，一是鬥爭，一是改革。首先講鬥爭，有的是分兩步走，先鬥爭當權派，再鬥爭學術權威，有的是兩者一塊來，大部分是先鬥爭當權派，再鬥學術權威，比如北大先鬥陸平、彭佩雲，下步就是翦伯贊、馮定、馮

---

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一九六六年。

友蘭，批了再改，改革學制，改革教材，怎樣半工半讀，都要進行。

現在看看工作組在北京市的大致情況，有的是好的；有的不好，也不很壞；有的不好的。有一時期我們看到師大、地質、林學院、輕工業學院、廣播學院……很多學校，工作組去了，不鬥當權黑幫，而是「六·二六」事件，「六·一八」事件，轉過矛頭鬥學生，鬥貼第一張大字報的學生，清華也是這樣，有的如北大雖沒鬥聶元梓，但卻冷冷清清，不是革命運動。

有幾個原因，工作組倉促從農村回來，來自五湖四海，他們沒有準備，臉也沒有洗，下車就來了，文革文件也沒有學，對學校也無知識，無準備，這也不能怨他們，還有成員複雜，有左有右，誰也不認識誰，也有下到本部就被鬥，這隊伍能不能作戰？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怕亂，北大「六·一八」事件是群眾革命運動，有缺點打了人，戴高帽子，但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壞人，工作隊慌了手，認為是反革命。結果是冷冷清清，各班各系之間互不發生關係，鬥崗重重，不像前階段那樣轟轟烈烈。那樣怎能革命呢？什麼叫怕亂，怕亂就是怕群眾，怕群眾就是怕革命。這樣的運動沒有經驗，本來是革命運動，他們認為是不革命是反革命，結果「六·一八」以後，出現「清掃干擾」，把黑幫丟了，掃你們學生。證明有些工作組不去領導，而建立阻礙，師大更厲害，清華也包辦。（南京大學……更厲害，一個多月了光鬥學生）這是比較有全國性的，西安交大也是這樣，南大我不瞭解，我是懷疑你們那兒（有人打斷停了一下）敲鑼打鼓歡迎工作組，工作組有了缺點貼大字報就不得了，就是奪我的權了，七搞八搞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帽子，鬥學生，打擊左派。

另一方面鬥黑幫。工作組瞭解，還是你們瞭解？鋼院去了二、三百人，他們來自五湖四海，他們對鋼院情況瞭解，還是你們對鋼院瞭解？鬥學術權威是你們有本事，還是他們有本事？叫我去鬥鋼院權威，我帶了眼鏡也沒辦法，因為我沒知識，將來教學改革由誰來搞呢？張承先鬥翦伯贊，連翦伯贊的書也沒有看過，這辦法不行，通過這樣把轟轟烈烈的革命群眾運動搞成了包辦代替。革命不能包辦，不能代替，靠自己，

工作組不是在群眾中當小學生，勤務員，而是在上面，有些同志習慣於機關首長的辦法。……昨天到師大說你們現在是不是幼稚園！還要保姆？你們現在就是這樣，保姆不是好保姆，好心（的）愛護孩子！壞的要打小孩揍小孩。因此不說工作組好。無論是左、中、右，方法不適用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因此很多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方法需要改變，所以決定工作組撤銷，撤後怎麼辦？依靠群眾，相信群眾，發動廣大群眾進行文化大革命，因為革命群眾是主人。自己做工作不能包辦代替。他們能不能？能。北京大多數都是鬥垮了黑幫以後工作組才去的。所以根據毛主席（提出的）路線就是群眾路線：要廣大革命師生自己起來鬧革命。在學校裡革命學生老師是主力，是主人，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他們鬥爭、改革，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所以我們建議各校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下面小組。全校有革命委員會，還可以有文革代表大會，文革代表大會有學生、老師，選舉要充分醞釀，把名單公佈出來再選，這要在鬥爭中看這人怎麼樣，要充分討論。當工作隊撤走還可以用過渡辦法，或者選出籌委會或直接選上的領導可以指派巡視員，觀察員，在旁邊幫助（人數要很少的）。

（我們問：毛主席指示文革委員會要有左中右是嗎？）毛主席講過革命委員會要有廣泛的代表性，革命左派要善於團結群眾，要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的人，你們讀過《九評》沒有？其中第三條就談到這個問題，即五條左派的標準，左派不要自己孤立自己。我告訴你們，文革委員會，千選萬選，不會是鐵板一塊，總會有意見分歧的，隨著運動的發展，還要變化；可以不斷地選，一級一級地選，現在學校不敢開大會。選票要充分討論（我們說：我院工作組昨天要我們在三個半小時內，選出校文革委員會來）。我看看也不行，工作組讓你們選，你們不選，說我們自己作主。你們不能作主，你們算老幾啊！（師院一位同學說，我院一個人在市委檢查完了回院後，就當選為文革委員。）我教給一個辦法，選不上了，另選。現在都有人假借中央的名義，都說是毛主席派來的工作隊，沒有那麼一回事，毛主席連曉得也不曉得。

（我們問：八條規定是中央的指示還是北京新市委的指示？）根本



沒有什麼八條指示，毛主席的六條指示，胡克實的十三條「指示」，根本什麼都沒有。

## 康生、江青、陳伯達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話 (1966.7.27.)

###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你們好嗎？（眾：好！）

同志們，今天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所有成員到你們師大來，（歡呼）向你們學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跟你們學習，並且向你們問好！（鼓掌）我受毛主席的委託，問所有同志們，你們身體好！（眾：毛主席好！長時間地熱烈鼓掌、歡呼！）同志們，好多同學遞條子來，要我們介紹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現在我就來介紹。（以下逐一介紹小組成員）

同志們，同學們，今天，我們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全都來了，聽到師大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好，辯論進行得很熱烈。因此，我們想跟同志們來學習，來傾聽同學們的意見，不管哪方面的意見都要聽，我們都要學習。我們是你們的學生，你們是我們的先生，因此先聽聽同學們的意見，希望同志們把意見告訴我們。

首先，師大門黑幫分子，鬥程今吾，鬥得很好！（眾：打倒程今吾！）程今吾是彭真、陸定一黑幫的親信，（眾：打倒程今吾！）但是，對程今吾的鬥爭還沒有澈底，是剛剛開始。以後工作組派人來了，派來的是以孫友漁（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為首的工作組到你們這兒來。我們經過調查，孫友漁這個組長是沒有聲譽的。他到你們學校之後，沒有把程今吾這個黑幫緊緊抓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同學。有的同志問我們中央文革小組，你們的調查是不是很全面，是不是抓住了關鍵

問題，孫友漁在師大做的工作是好還是不好？同志們希望我們調查，我答覆：我們是經過詳細、周密、澈底調查研究的。（歡呼）

我只舉一件事實：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他們策劃政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策劃在北大、人大，每個學校駐一營軍隊，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們在北大看過房子，這件事含有極大的陰謀的。這點北大的……同志親自參加過他們會議，陸平是給他們修過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過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後，北大用大字報揪出來的，這個消息也傳到了你們師大的王運良同志，在六月二十日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叫做《郭影秋你是什麼人？》這張大字報千真萬確，千真萬確。但是這張大字報被孫友漁歪曲了，孫友漁在二十日做報告時，就認為貼大字報的同學是「造謠」、「挑撥」，他煽動同學說「這要製造流血」，還說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說！他在五千字的報告中，用四千字反來覆去講這個問題，這樣他就把同學保衛黨，保衛毛主席的熱情蒙起來了，一些同學不瞭解，被蒙蔽了……這些同學認為譚厚生、高樹奎同志是「反黨」，是「反革命」，這件事完全是孫友漁一手造成的。而且不僅如此，同志們你們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師範大學的簡報就是這樣造謠誣蔑的！他說：「有些同學要欺騙群眾，製造混亂，造謠說彭真真搞政變！」同志們，這是在替彭真辯護！……（打倒孫友漁！）彭真大黑幫要去北大，人大準備政變，這本來是真的，但是孫友漁說是假的，彭真本來是要政變，要奪取政權，孫友漁卻說是造謠！你們看孫友漁是什麼立場？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同學們，你們想一想，這樣替彭真黑幫辯護應該不應該罷他的官呢？（應該！）同志們！我還要和同志們講一件事，孫友漁反黨活動中間，他們不是去反對彭真黑幫，而是把矛頭指向我們「紅旗」雜誌的左派林傑同志，你們看，我把林傑帶來了，（鼓掌）同學們！林傑是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學生，（熱烈鼓掌）這是個好學生，你們的一個好同學！（熱烈鼓掌）但是被孫友漁別有用心地說「林傑支援右派學生！」還有人說「林傑的後臺是關鋒，關鋒的後臺是陳伯達……」還有個後臺老闆是我呢！今天我要問一問你們：看

我是不是黑幫？（不是！）算不算黑線？（不算！）……

文化大革命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鬥爭，另一個方面改革。鬥爭混在黨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當權派。鬥爭他們的時候，就批判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權威」。這個鬥爭大概就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也許連在一起來鬥，也許分開來鬥。以後就要改革，教育革命，教學改革，學制怎麼辦？實現毛主席的辦學方針怎麼辦？和工人、農民、解放軍如何來結合？到底課程、專業怎麼辦？到底我們的教材誰來編寫？教科書什麼內容？一系列教學教材的改革，學制的改革等在我們的後頭。所以我們要先破後立，後立也要破，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這個輪廓，這個輪廓請同志們想一想，要依靠什麼力量？（有關師大革命要依靠師大師生員工的話，略）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的腦子裡破除迷信，提高覺悟，自覺革命，肅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相信自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你們能夠把文化大革命搞得好的，搞得深，搞得透，一直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鼓掌）

## 江青同志講話

師大的革命同學們，革命的教職員們：

我們今天來，也受毛主席的委託，問候你們好！同學們要我講幾句話，我沒有很多意見講，因為我們應該先來做小學生，瞭解情況，聽聽同志們的意見。我接到許多同志的條子，有一些意見我覺得是好的。你們已經是大學生了，至少十八、九歲了。我們這些同志都是十八、九歲就鬧革命的，有的還小呢！十五、六歲。那時有國民黨的壓迫，我們就沒有被國民黨什麼人牽著鼻子走，我們還是幹起革命來了。你們是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無產階級專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人，你們難道就不能自己革命嗎？你們難道還是幼稚園的小孩子嗎？還要阿姨叔叔嗎？要這樣順從嗎？我相信許多同志是被蒙蔽的，鬥爭矛頭不是對準黑幫分子，對準地、富、反、壞、右，而是對著革命的師生，這是錯誤的。黨中央、毛主席向來是相信革命青年的。你們現在的革命形勢，我認為已經是大大

好的。

你們已經接受了一些考驗，但還不夠。你們有些人還想要保姆，保姆還是好的，保姆還出於愛護小孩子。現在我們的工作組是石頭，阻擋你們前進的道路。革命是不能叫別人來包辦代替的，要靠自己自覺，自己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有的人認為自己是老革命，革命要看他一生，同時還要看他在重大關鍵時刻如何表現。陳獨秀曾經是黨的領袖，後來成了黨的叛徒。因此，老革命，我們這樣的人，在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中也要像小學生那樣虛心學習，向群眾學習，也要改造，進行革命。你們要求撤銷工作組，我們中央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建議，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工作組也不一定都是壞人，有一些是好同志，到了群眾面前束手無策，……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來打擊你們，迫害你們，這是有罪的，要檢查交待。

我們建議你們自己組織文革小組、文革委員會，甚至全校代表大會，可以充分醞釀討論選舉出來後，經過鬥爭的考驗，搞不好，再罷他的官；好的，我們就跟他一起革命，這裡沒有折衷主義。但是工作隊孫友漁，包括劉卓甫這樣的工作隊，在同學中造成分裂。因此，我希望那些受了迫害的同學應當原諒那些被蒙蔽、被欺騙的人。經過鬥爭考驗，才能做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那些被欺騙、被蒙蔽的人，做了不好事情的人，也應該想想，也應該交待（指工作組的），然後才能站到革命這邊來。只有這樣才有利於革命運動向前發展，才有利於打倒一小撮黑幫、修正主義、地富反壞右。

今天我只講這一些，供革命同學、革命教職工參考。我們的意見不對就寫大字報。我還是這樣說法：革命的跟我們一起來，不革命的走開。不要怕亂，亂和治是對立的統一，沒有亂哪來的治？不受迫害，你們怎麼知道革命的困難呢？多受點迫害，能挺得住，將來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我們相信你們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不要把我們的青年教成像小特務一樣，我看見許多這樣的材料，這是犯罪的。你們要牢牢記住這一點。對自己人盯梢、監視幹什麼？我們公安部隊不是這樣工作的，是走群眾路線，為什麼鬧革命不依靠廣大群眾？為什麼把矛頭

對準同學？希望同學們不要害怕在大風大浪裡鍛鍊。我的話今天講到這裡。你們有什麼事，什麼意見？我講的是給革命的同學、革命的教職工聽的。反革命的他們也可以來聽，讓他們靠邊站著。革命的師生對我們文革小組有什麼要求，我們召之即來。（有關師大的具體問題，略）

### 陳伯達同志講話

剛才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講話，是代表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意見，我完全同意。康老和江青同志的講話，提出來的主要是兩個建議，一個建議，文化革命工作組是從上面派下來的，不管它是好的還是壞的，包辦代替的方式是不好的。因此，我們建議撤銷工作組，好嗎？革命必須自己靠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我們向你們建議組織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代表會議，作為你們學校文化革命運動的權力機關。不要搞保姆，你們長這麼大了，保姆又不好，不能做保姆。他要當保姆也要先學習，先當學生，沒學習過就不能當保姆。你們學校來了兩個工作組了，孫友漁的工作組搞得很壞，沒有孫友漁的孫友漁工作組，就是劉卓甫工作組，也搞得不好。是否還要第三個工作組？自己管理自己，我看可以搞好的。將來有些具體問題可以幫助解決。有些事情同志們是關心的。例如文件案、技術資料、武器問題。這些，你們文化革命委員會擬出一個管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文件案這個問題的發生是有道理的。現在來查這些人的出身，這些人的歷史，就是什麼家庭出身，過去幹了些什麼事。修正主義者有它的社會基礎。北京大學的陸平黑幫，你可以把他們的家庭、社會關係列一張表出來就可以清楚了，原來是這些人在這裡掌權。為什麼陸平這個黑幫要排擠工人、貧下中農子弟，照顧地、富、反、壞、右子弟？就是因為他們有社會基礎，有了這個社會關係。所以，查黑幫的文件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文件案要有一定的手續，你們文化革命委員會可以訂出條例，按照正確的手續、條例查文件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術資料要保管好，不要隨便動。你們搞思想革命，搞腦袋裡的革命，革資產階級思想的命，革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

命，革現代修正主義思想的命。你們一定有好多事要做，比如飲食，現在大師傅做飯，你們滿意嗎？（滿意！）在文化革命小組下，你們可以成立生活小組或者生活管理委員會，監督管理生活的事。

工作組有一些好的、比較好的，這些不是都不可信任。要吸收前兩屆工作組的經驗教訓。犯了錯誤，他們被轟走，這是完全對的。他們為什麼落到這種地步？因為有固定的剝削階級思想、剝削階級習慣、剝削階級勢力，在他們腦袋裡盤旋著。除此之外，有些是好人，有些是比較好的人，有些是犯錯誤的人，還有一些犯有嚴重錯誤的，但不是不可救藥的。他們根本的錯誤是想當保姆，又不想學習，不當學生。剛才江青同志說過，你們不要保姆，運動可以進行得更快些，更健康些。他們沒執行毛主席的工作的根本方法，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他們學生不當，你們說一句話，就打到底下了。這種人做群眾工作，特別是做文化革命工作，一定要失敗，你們轟的完全正確。你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代表也有可能走他們的路子。任何人當了文化革命小組組員，當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當了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代表，都要非常警惕，要好好地學習，很好地當群眾的學生，當群眾的勤務員。如果認為當了委員、當了代表就高人一等，也會失敗的。有的學校工作組撤銷了以後，已經成立了臨時委員會來籌備選舉工作，我看是個好方法，你們可以考慮。過去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名單是不是預先指定的？現在要經過群眾的充分醞釀，醞釀多少次、多少天，完全由群眾決定。提出候選人名單由大家討論，這個人合適不合適，能不能當，有沒有代表性。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不要宣傳青一色，要有廣泛的代表性，要以革命的左派、以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為核心，也要讓旁的人參加，這樣才能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才能夠爭取犯過錯誤的人、動搖不定的人。這樣我的話就完了，沒有話說了。

所有過去指定的那些組織，現在一律重新改選。原來的工作組還要留下，因為他們沒有當好你們的學生，要受教育，讓他們留在這裡補課。因為他們一來就是欽差大臣的派頭，他們來了就要當先生，瞎指

揮，自以為什麼都懂，其實什麼也不懂，很可卑。凡是不能當群眾學生的人，永遠不能當群眾的先生。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跟黨的關係。是不是成立這些組織，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同學們都知道，過去列寧講過「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是不是不要黨的領導呢？並不是不要黨的領導。我們的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的最高權力機關，也沒有說不要黨的領導。正是在制定憲法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講到：「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的領導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是黨中央的領導，不能說某一個組織、某一個黨員都能代表黨的領導。在這次文化革命中不是有的黨組織癱瘓了嗎？一些黨員不是要不得嗎？黨的各級組織，所有黨員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考驗，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不是無產階級的黨的組織，是不是能夠真正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黨員，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黨組織。是不是像毛澤東同志教導的那樣真正當群眾的學生，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是這樣的黨員，每個人就能在文化革命中起一定的作用，黨的組織就能起領導作用。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起作用。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在文化革命中應當成為我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橋樑。

同志們，有許多黨員不是反映群眾意見，把自己看成是站在群眾之上，而不是站在群眾之中，這樣的黨員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進行自我批評，這種黨員是壞黨員，終究要被黨開除出去的。毛主席告訴我們，共產黨的根本標誌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如果有這樣的共產黨員，這樣的共產黨的組織，沒按毛主席講的去，違背黨的三大作風，就要批評，給他提意見，如果不接受，就可以告他們。我過去在鄉下的時候，見到有這樣的幹部，他當了幹部就像高人一等。老百姓說：「他們是父母官，我們怎麼能批評呢？」我就給他們說，現在革命了，解放了，無產階級專政了，翻了身了，已經是社會主義時代了，過去把當官的比作民之父母，民為之子，現在相反了，

共產黨員、幹部是人民群眾的兒子，人民群眾是共產黨員的母親。有些農民覺得很可笑，說過去怎麼沒聽說過？我說過去沒聽說，現在我給你們說一下。現在我也給你們再說一下：我們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幹部只有依靠群眾才能生存，我們是人民的兒子，而不是人民的父母。

差不多了，講得差不多了。<sup>3</sup>

## 康生在北京大學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 (1966.7.27.)

我同意小組長（陳伯達同志）的建議，不知同志們怎樣？我們只是一個建議（指撤張承先），不是要強加於你們。贊成否，權力不在我們，在你們大家。……

昨天我們調查過，張承先的最大錯誤：（1）不能使同學們意識到北大革命由革命師生來進行，不相信群眾，不走群眾路線；（2）一個全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都沒有組織起來，工作組包辦代替了工作，組織上都犯了嚴重的錯誤。為什麼不依靠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呢？

張承先的路線錯誤完全違反了毛主席思想。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離開了群眾是不好的……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放手發動群眾，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工作方向：

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不僅是接什麼的問題，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關鍵在於能否真正把革命力量組織起來。

你們瞭解北大情況，改教材改學制，都要靠你們！……<sup>4</sup>

<sup>3</sup> 一院大字報選編小組，《大字報選 第二集》，北京：1966.12；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一九六六年。

<sup>4</sup>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



## 康生接見部分學校來訪學生時的談話（1966.7.28.）

各校有不同的問題。你們所關心的工作組的問題。我們到過廣播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在這三個學校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向革命師生和市委宣佈兩個建議：

一，撤銷工作組，二，革命的師生自己在各校組織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小組和文化革命代表會議。

這兩個建議是真的，不是假的。

中央有兩個考慮：我們認為為了更好的放手發動群眾，為了更好地使革命師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鬧革命，使革命師生的高度熱情更好地發揮出來，自覺革命，更好地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更好地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鬥爭，以便將來更好地改革教學制度進行教學革命和教學改革。

派工作組的方法，兩個月的事實證明，這個方法是不能適應現在革命的要求，不能達到中國文化革命的目的。所以，中央認為，所有的工作組都應撤銷。

六月一日，中央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把北京和以彭真為首的黑幫的蓋子一下子揭開了。因此，北京各校的革命運動就一下子爆發起來了，有許多學校的黨委都垮臺了。各校向市委要求派工作組去。當時，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來看，要派工作組，北京市委就從各地抽調幹部，派出工作組。工作組剛到學校，學生很歡迎，敲鑼打鼓。你們不都幹過嗎？但是，從兩個月的經驗看起來，這個方法不適應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不適應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鬥爭，一個是改革。鬥爭，有的學校分為兩個階段，有的學校合併起來，有的學校先鬥當權派，再鬥學術權威。例如：北大先鬥陸平、彭佩雲，然後就要輪到鬥翦伯贊、馮

定、馮友蘭；下步就是教學革命。包括教材、教學。重要的教材研究，半工半讀等等都要解決。現在看來，北京工作大概是這個情況：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不壞的；有的是壞的。有一個時候，我們看到如師範大學，地質學院，林學院，廣播學院等很多學院不鬥黑幫。「六·一八」、「六·二零」事件後，反過來鬥了學生，鬥了第一批貼大字報的學生。清華也是如此。

北大沒有鬥聶元梓，但長期以來冷冷清清。這不是革命運動。這裡有幾種情況：工作組倉促進學校，有的一下火車就進學校了，有的連文件也沒看，對學校也不瞭解，文化革命也沒有搞過。他們也毫無準備，毫無知識，就去了。這不能全怨他們，他們對學校不認識。工作人員複雜，有左的，中的，右的，裡面也可能有回本單位就挨鬥的。這樣的隊伍是不能作戰的。他們都有很大的缺點，就是怕亂。

北大「六·一八」本來是群眾的革命運動，雖有個別缺點，但是好的，是革命的。但工作組就慌了手腳，把它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以後就把工作搞得冷冷清清。這個班跟那個班，這個系跟那個系，不能發生關係。鬥崗層層，這樣是不能革命的。害怕群眾，就是害怕革命。「六·一八」等事件本來是革命的，就是認為不是革命的，是反革命的，所以後來就來了個消除干擾，結果把黑幫丟了，把你們學生鬥了。這證明有些工作組不領導革命，而是去阻礙革命的。北大是如此，師大更厲害，西安交通大學也是如此。工作組一去，人家敲鑼打鼓歡迎，但是工作組搞得不好，人家貼大字報，他們就說奪權，是反革命，就打擊左派，整學生。

另外一方面，鬥黑幫是工作組清楚呢？還是不清楚？（鋼院有同學插話，康老答）鋼鐵學院有工作組吧？是他們瞭解情況呢？還是你們瞭解情況？將來鬥學術權威是你們有力量呢？還是工作組有力量？要叫我鬥鋼院的權威，我只好乾瞪眼。我沒有什麼認識嘛！讓張承先鬥翦伯贊嗎？他連翦伯贊的書都沒有看過！這樣就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搞成由工作組包辦代替。革命不能包辦代替，必須由群眾自己來搞。自己來革命。所以，工作組代替就不是從群眾中來，不是當小學生，而是站在群眾之上。我們有的幹部都習慣坐機關，坐辦公室。我們有些學校

的工作組像褓姆一樣，你們搞革命還要有褓姆來看管？褓姆也有好的，也有壞的。好的就看一看，壞的就打小孩。所以，派工作組是不適應當前形勢的，很多經驗證明，這種方法是不對頭的，應該改，要撤出工作組。

撤銷以後怎麼辦呢？就要依靠群眾，信任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因為群眾是主人，群眾能夠做好，不能由工作組包辦代替。大多數學院是鬥垮了黑幫，工作組才進去的。根據毛主席的群眾路線，要讓廣大革命師生自己起來革命，革命的老師和同學是主力，要動員他們，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他們才能完成教學改革，才能完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們倡議：各校成立文化革命小組，全校要有文化革命委員會，還可以有文化革命代表會議。要由師生自己選舉，充分醞釀，充分議論。不充分醞釀，不充分議論，就不選，就可以重新選，不好的就可以罷他們的官。經過幾天的醞釀，把候選人提出來，把名單貼出來，再進行選舉。因此，當工作組撤退就可以採取過渡辦法，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上級機關只派巡視員，觀察員在旁邊幫助，這樣的人很少。

毛主席說過，文化革命委員會，要有廣泛的代表性，革命左派要善於團結廣大群眾，善於團結有不同意見的人。你們讀過九評吧？你們看看第三條，這條是左派的標準，左派要善於團結大多數人，不要孤立自己。（有人提問，康老說）我告訴你們，你們選出來的也不是鐵板一塊，各人有各人的意見，有的你今天看不出來，將來遇到一個事，就可以看出來了。（有人提問，康老答）工作組提了候選人不算數，可以不選，你們是主人，你們自己來選。

有的學校不敢開大會，開萬人大會的實際還沒有。找個教室，幾面又拉上線，同學見不到發言人，發言人見不到同學，這是不行的。工作組作主不算數，即使選出來了也不算，你們堅決反對！中央的方針是：你們自己提名單，自己選舉。你們什麼時候想選，就什麼時候選，工作組算老幾！<sup>5</sup>

<sup>5</sup>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黨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一九六六年；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

## 康生、陶魯笳對中國人民大學部分革命師生的講話 (1966.7.29.)

###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在座的都是人大的同學嗎？（答：是）大概同志們都是為郭影秋同志而來的吧？首先我想告訴同學們一個結果，根據郭影秋同志七月二十六日給我的信，郭影秋同志對師大的大字報，他在以前是不曉得的，直到七月二十三日師大的王運梁同學給他的信，郭影秋同志才曉得原來有張大字報。現在我把郭影秋同志的信讀一下：「一歐同志送上師大同學王運梁來信的意見請收閱，這封信我是七月二十五日上午看到的，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有這麼一份大字報，（所謂這張大字報是六月二十日王運梁同學貼的大字報，郭影秋同志是不曉得的，七月二十三日王運梁同學給郭影秋以前，他說我不知道有這份大字報）也不知道孫友漁六月二十日的講話裡攻擊學生，製造流血事件，就是針對著這份大字報的。六月十七日我從上海回北京，市委通知我準備回校檢查。那時，文教辦公室已經改組，我完全離開了工作，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沒有人再和我談。到六月二十三日，雪峰作報告時，才明確，我暫不去人大，恢復了工作。所以，在六月二十日前後發生的問題我不清楚。我的錯誤在於沒有把孫友漁的講話弄清楚，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對他的批評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表面上信任他的檢查。」七月二十六日這份信是交給曹軼歐同志，請曹軼歐同志轉交給我的。

我是相信郭影秋對這件事事先是不曉得的，我先把問題結果告訴同志們。事情的經過是怎麼一回事呢？經過是這樣的。這是北大丁鍵七月十九日揭發××密謀搞軍事政變的一個材料，當然這件事我們還要繼續調查。丁鍵的信是這樣說的：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十三日，張學書

---

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北大前黨委副書記），張起永（前北大武裝部副部長）參加了北京市第二屆民兵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為貫徹主席的正規軍、地方軍部隊、民兵三位一體的指導精神，調一個獨立團來北京，名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這話是張起永二月底在武裝部說的。二月十七日調我去武裝部搞民兵訓練的思想工作，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張起永帶領了北京衛戍區一個參謀來看房子。張起永回來以後就對我們說：「學校這次接受了一個營的駐軍任務，其目的是為了貫徹毛主席的正規軍、地方部隊、民兵三位一體的指示。會議決定調西山一個獨立團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共兩個營，一個營在我校，另一個在人大，可能三十一日左右到我校來。」張起永又對我說：「你們學生會考慮一下怎麼接待，要隆重一些，什麼對聯、節目？」張起永回來又向陸平彙報此事，陸平表示熱烈歡迎，親自下令劉德貴把四十齋粉刷好，駐軍，學生三食堂給他們用飯。我覺得陸平，張起永這兩個黑幫分子，對於民工要來住校百般推遲，百般刁難，而對市委駐軍的事很熱心，同是市委佈置的，態度就不一樣，這裡有鬼。張其永對我說，一個營駐我校，對我校大有好處，三月五（六）日我問張起永：「部隊什麼時候來？」張說：「因為市委有考慮，還有修京密引水工程的任務，可能要來民工，部隊就不來了。」五月二十四日北京衛戍區有一個處長來北大檢查槍支完全情況，丁問他：「為什麼部隊不駐我校了？」這個處長回答說：「因為考慮你校女生多，她們大多都是青年人，二十多歲，所以就不來了。」我曾聽郭立軍說過，北京沒有正規軍，有兩個警衛師分散在全市各地，有的地方一個排，有的地方一個班，可見調兩個營集中駐紮，以便調動，發動政變。以上有可疑之處（一）陸平對駐軍十分歡迎，親自出馬；（二）市委不駐軍的原因是要派民工來，而住在三十八齋的民工都走了，而那個處長說女生多，不方便。這兩個原因是矛盾的。

丁鍵（北大團委組織部長，一九六四年化學系畢業生）被北大黨委副書記，某組織部長張學書曾調到武裝部工作。這是七月十七日揭發的一個材料，這個材料我們正在調查核實。不過北大的同學因此事而懷疑彭真黑幫準備政變與這有關，這樣懷疑是完全對的；而且懷疑彭真和陸

平合夥搞陰謀，這個懷疑也是完全對的。這件事，北大化學系二年級有兩三個人六月一日以後，曾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彭真篡黨、篡軍的大陰謀，他們要調駐西山的一個團，指定在三月十五日進京分駐北大，人大各一個營，並指定住四十二齋，三食堂作飯廳。在六月二十日，師大物理系有三個同學貼了大字報，有王遠梁、范強、蕭道智，他們於六月二十日貼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郭影秋是什麼人？》其中關係到軍隊的有這麼一條，根據揭發彭真等人準備往北大派兩個營，人大派一個營軍隊，人大，北大都駐軍隊，這說明什麼？

這個大字報被師大工作組組長孫友漁所反對，孫友漁在六月二十日作了一個報告，說貼了大字報的同學是造謠，是挑動人民與軍隊的關係，使我們流血，把同學挑起對寫第一批大字報的同學進行圍攻，是孫友漁說他們造謠彭真要搞政變，這在客觀上是為彭真辯護。同志們要問孫友漁，當時是否曉得彭真要往人大，北大派軍隊，據我估計孫友漁事先是不曉得的。

孫友漁的錯誤是應該先去調查，而不應煽動貼大字報者是挑動人民與軍隊的關係，使我們流血，來打擊革命同學，看來不是他事先曉得這件事。這事師大的同學也問過我，孫友漁的錯誤是利用此事打擊革命同學。駐軍這事到人大去，郭影秋曉得不曉得這事呢，郭影秋知道這件事，這是七月二十四日郭影秋同志給我一封信，他說：「康老，今年三、四月間我在農村搞四清，一次我到學校來，聽到學校的幾位書記，孫洪、崔耀先、趙德芳說，北京市通知學校要駐解放軍，要騰出能住三、四百人的房子。我當時表示到市里去交涉一下，不住最好，雖然學生大批下鄉，但四清結束後還要回學校的。如果交涉無效，那只好騰房子了。」這信上又說，過一段時間，大概是在四月底，聽說不駐學校了，究竟是誰通知學校要駐軍，又是誰通知不駐的，我不瞭解，如果要調查，可問孫洪、崔耀先同志。七月二十四日要來的，北京市要在人大駐一個營的軍隊，郭影秋同志大概在三四月間，回校來，是聽說有這件事，但究竟是誰決定駐，誰決定不駐的，他不清楚，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師大貼大字報問他及孫友漁利用這件事打擊學生，他不曉得。王運梁的信是這樣寫的：「郭影秋同志：你好！六月二十日我給你貼了一張大字報，現在我覺得那張大字報是錯誤的，你是一個好同志，我打了一個好同志，我誠懇地向你道歉，也希望你能給我以指導。我貼了一張《郭影秋是什麼人？》的大字報，主要想法是這樣的，覺得你本人是人大黨委書記，高校黨委書記差不多都有問題，因此懷疑你也有問題。聽說彭真打算往北大，人大派軍隊的謠言，是從大字報上聽來的，覺得彭真來這手，是想搞政變的。因此我看了大字報就認為彭真與陸平有關係才派軍隊，那麼往人大派軍隊是否也與彭真有聯繫呢？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我對你瞎懷疑，因此就寫了這張大字報。」這是七月二十三日王運梁給郭影秋的信，實際上王運梁聽到的消息不是謠言，而是事實，至於駐軍在幹什麼，我們正在調查。

因此，可以說郭影秋同志對王運梁的大字報及孫友漁利用此事打擊學生，郭影秋同志是不曉得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同學們想問一下郭影秋同志的情況是必要的。聽說人大把郭影秋同志關起來，是不是這樣？（同學回答：是。接著陳洪同志介紹了凌晨鬥爭大會的情況，另有計統系吳傳寶介紹他向崔耀光，趙德芳，李宗之調查我校駐軍情況。）

**康生同志聽完發言後又說：**

第一，我到北師大去講這個問題，主要講工作組組長孫友漁利用同學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熱情，利用王運梁這張大字報煽動同學，說有人挑撥工作組，解放軍？人民的關係。他們受蒙蔽，我們要流血，另一部分同學被圍攻，被打擊。我主要講孫友漁利用此事打擊革命同學。同時孫友漁不加調查，不加研究，就污蔑同學說彭真要進行政變是造謠，這是我講的主要問題。

第二，為什麼說到郭影秋同志呢？我是證明這件事不是王運梁無中生有的造謠。北大丁健這件事，北大的學生也知道這件事，人大郭影秋也知道這件事。我對此事怎麼看呢？，根據同志們調查，可能是軍隊需

要住房，因為如果解放軍和軍事機關不曉得這件事，彭×也難調動，所以軍隊可能要住房。至於彭真是否背著解放軍又搞陰謀，這是另外一回事了。至於人大校長郭影秋同志及其他副校長是否與彭真有關係，參加這個陰謀，根據同學們揭發的材料看，據我現在判斷，郭影秋同志不是參加彭真這個陰謀的。

這件事我再重複說一下，希望到人大把我的話告訴同學們，說郭影秋同志對王運梁的大字報及孫友漁怎樣污蔑同學們，他是不是曉得的，當時郭影秋同志不管這件事，他的信也說明瞭這個問題。

郭影秋同志的錯誤在於他領導北師大工作時，沒有看清孫友漁利用這張大字報打擊革命學生，對北師大工作的領導是有缺點的，但是我們現在相信郭影秋？？彭×的陰謀是沒有關係的。同志們懷疑一下，瞭解一下，問一下，這對不對呢？當然也是對的。同學們知道這件事，要問一下郭影秋同志當然好。郭影秋同志也講了，同我講的情況差不多。聽說對郭影秋同志處理的態度有兩種意見。怎麼樣的兩種意見呢？（同學們答：一種是黑幫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要鬥爭，要關起來；另一種意見，要好好瞭解事實真相，再下結論。）這個事情我向同學們講一講，一部分同志要調查一下。

同學們聽了這件事很激動。這種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在北師大的講話主要是講孫友漁的問題，對郭影秋的問題，也不像今天講的這麼清楚，質問郭影秋同志是完全正確的。你們有兩種意見，不能鬧糾紛，更不要在同學之間打架，打架就不好了，意見不一致，可以辯論，調查。

另外一件事，鬥爭會帶上帽子，掛上個牌，同志們一時義憤可能發生，這是同志們在一時不太清楚的一種義憤，當然是不符合黨的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要責備那一部分同學，同志們要原諒他們。但限制他的自由，那不好。不應限制他的自由，有什麼不同的意見可以辯論研究，但不採取這種辦法，這種辦法不符合黨的政策。有些同志說一些問題，叫郭影秋同志交代，當然可以，但不能把他關起來，限制自由，這是不好的，我們不同意。



## 陶魯笳同志講話

人大的革命師生同志們！今天我來看看大家，向大家學習文化革命經驗，下午要派人出席人大會堂市委召開的大會。這個萬人大會，主要是高等院校的代表，這是市委召開的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會上中央負責同志要講話。現在我講幾點意見。

人大這兩天運動是個大好形勢，一天等於二十年，搞得轟轟烈烈，把前一階段冷冷清清的局面向打破了，好得很！（鼓掌）再講一個好得很！（鼓掌）還要再來一個好得很！（熱烈鼓掌）就從那天同學們參加北大的大會起，就把局面打開了，這兩天的情況證明瞭一點，依靠本校革命師生搞文化大革命是完全能搞好的。證明市委昨天的決定完全是正確的，不僅北京市各校工作組一撤出，全國各高等學校工作組也要撤出，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條英明決定。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已經公佈了，工作組在這段工作有什麼缺點，錯誤，新市委歡迎大家放手批評，我們對工作組指示只能是虛心檢討，不能有任何打擊報復。

工作組撤走以後，就由革命師生召開文化革命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文化革命委員會來領導運動，聽說人大還沒選出來，工作組已經停止活動，集中學習，接受大家的批評。怎麼辦？有的學院，如廣播學院搞了臨時革命委員會，北大各系由聶元梓出面組織產生了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大家可以創舉，現在是革命時期，大家都要開動腦筋，我們完全相信同志們能完全地，創造性地搞好。原來班上的領導小組同學們要求重選，可以重選，也應當重選。

第三個意見，昨天同學們要求郭影秋同志回來，根據同志們的要求，新市委請示了中央文革小組，他們也完全同意他回到人大來，他的錯誤由人大的革命師生揭發，批判，鬥爭。昨天晚上的事有的同學問，昨天晚上鬥爭郭影秋好不好？我們市委同意同學們的要求，讓他回來，同學們是革命的行動，革命的熱情是對的。所說你們有兩種意見，不管哪一方面都是為了革命，不同意見互相辯論，不要因為看法不同就分裂，不同的看法可以通過討論取得一致。兩方面同學的目標都要把文化

大革命搞深，搞透。郭影秋是不是黑幫分子？康生同志已經講過了嘛！剛才同學們說有的同學到康生那裡去問過二月兵變的事，康生同志明確回答，郭影秋同志和二月兵變沒有關係，昨天市委認為郭影秋可以回來參加人大革命委員會，接受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我們告訴他，要他接受這個運動的考驗。

聽說同學們開展了對他的鬥爭，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說不對，但康生同志說把他關起來不給自由這不好，讓他參加運動嘛，對運動一他的發言權，不要剝奪他的發言權。（陶念語錄及二十三條中的一段）我相信我們革命師生一定能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我聽說同志們對郭影秋以兩種意見，我們要說，我們要在革命的共同目標下展開辯論，一致起來。我們的同志在這樣複雜的鬥爭中，一定會有不同的意見，這是正常的，不足為奇的。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組織，就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陳伯達同志在北師大說過，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同志當心不要重複工作組的錯誤，就是當群眾的褓姆，不當群眾的學生，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絕不要被選出來就高人一等，一定要甘當小學生，向群眾學習。文革委員會由群眾選舉產生，各種不同意見都要有代表。

郭影秋同志回來參加人大的文化革命運動，暫時不回市委，至於郭影秋的錯誤究竟是什麼性質，不要過早下結論，不要隨便給一個「帽子」，這樣做比較主動，作結論，戴帽子，可以在運動後期，否則會被動的。是不是黑幫，會搞清楚的。你們五千個同學有一萬支眼睛，一萬支耳朵，能視能聞，一定能搞清楚誰是牛鬼蛇神，誰是黑幫，一個也跑不了。剛才我的講話不一定對，可以批評，貼大字報，我是來向大家學習的，是支持大家的。我們是大家的勤務員，召之即來。我們都是新調來的，按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能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地發議論。革命師生自己起來，一定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sup>6</sup>

<sup>6</sup>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一九六六年；北京汽車分公司文革大字報辦公室、北京汽車分公司行政保衛

## 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學的講話（1966.8.4.）

### 江青同志講話

同學們好！我感到北大的革命火焰已經高高地升起來了，要揭穿張承先，張德華之流的挑撥離間的罪行。你們要分清是非，站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立場上團結起來。不要被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相信你們一定能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也一定能取得勝利。

剛才一位工人說他受到同位素的毒害，我向他致以慰問。我也患有惡性腫瘤，受過放射性治療，我知道它的滋味，渾身出汗，現在還四肢無力。同位素我知道是什麼東西，可是這居然害了我們的工人同志，我們一定要清算這筆帳。至於革命幹部子弟，他們有何罪？他們有缺點，有錯誤是難免的，他們上了當，他們是我們的好兒女。張承先，張德華欺騙了他們。你們歡迎不歡迎他們歸隊呀？至於工作隊員，我希望你們對他們要一分为二，不都是壞人，大多數是好人。我收到他們很多信，特別是海軍同志的來信，他們痛哭流涕，說上頭壓著他們，他們沒有辦法。對這樣的同志，就採取不同的態度。至於張承先，張德華死不悔改，堅決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應該鬥倒，鬥臭，批倒批臭。大量事實證明他們不是來革命的，而是來鎮壓你們革命的，到今天還不老實，要他們交待，繼續檢查什麼時候你們不想聽他們那一套了，就讓他們走。

我剛才收到你們的條子，說要成立工人、貧下中農、革幹子弟的什麼協會，我建議凡是工農出身的子弟、革幹子弟，堅決參加你們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不要再搞什麼分裂活動，上人家的當了。我們懷疑又有什麼壞人在叫你們上當了，他們對聶元梓這樣的左派有很多的流言蜚語，進行挑撥離間，難道他們就不會對你們這樣做嗎？

---

文革、北京國棉三廠文革籌委會宣傳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內部資料，僅供參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階級鬥爭是複雜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要識別他們是什麼東西，揪出他們的後臺老闆來。聶元梓同志給我和康生同志一封信，有一要求，我念一念：「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我要求工作組二組和海軍同志留下來繼續擔任北大的保衛工作。因為這些工作，目前我們一時很難接下來，他們全部撤走，會給工作帶來損失。敬禮！聶元梓」

革命的老同學們，教職工們，你們信得過他們嗎？（信得過）好，那我們就建議把他們留下來。我的話講完了。

### 朱德同志講話

北大革命師生員工同志們：

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支援你們的。你們兩月來的革命鬥爭，階級鬥爭，是殘酷的階級鬥爭，也是奪取政權。兩個月來奪取政權的這個反覆，你們勝利了。這是北大師生的光榮勝利。你們奪下了北大的政權，也只有你們才能接收。我們無產階級專政辦事主要靠主體，主體是學生，其他人是為你們服務的。無產階級專政十七年來還沒有無產階級的學校，怎麼辦？頭一次靠我們奪過來，以後怎麼辦好，是你們的事。你們是接班人，接學校的班，今後世代代傳下去。這是你們的事業，要好好辦下去，相信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思想比過去強。以後學校畢業了不同以前的，專做官做皇帝，以後任何事情都得做，軍的事要做，工的、農的事都做，同整個無產階級專政聯繫起來，共同向前進。我希望你們大家更加努力，更加辦好。完了。

### 康生同志講話

幾次到北大來使我得到很大教育。從六月一日到現在，我們看到北大文化大革命雖然受到了挫折，但是，又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兩個月中經過了很殘酷的階級鬥爭。五月廿五日聶元梓等七位同志貼出了革命的大字報，這是個重要的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另外一方面，我們在六月廿日看到一份《北大簡報》，也看到張承先在北大工作二十天來的《工作簡報》，這兩個文件是鎮壓革命的文件，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文

件，殘酷的階級鬥爭，集中表現在一個革命的文件和兩個反革命的文件中，希望同志們好好分析研究。在這些文件中，為什麼說「五·二五」大字報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呢？大字報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如果從姚文元的文章發表算起，即從去年十一月十日算起，到今年六月一日為止整整七個月減十天，整整二百天。二百天的歷史很短，但是當中經過的階級鬥爭是非常激烈的。從姚文元的大字報，（笑聲）錯了，也可以說是大字報吧，從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展開了一系列的階級鬥爭，當中經過中央書記處十幾次革命的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通過了一個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你們黨團員都看過了吧，稱為「五·一六通知」，有許多幹部知道中央指示，因此在二百天的鬥爭中產生北大「五·二五」大字報決不是偶然的。五月廿五日大字報揭露了陸平，彭佩雲黑幫，實際上是揭發了彭真、陸定一這個黑幫。但是，這張大字報貼出後，當時北大在陸平，彭佩雲黑幫的統治下，通過他們的一些親信爪牙，蒙蔽同學們，造謠說大字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七點以前，廣大革命師生歡迎這張大字報；七點後，陸平佈置後加以圍攻。五月廿五日後受到陸平反革命的還擊。

五月廿五日大字報點起了廣大革命師生的革命火火焰，陸平想撲滅。但我們偉大的英明的領袖毛主席六月一日看到了這張大字報，就採取了措施。一日下午四點打電話給我，要我立即廣播這張大字報，並且明天登報。我接到這個通知，感到聶元梓解放了；當時我、楊克明、張恩慈等同志也感到解放了。因為我們也受到壓抑，我們支持聶元梓同志的大字報。由於毛主席英明領導，晚上八點鐘一廣播，整個北京城就爆炸了。中央廣播電臺半小時內收到北大九十多個電話，有的贊成，有的懷疑，有的指責說：「誰叫你們廣播的？」……他們是不瞭解的，以後就清楚了。同學們說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你們常講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主席看到了大字報，看到了從群眾中來的大字報，馬上廣播又回到群眾中去，一夜就點起了文化革命的火焰。（歡呼）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什麼叫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就是要支持革命，贊成革命。

巴黎公社不是馬克思發動的，但是發動後馬克思就熱烈支持，點燃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火焰。現在我們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代，北大「五·二五」大字報，毛主席使它點燃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掀起了全國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什麼性質呢？這是廿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這是北大全體革命師生的一種光榮，也是我們黨在毛主席領導下點起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火焰。這個革命，不僅關係我國的前途命運，而且對世界革命具有重大意義。我們革命師生要珍惜這個光榮，要愛護這個光榮。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堅強地團結起來。

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不僅存在於一般的階級社會，不僅存在於經濟範疇內，在政治範疇內，而且存在於思想範疇內。我們從北大這次鬥爭中，看到了我們經歷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這就是北大的廣大革命師生同張承先，張德華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我上次出了個題目，我問：張承先到底是什麼樣的錯誤？當時有的說路線錯誤，有的說路線性錯誤，有的說右傾思想。今天你們答覆了，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回答的完全正確。

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呢？不單是阻礙革命，不僅僅是個絆腳石，絆腳石躺在那裡不動，繞一個彎就過去了。而張承先不但阻礙革命，而且利用職權和工作組的名義，跑到北大來鎮壓革命。這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是代表資產階級來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他來北大實行什麼？「六·一八」以後，實際實行的是白色恐怖。今晚，西語系揭發有個女同學服安眠藥自殺，這我們一點也不知道。要張承先你回答一下，（張承先答：開始不知道，後來知道了。）你為什麼不報告？（張答：這是個嚴重的錯誤，在這個問題上，我有罪，有罪。）

同學們，你們從這件事得到了什麼教訓？他對陸平、彭佩雲這樣關懷備至，對革命同學自殺了也不彙報，他站在什麼立場上去了。這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他們這些鎮壓群眾的活動，也集中的表現在北大六月廿日的簡報上，這個簡報實際上說：「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還

有一個報告叫什麼《北大廿天工作經驗》，（笑聲）完全站在反革命立場上，把革命群眾說成是反革命。「六·一八」後，根據他的指示，班與班、系與系，不准聯繫，校外更不准聯繫，工人農民支援也不准進入校門。過去陸平不敢實現的事情，他卻實現了。雖然有的同志直接受壓迫，有的受蒙蔽，也是間接受迫害。今晚雷俞平，李仰揚自我檢查講得很好，我十分歡迎。他們有個時期反對聶元梓的大字報，贊成留下工作組，這是要由張承先負責的。是間接受迫害的，同學們應當原諒他們，這樣才能在毛主席教導下，堅強地團結起來，團結得像一個人。

江青同志說得對，對工作組要個分為二，把張承先，張德華同工作組的好同志分別開來，這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張承先，張德華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罪過，必須澈底交待，馬馬虎虎過關是不行的，不僅對群眾是通不過的，對他自己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張承先你要把自己廿日的彙報和簡報好好地看看，把你們鎮壓革命的文件，同聶元梓的革命大字報對照一下，這對他有好處，對我們大家也有好處。說實在的，我在北大的階級鬥爭中深受教育，是活生生的階級教育，是活生生的毛澤東思想教育。雖然我們運動出現曲折，但可以接受教訓，壞事可以變成好事。我感謝同志們給我的教育，你們在工作組撤出後，能立即成立文革籌委會，我代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向全體革命師生和北大文革籌委會同志以革命的祝賀。

但任務是艱巨的，一方面要批判張承先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又要準備選舉文革委員會，然後要鬥陸平黑幫，任務非常艱巨。我有個想法和同志們商量，是不是這樣，由於張承先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對我們的毒害，造成同學中有一點不團結，這一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中文系的選舉經過這麼長時間的醞釀，是可以看出問題的。以後選代表是否會一帆風順呢？還有很多困難，系裡要選代表，系裡問題多的很，要一件一件處理乾淨得半年功夫，半年還不夠。首先要各個系，各方面的同學和老師抱著一種團結對敵的態度，注意到什麼是革命的主要問題，什麼是最迫切需要的解決的問題，消除分歧。我不是說不要原則，當然要有原則，我們的原則是搞文化大革命。一鬥，二批，三改，這是我們

的總綱，在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後，還要進行教育革命。這個任務也很艱巨，很偉大，我們應當在這三大原則下，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個人意見不同，在這個原則下是個比較小的事情，不能因為一個班，一個系的事情，妨礙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不能因為個人意見，妨礙我們高舉廿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旗幟。選舉校系文革要醞釀，允許反覆，但大家要儘快完成這個任務，去鬥黑幫。張承先不鬥黑幫，自己當了家，還不鬥黑幫，這就不對了。在革命原則下團結起來，在毛澤東思想原則下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我們的一鬥，二批，三改進行到底。

我想具體答覆幾個問題。

一個同學遞了一個條子，上面沒有署名，不贊成我們在會上質問張承先，條子上問我們：「你們是什麼人？有頭腦沒有？逼供信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還說什麼這有損於革命事業，叫我們制止，再不制止就有意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會脫離群眾。（大家很氣憤，要把他揪出來）他還要我談談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很簡單，我堅決反對這種說法 and 做法。（鼓掌）張承先這樣大的罪過，這樣鎮壓革命群眾，我們在這裡問他一下都不行嗎？為什麼他們把人逼死了，你們不說一句話，而我們一問，就叫逼呢？

（一個女同志說：「有膽量的站出來！」）

（江青同志說：「有膽量的站出來，我們不怕，上臺講！」）

叫我說完。我們問他，他應不應該回答，這叫不叫逼供？（不叫！）還有一個信，我們就是不相信他。上次檢查，你們不通過，這次回答也通不過，你們不相信，這個逼供信扯不上嘛！他希望我們信他，我們可就是不信。寫這個條子的有兩種人，一種情況是思想糊塗，一種是不贊成我們，想保護張承先。你思想糊塗，不要說我們糊塗，上來講一講。另外有一種，是有意的保護張承先，也允許嘛，這麼多人不容許有一個保留意見？這是教員，是反面教員。世界上是沒有青一色的，打麻將青一色不是和了嗎？青一色也不都是一樣的，有一萬，二萬，三萬，世界沒有百分之百一致的東西，總是一分為二的，他的意見是片面



的，錯誤的，甚至是反動的，當然要反對；但有一點好處，當反面教員。我一念條子你們就興奮起來，這不是好事嗎？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鈞，北師大的黃藥眠也都留在那裡吃飯，睡覺，拿錢，這是花錢請的反面教員。那個同學也許糊裡糊塗，上來講講嘛！觀點不糊塗，也可以上來給我們上上課。今天不願講，明天講也可以。

另一張條子問，我在師大說：師大工作組組長孫友漁，利用一張大字報鎮壓革命群眾，革命左派。六月廿日有個同學叫王運良，貼了張大字報，聽說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駐軍，就問郭影秋知道不知道，題為《郭影秋是什麼人？》只有兩行字。孫友漁立即作報告，五千字中有四千字說他是挑撥人民和解放軍的關係，這樣要流血，對這個同學打擊。結果挑動同學打擊同學，打擊左派，甚至流血。從這個問題上說，人大，北大要駐軍是千真萬確的。北大團委丁監寫了一個材料，郭影秋也是知道的。我不是說二月兵變也是千真萬確的。至於駐兵的目的，是要調查，調查的結果，鄧小平同志在人大說軍委和華北局都知道。彭真是否有陰謀，不一定。一，彭真要搞政變，中央文件上有。彭真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就是要搞政變的。這種修正主義分子的反革命分子，時機成熟就要搞政變，要搞資產階級專政。什麼時候搞，我不知道，只說時機成熟，沒說今年二月搞。二，彭真是否真的抓軍隊，搞政變不抓軍權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和羅瑞卿勾結，就是要通過羅瑞卿抓軍隊。

因此，我們答覆這個問題：（1）彭真是否要搞政變？要。什麼時候？還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軍權？要。已經和羅瑞卿勾結起來。在北大，人大是否要有駐軍？軍委、軍知道，現在還沒有調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變。孫友漁利用這件事鎮壓革命。同學們懷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為什麼孫友漁要拿這個來圍攻革命同學呢？這件事實有，我沒有說二月兵變，看來彭真二月兵變還沒有準備好。

再有，同志們問我，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是不是要成立一個組織？一，同學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學校在文教系統貫徹路線是對的，總是有階級路線的。過去陸平、彭佩雲恰恰是沒有階級路

線。我瞭解同學們的心情，過去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在學校裡受陸平黑幫的打擊，迫害，現在明白了，要團結起來，不再受打擊迫害，這種心情是完全對的。我完全理解。二，同學們提這個問題是問革命左派在學校裡如何組織階級隊伍。同學們對在學校裡如何組織階級隊伍是不那麼清楚。學校裡沒有階級組織呢？有，共產黨，共青團就是。問題是過去在前北京市委的統治下，黨，團組織存在許多問題，甚至很嚴重。有的黨團組織在文化革命中不起作用。北大黨委癱瘓了。但不能因為這樣就對黨團組織失去信心，就要另建階級組織。我們應當積極起來徹底改造我們的黨團組織，這是我們的光榮任務。至於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是否另成立階級組織，我同意江青同志的看法，階級組織要通過黨團組織來體現，不要另搞一套，因為這樣很可能使我們孤立起來，使團結受到損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者，我建議你們學習一下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第一，「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即真正的共產黨員。也就是要成為一個很好地學習，體會毛澤東思想的黨，團員，好同志。

第二，「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離開了絕大多數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

第三，「他們必須是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你們就是要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同陸平，彭佩雲黑幫進行鬥爭。左派。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要時刻提高警惕。這方面你們有個危險，時刻注意不要脫離群眾。今天毛主席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中，再三強調不要脫離群眾。我希望同志們能團結絕大多數人。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今天李仰揚有一句話我很歡迎。要真正站在群眾之中，不要站在群眾之外。我非常贊成這

句話。現在的任務不是成立什麼「協會」，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這是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我想你們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子弟會懂得這個道理的，你們年輕人，比我們年老人覺悟得要快。

最後回答一個問題。

有人說現在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書店買不到毛選怎麼辦？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現在我們已作出這樣一個決定，停止其他一切書刊的印刷，把紙張，印刷力解放出來，集中力量印毛選，從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年底共印三千五百萬套。還要告訴同志們，我們為了適應廣大工農兵和青年學習毛主席著作，已把豎板改成橫板了。第二，是改成簡體字了，第三，過去四卷原價是三元二角五分，現在減為二元。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滿足大家的要求。

同志們，今天我們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是成千上萬的工農兵，勞動群眾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時代。這是一百多年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件大事。成千上萬的工農兵勞動群眾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能保證我們黨政機關不變顏色，保證我們國家不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同學們要知道，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正上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勝利。（群眾歡呼！）

還有兩個條子，一個從湖南來的，一個從四川來的。請到國務院接待室，我們願意和他們談話。

## 中央首長在來自全國各地革命師生歡迎大會上的講話 (1966.8.16.)

【時間：八月十六日上午，地點：北京工人體育場。國家領導人林彪、周恩來、陶鑄、劉少奇、李雪峰和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主要成員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同志在北京體育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師生。

在歡迎大會上，陳伯達、李雪峰、康生、姚文元同志作了重要講話。】

### 江青同志講話

革命的同志們好！我向你們致以崇高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我受毛主席的委託，問你們好！

現在請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給同志們講話。（陳伯達同志的講話已在報刊上發表，詳見「紅旗」雜誌）

江青同志：小組請李雪峰同志講話。

### 李雪峰同志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歡迎你們！歡迎你們在北京各學校進行參觀，進行訪問。同時，他們也將和你們一起學習，交流經驗。同學們來了以後，我們照顧得不夠，我們的招待工作搞得不太好，請同志們原諒。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發表後，我們全國各地，華北各地，北京各地，各學校，各單位，各機關都在學習，都在根據各地情況來應用中央這個決定，執行這個決定。

我們這次來看同志們，如果你們需要什麼，你們可以提意見。我們可以做組織工作，組織交通，組織車輛，按照你們的意願送你們回去。如果同學們願意在北京暫時停留一個時候，還要進行參觀，訪問，我們積極幫助。

向同志們致革命敬禮！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江青同志：現在請姚文元同志講話好不好？（革命師生齊答：好！）姚文元同志你們知道嗎？就是評《海瑞罷官》的，知道吧！（革命師生齊答：知道！）

## 姚文元同志講話

同志們！革命同學們！我們向大家問好！我們向大家致無產階級的戰鬥的革命的敬禮！我們今天冒著雨在這裡開會，但是我們的心是火熱的！今天在這裡開會就是一個象徵，也象徵著革命的無產階級青年一代永遠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大自然下雨，我們不怕，颶風，我們不怕，階級鬥爭的風浪，我們同樣也不怕。毛主席說過，我們青年一代要經風雨，見世面，我們不能在溫室裡成長，只有在革命鬥爭當中，在暴風雨中成長。我們到這兒來就是不做溫室裡的花朵，而是暴風雨中的海燕。陳伯達同志剛才的講話很好，希望大家很好地學習中央的「十六條」決定；希望大家很好地學習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同志們，這兩個文件就是毛主席親自主持下制定的，我們一定要很好地學習。「大海航行靠舵手」這句話，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在任何時候，我們也要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這兩個文件就是毛主席的聲音，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的學習，而且貫徹到今後的行動當中去。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要學習「十六條」，學習公報，貫徹「十六條」，貫徹公報。在公報的最後一段「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這段話說出了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公報號召我們要很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像林彪同志講的那樣，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學用結合，立竿見影。一定要根據公報精神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好好學習「十六條」。同志們，我們能不能做到？（齊聲回答：能！）對！我們一定要對照文件的精神去做，我們來自各個地方，來自五湖四海，都是為著革命到這兒來的，真正革命的同志，革命的戰士，總會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走在一起，團結在一起的。最後，希望大家注意身體，注意健康，因為鬥爭的道路還很長，我們還要繼續鬥爭。讀毛主席的書，要讀一輩子；搞階級鬥爭，要搞一輩子；幹革命要幹一輩子。堅決走到底，跟著毛主席走到共產主義的澈底勝利！

江青同志：請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康生同志講話。

##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體成員向同志們問好！現在，我把文革小組的成員一個一個地向同志們介紹一下，贊成不贊成？（齊答：贊成！）可以不可以？（齊答：可以！）那好，接受你們的意見。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王任重同志。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

常寫文章的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關鋒同志。

你們在報紙上常見他的名字，常寫文章的戚本禹同志。

常寫反修文章，寫九評的參加者王力同志。

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紅旗」雜誌副編輯穆欣同志。

寫批判吳晗《海瑞罷官》的姚文元同志。

同志們，同學們，剛才我們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作了一個很好的講話。同志們要很好地深思，要好好地學習。你們要走光明的道路，來到光明的首都，來到毛主席所在的北京，來交流經驗，來互相傳播革命道理。我們對你們這種不遠千里來到首都的革命行動，表示熱烈地歡迎！同學們，你們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你們這一次來也是一次極偉大的鍛鍊。同志們，同學們，你們能夠在大風大浪中鍛鍊自己。陳伯達同志已經講了，要我們好好學習「十六條」。這「十六條」決定是毛主席親自主持寫成的，這「十六條」是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創舉。它反映了毛澤東思想，是在毛澤東思想紅旗下產生的具有歷史運用的偉大文件。在報紙上你們看到了在毛主席主持下的一中全會，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全會通過了一個公報，現在它勝利地完成了歷史任務。這個公報談到了國際問題。……是馬列主義的總結。它是全面地，深刻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保衛馬列主義的，毛澤東同志把馬列

主義創造性地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可靠保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南。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我們就能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推向前進。這個公報，這個「十六條」，對我們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都有深遠的偉大的歷史意義。現在同志們要好好學習「十六條」學習中央全會公報。同志們要不要學習「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反覆學習「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熟悉「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掌握「十六條」？（回答：要！）要不要運用到各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來？（要！）同學們每條都要仔細地學習一下。在決定中，特別是第四條，要好好學習。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革命不能包辦代替。現在你們學習得還不夠，運用得還不夠，不夠熟悉，不夠全面，以後要好好地反覆學習，好好瞭解，好好運用。「十六條」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強大思想武器。同志們，現在中央已有了公報，能不能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要靠同志們，同學們，要靠全體革命師生，你們贊成不贊成這個話？（贊成！）「十六條」決定要好好學習，好好運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圍繞一鬥，二批，三改，大家要好好掌握。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下，一定能進行到底！謝謝同志們對我們的希望，我再一次向同志們致敬，感謝你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萬歲！萬歲！萬萬歲！

## 康生對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鬥爭林楓會的指示 (1966.8.19.)

你要告訴同志們，把你們的情況作了彙報。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

命熱情。要把林楓等人的問題挖深挖透，才能解決問題。按「十六條」辦事，應該文鬥，不要武鬥。當然戴帽子、掛牌子也是不稱武鬥。戴帽子、掛牌子這種做法形式上轟轟烈烈，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搞好文化大革命，必須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sup>7</sup>

## 康生接見部分來京串聯同志時的講話（1966.9.8.）

康老：來了好久了？（笑、眾笑）沒有很快見大家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忙，不能很快地見你們，一天有一千多封信，老拆信就拆不完。另外到了的這些同志因為地方未定，想找也找不到。山東大學的同志曾和王力、關鋒談過一次，在座的同志是否見過了一些？（眾答：沒有）情況是知道一些，青島的問題、山東大學的問題、山東師範學院的問題，咱們商量一下子吧。大家最好到六點，最多六點十分、六點半，我得接見，接見索馬里代表團。一個單位講一刻鐘，主要是聽聽你們的意見，見見同志們。

山東的學校我不大知道……聽聽同志們的意見吧！看哪個單位的先說吧！

山東海洋學院的學生：請康老轉達我們山東海洋學院全體同志對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問候。（群眾鼓掌，康老鼓掌）

康老：咱們熟悉一下，你叫什麼名字？（答：略）什麼系？（答：略）幾年級？

海洋學院同學：五年級了。

康老：快畢業了。

海洋學院同學：階級鬥爭這門課我們還沒有畢業。

<sup>7</sup>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1）》，一九六六年。



康老：這我也沒畢業。（眾笑）

當山東師範學院講到工作組未檢查澈底就撤走了時，康老插話道：「中央不是有一條不檢查澈底就不讓走嗎？」師範學院：「省委決定要他們走的，我們又把他們要回來了。」

各校彙報完了之後，康老講話：

我歡迎同志們到北京來交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並通過你們向山東大學、山東海洋學院、山東師範學院、萊蕪二中的全體同志們，向他們也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敬禮。你們來到北京，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這個文化大革命深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深入到人們靈魂的階段。當然，交流經驗是很必要的，我們來問問同志們到北京來學了什麼經驗，經驗我有一點，可以介紹一下。

同志們看到北大的文化大革命，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從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樞等七同志的一張大字報揭露北京市委大學部宋碩、北大校長陸平、黨委副書記彭佩雲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起。這張大字報不僅揭開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點燃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且點起了全國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火種。但是大字報貼出來，從五月二十五日到六月一日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內，受到彭真、宋碩、陸平、彭佩雲黑幫的打擊鎮壓。是誰把這個火種燃起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呢？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六月一日下午毛主席通知說：「北大的大字報是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必須立刻廣播，立即見報。」下午接到主席指示後，八點半就廣播了，二號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廣播後，在全國大學和一部分中學都動起來了，他們一方面聲援北大，一方面在本校發動革命。毛主席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這個大革命對防修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對全中國、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偉大的貢獻。這個運動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深入到社會及靈魂，它不可能直線發展，必然發生曲折，遭到阻力。所以運動一開始有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種種方法打擊左派，壓制運動。也有人害怕運動，想盡

種種方法限制運動，派工作組就是這樣一個方法。工作組，主席講全國百分之九十五都有錯誤，領導決定派工作組是一個錯誤，這是一個路線的錯誤。「十六條」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工作組在院校中包辦代替，阻礙群眾的積極性。有的工作組壓制群眾，製造白色恐怖。對工作組要分析，大致是：一種，它自己還想革命，但方向錯了；有的完全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在學校中充當了新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工作組內部也要分析一下，不是所有的工作組都是不好的，例如，有些解放軍參加了工作組。有的是要去革命的，但在錯誤路線下，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大部分則是倉促應戰，對文化大革命不瞭解，對學校不瞭解，對鬥、批、改更是不懂，鬥當權派不瞭解，批這幫人更不成。如批翦伯贊、馮友蘭，工作組沒有去研究這些東西，無從批判。將來還有改，改革教學方法等等他們更是不懂。無論鬥、批、改，他們都不行。只有依靠廣大工農兵，廣大的群眾，他們懂得怎樣改革教學制度，他們有親身體會。只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才能把運動搞徹底。就北京來說，已經從學校的鬥、批、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它已衝破本學校、本地方的限制，發展到全國。就北京的紅衛兵來說，是超過了「十六條」規定的鬥、批、改，多少年不能解決的問題，在這個運動中解決了。社會上存在著許多不能解決的事，他們都辦到了。可見這個運動對社會主義革命，對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都有深刻的意義。

自從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由主席決定廣播到全國，工作組由主席宣佈撤銷，並指出這是方向的錯誤，運動又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你們參加過「八·一八」的大會，有的同志參加了「八·卅一」大會，你就知道主席怎樣地接近群眾，怎樣地關心群眾，他不愧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群眾熱烈鼓掌）

你們從青島來的同志，特別要看到北京的經驗，北京各校工作組鎮壓革命這件事你們都知道，北大、清華、師大，你們都見到了。山東海洋學院的同學們這是件什麼事？這是階級鬥爭，這是階級社會中的反動思潮！有工作組發生這種事，沒有工作組也發生這種事。這不是哪一個

人的問題，是一個階級的問題。你們從蘭州、哈爾濱、青島的事件中，如果從階級鬥爭，特別是從深入靈魂的角度去理解就不以為偶然了。這種事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要有，階級鬥爭或高或低，或隱或現，總是有的。正如主席教導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同志們從這個運動中就會明白，什麼叫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北京的工作也有許多缺點。有一點是值得學習的，就是不管哪一個學校都沒有去煽動工人、農民，利用工農壓制學生運動。一般說來，北京的工農，學生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團結的，當然個別的也有，人大有兩派鬥爭，有一派去公社找了六百農民，他們受了欺騙。郭影秋在社教時表現還好，保郭影秋的就將社員請來了。這個問題一經發現，我們就制止了，說服了農民，教育了學生。在外省這個問題就是比較值得注意的問題。西安、蘭州、青島、哈爾濱都不是偶然的。《人民日報》八月廿二日發表的社論中，號召工農積極支持學生運動。各地黨委有個很大的錯誤，就是煽動工農鬥學生，本來北京這一現象有，即煽動這一派學生去反對那一派，外省還有這一學校鬥那一學校的。現在煽動工農反對學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是破壞文化大革命。革命師生應向工農學習，團結廣大工農社員。現在你們在北京學習，回去要注意宣傳，凡是蒙蔽工人、農民，利用他們去鎮壓學生，這是完全錯誤的，不但我們革命師生要學習工農，也歡迎他們支持文化大革命。

另外，他們也要學習。昨天《人民日報》有個社論《抓革命，促生產》，革命師生應相信工農，他們在工廠、農村會按照自己的特點去革命，不要包辦代替，他們的生產一分鐘也不能停。「十六條」說抓革命，促生產，不能破壞生產。有的說停止生產也不要緊，鬥學生加工分，這是極大的錯誤。當前農村面臨三秋，今年各地生產是一個豐收年，但能不能搞到人民手上，這就不但是農民的任務，工人、黨政機關都要支援。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毛主席制定的方針，革命就是為了解放人民思想，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使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進一步發展。當前中央決定要按照農村的生產計畫，社教計畫進行，不要干涉他們，還要幫助他們秋收。北京很快就要這樣做，紅衛兵參加勞動

也好，向他們學習也好，抓革命促生產也好。中央有這個社論，也下達了指示，還有一個報告。黑幫分子有個說法，文化大革命要破壞生產，他們竭力想破壞生產，給文化大革命抹黑，我們決不能讓他們這個陰謀得逞。我們要和他們相反，抓革命促生產，使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更加按照毛澤東思想向前發展，這在當前很重要。

北京的這個經驗對山東各地，特別是青島，要把這個經驗向革命師生，向工人老大哥講，這一點是重要的。

第三，你們要一道學習林彪同志八月卅一號大會上的講話，文化大革命是觸及靈魂的革命，要文鬥不要武鬥。文化革命不是武化革命，是腦子裡的革命。我贊成北京的紅衛兵去破四舊，但首先要清我們（包括我在內）腦子裡的四舊，你們腦子裡也有四舊吧！我看有，要不怎麼要學習毛主席著作呢？清除頭腦子裡的四舊，你們給他戴上一個高帽子沒有用。上海同濟大學一個校長被戴上一個西瓜皮去勞動，天熱，他戴上這個高帽子很舒服，叫他摘下去他還不幹哩。有些地方傳我一句話，說我贊成戴高帽子，掛黑牌，這是從高級黨校傳出來的，是個誤會。八月二十日高級黨校鬥林楓，他們給他戴高帽子，身上貼了標語，給我彙報時，我覺得這個辦法在思想上解決不了問題，又不能給群眾潑冷水，就說群眾出於義憤，給他戴了一個帽子，掛了一塊黑牌子遊了一下街，也沒有什麼，還是要按「十六條」辦事好。當然，遊街、戴高帽子，只不過帽子高一點嘛！沒有什麼，但也不算文鬥。黨校只給傳達了前一句，後一句漏掉了，他們從電話中傳了出去，貼了大字報，就給傳錯了。戴高帽子不解決問題，林彪同志講，這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你們要學習林總這一指示。

當前，你們山東大學、山東海洋學院的回去還會遇到很多困難怎麼辦？你們知道革命不會沒有阻力。革命就是件難事。你們讀了十一中全會公報沒有。公報中最後一段說：（見「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一節，略）這方面困難都會克服。真正的左派只有在克服各種困難中堅定起來，成長起來；同時應有充分準備。舊社會說，知難而退！共產黨是遇難而進。困難是進步的開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遇難而進，有了

困難要去克服。同志們，不要被困難嚇住。也不要為困難而急躁。矛盾不斷產生，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矛盾還會出現，同志們要有信心。這個信心就是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導下，廣大群眾、工農兵、革命師生團結在黨中央毛主席周圍，一定能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保證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我們不怕困難，我們有偉大毛主席的教導和指示，勞動人民開闢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萊蕪同志（指萊蕪二中）提出在農村買毛選很困難，請我幫助解決。你們把數字給我，我讓文化部給你們辦。今後我們要印出，今秋明年三千萬套，今年出一千五百萬套，要保證很快。運輸，收費要賤，橫排已開始印了，價錢比以前減低了，同志們的要求基本保證。

時間已經非走不行了，我們以後到山東再見面。<sup>8</sup>

## 康生給江蘇鎮江農機學院紅衛兵、赤衛隊的覆電 (1966.9.9.)

江蘇鎮江農機學院紅衛兵、赤衛隊：

電悉。我是不贊成戴高帽子、掛牌子、遊街等鬥爭方法。我說過，這種作法，雖然不是武鬥，但也不是文鬥。它不能解決觸及人們靈魂鬥爭的問題。我們應當不折不扣地執行「十六條」，要文鬥，不要武鬥。外面有人歪曲我的原話以訛傳訛，望你們不要輕信謠言。

康生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

<sup>8</sup> 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總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中央及有關負責同志講話（選編）》（第一集），一九六六年十月。

## 康生、謝富治、楊成武與北京航空學院「紅旗」代表談話（1966.10.6.）

康生：（看了我們的《談兩條路線的鬥爭》後）你們這個《談兩條路線的鬥爭》寫得很好嘛！你們批趙如璋批得很好嘛！我們中央文革小組都支援你們。（我們請康生同志給我們的文章批示）我再很好地看一遍。

謝富治：譚力夫的講話是修正主義的。你們在科委和趙如璋鬥爭二十幾天，做得對！幹得好！我早就公開支持你們少數派的鬥爭了！（我們說：我們在鬥爭最艱苦的時候要防右，而在鬥爭順利的時候要防「左」，注意政策和策略。謝富治副總理立即親切地和我們握手說）有水準！（並指示我們）要注意爭取大多數人。（我們說：宣傳毛澤東思想就是要大喊大叫。謝富治副總理親切地說）好！

楊成武：（我們說：我們正在批判譚力夫講話）批得對，應該批！（我們說：我們開會就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說：對！對！今天就是支持你們的！你看，哪次都沒有這麼多，都來了！（指周總理、江青、陳伯達、陶鑄、康生等同志都出席了昨天的大會）（我們說：我們「紅旗」在北京是被罵臭了的。）

楊成武：不是臭，而是香，他們說你們臭，領導說香！（說到關於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時）

楊成武：中學和大學不同，要多多的誘導，西城區糾察隊精神可嘉，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毛澤東思想是真理，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只要你們堅持按「十六條」辦事，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就一定能把他們團結起來！<sup>9</sup>

<sup>9</sup>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第三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彙編第二集（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 康生對新疆少數派「紅二司」戰士的講話（1966.11.15.）

【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康生同志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和勞動黨建黨二十五周年慶祝活動後回北京途經烏魯木齊，於十一月十五日夜在賓館接見了新疆紅二司二百餘名革命戰士。十一時五十分（烏魯木齊時間）當康生同志進入大廳時群情激動，無限歡欣。數名維、哈、漢紅衛兵給康生同志戴上了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紅二司）的紅衛兵袖章，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誓死捍衛毛主席！」「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誰不站在毛主席一邊就砸爛他的狗頭！」「向自治區黨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被接見的有新疆大學星火燎原戰鬥團、革命造反團、東方紅戰鬥團和外校、外地部分革命小將。接見時在座的還有伍修權等同志。開始時，紅衛兵戰士給康老和伍修權同志戴上了「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袖章，大家熱烈鼓掌，不斷地高呼：「毛主席萬歲！」之後，大家請康老坐下講。】

康老說：

我謝謝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們今天到飛機場去歡迎我。（大家鼓掌歡迎康生同志坐下講，康生同志不願坐下）坐下講，不大方便。要講話就不坐，我坐著就講不出話來。（鼓掌，眾喊：「一定要康老坐下！」鼓掌）康老坐下又站起來說：坐下，後面的就看不見了，坐不坐由我吧！坐下就講不了話了。兩個半鐘頭以前，我寫了封信。（讀信）

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志們：

謝謝你們給我的關於「王恩茂同志的檢查」。對這個文件，因為今晚招待外賓，來不及閱讀，我準備帶回北京仔細地看看。

你們很想見見我，我也很想同你們談談新疆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但我是同好幾個兄弟黨參加阿爾巴尼亞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同機來此，他們有事急於回去，我也要很快的回到北京向毛主席彙報阿黨五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因此，我無法在此停留，明天（十六日）早上就必須離此返京。這樣我雖然很想找你們談談，但是時間來不及了，請你們原諒。將來你們到北京來時我們再談吧！

林彪同志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宣告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宣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破產。」希望你們緊緊掌握著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澈底地批判錯誤路線，把這場由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旅途匆匆，恕不多寫，以後再談。

敬禮！

康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十二時

現在交給你們（康老把信往桌子上一放，鼓掌！）。

既然同志們都來了，我就從床上起來跟大家見面，（笑，眾也笑）看來要談話，不談不像話了。談什麼呢？你們談呢？還是我談呢？（請康老先談）

我先講。你們看過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沒有？（同學：看過！）裡面不是講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你們那裡不來，我怎麼去？（眾笑）毛主席教導我們：先當群眾的學生，再當群眾的先生。你們看，我還是先當群眾的學生好，還是先當群眾的先生好？（熱烈鼓掌）

我是十月二十六日離開北京的。離開北京的前一天，中國人民大學的紅衛兵寫給我一封信，提了三個意見：1、要到機場歡送我；2、要叫我到國際方面去串聯；（眾笑）3、他們說最好他們也派幾個代表跟我一塊去阿爾巴尼亞去串聯。第一、我謝謝他們。因為有幾個代表團同去，就不必歡送了，就不必客氣了。第二、還是謝謝。我確實串聯了，國際串聯也是串聯嘛！（笑）串聯的情況，你們在報紙上也看到了。通過他們的大會，通過我們的賀詞，通過在我黨二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宣傳了毛澤東思想。



我們到了亞得利亞海邊一個叫里拉的城市，到了××（地名），赫魯曉夫篡改（漏記）侵犯阿爾巴尼亞主權，背信棄義撕毀條約的這麼一個地方，貝拉特，看到了我們幫助他們建立的紡織廠。這個紡織廠他們命名的時候，叫做「毛澤東紡織廠」（熱烈鼓掌，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然後我就到了菲裡城，我們合作建立的氮肥廠、熱電廠，以後又到了法羅那，我們幫助阿爾巴尼亞建立的化工廠、電廠。所有這些廠，我們都串聯了！（笑）到了三十幾個黨，都串聯了。

這一次到阿爾巴尼亞，全民歡迎中國的代表團，為什麼呢？最重要的，我們這個代表團……。你們從報紙上看到了，是毛主席的賀電。這個賀電，使全體人民都沸騰起來了！（熱烈鼓掌，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通過這個賀電，不但對阿爾巴尼亞，對她的黨、對她的人民，對黨員，而且把參加大會的，凡是祝賀阿爾巴尼亞大會的兄弟黨都動員起來了，他們認為毛主席的賀電有國際意義。

參加這個大會，通過這個大會，一方面我們是如實地宣傳了毛澤東思想，宣傳了毛澤東思想的作用。這些你們從報紙上看到了。

我們的賀詞中，我們就把十一中全會的公報的第三部分，就是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部分全部地都加上了。因為我們又不強加於人，但是我們講了，我們黨對毛澤東思想是怎麼樣的看法，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用科學的語言說，什麼叫毛澤東思想呢？毛澤東思想就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暴風雨般地長時間地熱烈鼓掌，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這一點我們可以敞開講了，在大會也講，群眾會上也講，兄弟黨會議上我們也講。

對於這一點呢，我們利用毛主席的賀電的力量對毛澤東思想進行宣傳。這是第一點。第二，我們利用這個大會宣傳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三，也宣傳了你們紅衛兵！（熱烈鼓掌）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同志，恩維爾·霍查同志，在我走

的頭一天晚上，宴會的時候，他講了兩句話很有意思，我現在給你們介紹一下。他說，開始聽說文化大革命嘛，學校裡不是放假嗎？原來說是放半年假就差差不多了，現在又說到……到什麼時候啊？（同學：到明年秋天！）開始想不通，中國人這個事情，學生放下書不讀，搞革命搞一年，這不太多了嗎？（大笑）以後就想通了。想通了講了兩句話：「革命搞一年，勝讀十年書。」（熱烈鼓掌，高呼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我看這句話是對的。現在這個學校是個大學校，還有比這學校更大的嗎？誰的校長呢？毛主席的校長！（熱烈鼓掌，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有的外國黨講：「毛澤東是當代的列寧。」（熱烈鼓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說：「贊成還是反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分水嶺！」（熱烈鼓掌，高呼口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總之一句話，毛主席的思想在國際上的影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世界的影響，我們這個紅衛兵對世界的影響，在我們國內，雖然想到了，但是體會不了那麼深，我現在就體會得比較深了。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不但在你們的一生中，而且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在世界的革命運動中間，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載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史冊上面去！（熱烈鼓掌，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當然，反對毛主席，贊成毛主席的人都有。對於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有兩種人。在大會上，有一種說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的紅衛兵糟得很。是什麼人呢？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牛鬼蛇神，或者表面上是「左」的，實際上是修正主義的，走中間路線的人。（熱烈鼓掌）

有的人在會議上提到毛主席的思想，提到我們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人站起來，他不好不站起來，別人都站起來了。（大笑）雙手放在胸前（做姿勢。笑）；有一種人，他站起來又坐下了（做姿勢。笑）；還有一種人，聽到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就溜掉了。（大笑。）

反對毛澤東思想，在國內有，在國際也有。如果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反動派、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他們也贊成毛主席的思想那就糟了糕了！（大笑）正因為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才說明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毛主席不是常講：敵人反對我們，那就好了，要是敵人也贊成我們，那就說明我們錯了。（熱烈鼓掌）

廣大人民，全世界的馬列主義者，對毛主席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是讚揚的。「好得很」，「糟得很」這是階級鬥爭！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通過文化大革命，你們可以懂得，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你們回去想一想。

我這是向你們彙報一下，看我申聯的怎麼樣。（笑）

我曾經根據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講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大概你們從《人民日報》社論、「紅旗」雜誌社論裡就知道了。當面測驗一下，好不好？（笑）為什麼要進行文化大革命？為什麼必要？為什麼要進行？毛主席那麼樣的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反覆接見你們，這是為什麼？（星火燎原紅衛兵宋衛東激動地回答：就是為了反對修正主義，防止修正主義；為了使我們黨和國家千秋萬代不變顏色。我們要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同志講得對，（有人說：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是啊，都對的，但還差一點，應當更進一步。

你們在大學，中學裡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總是學了一些，那麼，總是曉得，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也就是林彪同志所講的，提倡一個「公」字。因為把地主的土地，官僚資本家的工廠、企業、銀行沒收了；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經過這次文化大革命，定息恐怕就要掃除掉了。（同學：××地方定息已經取消了！）那是你們幹的，中央雖然還沒有明文規定，看來經過你們這麼一掃啊……。（笑）中央沒有這個規定，但有這個意思。（笑）

總而言之句話，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新的經濟基礎，那麼一種新

的經濟基礎就必然要求新的上層建築為這個新的經濟基礎服務。

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它要求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為這個基礎服務。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就要求這個上層建築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社會主義社會，這新的經濟基礎，是不是設想一下，如果還是舊的上層建築，能不能為這個新的經濟基礎服務？（同學：不能！）那就必然要求新的上層建築為這個新的經濟基礎服務。如果是新的經濟基礎，還是舊的上層建築，舊的上層建築必然反轉過來影響新的基礎。如果上層建築是資本主義的、是舊的，必然使新的基礎不鞏固，那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就不鞏固。所以上層建築是影響經濟基礎的。

我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把舊的上層建築——四舊囉！——去掉，那麼我們新的經濟基礎就不能鞏固，會出現修正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底，使新的上層建築為新的經濟基礎服務。這樣就會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修正主義復辟，保證社會主義不變顏色。

你們講得很對的，但需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你們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總結經驗，實際工作的經驗，不斷提高你們的認識。我們相信，通過這次文化大革命，必然會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必然在中國會大大地發展！（熱烈鼓掌）

我給外國的兄弟黨講，革命的基本問題，是什麼問題呢？政權問題。這一點是大家知道的。那我們沒有取得政權時，中國人民跟隨毛主席，跟隨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武裝鬥爭中，取得了勝利，這一點大家都清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一個人，僅僅是稱讚階級鬥爭，還不能是一個徹底的馬列主義者，還必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在取得政權之前，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但是，已經取得政權之後，就是已經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過去大家都是這樣講，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後，無非就是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就好似說，已經取得政權以後，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但實際上看來，在取得政權之前，革命的基本問題還是政權問題。沒有取得政權是奪取政權，建立無

產階級專政；取得政權之後，是鞏固政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

如果失掉了政權就失掉了一切。如果政權被修正主義篡奪，如果資本主義復辟，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澈底，那麼共產主義社會就不會過渡過去。這個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這個功勞應歸功於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熱烈鼓掌，呼口號：毛主席萬歲！……）

毛主席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加以發展了。你們看了十一中全會公報沒有，開始的時候，毛主席根據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這個總的綱，通過總路線、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勝利。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是觸及到人們靈魂的革命。因此我就想到，你們除了串聯啊……還要在理論上，在思想上解決問題。首先是想到什麼東西呢？到底社會主義社會中有沒有階級？在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意見是不完全一致。我們國內幹部的意見也不完全一致。在你們看來，你們講實話，到底有沒有階級？十七年來，有沒有階級？（眾：有）表現在哪兒？（眾：到處都存在，政治、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那我就反駁你這個論點了。

（笑）列寧劃階級是怎麼說的？（眾：是按經濟地位劃的）那麼根據這個，咱們不是就沒有階級了嗎？（眾：毛主席發展了）怎麼發展的？

（眾回答不一）這個問題在你們思想中考慮一下。廿年前，我們開了一次土地會議，成立了一個土地法。在我們這個土地法裡，按列寧定義劃分了階級，什麼叫地主、什麼叫富農、什麼叫中農、什麼叫貧農、什麼叫雇農。這個話是對的，我不是說列寧的不對，但是要進一步。在這個土地法裡面，地主如果是被沒收了土地，參加勞動五年，就可以改變成分。如果一個地主，他也參加了勞動了，表面上也不反對社會主義了，那麼是不是這樣經過五年，就改變成分了！你相信不相信？（眾：不相信！）如果你現在到農村去向貧下中農講講，說那個地主勞動了不止五年了，已經二十年了，可以改變成分了，你看行得通行不通？（眾：行

不通！)行不通，大家講得有道理的。毛主席對於這個階級問題是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說，看一個階級，不僅是從經濟範疇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生產品的分配這方面去看，而且還要從政治範疇，思想範疇來看。對於這個問題，必須看到兩個方面。從這個方面看，雖然沒有剝削了，沒有地租的剝削，但是作為社會的一種力量，還在那個社會裡面存在。那麼這次文化革命，紅衛兵抄了地主的家，資本家的家，還有變天帳。為什麼呢？所以說，看階級不單是從經濟來看，而且還要從政治範疇，思想範疇上來看。這件事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偉大發展。（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什麼叫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階級對階級的專政。那麼，既然是階級對階級的專政，你這個國家如果沒有階級了，那麼這個專政的對象不就沒有了嗎？那赫魯曉夫不就對了嗎？你如果是全民國家嘛，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了嘛，沒有階級了嘛，可也有些壞分子，也有些流氓，也有些偷盜貪汙分子，是階級還是分子？（眾：階級）那全民國家不就完了！不講道理！

既然沒有階級，那麼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階級的專政，既然沒有階級了。那麼這個專政就沒有作用了嘛。你是說對外國囉，對外國的話，那麼全民國家也能對付一下嘛。

這樣，究竟有沒有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有沒有階級？這個問題就成為毛主席的思想同一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是一些好心的，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死板教條的人的分水嶺。既然有階級鬥爭，怎麼能沒有階級呢？既然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對階級的專政，怎麼沒有階級呢？

在中國方面來講，取得政權以後，十七年來，大概進行了以三種範疇為主的階級鬥爭。

第一次是在取得政權以後，主要的是以經濟範疇為主地進行了階級鬥爭。這就是沒收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工廠，銀行等等。說是以經濟範疇為主，不是說沒有思想範疇的階級鬥爭。這個大概在五六年以後就基本解決了。斯大林的錯誤就在於在三十年前就宣佈在蘇聯沒有階級和階級

鬥爭。

第二次、五七年整風反右，這一場鬥爭主要圍繞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以政治範疇為主的階級鬥爭。說是以政治範疇為主，不是說沒有經濟範疇、思想範疇的階級鬥爭。根據這個理論，根據這個經驗，我們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中曾經提出來十月革命的九條規律，其中有一條就是要進行思想文化革命。這又是一次。

第三次、就是我們這一次。以文化、思想這個範疇為主，當然聯繫到經濟範疇，當然也聯繫到政治範疇。實際上，我們現在這個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是超過了文化革命的範疇，涉及到政治、經濟的革命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十七年來我們在三種範疇內進行了三次階級鬥爭。所以，修正主義罵我們，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國內錯誤政策的必然結果。這是修正主義這麼說法。但是我們看來，的確是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內國際階級鬥爭中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次文化大革命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它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開始的時候，誰叫吳晗寫那個劇本的，他不寫不行，難受嘛，睡不著覺嘛。（笑）

從國際方面看，開始有一個南斯拉夫，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脫化變質到成修正主義。如果說南斯拉夫，鐵托是個別的事情，那麼蘇聯——列寧締造的國家，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能夠被修正主義篡奪領導，並且向著資本主義復辟！那麼這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想一想，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可以不可以被修正主義篡奪領導……。

所以我們說，社會主義社會是有階級鬥爭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範疇，也表現在政治範疇；不僅僅表現在政治範疇，也表現在思想範疇。

我向兄弟黨說明瞭，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證明瞭毛主席這種天才的預見。

這次文化大革命，所以必要，所以必然產生，毛主席之所以發動這次文化大革命，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根據我們國內的實際，階級

鬥爭的實踐，根據國際階級鬥爭的經驗，他就天才地預見，沒有取得政權以前，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奪取了政權之後，還是政權問題。離開了政權問題，那就什麼問題都談不上了。

我向外國黨的同志們講的時候，沒有像這樣長篇大論地講，把這個思想講了講，大講就拿人家當學生了嘛。在咱們家中就可以講講。……（漏記）

就是說這個紅衛兵抄資本家的家，現在幾個大城市，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一百二十萬兩，就是六十噸，白銀十二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銀元美元的數字我忘記了。據說……我沒有調查，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一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一些。（笑）大小槍支一萬多支。（眾驚）一萬多支，其中包括有炮，（眾更驚）其中包括有機關槍，特務用的電臺呀，就是收發報機，幾百架。材料不在我身邊，一下子記不清了。

成績是偉大的，但是你僅僅把這些成績向外國兄弟黨講，還是不夠的，還是從理論上、從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講，從毛澤東思想來講。

大概是在×××（地名）要作一個報告，沒有作，最後在告別宴會上我就講了，但不完全是這個。

毛主席不是講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兒來的呢？就是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來的嘛。你們搞紅衛兵呀，搞紅衛兵呀，破四舊呀都是。當然你們要想發展到毛主席那樣，比較難啊，但是你們從這樣一點，那樣一點，從群眾中來，經過毛主席這麼一總結一發揮就出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笑）毛主席不是講群眾中來，從群眾中來，從哪裡來？從你們那裡來嘛，你們一點沒有，我怎麼來呢？（笑）

我想，最後一點就是我剛才講的，當前的文化大革命，它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是客觀存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我剛才講了，通過我們十七年來的經驗，就看出來了，社會主義社會中間有經濟範疇的階級鬥爭，有政治範疇的階級鬥爭，就必然有思想範疇的階級鬥爭。當前的文化大革命，它是經濟範疇的階級鬥爭，政治



範疇的階級鬥爭的更深入的更高級的一個階級鬥爭的發展。這種階級鬥爭深入到每個人的靈魂中。由此，我們就進一步地瞭解了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我們自己就親身體驗到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這是一步步深入的。他證實了毛主席的預見，也使我們逐步認識到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的規律。

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點呢？通過這一個鬥爭，就把毛主席的偉大思想深入到億萬人民群眾中去，廣大勞動群眾、革命知識分子更高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這一件事是史無前例的，這件事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人民掌握了毛澤東思想這個力量，任何敵人是打不倒的。

我在天安門上看到紅衛兵檢閱，每一個人，一面走，一面舉著這個（舉起《毛主席語錄》）。（鼓掌）我就想，人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拍著語錄本）結合起來了。（熱烈鼓掌）這個力量帝國主義懼怕，修正主義誣蔑。千百萬人把毛主席思想和他們結合起來，才是真正的防止修正主義篡奪我們的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使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不變顏色，社會主義革命能夠進行到底，逐漸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保證。（熱烈鼓掌）

這個運動之所以偉大，這是保證社會主義社會不被修正主義篡奪領導，不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我們國家復辟，改變我們無產階級的顏色；使我們能夠跟著毛主席的思想，能夠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件事情，不單在中國方面有重要意義；就是在國際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中間，在一切社會主義國家中間，在國際上也有重大意義。所以修正主義懼怕我們，連我們這五十幾個學生在那兒也害怕了，在蘇聯，只有五十幾個人，他們都要趕走。對毛澤東思想他們害怕得要死嘛！你看修正主義這樣子，報紙上就沒有嘛。智利的革命學生組織了紅衛兵，拉丁美洲也有，墨西哥的學生也要組織紅衛兵，非洲的學生在中國的留學生也搞紅衛兵。回非洲去，不知走到那一個什麼地方，走到……（伍修權說：衣索比亞的首都）那些非洲人像你們一樣，戴的紅袖章，穿的蘭褂子，打扮成你們這個樣子，就跑到那個地方去

了，非洲那個地方，衣索比亞的首都，就在街上走，被美國佬看到了，就照相，當下紅衛兵就和他們打架，就打了一場。（笑）這件事，在西非地區，引起國際騷動。

所以保證不被修正主義篡奪領導，不讓資本主義復辟，社會主義不變顏色，在於人的革命化。人同毛主席的思想，人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起來了。這件事是很大的。

這是我講的第二點囉，第三點是什麼啦？（回頭問隨行人員）忘了，不管它順序吧！（笑）

第三點，是使我們曉得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正如五七年毛主席所講的，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社會，要成為這樣一種情況，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這種民主同資產階級的民主根本不可比擬的。同一般的，不但是修正主義講得，就是一般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過去所想的那種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那也是很不相同的，想不到的。通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民主超過了巴黎公社的那種民主。

現在是這樣子囉，那的確是，不管你是什麼權威也好，不管你是什麼老革命也好，不管你有什麼資歷也好，只要你離開了毛主席的思想，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批評嘛！就炮轟嘛！哈哈。（長時間的暴風雨般的熱烈掌聲，高呼口號：「炮轟區黨委！火燒王恩茂！」「炮轟區黨委！火燒王恩茂！」）

我舉一個小故事。

「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以後，在工人體育館召開了一個十萬人的大會，（同學：十月六日）有個小孩講，（同學：十三歲，揚州人。伍修權同志：對！十三歲，揚州人。）那個小孩相當沉著，（笑）她講了，她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父親不贊成。我就問她了，我說你兄弟、姊妹幾個？她說四個。我問她了，你是老幾？她說老二。我說是不是你母親喜歡老大，或者喜歡老四，她不喜歡你？她說不是。她父親——（同學：監委的，是監委）對，是督察委員。那個揚州的地委書記

對文化大革命是有抵觸的，她父親是跟著跑的，所以我就反問一句。那麼她就接著講了。「你過去是革命的，我贊成；你現在不革命了，我就反對！」（熱烈鼓掌）這個十三歲的小孩能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可見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了。我就問她，是不是他不喜歡你呢？她說不是。不是那為什麼呢？她說我們的觀點不同！（笑）哈哈！她和我談了話以後，這個小孩就把她這個毛主席紀念章給我戴上，戴到現在（指胸前的紀念章），我還戴著出國串聯呢！（笑，掌聲）

這樣的一種大民主，你哪個國家敢實行！你說這個赫魯曉夫……（大笑）赫魯曉夫行不行呢？勃列日涅夫行不行呢？修正主義的爪牙現在這個日夫科夫——保加利亞的——行不行呢？捷克的參加大會的毛德里斯行不行呢？匈亞利的卡德爾行不行呢？東德的烏布利希行不行呢？你試試看，只三天就垮臺了。（大笑）

這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使我們懂得什麼叫做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因而也才懂得了毛主席所講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那麼我們現在有沒有集中呢？（眾：有）集中在毛主席的思想上。那有沒有民主呢？你看這個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眾：大串聯）大串聯。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的心情舒暢。有沒有統一意志呢？（有）毛主席的意志，那麼有沒有這個個人心情舒暢呢？我看你們就有點心情舒暢，（笑）也有個別人心情不舒暢的。（笑）他不舒暢，就給他治病嘛，治好了心情就舒暢了。（有人喊：王恩茂現在心情就不舒暢）以後就會舒暢了。（笑）

有個紅衛兵講了，那是哪個地方？文化部嘛，文化部的蕭望東嘛，他說，我不是黑幫，我還是有功勞的嘛。有個紅衛兵講，我們鬥你，不是要把你鬥成右派，是要把你鬥成左派！（熱烈鼓掌）我們的同志革命的心的確是好的，誰願意把同志鬥成右派呢？右派的帽子還是少一點好嘛！毛主席思想的左派嘛！（熱烈鼓掌）

當然現在開始這樣的一個局面了，那還要進行努力了，還要發展了，去實現毛主席所講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這麼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點，我們從

這個文化大革命中就認識到了，看出這個問題了。

那麼這是一點了，還有一點呢？五七年黨裡面有這麼個文件，這個文件沒有發表，叫做……《事情正在起變化》，還是這個……我忘了是哪個文件了，就是五七年整風反右的時候，是《事情正在起變化》，還是……當時是兩個中央文件，一個是……，這裡面毛主席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來，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要建設，必須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的隊伍。這個問題，五七年到現在十年了。十年中間，檢查我們做的怎樣了，你說這十年中間一點兒也沒有做，那不是這樣的，但是力量還不夠，這個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但是這個隊伍不大，這個隊伍還不夠堅強，還不夠。為什麼說是也培養了一些呢？同志們，這個東西就可以看出來了。那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了，在國際方面影響之大是我們想不到的。對自然科學來說，我們看到了，咱們試驗成功的人工合成胰島素，這個北京的同志大概都知道。這件事情，美國、西德搞了二十年，我們只搞了一年多，就搞成了。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美國的一個科學會議上，有人報告這個問題，他們有一個科學家說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不能像過去那樣看了。

最近還有上海的人工合成苯，這件事情，也是科學上三大革命取得的偉大成績。

那麼最最重要的就是現在的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這件事情，使帝國主義震驚的不得了。英國資產階級有一個說法，他說，這次科學實驗，它總是像樓梯似的，一級一級地才能上升。他說現在中國把這個樓梯給燒掉了，一躍進呀，就躍上去了！（笑，熱烈鼓掌。）

有的工廠裡面搞技術革新，我們在農村，農民呀、工人呀，創造發明。

總而言之，一條，十年來——去年十一月的時候，我到天津去了，我到天津的工廠裡見到工人學習毛主席的哲學。這件事，在五七年整風反右中，在五八年曾經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工人學毛主席的哲學。我開始去上海求新造船廠，有一個車間這樣做了，我就同他們開了一個座談會。然後，我就到了天津，天津一個仁立毛織廠——就是織毛料子

的——還有一個食品加工廠，他們自動地學習毛選。我在天津曾經開過兩次座談會。這一點，有時候我們在學校裡的時候，講毛主席所講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比如我們在學校也就是說哲學從哪裡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是從哪裡來的？比如我們在學校裡講課的時候講，矛盾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抽象地講也可以理解，也可以懂，但是怎樣去把它說得那樣生動。仁立毛織廠的工人同志，他們講得實在生動得很。事隔快有十年了，我總是還是記得他的這次話的。他首先講了，他說仁立毛織廠是個老廠。的確是比較老的，解放前就有這個廠。解放後生產一直上不大去。那麼他們學了毛主席著作以後，特別是學習了《矛盾論》以後，他們就找這個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到底在哪個地方？他們也開了座談會，你講這個是主要矛盾，他講那個是主要矛盾，紡織車間講它的是主要矛盾，織布車間講它的是主要矛盾，究竟主要矛盾在哪個地方？以後就經過調查研究，也是經過從群眾中來，才曉得主要矛盾在哪兒呢？在紡織車間。紡織車間上不去，織布車間織布常常受到限制。那麼紡織車間是什麼問題呢？機器不好，人力不強。後來調整了一下，紡織車間的問題解決了。可是，過不了兩個月，織布車間又跟不上去了，他們就想到了：大概是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啦，矛盾是絕對的。然後在織布車間這麼一搞，生產就又上去了。因為他們才知道了矛盾是不可怕的，矛盾還真正地能夠發展生產。

去年十二月間，我到天津去了。在那個工廠裡面正在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工廠裡面有黑板報，黑板報上寫得很好。有一個工人，學習毛主席的語錄，學習毛主席著作，他就講了，他說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總要佔用一點生產時間的，或者是正式的生產時間，或者是一些生產準備時間。你們在搞革命的時候，還耽誤一年學習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是個減法，從生產中間總要減減，減出時間來學習，但是學了以後怎麼樣呢？三種變化；人的思想變化了；人的思想變化了就技術革新了，機器技術變化了；技術變化了怎麼樣呢？生產就變化了。三種變化嘛！那麼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呢，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是什麼呢？是個乘法。所以從表面上看呢，是個減法，就好似你們這個樣子，半年多沒上課了吧，你

說這是不是個減法，可不就是個減法嘛。（笑）但是從你們這個文化大革命來看呢，是個什麼東西呢？是個乘法。很生動地把這個辯證法，這樣子具體應用了；而且是有一個人，他用一個事蹟來解釋。

所以六二年的時候，我們的黨校校長楊獻珍——他是我們的敵人。他一直罵我，把我罵得一塌糊塗，這是其中一條罪狀，就是說我在工人中間提倡學習毛主席的哲學，「工人怎麼能學習這個東西呢？那不就庸俗化了，表面化了！」他反對我，我當然高興了。（笑）其實這並不是我創造的，是人家工人創造的，我不過開了幾次座談會，支持一下嘛！我看這個減法、乘法，對我們來說，看得很清楚也就正如霍查同志所講的了，「革命搞一年，勝讀十年書」。

所以我們說，這幾年，我們培養了一批新的革命知識分子。但是呢，這個運動還不大。到底怎麼樣完成毛主席五七年提出的這個任務呢？也就是大量地培養無產階級的新的革命知識分子，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隊伍。現在看起來，從我們這個文化大革命中間，人才輩出。我很佩服你們開大會的時候，理科的立刻就寫出那麼一篇短短的文章。尤其有些紅衛兵的大字報，詞句很好，我們也看了。這個人才，整個中國現在在這樣一個大革命，這樣子一個熔爐噢！政治火焰的熔爐中間，才能創造出來！所以看到了，毛主席的這個任務，我們找到了一個法子了，就是通過這樣一個文化大革命，大量地培養無產階級的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隊伍。這一點，已經看出這樣一個作用來了。當然，我們離完成還有距離。

這是我要講的一點。還要講的一點呢，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有直接關係。這是直接的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因為帝國主義有兩手政策，第一是戰爭威脅，第二手是和平演變。演變經過什麼呢？經過我們黨內的、我們國內的那種資產階級當權派人物，即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那麼我們文化大革命這麼一掃呢，就清除了帝國主義在我們國家和平演變的這種社會基礎。修正主義在我國幹什麼東西呢？搞這……叫做什麼東西呢？（回頭問隨行人員）修正主義把和平演變叫做什麼呢？

（猛地想起）「顛覆活動」。修正主義要在我們這裡面搞顛覆活動。過去找過嘛，找過高崗，找過饒漱石，找過彭德懷；這次文化大革命，你們看，你們不是都知道了嗎？你們大字報上也有嗎，找過彭真，找過陸定一嘛。這個文化大革命這麼一掃，把修正主義顛覆活動的基礎就掃掉了。那這不是對反對修正主義有直接關係嗎？

另外，帝國主義也好，修正主義也好，它們說我們好戰。我們這個文化大革命是要備戰的。我看這一點是說對了。你們相信不相信？我看，你們這個革命，是一個政治上的戰備動員。現在提倡這個串聯嘛，要徒步嘛！徒步串聯嘛，看來徒步串聯特別重要，不僅是鍛鍊自己了，到處宣傳啦，也跟工人、農民學習，而且鍛鍊行軍嘛。哪有那麼多汽車讓你們打仗去坐？哪有那麼多火車讓你們去坐？（笑）是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的戰備動員。

那麼，從這一點，也就講到了，這個問題要看你們啦。美國帝國主義天天這麼設想，根據蘇聯的經驗，天天這樣設想，希望從中國第三代——第三代就是指你們。看來，第一代搞修正主義，搞和平演變比較困難了；第三代大概有希望！（下面有人回答：妄想！）這麼一搞就把第三代的希望也搞掉了。（笑）當然啦，是不是真正澈底搞掉了，這靠你們，看你們是不是迅速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但是這件事確實是帝國主義它自己講了。這樣一搞，美國人也講，它們的資本主義再過二十年就垮臺了。這個文化大革命，對於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是有根本意義的。

這是一點。還有一點是毛主席經常提倡的抓革命促生產。這一點從什麼道理講？從物質變精神，精神反過來變物質。我們從哲學方面來看看，很清楚，人的精神那當然離不開物質了。否則就會變成修正主義、唯心主義的東西。但是反過來說呢，人革命化了以後，就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這個問題，我去年在天津的時候，問工廠的工人，問近鄰的農民，他就很容易懂這個問題。因為你就講這個嘛，學了毛主席的著作，人變了，機器變了，生產變了，那是什麼東西呢？那是精神變物質很具體很具體……他這個比起在學校裡邊看得還清楚。導彈核武器，這樣快

就搞出來，美國從原子爆炸到導彈發射經過十年，蘇聯經過五年，我們只經過兩年，實際上還沒有兩年。為什麼使帝國主義那樣吃驚，因為人的精神革命化了。這種精神，毛主席的這種思想被群眾所掌握了，它就會必須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所以抓革命、促生產，一定搞得好，是不用懷疑的。所以這一點在開始的時候，很相信這個問題，同志們也很相信。說是最近有一個社論，（同學說：《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因為的確是這個樣子囉。這個問題，這個道理很簡單，人的革命化，必然會變成物質力量，只要把這個力量組織得好，那就是一種。（漏記）

這是一條。最後一條，通過實踐。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會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得到更大的發展。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面，毛主席的思想會在運動中間經過群眾掌握之後，可以更大地發展。不可能設想，這樣大的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發展。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實踐中來的，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科學實驗中來的。這樣一個運動怎麼能不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如我剛才講的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大民主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面如何培養知識分子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下面怎麼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怎麼反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和平演變、顛覆活動；怎麼把精神變物質，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它就必然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外國我就講了這麼一些，沒有這樣長篇大論地講，只是扼要地講了一下。當然講的時候嘛，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就贊成了，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就不贊成了。

所以總起來說，這一次我離開北京時，紅衛兵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去國際串聯，到底怎麼樣，還要靠他們評論，但是我做還是做了一些。有時候講一天，一天也相當勞累，一天要講四次話的，每到一個地方，人民全城歡迎中國代表團，讚揚毛主席的賀電，所以結果怎麼樣呢？一到那個地方，人家先給我招待一下，喝一杯酒，就講了，人家講話，你不能不講吧！講一次，然後在群眾大會上又講，人家講話你又講；開完會吃午飯，又講一次；吃晚飯又講一次。一天四次。（笑）成績到底怎



樣呢？我剛才不是說了，回去要向毛主席報告，到底做得好不好，自己還很難說囉。那一個任務我也沒有完成，上飛機也沒有把他們帶走，我也不知道人家贊成不贊成，也不能帶去。但是不帶去也一樣，你們在國內搞，通過報紙呀、社論呀、廣播呀、通信呀，國際的影響那還是很大的。

所以，總的看來，贊成毛澤東思想，贊成我們的文化大革命，贊成我們的紅衛兵；還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反對我們的紅衛兵，成為一種國際的階級鬥爭，已不僅是在中國的階級鬥爭。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同志們做得好囉！自然囉！我在工作中間有沒有缺點，那……，要不就不革命，不革命你就沒有缺點，就像廟裡的那個泥菩薩。（笑）你們不是常講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嘛，怎麼能沒有缺點呢？沒有錯誤呢？列寧都講過嘛，上帝都允許青年人犯錯誤。（笑）也可能有。主要看大的方向，大的方向是什麼呢？就是同志們所講的，要防止修正主義篡奪我們的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把社會主義社會革命進行到底，要把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路線貫徹到底，澈底地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垮，消滅掉！（熱烈鼓掌）

我冒充先生嘍，講到這裡。（熱烈鼓掌）我還交待一下，在飛機場上，同志們給我的材料「王恩茂同志的檢查」還有你們剛才給我的這些材料，一下子叫我一次吃下去，（笑）消化不了（笑），我還是帶回去。

這件事要是出在你們身上，……我不是給大家常講嗎？你們不要覺得我們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不一定是對的。我們自己的錯誤也不少囉！就是不要找保姆，既然不要找保姆，也不要找保男嘛！（大笑）紅衛兵就是要敢闖嘛，敢想、敢幹嘛，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嘛！

對於這個文件，（指「王恩茂同志的檢討」）我現在不能細看，你們的工作到底怎麼搞法，大概你們自己要問我，這個問題、那個問題要問我，大概是有這個想法的。這一條我告訴你們，第一，我已經離開二十天了，這個文化大革命一天一個發展，一天一個變化；你看主席幾次接見紅衛兵，我沒有趕上，你看三號這一次，十號這一次，十一號這一次，我都沒有參加；我走的時候，中央開會還沒有完呢！中央不是開會

嗎？在北京開會，這個大概你們學習報紙的時候都知道的，還沒完我就走了。所以有時候中央有些什麼最後決定，我不好亂吹嘛。（笑）如果吹的不好，你們在整我的時候，這就是口供嘛！（笑）本來我就沒有心要犯錯誤，你逼著我犯錯誤嘛！（笑）

所以離開二十六天的這種變化，是很大的，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新疆的事情，我不那麼清楚，我剛才看了看你們那個東西，看了個題目，有個「九三事件」是怎麼回事呀，我也還弄不清楚。

只有一條，堅持毛主席的路線，澈底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只要把這個總綱掌握住的時候，大方向就對。

卡拉奇那個地方交通不方便，《人民日報》這些時候我沒有看見。我在從巴基斯坦到這裡來的飛機上——我們自己的飛機——從一號到十二號的《人民日報》帶上了，在飛機上帶著，我在飛機上才看了。我看你們新疆到北京去串聯，有一件事很好嘛，新疆的同學到天山上去挖了一棵……兩棵？（同學：兩棵）挖了兩棵松樹送給毛主席，這個事情嘛，又有經濟，又有文化，這個是非常好的，我還是在那個報紙上看的。從和田到烏魯木齊，經過天山，看那個天山上確實有松樹，（笑）這點也還是我的一個常識，一個知識。因為我腦子裡面那個天山上像那個崑崙山一樣，光光的，沒有東西。（笑）崑崙山也許有東西。我們在飛機上看到這個天山上邊確有森林，很怪的啦，我請教了一下，它那個松樹長在山的這邊，（一同學：向陽面）不是向陽面。（笑）為什麼山的那面沒有，這邊就有呢？道理是這樣的，那邊的雪水少，這邊的雪水多。所以，我看到報紙上新疆的同志也有維族的，也有其他族的，哈族的吧？還有漢族的同學們。你們這個大學校的、中學校的同學們，我看這個事情你們都懂。現在不曉得你們新疆到北京去的都去完了沒有呀？（同學：沒有！）還有多少？（同學：還有中學生；中學生不讓去了，中學都開學了……）我說一下噢，我現在不知道，我不負責任，據說現在允許去了，是不是？（同學：允許去的，中學開學了，像這兒的農二師、八一中學，現在都要開學了，這是事實。）在新疆呀？（同學：是！）那太容易了嘛，你不上嘛！（笑，熱烈鼓掌，高呼口號：「無產

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革命造反有理萬歲！」）你那樣說，說你那個地方是個小學，我要上毛主席的這個大學！（大笑，熱烈鼓掌）

有沒有一半？到北京去的有沒有一半？（同學：有！）包括中學生的有一半吧？（同學：有！）從烏魯木齊到北京有多少路？（眾回答不一）八千里路要走嘛，我今天在路上看到有人背著背包走了。（同學：走了好多了！）八千里路要走起來要……？（同學：一年）還要宣傳啦，還要跟工人呀，農民呀，革命先輩學習啦，有的時候還要休息一下。但是，這是幹革命！這個八千里路要走多少天啊？（眾回答不一，伍修權同志說：六個月）大概半年不行。

康生同志講完，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赴疆串聯的一同學問：中央是否有這樣的指示，把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趕出城市？

康老回答：「沒有這樣的指示。」（這位同學拿出烏地區紅衛兵總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頒佈的（66）糾字第四號通令交給康生同志看。按：這是多數派組織發出的通令，發出後得到自治區黨委的配合執行。但這是一個嚴重的通令。新大革命造反團及其他革命「少數派」社團都發出通告，宣佈這一通令無效。）這位同學作說明說：「這個通令發出後烏魯木齊公安機關配合行動，烏魯木齊不但是把五類分子、牛鬼蛇神的往外趕，還有的不是五類分子、牛鬼蛇神也往外趕。我們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的同志與自治區黨委聯繫多次卻沒有解決。我們認為這樣做是不合適的，我們找王恩茂同志多次，十一月十三日找王恩茂等了八個小時都沒有解決，我們覺得這是形『左』實右的，特別在現在自治區有些單位才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些在前一時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的還沒有平反。發出這一通令是不是符合中央指示的，我們向您請示。」

康生同志答：「我知道中央沒有這個規定，這是情況不瞭解。運動中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黨分子』、『真右派，假左派』的人不能劃成牛鬼蛇神，這些還是革命的。別那樣講，不對。我們自己（指紅衛兵組織）不能這樣講，即使這裡有牛鬼蛇神，這時也

不好處理。」

（又有人說，王恩茂同志說：「你替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我當第一書記也是不容易的，不然你們當書記試試看。」請康老反映給毛主席，好好批評批評他。）

康生同志說：「好。這樣說共產黨也不好當。全人類的命運交給了我們，不僅不好當，有時命也要犧牲。革命怎麼那麼容易！」

【這次親切的交談至十六日晨二時半（烏魯木齊時間）。結束後，紅二司八農造，一中造等趕來，康生同志又與之作了十分鐘的交談。農學院革命造反團，農學院革命火種造反團等單位的同志也陸續來了。想問問題，反映情況人很多，時間已是深夜兩點半了，康生同志還須于十六日早晨乘機離烏返京，就只好結束了這次接見。】

（根據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紅二司新疆大學革命造反團《革命造反報》記者記錄整理）

一九六六十一月十六日

##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6.12.4.）

【時間：下午。】

對工人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沒有調查研究，過去沒有接觸過，今天算第一次。對工人階級文化大革命怎麼認識，對工廠文化大革命怎麼認識，我也不大很瞭解。近來，同波蘭的左派的一個同志，談了三次，十個鐘頭，從同他談話來看，受教育不少，談到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變為資本主義國家。這個波蘭的同志，過去是中央委員，搞過工業，

談得很詳細。社會主義工業向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情況，他們形式是「公」，實際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實際上是「舊」，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過去對這些問題不大理解。

（林彪同志插話：形式未變，內容變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

（徐向前同志插話：掛社會主義招牌，實際是資本主義。）

我們過去對蘇聯，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領導變，我們比較清楚，文化上也比較清楚，比如葉甫圖申科到美國，到處受到歡迎；農業上，他們有自留地……等，我們也還知道一些。對工業就不大清楚是怎樣變的了。

（林彪同志插話：把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農業、工業、文學、藝術、黨各項政策怎麼變的，要找人研究一下，怎麼復辟的，我們還對這些到底怎樣變的，不甚瞭解，怎能塞這個漏洞，要研究。昨天同周總理談話，還談到這個問題，資產階級革命是經過多少次反覆的，法國革命從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四上臺，後來就上了斷頭臺，拿破崙上臺又恢復了帝制。從××年到××年，三次革命，五次反動復辟。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也經過很多次反覆，克倫威爾後來也上了斷頭臺，墳墓都被挖出來了，屍體被燒，活像赫魯曉夫斯大林一樣。可見資產階級革命也是經過了多少次反覆。中國革命，從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袁世凱做皇帝恢復帝制，北洋軍閥到蔣介石，也是幾次反覆。）

（周總理插話：剝削階級代替剝削階級，還經過這樣多次反覆呢！）

（林彪同志插話：社會主義革命，的的確確、實實在在存在著反覆問題，幾千年人類有文化以來的歷史，就是個剝削史。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變為資本主義的，如何復辟的，現在我們只有籠統的概念。沒有具體事實，沒有說服力，請康生同志組織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從波蘭情況看資本主義復辟，在工廠方面，關係很大，因為它是經濟基礎。

（林彪同志插話：工廠比學校厲害，好也厲害，壞也厲害。）

波蘭的情況是有三種經濟，一是私人可以開工廠，私人可以開飯館、旅館、舞場，法律規定雇傭工人不許超過三個，但是學徒不算數，

（周總理插話：我們半工半讀學校，剝削也很厲害，他們每月只有

二十元，八小時工作制，沒有什麼學習。）二是他們農業勞動合作社，形式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農村的富農經濟更突出，一個人可以有五十公頃土地。

（李先念同志插話：這就是富農經濟。）有的土地並不多，在郊區經營蔬菜、水果，可以變為百萬富翁；三是國營經濟，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他們除貪汙盜竊以外，同國外有勾結，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國家，或叫新的資本主義國家。我感到我們的工廠，是否那樣乾淨，我沒有研究。要挖掉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根子，怎樣搞文化大革命，林總講的「我們的經濟基礎是新的，上層建築是舊的，不行」。這是對的。什麼是新的？我看了《哥達綱領批判》和《國家與革命》，所謂新，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

（林彪同志插話：所有制由私變公，其他一切都跟著變了。）

我們工廠裡，舊的經濟規律沒有變的是什麼？在交換問題上，商品等價交換規律沒有變，工資仍是按勞付酬，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仍然存在。毛主席五八年就說過，要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很好的研究過這個問題。列寧說：「小生產者可以隨時產生資本主義。」我們工廠資產階級法權殘餘還存在，仍可產生資本主義。工廠搞不好，也會出修正主義的。上層建築不好影響基礎，基礎不好影響上層建築。工廠文化大革命，就這個意義講，比學校重要。它是經濟基礎，工廠也有上層建築。

（林彪同志插話：不論工廠、農村，都有上層建築問題。）

因此我們工廠文化大革命，對防資、防修很重要，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比文化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次要一些，更重要在於工交系統怎麼認識工交文化大革命，需要很好研究這個問題。現在領導機關，對於工業、農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問題上認識不夠，很不理解，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谷牧彙報的第一條、第二條理由站不住，對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須要認識。要調查研究什麼叫修正主義根子，要深入調查研究，工廠的問題不一定比學校少。

（林彪同志插話：問題是不摸底，一摸不是問題少，而是一堆。）

（江青同志插話：工廠裡有成本、利潤問題，從修正主義那裡抄來

很多東西，我們的脫產人員太多，生產工人一表現好了，就馬上提拔上來，脫離生產。××是勞模，讓他脫產了，坐上了汽車，提高了待遇，這個問題很大，他怎麼革命呢？）

（林彪同志插話：吃了飯不革命，就鎮壓人家革命。）

我們有些工廠，恐怕是列寧所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工廠，工交口的同志要很好地對待這個問題，教育幹部，認識這些問題。

（林彪同志插話：前車之鑒，引為教訓，不要重蹈覆轍。）工廠權力比學校幹部權力大的多。

（林彪同志插話：有身家性命、生殺予奪之權。）

蘇聯專抓經濟工作，政治不掛帥，檢查起來，我們工廠政治不掛帥，毛澤東思想不掛帥，恐怕比學校還厲害。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我參加共同討論的，完全贊成。但是，第一條是否再加這幾個句子：「工廠文化大革命，對防止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發展生產力，有更大的作用。」抓革命，促生產，這不是二元論，而是主席說的，抓好革命才能促生產。

北京第二機床廠一個車間的材料不錯，由於抓革命，促了生產，精神變物質。不好的地方是領導搞的不好。

（江青同志插話：凡是革命的地方，生產總是搞得好的。）

我補充一句。波蘭同志說，修正主義的力量，一是黨的上層領導，一是基層企業領導。

## 中央首長談工交系統文化大革命：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李先念等首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1966.12.18.）

康生：對工人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沒有調查研究，過去沒有接觸過，今天第一次，對於文化大革命怎樣認識，我也不很瞭解，近來同

波蘭一個左派同志談了一次，十個鐘頭，從他談話來看，受教育不少，談到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變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位波蘭同志過去是個中央委員，搞過工業，談得很詳細，社會主義工業向著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他們的形式是「公」，實際上是「私」，形式是「新」，實際上是「舊」，形式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過去對這些問題不大理解。

林彪：形式未變，內容變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

康生：我們過去對蘇聯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領導變修我們比較清楚，文化上也比較清楚，比如葉甫圖申科到美國到處受歡迎，對農業上他們有自留地……等，我們也知道一點，對工業就不知道怎麼變的了。

林彪：把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工業，農業，文學藝術各項政策怎麼變的，要找人研究一下，怎麼復辟的，我們這些到底怎麼變的不甚瞭解，怎樣塞這個洞，要研究。昨天同周總理談還談到這個問題。資產階級革命是經過多少次反覆的，法國從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四上臺，後來又上了斷頭臺，拿破崙又上臺，恢復了帝制，從××年到××年三次革命，五次反動復辟。英國資產階級也經過很多次反覆的，科倫維爾後來也上了斷頭臺，墳墓都被挖出來，屍體被燒，活像赫魯曉夫燒斯大林一樣，可見資產階級革命也是經過多次反覆。中國革命從戊戌政變袁世凱作皇帝，恢復帝制，北洋軍閥到蔣介石也是幾次反覆。

周恩來：剝削階級代替剝削階級還經過這樣多次反覆呢？！

林彪：社會主義革命的的確確實實在存在著反覆的問題，幾千年來人有文化以來的歷史就是剝削史，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怎樣演變成資本主義的，如何復辟的，現在我們只有籠統概念，沒有具體事實，沒有說服力。請康生同志組織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康生：從波蘭的情況看來，資本主義復辟在工廠方面關係很大，因為它是經濟基礎。

林彪：工廠比學校厲害，好也厲害，壞也厲害。

康生：波蘭的情況是三種經濟：一種是私人可以開工廠，私人可以開飯



店、旅館、牛場，法律規定雇用工人不得超過三個，但是學徒不在數。

周恩來：我們半工半讀學校也剝削，也厲害，他們每月工資只有二十元，八小時工作制，沒有什麼學習。

康生：他們農業勞動合作社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農村的富農經濟更突出，一個人可以有五十公頃的土地。

李先念：這就是富農經濟。

康生：有的土地不多，在郊區經營蔬菜水果，可以成為百萬富翁。三是國營經濟，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國家，他貪汙盜竊，外同外國勾結，我感到我們的工廠是否那樣乾淨，我沒有研究，要挖掉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根子，怎麼搞文化大革命。

林彪：這是對的，什麼是新的。我看了《哥達綱領批判》和《國家與革命》，所謂新，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變為公有制，所有制由私變公，其他一切都變了。

康生：我們的工廠裡舊的經濟規律沒有改變的是什麼，在交換問題上，商品等價交換規律沒變，工資仍是按勞付酬，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仍然存在，仍可產生資本主義，工廠搞不好也會出修正主義的，上層建築不好，影響經濟基礎，基礎不好，影響上層建築。工廠文化大革命就這個意思上講比學校重要，它是經濟基礎，工廠也有上層建築。

林彪：不論工廠農村都有上層建築。

康生：因此我們工廠文化大革命對防資防修很重要，不是可有可無的，不是比文化教育的文化大革命次要一些。更重要在於工廠系統怎麼認識工交文化大革命，需要很好研究這個問題。現在領導機關對於工業農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問題上認識不夠，很不理解，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谷牧彙報的第一條、第二條理由站不住腳，對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還要認識，要調查研究工廠的問題，不一定比學校少。

林彪：問題不摸底，一摸不是問題少，而是一堆。

江青：工廠裡有成本，利潤問題從修正主義那裡抄來不少東西，我們脫產人員太多，生產一表現好就馬上提拔出來，脫離生產，郝××是模範，讓她脫產了，坐上汽車，提高了待遇，這個問題很大，她怎樣革命呢？

林彪：吃了飯不幹革命，就鎮壓別人革命。

康生：我們有些工廠，恐怕是列寧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工廠。工交的同志要很好地對待這個問題。

林彪：前車之鑒，引以為戒，不要重蹈覆轍。

康生：工廠權力比學校大得多。

林彪：有身家性命，生殺之權。

康生：蘇聯專抓經濟工廠，政治不掛帥，檢查起來我們工廠不掛帥，毛澤東思想不掛帥，恐怕比學校還厲害。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我參加制定的，完全贊成，但是第一條是否加上幾句話：「工廠文化大革命對防止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發展生產力有更大作用。」抓革命促生產這不是二元論，而是主席說：「抓革命才能促生產。」第二機床廠一個車間材料不錯，由於抓革命，促了生產，精神變物質，不好的是領導搞不好……我補充一句，波蘭同志說，修正主義的力量一是黨的上層領導，一是企業基層領導。

江青：凡是革命的地方，生產總是搞得好。<sup>10</sup>

## 康生對某部一個學習簡報的批語（1966.12.21.）

××同志：

簡報反映的情況，值得嚴重注意。

康生十二月二十一日

<sup>10</sup> 《新交大通訊》上海交通大學教聯站動態組主辦，1967年9月19日。

## 簡報原文

### 一、對目前形勢的認識

三處這兩天在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時，認為形勢大好的表現是：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確實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了；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大民主，澈底批判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國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已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破獲了許多案子，解決了許多老大難問題。

黨團辦公室、幹部科、研究組有的同志認為，在大好形勢下，也存在一些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雖然伯達同志和報紙上都講了要區別對待，但下邊區別對待做得有些不夠。有些地區，有些單位，重點鬥爭批判的面是否寬了些，北京地區的大專學校被批判的人比較大。其中有的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反動的學術「權威」，有的可能是好人。現在派別多，有的單位最少是兩派、三派，甚至更多的派。人大會堂八百人就分九派。有些學校也分許多派，你不聽我的，我也不聽你的，紅衛兵、文革都抓不起來。這樣下去，別說明年暑假，就是後年暑假也統一不起來。有派是自然的，但老這樣下去，鬧得很對立也不好。因此，認為仍需不斷地交待政策，加強具體領導，在主席思想、黨的政策基礎上，儘快地統一認識。也有的認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有些單位是否時間花得多了，有些地方揪住不放，有的就是有點影響嘛，批判一下就行了，不要等大多數單位都完了，再往下轉，否則等到何時？幾派的鬥爭，現在弄不清，可以保留意見嘛，通過實踐再來看誰是誰非。還是要抓住大方向，轉入批、鬥黑幫。也有的認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要深入下去，搞深搞透。目前一部分人是轉變過來了，願意檢查，但也有一些人沒有轉變，恐怕還是要發動群眾來批。

在談到大民主時，三處有的同志說，民主與集中在不同時期可以有不同側重點，但民主是要有領導的，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領導的民

主，而現在有些人搞的是極端民主化，這不是中央提倡的。現在出了一些問題，中央是瞭解的，問題是什麼時候講話，採用什麼方法解決。接待站有的同志說，大民主是方向，使大家敢於提意見，言者無罪，這樣就不容易出修正主義了。也有的提出，是否任何時候都可以採取大民主的形式？林彪同志說，有大戰役、小戰役。主席也說過，要搞小民主，和風細雨。因此，以後可能轉入小民主。

## 二、對林彪同志講話的反映

四處有的同志說，林彪同志用最通俗的語言，精闢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具體做法，高度地概括了保持晚節的三個條件，是一篇有關新階段的高度指導性文件。印刷廠的同志們說，從解放十七年來，在文化思想領域裡，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統治舞臺；彭、羅、陸、楊四大家族控制著北京市和中央的宣傳、文化部門，甚至掌握了軍隊以及劉、鄧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動路線等，進一步認識到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馬列主義的新創舉，對防止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對指導世界革命有偉大的深遠意義。

## 三、印刷廠對部裡運動的看法

- 1、有的同志認為，在「八·二四」會議上，×××同志起來糾偏是應當的，九、十處之所以抓住××同志一些錯誤不放，想把××同志打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在於××同志在運動初期的一次大會上給九處貼了個口頭大字報（關於九處教學問題）。
- 2、有的同志認為×××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因及時被部領導抓住了，同時只有四天半的時間，夠不上反動路線的代表，但其影響很深，應進行批判。有的同志認為××執行了反動路線。給××戴上了「野心家」的帽子過早些，但他就是有野心，上臺後想露一手。  
有的同志說，×××在大會上不讓×××發言是反動路線的影響。

#### 四、提出的問題

- 1、聶元梓的大字報說，劉少奇同志是中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同志是第二號。本來劉、鄧問題的性質中央已有了定論，聶硬是升級，是不是和中央唱對臺戲？
- 2、經委大字報說，安子文、王從吾、薄一波、楊獻珍等人曾在《華北日報》公開聲明叛黨，是否事實？如不是，這樣做對黨是否有利。
- 3、許多中央和地方領導人的大字報都上了街，如果沒問題，將來怎麼辦？
- 4、劉、鄧的錯誤，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解決了，但是現在大街上到處貼標語，散傳單批判，這是否是中央的意圖？他們是否還要向全國人民檢查？對劉等同志的做法是否對黨的團結有利？少奇同志現在政治局常委中已排列第八位，是否算罷了官？
- 5、戚本禹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蘇共那一套？這種說法在黨內沒有講，現向群眾講了，如何理解？
- 6、過去提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是四個人，現只有林彪同志，這是否毛主席的意圖？
- 7、五七年毛主席說不搞大民主，為什麼現在又提倡大民主？
- 8、全國各級黨委對這次運動應怎樣進行領導？
- 9、林彪同志報告中說，兩頭勁頭大，中間不足，甚至頂牛，怎麼理解？在哪些問題上頂牛？
- 10、怎樣估計十三、四歲的初中學生外出串聯的作用？  
（以上問題是三處提出的）
- 11、什麼是反動路線？它的表現形式是什麼？對反動路線要批判到什麼程度？如何解決把提出這條路線的人和執行這條路線的人區別開來？部裡有無反動路線，誰是代表？革委會的同志會不會成為反動路線的代表？（接待站）
- 12、如何劃當權派？寧一同志說處長以上算當權派。黨支書為什麼不

算？革委會算不算？（接待站）

康生同志對上述簡報分段作了批語

連批（鬥）運動也不曉得！這就是對主席的抵觸，這正是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的論據。

怕革命，怕階級鬥爭。

替劉、鄧反動路線提抗議。

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民主，對大民主怕得要死，對反革命反撲熟視無睹。

對叛黨分子沒有義憤。

你看怎麼辦？是不是取消大民主？

為什麼不能講？

你是否以為把反毛主席思想的人也可以叫做主席的親密戰友？

就是在這份簡報上。

好得很！

讀讀毛主席的大字報吧！<sup>11</sup>

---

<sup>11</sup> 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北京經濟學院無產階級革命團、北京市東方紅印刷廠革命造反聯絡處、化工部化學工業出版社印刷廠聯合彙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資料（4）》，一九六六年。



1967

---





## 康生對北大學生崔子明等人兩封信的批駁 (1967.1.3.)

【按：當革命師生員工奮起反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並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技術物理系一三二班崔子明、席關培、張拯三人跳了出來，他們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二十六兩次致信康生。用質疑的手法為反革命分子進行辯護，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攻擊中央文革小組。康生對他們的反動信件給以嚴正的批駁。現在我們將康生的批語全文摘錄下來，供廣大革命師生員工在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新反撲的鬥爭中參考。】

附：

### (一) 康生致中央文革小組的信

伯達，江青及文革小組諸同志閱：

這是北大技術物理系的三個學生來信，他們用「質疑」的手法，來保李洪山、喬兼武、楊勳、楊炳章等反革命分子的。

康生六七年一月一日

### (二) 康生對崔子明等人兩封信的批語

當崔子明等人寫到十二月十二日給康生公開信錯誤之一是「在於當時我們對形勢作了錯誤估計」時，康生批語：不對，是反動階級立場問題。

崔子明等人認為：「李洪山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來反對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樹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們翻不了天。」康生批語：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小走狗，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們翻不了天」，但是你們給我的信完全不是這種觀點，而是同反革命分子李洪

山、喬兼武、楊秉章反革命言論相呼應，為這些反革命分子叫屈。

當崔子明等人談到錯誤之二在於：「對於全國陸續發生鬥群眾，群眾鬥學生的問題，我們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和主流」時，康生批語：不對，李洪山等人不是群眾，是反革命分子，鬥爭李洪山、喬兼武等人，不是群眾鬥群眾，是革命群眾向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北大大學批判你們這封反動的信，是正確的，作得對，作得好。

當崔子明等人談到：「當然橋和船的問題在有些時候也會成為主要矛盾。尤其在目前運動正向縱深發展時，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萬萬不可小視。我們不僅要敢於革命，而且要善於革命」時，康生批語：你們不僅是反對革命，而且是破壞革命。

當崔子明講到，他們「由於剛剛串聯回來沒有什麼事可做，（當然我們主觀能動性也發揮得不夠）」時，康生批語：你們反革命的能動性發揮得很夠。在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被鎮壓後，你們還要垂死掙紮，還寫這樣的反動信來進行反撲。

崔子明等人說，他們在信中「發了些牢騷，這是極不嚴肅的」。康生批語：可恥的狡辯。

崔子明等人認為公開信在「客觀上使親者痛，仇者快，影響很不好」。康生批語：這正如來信所講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來反對中央文革，乃蚍蜉撼大樹，沒有什麼了不起。」

崔子明等人對同學們的批判感到「我們目前所受壓抑很大，幾乎抬不起頭來」。康生批語：好得很，這對你們是很好的教育，不是「幾乎」，而是要將一切反動言論使它永遠抬不起頭來。

崔子明等人說：「我系文革的一位副主任則說：現在我認（為）你們是人民內部矛盾，繼續下去就是敵……（康生在省略號之處加了『我矛盾』三個字）。談到這兒，他把敵字咽了下去，改口道，繼續下去就是對抗性矛盾……。」康生批語：講得對，不應該咽下去！應該如實的講。

崔子明等人說：「有一些人叫我們『反革命』、『跳樑小丑』，或許大多數同學在開玩笑。」康生批語：他們不是開玩笑，而是嚴肅的階級鬥爭。

崔子明等人要求同學們對他們的態度「能否緩和一下」？康生批語：對錯誤為什麼要緩和呢？

當寫到一位哲學系五年級的同學批判他們時，「我們還是陪著笑臉聽了他的意見，心情您老是可以想見的」。康生批語：我瞭解你們的心情，但是同你們所說的是相反的。

崔子明等人說：「我們的信件（經同學建議成了公開信）的觀點和認識有錯誤，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們感到很痛心。」康生批語：歡迎自我批評，但是要誠懇的，坦白的，革命的，不是玩兩面手段的。你們的信原來就是準備公開張貼的。給我的信寫明是十二月十二日，公開貼出也是十二日。

崔子明等人問：「我們的信件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信件？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康生批語：是大毒草。

崔子明等人在信中寫道：「我們有了想不通的問題可以不可以反映給你們？對中央文革的同志們有意見可否提出？（當然意見不一定正確），認識上有錯誤就一定是立場問題嗎？」康生批語：對中央文革小組有意見，完全可以提出，也完全可以批評。我們對於任何批評，不管是對的或是不對的，都願傾聽。但是你們的來信，一不是反映情況，二不是提出意見進行同志式的批評，而是偽裝成提意見進行商討的樣子來，1、反對對彭、羅、陸、楊進行鬥爭。2、歪曲兩條路線的鬥爭。3、抗議對李洪山等反革命分子的鎮壓。4、反對革命小組和陳伯達、江青。5、打擊革命左派，包庇反革命分子。6、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維護資產階級反動路線。7、反對無產階級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對革命的廣大群眾實行大民主，對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絕對不允許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

崔子明等人寫道：「我們提出的問題看來還有一定的代表性，您的指示對於我們和持有我們同樣疑問的人都有好處。」康生批語：大概能代表李洪山、易振亞、萬會秦、賴銳銳、伊林、喬兼武、楊炳章及「虎山行」等一小撮人。

崔子明等人對康生說：「上次給您的公開信就是很不認真地寫出來的。」康生批語：不，很認真地寫的。不要用謊言去掩蓋錯誤。

最後崔子明等人要求康生：「我們急切地等待著您的答覆。」康生批語：對此信的批語，就是對你們兩次來信扼要的回答。

康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sup>12</sup>

## 中央首長與「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座談紀要 (1967.1.4.)

江青：你出去了沒有？

同學：出去了。（講了串聯情況）我們幾個頭頭每天忙得要死，說不定哪天要下來，大家說我們是小當權派，以後還要鬥我們哩！

（首長笑了）

康生：領導忙，下面沒事幹怎麼辦？

同學：整風……其實說整風也沒整，以後說準備參加兵團，兵團沒要，他們自己組織，這組織那組織。

江青：要哪個組織？要保他們自己。

同學：希望中央要注意中學情況，中學的問題要抓。

江青：對，我們的責任很大。

同學：鐵杆紅衛兵在中學還是不承認（錯誤），大學搞了，中學反動路線更深，各個學校組織不多，紅五類組織起來……

江青：什麼叫紅五類？……（分析幹部問題），有些人的父母可能就是黑的。彭小蒙我早就發現她浮躁，她很好，但要批評她。

<sup>12</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1）》，1967年3月；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同學：他們根本不是辯論，就是壓，只要意見不同，反對反動對聯，動手就打。

江青：這些人只要是拿刀子捅人，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鎮壓。

同學：我們認為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無產階級大民主。

康生：對嘛！你們這個觀點很好。

姚文元：（對李峰）我不是跟你們講過，以這為題寫一篇嗎？

李峰：（表示遺憾）

江青：不要怕，不管他是誰的孩子，什麼主席、副主席，將軍、部長就甭提了，只要是反革命，就不客氣，你們講嘛，隨便講。

同學：紅衛兵也應該有自我革命精神，以前只革別人的命，文化革命也要觸及自己的靈魂，要造自己靈魂的反。

江青：老子革命兒子不一定革命，更何況老子也不一定革命。

同學：（談到「西糾」鎮壓革命的活動問題）他們也是紅衛兵，對他們不好辦。

江青：他們不叫紅衛兵，叫糾察隊！

同學：他們要解散我們。

江青：我們還要解散他們哩！

同學：他們的黑電話隨便打，還準備砸我們哩！

江青：打人的都要把他們抓起來。

同學：一辯論他們就要看觀點，觀點不同就是「混蛋」，就打。

江青：這是流寇！

同學：他們只允許同意自己意見，不同意就打、罵。

江青：法西斯囉！希特勒！

同學：「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鬼見愁」，影響極壞。

江青：完全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老子英雄兒好漢」還是四舊呢！提出對聯的人，父親職位高一點，是個大官，應該搞掉。那天（八月六日）很對立囉！（那對聯）我一開始就反對。

同學：我們要看你的講話，他們就保密，我們貼了三次，他們撕了三次。

江青：什麼？撕的什麼？就不對嘛，有的人有有利條件，有幕後操縱者。（這時李峰給康生同志寫了一個條子，問謝清泉是不是謝鏗忠的兒子？說他幹的兩件事。康老遞給江青，江青對謝鏗忠說：「回去讓你的兒子去派出所自首。」）

康生：那就是老子革命兒混蛋嘛！

同學：最近確實有一種反撲形勢，他們砸其他地方都是坐汽車去的，我們的糾察隊也得準備，比較緊張。

江青：你們不要把形勢估計得那麼高，他們只是一小撮，有幕後人，我們幫助你們，你們不要怕，其實他們那麼幾個人，從東城跑到西城，從西城跑到東城，就那麼幾輛車。

同學：現在紅衛兵打人都合法了。

江青：不合法，你們幫我們闢謠。說我的什麼秘書是張久舜，有人還說李潤貴是林彪同志的秘書，我也要造他的反。

同學：（講述紅衛兵搶東西等惡劣作風。）

江青：這是流寇作風。

同學：他們為什麼這麼硬，敢於炮打中央文革？

江青：主要是背後有人。

陳伯達：不要叫糾察隊，（指李峰說）你們的學校，他們真正的祕密的地方，我還沒找到。（指六中殺人的紅衛兵及西糾隊員。）

同學：我們又發現了一些，其實在校外。

江青：他們在學校呆不住嘛！

同學：我們認為市聯絡站沒有立場，把嚴肅的階級鬥爭看成哄小孩，對誰都一樣。（不分多數派，少數派。）

康生：這個意見對。

江青：我看這個聯絡站應該解散，就怕打仗，實際支持打。廖承志就是這樣，把階級鬥爭看成哄小孩，羅青長的孩子現在也打人，現在一個秘書長就了不起了。（面對同學）你們明白，我們是支持你們的，對他們酌情處理。

同學：西城分局的拘留所，西糾的人可以隨便出入。……

江青：我昨天解決了，他們幫了資產階級專政。

同學：我認為應該給無緣無故死去的同學平反，平反應該包括這些人，死得要有價值，要死得其所。（首長們連連點頭。）

同學：王光華昏死幾次，一醒就喊：「要文鬥，不要武鬥」，「堅持黨的政策」，最後五分鐘，給做人工呼吸後，還在喊。

江青：他是你們應該學習的英雄。

戚本禹：他喊「毛主席萬歲」了沒有？

同學：我記不清了，反正「要文鬥，不要武鬥」我記得清清楚楚。

戚本禹：他貼第一張反黨委的大字報，可以算左派學生。

江青：對！左派，左派！

同學：他出身算什麼？（講了他出身情況。）

戚本禹：不算資本家，小業主。

江青：不管什麼，看他表現嘛！（對同學）救活了嗎？

同學：說實在的，打人的還有董必武的兒子。

江青：董福三在哪兒？

同學：在廣州，聽說要辦個農場。

江青：（對姚）要廣州軍區注意，把他們（董及同夥）叫回來。

姚文元：那是陶鑄抓的。

江青：那……管他陶鑄呢！

同學：聯合行動委員會要弄中央文革。

陳伯達：六中的紅衛兵還要同我們辯論呢？

江青：不要理他們，該抓的抓起來，該平反的平反。

康生：你就說，我不同殺人兇手辯論！（氣憤）

江青：你們就是要辯論，像譚力夫臭哄哄，你們不要理他，不要同他們辯論，提高他們的身價幹什麼？你們要正正派派地搞政治，不要學他們搞特務，你們要揭發他們，要有膽量鬥爭，保證你們的安全，專政。我們幫助你們。我們接見你們晚了，應作自我批評。

同學：我們特別想見首長。

陳伯達：我們都是老百姓。



江青：不要看職位高低，只不過革命工作分工不同。

同學：六中教員幾十人到國務院要見負責同志，周不讓……

江青：碰到鬼了，你們可以質問周榮鑫：「你究竟支持不支持我們？」你們貼他的大字報，在國務院許明（國務院辦公廳秘書處工作，孔原之妻）貼我的大字報，你們可以貼她的。（對康老）康老，她還是你的學生呢？

康生：是啊！你們都是我的學生，「一分為二」嘛！

江青：許明是我的同學，在外辦，她們對你們什麼態度？她可能有裡通外國的問題呢！你們可以揭發她，沒有群眾壓力，她才不交代呢！

同學：（編輯部的同學向首長講印報困難，把三份戰報給陳伯達同志，其中談到《光明日報》印了一次）。

江青：穆欣同志可以幫助，解放軍應該幫助。（穆欣站起來答應）

康生：你們《光明日報》印了一下，值得表揚。

同學：我們第三期、第四期出版，隔了這麼長時間，還沒地方印呢！

江青：穆欣同志有責任，（穆欣解釋。）穆欣你虛心點，作自我批評吧！

同學：（又談到譚力夫的事）

江青：哎呀！譚力夫那套該上廁所的東西。

同學：（談一二·九以前的大反撲形勢，又說了打人和暗害事件。）大慶工人代表恨他們，說他們再這樣幹就……

同學：什麼是階級路線？

康生：什麼是階級路線，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就是階級路線，哪一條也不能少，他們就是不要第四條嘛，專橫跋扈，不講道理嘛！

同學：他們幹了這麼多壞事，公安局也不處理，我認為公安局有問題。

江青：要把幕後人揪出來就好了，昨天我們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公安局是有問題，它起了幫助資產階級的作用。最近我還聽說有一封控告新的公安局的信，……背景是多方面的，多數是犯了路線錯誤的人。（康生關切地把手帕遞給李峰擦眼。）

江青：這些孩子都睡眠不足。

同學：我們每天十二點，兩點睡覺，有時不睡，外面砸得很厲害，還搞

暗害。

江青：他們給你們製造壓力了。

同學：最近，成立那個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我校的王昌明說中央文革犯了錯誤，毛主席不在北京，就像上次派工作組一樣。

江青：謠言。王昌明是誰的孩子？

同學：全總王稼祥的孩子。

江青：是個造謠專家嗎？

同學：（又提到對聯）。

江青：這個對聯我看是有人故意提出來的。

同學：有人說中央首長肯定了。

江青：哪個中央？

同學：他們說是您。

江青：那次（八·六）他們就很反對我嘛！

同學：我認為個對聯是由來已久的。一年前，幹部子弟傳出一句話，說是主席說的，大意是現在有些幹部子弟表現不好，而一些剝削階級子弟表現積極，但政權不交給他們。好多幹部子弟把它寫在本子上。一年前，從石油附中傳來一個材料，平時幹部子弟就要聯合起來。後來康生在北大表示不同意，說黨的階級政策，在學校不是這樣，階級隊伍就是共產黨、共青團。我認為階級路線就是「十六條」中第五條，解決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階級政策是為它服務的。剛才同志提到紅衛兵內部有修正主義作風，我認為就是有修正主義紅衛兵。

江青：對一組織恐怕要慎重。

同學：他們說他們在學校受壓。

江青：幹部子弟受什麼壓。

同學：真正受壓的是工農子弟。

江青：對，是工農子弟。以後不要叫首長，這是四舊，可叫負責同志。

（同學反映方立功式的人物的情況。）

江青：比較起來是少數，但這些少數要注意。

陳伯達：方立功是盜竊犯。

江青：方立功怎麼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要實行專政，（向閻長貴問方立功父母的情況）抓方立功幕後人，他是董必武加流寇的作法。

同學：譚力夫回來了嗎？

康生：回來了。譚力夫、方立功都是些小人物。

江青：譚力夫決不要提，算小人物嘛！譚、方都是小人物。你們要批判王任重，他拖著我們犯錯誤，王任重給你們搞了，王這個人糟得要死，背著毛主席、背著中央、背著我們小組另搞一套，他得停職反省了。

同學：（談到幾個縱隊）。

江青：八一縱隊負責人是誰？

同學：賴銳銳。

江青：可以抓了。

同學：學校的同學至今不敢組織起來，壓得厲害。

江青：壓力，無形的壓力。

同學：對，無形的壓力。關於軍訓我不同意，我希望中學要大幹一場，亂，好多問題還沒辦嘛？路線鬥爭要搞（延長兩天）。

江青：剛反一個軍訓，集訓，又來一個軍訓。

同學：看來最近還要暗害呢！如六中九月末還打死一個同學，我比較瞭解。（敘述慘害經過。）

江青：救活了嗎？

同學：活了。

康生：被殺就因為他「變節」？

戚本禹：懷疑他揭發了西糾。

江青：都是革幹子弟，他們無法無天了。

同學：沒辦法。

江青：不怕，不怕，我們幫助你們。西糾大頭目叫孔丹，他父母都有問題。

同學：六中的教員要求中央接見，因周榮鑫不讓。

江青：這可能。

同學：（談到糾察隊）

江青：不要叫糾察隊，這個名字好像凌駕一切，我們不要這樣一批人，你們可以叫另外的，多做宣傳工作。

同學：他們不光是唯成分論，也是唯觀點論，觀點不同也打也罵。

康生：唯觀點論，我們倒是要唯觀點論。唯毛澤東思想觀點論。

同學：紅衛兵是否是階級隊伍，他們總說紅衛兵是階級隊伍。

江青：不是，它那能高於黨，他是青年學生的一種革命組織，你不能說修正主義分子，作為一個組織不是這樣。有分子是修正主義分子，說修正主義紅衛兵不好，這個組織在國際影響很大。（同學談到階級路線。）

江青：階級社會要講成分，這是本質，但要看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有背叛其本階級的人，這就是不要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現。

同學：其他勞動人民子弟，可不可以組織紅衛兵？

江青：可以。怎麼不可以？！只要是幹革命就好嘛！

同學：我們是提著腦袋幹革命的，隨時都準備著死！

江青：幹麼要死，要活嘛，幹革命！

同學：我們希望解放軍幫助我們搞軍訓。

另一同學：我不同意，中學運動必須大亂，剛剛搞起來，又要搞軍訓，等於阻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同學：軍訓有戰備意義。

另一同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戰備。

江青：現在一切服從文化大革命，這最重要，我的意見不派，派不是好辦法。

同學：總理講過。江青：什麼時候？同學：十一月九日。

江青：那天他還生氣，西糾打了解放軍記者，可能就講了，我們不是這樣。

同學：十五期社論講到一個特點，就是工人起來鬧革命，學生和工人，我們要不要到工廠去？

江青：暫時不去工廠，可以先到住宅區嘛！要一步一步嘛！

北醫長征紅衛兵總部、紅教工總部

## 康生與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青訓班的談話 (1967.1.10.)

【時間：一月十日上午十點半至一點半，地點：人民大會堂。】

找你們談談，你們一月五日的大字報，我覺得寫大字報好嘛！是一種好的大字報，找你們談談，瞭解瞭解你們怎麼想的。

然後康老又問：「你們都是哪個中學的！」這時曹軼歐同志插話說：「都是青訓班的，青34。」接著我們一一作了回答。

陳維克同志談到：以前對階級鬥爭認識不清。陳琪同志也接著說：我們以前開會總念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我們以前對錯誤不是認識不清楚，而是根本不認識的問題。康老就說：「在實踐中才能體會，就是林彪講的：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你們現在好嘛！經過思想，認識真理要千百次的反覆，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真理的認識要有千百次的反覆。」陳琪同志接著說：我們那個大字報還有所保留，現在確實認識到李廣文同志是堅定的革命左派。在工作中有錯誤和缺點。

康老：「個別缺點，個別錯誤，說錯了一句話，兩句話每人都有，要區別主流和非主流。我是看到你們青訓班，每次看到你們青訓班，我心裡有點慚愧，不是我自己檢查自己，事情不是我的，主要責任不是我的。但看到你們我心裡很難過，我對不住你們的父母，我八月間講過這個問題，看著你們立刻我就有一種心情。」

我直接管黨校是五九年的下半年，六零年下半年，六一年下半年，六二年下半年到六三年上半年，我直接管黨校是三年半，從五九年冬天到六三年夏天，我不是一開始管黨校也不是最後管你們，你們這班成立

時我不直接管黨校，陸定一管黨校，那是陸定一管黨校，一直到這次，把閻王殿打倒時，中央把黨校文化革命讓我管一下，你們青訓班成立時陸定一管黨校，但是我曾經知道這事情，說什麼黨校要召集青年訓練班，從小的時候就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時我是不贊成的，因為我覺到了林楓哩，他自己本身的時候哩，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沒有很好學習，他怎麼能夠領導青年哩！

林楓剛到黨校去時，我就說，你林楓，你自己應該建立毛澤東思想研究小組，你自己應該領導參加學習，你們那後來不是成立了一個毛澤東思想研究小組，成了林楓的秘書組，我覺得林楓這個人不是馬列主義，沒有什麼水準，他弄一個青年訓練班我懷疑，彭真黑幫同意，陸定一黑幫同意了，林楓又來問我，陸定一一直照管黨校，彭真又在書記處，我又不好反對，我當時說實驗一下吧！我當時是這樣一個心情，自己知道，但還試驗一下吧，所以說有責任。但是，我也好，陳伯達也好，我們的小孩都沒讓去。

我的小孩，小蘇不讓他去，陳伯達的小孩挑上了，也不讓他去，我經常檢討，自己小孩不讓去，把其他兒女去試驗了，這一點我常想到對這個問題的，這個沒有採取堅決反對的態度，當然堅決反對態度人家還是做了，但是也起一點作用。當時，我們寫文章去了，自己也不直接管黨校了，黨校是陸定一管，現在看一看這東西是什麼事哩！林楓、郭明秋組織青訓班的時候，實際上有一個用心，他要培養自己的幹部，現在看的清楚，把一些好的青年搞了去，培養他的，不是為黨培養青年幹部，而是為他的目的培養幹部。看著你們我就有這麼一個心情，但是你們也有好處，經過這一鍛鍊，把自己鍛鍊的會更好，所以也有一個好處，人是要經過鍛鍊。好了，我講的很多了，你們講講！

李建華：我們得先做自我批評，我們給黨造成了大損失，我的頭腦裡就有林楓的餘毒。康生馬上說：「對！有林楓的餘毒這句話講的好！我現在也在逐步瞭解，林楓這個人相當陰毒！事情都是逐漸認識的，林楓餘毒這個話講的好！」

康老講完，李建華同志接著講：回想起來，黨校運動中，我們沒有

起促進作用，而且增加了阻力，您五十人座談會講話後，我們沒有覺悟過來，有些同志還有些抵制情緒時，康生說：「那個事情，當時你們陷入，那話我說的還不夠那樣子澈底哩！當時不好講劉、鄧路線哩！劉是國家主席，是中央常委，有紀律，你們這個大字報上講的又大又深又厚又沉又重的黑蓋子，當時只能這樣講，不能那樣說，有紀律的，你們說話講長了，其實就這麼一句話，以後有的青年同志開始貼我大字報，袁寶樹同志說我把黨校弄的很神祕，他這話有點道理。又要告訴你們這個問題，但又不好直接講哩！我打斷了你的話，你繼續講。」

李建華說：有人說您六四年就知道林楓和楊獻珍的後臺都是彭真，那您為什麼還利用林楓打楊獻珍哩！

康生同志說：「那一次我公開同林楓講，是彭真揭出來後，劉少奇揭發前，那時在劉少奇家講的，守著劉少奇，那是怎麼講的呢？那時我問林楓，我幾次為了反對楊獻珍，王從吾，我幾次告訴你，你可以直接寫信給毛主席，甚至直接要求與毛主席談話，你根本不理，相反什麼事情你都找彭真，林楓當時怎麼說哩，他說，彭真不叫他去，他寫信給彭真，說向主席報告一下，彭真說，你向主席報告什麼哩！他實際上完全聽彭真那一套，談到這個時候我直接告訴林楓，反楊獻珍我督促你作了，楊獻珍後臺是彭真，我不敢告訴你，因為你與彭真很什麼，劉少奇在旁邊。」

李建華說：當談到陶鑄問題揭出來後，那種反動思潮又有所回升。

康生同志說：你提這個問題好，我估計會有這個問題，我一會兒也想講這個問題，李富春同志、李先念、譚震林、陳毅這四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某些場合說了一些錯話是有的，他們也在檢討，還有一個副總理謝富治，他們同陶鑄完全是兩回事，他們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他們大字報為什麼這麼多？他們背後有反撲逆流，有些人把矛頭要引向他們的。你們應該注意。

前天晚上在中南海西門有一部分人反譚震林，總理接見了他們，特別講了這個問題，這些同志反對彭真、反對劉、鄧還是堅決的，他們在具體工作上說錯了一些話，但是他們不是劉、鄧路線的，這一點方向千萬要注意。

給周總理的大字報，有一張很壞，是很壞的一個人貼的，要認清方向，堅持真理，這一點很重要，我估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一定會利用這個東西加以反撲，一定會利用這個東西。

李建華繼續彙報：反動逆流這種思潮的回升。

康生講：階級鬥爭是尖銳的！

李建華講：有人說陶鑄還是第四位哩。

康生講：「從排位子上不但陶鑄比我高，鄧小平還比我高呢！」說完大家都笑了。

李建華同志講：「紅戰團」的有一些同志決心自力更生幹到底。

康生講：「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這時老賈同志說：你們講餘毒大概有些人比你們餘毒還要深。

康生接著說：「盧國英寫信給了我，好像日常工作是他負責的。」

陳維克問：宋揚之他們是什麼性質？

李建華說：有人說把他們打成了反革命。

康生說：「還沒有打成反革命，要打成反革命不就到公安部去了嗎？」（相反地，我倒讓他們的家長做一些工作，昨天我才知道宋揚之常到姬部長那兒去，我打電話給姬鵬飛，我說他父母不在家，他經常到你們那兒去，本來我想同蘇振華同志講講，應把自己孩子經常注意一下），那個賴銳銳，賴傳珠的兒子同李洪山一道，很多幹部子弟是西城糾察隊，甚至董老有一個兒子也不好，自己投案了！是他們自己危險了，不是別人把他們打成反革命，相反的這些幹部子弟走到邪路上去，這個責任主要是林楓、郭明秋，主要是他們。

宋揚之父親同他（指姬鵬飛）在法國大使館工作過，他母親也在國外，小孩沒人管了！結果胡走道路。

蘇承德，我本來想看見蘇振華同志，有一個經驗，李井泉家兩個兒子，一個在清華，一個在（航空）學院，都站在反對林總，反主席，反對周總理方面，李井泉是政治局委員，他自己也不好，有不少大字報。

有一些高幹子弟要自己覺悟，不要把自己過錯推到別人身上，我對黨校，陳雲奎要在其他學校早就把他送到公安部去了，出了反動言論還



去盜竊文件，他自己還到處什麼……

李建國接著說：這種思想早就有了！

陳琪說：從青<sup>34</sup>變化我們自己準備揭露自己。

康生講：「這個好，真理很簡單，一個智純、武葆華反對林楓，受林楓打擊的，一個李廣文反林楓，受林楓反對，問題揭開後，還有人反對他們，主觀上是那樣，但客觀上是這樣，你比如黨校問題，我想把問題揭開後矛頭又對準我了，主觀上沒想保林，實質上……我把林楓揭開，結果有人反我。回頭這麼一想很簡單！丟開感情，丟開一切，客觀上想一想，正像姚旭講的：林楓高興，彭真他們高興，問題很簡單。」

康生還說：「由李廣文轉到我，由我轉到李廣文，很多話是什麼！有些人對我的態度也是不真誠的，你比如劉海藩那個問題，不是李廣文是我講的，林楓那時搞大字報，在北京是少見的，很成問題，那樣搞完全違犯了「十六條」，主席思想，劉海藩應該很好檢討一下。那事情不是李廣文的，現在推到李廣文頭上去了。」

康生同志說：問題不要糾纏到我，我有錯誤可以批判，問題是他們的大方向問題，方向不對頭，你們講的把主流丟了，這樣走必然越走越遠。

這時，呂玉春同志談到：「有些人他們說我們都是黨團員，黨中央說話了，我們服從組織決定，承認康生同志是革命左派。」

康生說：「問題不要糾纏到我，主要是方向問題。」

李建華同志繼續彙報說：「紅戰團」現在看許多同志有幹到底的決心，我們的大字報貼出後，有一部分人在考慮「紅戰團」的大方向，有一部分人在逐步升級，我個人看，將來說不定有人要炮轟您，康老低聲說：「那沒有問題，這是邪路。」

後李建華同志又講，以我自己的體會，我認為「紅戰團」的絕大多數同志是對兩條路線鬥爭的實質不理解，不認識。

康老馬上講：「就這個問題，你講的很對，方向沒有完全對頭，當然你說他革不革命，絕大多數是革命的，革命得有個方向吧！反對誰、贊成誰！是非得弄清楚。」

李建華又談到，我們過去確實對兩條路線鬥爭一點也不懂，兩條路

線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康生說：對！對！兩條路線是什麼東西？！很多的人不瞭解，甚至連紅旗隊的一些人，也不見得瞭解。至於康生對不對！是左派還是右派，這個不主要，是右派就打倒，是左派你一個人管什麼？在毛主席領導下，沒有你這個左派也不重要。

要看清一個路線問題，我向同志們談一下，關於黨校問題是逐漸認識的，包括楊獻珍也是逐漸認識的！五零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五四年一直病了五年多，這時五四年我在醫院，我對楊獻珍的認識，這個同志還研究過什麼學問，印象還不是很壞的，這個人是研究哲學的，可是有一點，主觀主義特別多，狹隘的非常厲害，我經常講拿楊獻珍作例子，但印象裡還不是壞人似的。

五四年我在醫院，有一天，他去醫院看我，拿著一個蘇聯社會科學院哲學教研室主任格列則爾曼給他的一封信給我看，當時我不懂怎麼回事，楊獻珍告訴我他五四年到蘇聯去，他有一個哲學教學總結帶到蘇聯去，經過一個中國人曾秀夫，把哲學教學總結後，交給蘇聯的格列則爾曼，然後格列則爾曼寫回一封信給楊獻珍，這封信在五五年一、二月間在《人民日報》上登過。他給我看的時候是五四年接信後不久，同時看了格列則爾曼的信以後，問：你怎麼到蘇聯去找到個曾秀夫，曾秀夫在中國名譽臭得很，是個死特務，陷害中國革命同志差不多都是他，凡是到過蘇聯的同志沒有不知道他的，沒有不說壞的，你怎麼通過他來轉文件哩！

現在看，曾秀夫是個湖北人，當時楊獻珍講曾秀夫在社會科學院學習，以後曾秀夫老婆孩子來北京與楊獻珍很好，黨校問題很複雜，黨校在楊獻珍時代有個裡通外國問題，這是一件事。另一件事，我看了格列則爾曼那封信，前面把楊獻珍吹捧了一頓，後頭拿蘇聯的經驗講，說蘇聯哲學上有過簡單化，庸俗化，貼標籤，我一看，我說這封信不好，是反對毛主席的，以後黑幫也這樣講，來源一方面是他們自己，另一方面是修正主義的影響，當時我告訴楊獻珍，蘇聯並不是這樣的那種人，借說他們說咱們，我一看就懂，這個東西是暗射我們的，我同楊獻珍

講，你不曉得蘇聯那些人是什麼手法，我曉得，你不要上當，當時楊獻珍不以為然，我當時從這方面想他不瞭解蘇聯的把戲，沒瞭解到他反對毛主席，他背後不聽我的勸告，後拿給劉少奇看，劉少奇很稱讚，就拿到《人民日報》發表了。

他有個裡通外國的問題，以後病好了後，從五七年接管黨校，沒直接管黨校，到六七年現在整是十年了，十年的鬥爭應當說從五七年楊獻珍的鬥爭，一直到王從吾、林楓的確是貫穿著兩條路線，一條是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路線，一條就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實際上這個鬥爭是從四八年高級黨校第一班開始的，那時我不在中央，是最近看了文件，郭丕衡大字報才知道。從第一班劉少奇作校長的時候開始的，你們去研究研究他在四八年的講話，就清楚了，實際上從四八年劉少奇當校長就開始了，當時校長首先是劉少奇，以後就是何凱豐，是高崗那個軍團的人，李卓然還搞了半年多，然後就是楊獻珍了，然後就是王從吾了，然後就是林楓了。將近十八年了，這樣一個歷史，校長是劉少奇、何凱豐，何凱豐是高崗時代的參謀長，李卓然是擁護高崗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從四八年就開始了，當時同逆流作鬥爭的是陳伯達同志，何凱豐當校長時，當時陳伯達已不當了！

陳伯達當時是反對他們的，實際上實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線。

四八年到五九年這一段，當時我是有病了，到華東，我只接觸到格列則爾曼一件事，這十年的兩條路線鬥爭我也不很清楚。有人說搞的很神祕，搞得很反感，前十年連我都不清楚，直到五七年我才接觸到黨校的問題，那麼這個是後十年了，這個也是逐漸認識的。第一次同楊獻珍作原則性的鬥爭，是五七年的上半年，鬥爭的問題是什麼問題哩，到底需要不需要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那個報告和主席三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這兩大重要著作。當時我同楊獻珍、侯維煜提議把黨校計畫講課停止，專門學習毛主席這兩大著作，遭到楊獻珍、侯維煜的堅決反對！因為那時我不管黨校，具體表現在短訓班，曹軼歐那時在短訓班，她回家的時候，我對她說：「你們應該停課學習毛主席的東西。」

當時楊獻珍、侯維煜反對，通過這個鬥爭，使我進一步覺悟到黨校對毛主席著作不重視，不把他看成是經典著作，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鬥爭現在找證人都可以找到，現在人還在哩！紅色聯絡站裡有個岳昭，岳昭最近給我寫信揭露這個問題，承認錯誤。（曹軼歐同志插話：岳昭不好。）康生說：「但是揭露還是好的，黨校對毛主席是拒絕的，採取抵制態度，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也是五七年，整風反右時，鬥爭的問題是高級黨校要不要整風反右的革命運動，那個時候楊獻珍、侯維煜包括范若愚、孫定國、伍輝文，當時認為黨校放假，不要整風反右運動，理由是黨校幹部都是各地方來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當時我反對了，這是整風反右是一次社會主義大革命嘛！難道黨校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嗎？這個影響到了彭真的黨校也放假，團校也放假，放假前還請我去講話，我去了，我大批評了這個東西，人家清華北大都搞文化大革命，你們為什麼放假？黨校有意把短訓班也弄走了，經過這一鬥爭才沒有放假。

直到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寫社論反對了，因此五月是右派向我們進攻的時候，羅隆基、章伯鈞等人向黨進攻。六月八日有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反擊，這時鄧小平、彭真、安子文要放假，藉口各地方需要幹部，回去說明整風反右。當時我堅決反對，這些學生對主席兩大著作沒有很好學習，他回去怎麼整風反右呢？組織部已決定放假，我就去找了彭真、陸定一去講了我的意見，他們又沒有辦法反對，才沒有放假。我反對了他們，這是第二次鬥爭。

第三次就是58年，鬥爭問題是關於黨校學習，黨校方針問題，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那個方針，還是用楊獻珍的「十六字」方針。大家知道「十六字」方針，是楊獻珍、侯維煜、劉少奇、彭真一塊制定的，叫做「學習理論，聯繫實際，提高認識，增強黨性」。本來這是抽象的。

學習理論，聯繫實際，還不提高認識，增強黨性嗎？這四句話表面上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用十六個字對抗毛主席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對幹部的提高方針。到底是用毛主席的還是用楊獻珍的，他當時

把「十六字」當聖經，在全國到處講，誰要不同就是離經叛道。上面有一個劉少奇打氣，後來我看到背後原來是對抗毛主席的方針的，這個時候我批評過，我說你這個東西不明確，沒有階級性，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明確方針。

我問過楊獻珍：你學習什麼理論？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還是學習修正主義的理論。你聯繫什麼實際？是提高革命認識，還是反革命的認識。增強黨性，是增強國民黨黨性，還是增強什麼黨性哩！為什麼不用毛主席的方針，而用這個，為什麼革命的不用呢？這個聯繫到黨校學習毛主席著作，經過鬥爭，表面上不要這個「十六字」方針了，以毛主席方針為主，但實際上還是不要毛主席的方針，這是第三次。

第四次，59年上半年，關於思維與存在是否有同一性問題，到底思維與存在有沒有同一性？楊獻珍認為沒有，這是毛主席的，毛主席認為在理論上認為是有的，蘇聯的米丁也認為沒有。

楊獻珍就打出這個東西，寫過一篇文章給「紅旗」，「紅旗」沒登，到我那兒去告狀，我說思維與存在沒同一性不對嘛！當時我好心哩！有一次請示一下主席，主席說：「為什麼沒有同一性呢？要沒有同一性，那麼辯證法在思維與存在上就不適用了。」

我告訴楊獻珍了，他又通過他的徒弟和他的朋友寫文章，還是反對。北京哲學所，關鋒那些人是反對他的。

第五次鬥爭，那是廬山會議了，反對主席，反對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這個你們都知道的了！

五九年這個鬥爭不僅同楊獻珍鬥爭，還同范若愚、伍輝文鬥爭，因為楊獻珍在黨校兩次反對主席的講話，范若愚、伍輝文封鎖中央。後來楊獻珍在廬山會議假反彭德懷，會後范若愚、伍輝文還不講，封鎖中央。後來，楊獻珍的講話，傳向東北遼寧省委，遼寧省委東北傳給我，讓我報告中央，我才知道。我找范若愚、伍輝文、許邦儀說：「黨校到底是楊獻珍的黨校還是毛主席的黨校！」最後他們沒辦法才批判楊獻珍。實質上彭真、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都支持楊獻珍，這是第五次。

第六次，一九六二年這時刮單幹風，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黨校也

好，組織部安子文也好，這個時候大反我了（大翻案了）。

現在宋揚之這些人反對康生，我很習慣了。十年十次反對。那時候我的黨籍都成問題了，侯維煜是中直黨委第一書記，王從吾是原省委書記，侯維煜要開除我的黨籍，我去控告，王從吾……當時他們說黨校有兩條路線鬥爭，這條算說對了，一條是假毛澤東思想，就是我，另一條是真毛澤東思想，是楊獻珍，說我是反楊獻珍的。另一方面反對我在工農中提倡工人學習毛主席著作，六二年真正組織上，我才是真正管黨校的了。簡報出了幾十期，不給我看，文件上寫著我的名字，康生轉中央，實質是不給我的，搞的很凶，手段很惡劣。

六二年十中全會時候，我批評了楊獻珍，在北戴河會議上，主席提出了矛盾問題，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把這股歪風打下去了，楊獻珍在十中全會上作了一點不痛不癢的自我批評。這是第六次。

第七次是六四年，楊獻珍打出一個「合二而一」，他明顯的反對主席，反對主席提倡的一分為二，這次鬥爭範圍就廣了，涉及到全國，這次就把他反毛澤東思想的面目揭開了。

第八次，去年春天，黨內問題也好，這裡面都有一個彭真問題，《海瑞罷官》問題，吳晗問題，聯繫到黨校反彭真問題。這個大字報比較清楚。

第九次，反對林楓、賈震的鬥爭。同時從這個鬥爭中才瞭解到彭真、安子文、楊獻珍等原來不是什麼共產黨員，而是一批叛徒。安子文這些人在劉少奇指示下，三六年在北京坐牢時，有一個「反共啟事」和國民黨一起反對共產黨。這個「反共啟事」是誰起草的呢？是楊獻珍起草的，彭真不是跟他一案。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問題揭露出來。

第十次即這次同劉、鄧路線鬥爭，才把黨校蓋子真正揭開。從五七年到現在十年中間黨校的確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條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

當時何凱豐、李卓然、楊獻珍、王從吾、林楓、賈震、支持他們的是劉少奇、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劉瀾濤，是劉少奇招降納判的叛徒們！

對黨校這個鬥爭我也是逐步認識的，逐步，一步步認識到。先認識

楊獻珍，後是王從吾、安子文、彭真，最後是劉少奇。我說揭開林楓僅是開始，後面還有一個又深又大的大蓋子還壓著，總起來，是實行毛澤東路線，是以毛澤東思想辦黨校，還是以劉少奇思想辦黨校。這才是黨校真正的蓋子，兩條路線鬥爭就在這個地方，包括幹部教育方針問題，包括反對毛主席著作的問題。實際上是兩條路線的問題。

我說黨校的問題，不要糾纏在我這方面，我沒多大關係，反林楓鬥爭的重要意義在什麼地方呢？因為林楓是彭真的最親密的一夥，所謂桃園三結義。在東北反對林總。

同時林楓是劉少奇的秘書，最親近的人，反對林楓的鬥爭同反對劉少奇是分不開的，問題是這樣這個重大問題。黨校是怎樣一個鬥爭，再講講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鬥爭是怎麼回事，這個問題不是簡單地劉、鄧路線50天鎮壓革命，這只是一部分。也不只是毛主席說的64年的形左實右，也不只是62年的單幹風，翻案風問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整個十七年貫串著這樣一條。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全國解放以後，是個什麼問題了？解放了以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是兩條路線的核心。劉少奇有這樣一種理論，這個理論同歐洲國民黨、托洛斯基、布哈林是一樣的，總起來就是「唯生產論」，什麼是「唯生產論」，就是講這樣一個理論，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足夠的水準的時候，那麼沒有條件實現社會主義，要實現社會主義就要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使資本主義經濟大大發展，使農村富農經濟大大發展，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理論列寧同社會民主黨、托洛斯基、布哈林作過鬥爭。毛主席解放十七年來，也貫串著這一鬥爭，劉少奇也是這些東西，劉少奇在各個時期貫徹著這個路線，剛剛解放不久，劉少奇在天津，你們在黨校這方面，很有成就，出了劉少奇的大字報（有李廣文、智純、武葆華的，有王中、郭丕衡的，有吳秉元的，還有其他方面的），最近紅旗隊出了一張傳單，說劉少奇是全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你們黨校對全國的貢獻。

兩條路線鬥爭貫穿著這樣一個鬥爭，劉少奇在天津講過，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勞動人民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這是

綱領性的兩句話，因此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實際上是一個綱領。他們認為沒拖拉機，沒有機械化不行，不能組織合作化，合作化組織起來反對搞合作化，發展到人民公社就反對人民公社。後來提出單幹，單幹打下去了，又提出六四年形「左」實右，反對四清運動，形「左」實右打下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他主張在城市發展資產階級，在農村發展富農經濟。什麼是社會主義！就是澈底清算私有制。文化大革命逐漸剷除消滅產生資本主義國家，是這麼一種鬥爭。這個鬥爭過去有，現在有，今後還會有，兩條道路鬥爭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

今天簡單地談一談，你們提出這個問題，什麼是兩條路線鬥爭要進一步去瞭解，什麼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路線你們進一步瞭解。從這個問題看，揭開林楓、反對林楓，這同反對彭真、反對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是分不開的。

所以你們考慮一下，過去的青34，以後的「紅戰團」大的方向對不對？的確抓到了一關鍵。如果不對，就會越走越遠。宋揚之、蘇承德走到邪路上去，這不是偶然的，「紅戰團」方向不對時必然有一部分人會覺悟的，必然會有一部分人走的更遠。所以我很欣賞你們經過一番摸索，然後覺悟，這個很好。你們簡單想一想，我領導黨校到把黨校蓋子揭開，把多少年反毛澤東思想這樣一個基地，我揭開後，有人把矛頭還指著我，這不是錯了嗎？

智純、武葆華、李廣文反對林楓，受林楓迫害打擊，結果林楓的問題揭開後還把矛頭指向他們，這個矛頭就錯了！這樣有兩種情況，一部分人會覺悟，會有一部分人走的更遠。

你們講的很對，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不能說李廣文是沒錯誤缺點，可笑的是把李廣文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甚至說成是以劉、鄧為代表的，這是很可笑的哩！人家還寫這方面的大字報，清華的一些材料還是跟你們要，這樣把兩條路線混亂了嘛！

你們這樣設想一下，假如李廣文犯很大錯誤，把李廣文趕走就行了！黨校必須有一個毛澤東思想的黨校，為建立毛澤東思想黨校，要澈



底批判劉、鄧、林這一連串。

有些青年人把問題看的很簡單，這多少年了，有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王從吾、陸定一、劉瀾濤，這麼簡單？不是一個王從吾、楊獻珍，後面有人，是劉少奇在掛帥，大家不太理解這個東西，我很歡迎你們覺悟；在這中間學鍛鍊，碰一個釘子覺悟提高一下，你們提出自覺不自覺地林楓殘餘是存在，特別是郭明秋青訓班搞一定水準人是駕馭不了的，搞一批小孩容易駕馭，當時搞到政策研究室全歸他管，我一看，糟糕了！這樣搞不出什麼名堂，當時沒看出陰謀來。

當時你們恐怕很高興的了！

認定了真理就堅持，有錯誤澈底揭露，我提倡你們學習古田會議決議，這是毛主席建軍建黨的重要綱領。這是方向。再學習一下《改造我們的學習》，一篇文章論述青年那一段也要學一下，有一篇文章叫《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生產和整風兩大運動的重要性》。

要批判劉、鄧這一套，是破了，還要立嘛！立毛澤東思想。

六月五日你們對了！……是啊，我們沒收林楓的文件，沒收了一些東西，你比如鄭德興，從林楓文件中看到他寫信給林楓，說智純、武葆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實質這是黑材料，智純、武葆華還不知道，鄭德興你自己知道，你應該自己把自己澈底揭開吧！文件中還有陳雲奎，鄭德興兩個人一起寫信反對馬列研究院揭林楓，甚至寫過林楓同志你指到哪裡我們打到哪裡去！反智純、武葆華就不對嘛！郭承認嘛！這樣像一個革命者樣子嗎？

李建華繼續彙報說：有些「紅戰團」的同志考慮問題不是從兩條路線實質去考慮，而是從小事考慮。

康老說：對！我說你們看看古田會議決議，還是一個「私」，在小團體上作文章，不是從公字上作文章，不是關心國家大事，而是關心身邊小事，從這方面想。

李建華同志彙報說：還有人考慮問題從人事關係方面考慮。

康老笑著說：還有這個道理呢？這不是新的東西嘍！薄一波在地質學院寫了一個批語，說反工作組就是反黨，以後師範大學搞了去了，地

質學院、師範大學幾個人到紅旗那裡去，林傑找見過他們，師範大學工作組長孫有漁追「左派」學生後臺老闆，現在看左派了，追譚厚蘭後臺老闆他們講了，這些右派學生為什麼呢？是有林傑支持，林傑再向上是關鋒，關鋒再向上是陳伯達，我，有文件呢！我們是黑線哩！

曹軼歐送回去時（指送所謂右派學生）還派偵察員哩，天天追查。天天追李廣文的時候，必然放鬆了劉、鄧，天天追我的時候必然地把兩條道路放鬆。（最近鄭德興寫了個信給我，盧國英也寫了信給我，一個是二號的，一個是六號的，一方面自己有錯誤了，寫著寫著矛頭上還是對著李廣文，那樣子矛頭還不會對。盧國英說：工作中存在著缺點錯誤，我要負責任，另外還講，同宋揚之、李赤有不同意見，但後面矛頭還是搞到李廣文身上。這個就不可能把自己錯誤改正，應把這個問題擺正）。

陳維克彙報說：「紅戰團」很多人有一個理論，把李廣文——康生中間劃一條線，反李廣文，擁護康老。

康老說：結果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弄混了，真正幫助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陳琪彙報說：「紅戰團」一部分同志抓住李廣文同志十一後的態度不放，說起碼應該檢討。

康老說：你給人家扣上一個帽子，人家怎麼說呢！

盧國英適當時我找他談談，他在黨校時間久了，五四年來的，看來盧國英給艾思奇當秘書，他沒有真正瞭解黨校兩條路線鬥爭。吳秉元理解我的話早，首先寫信，他瞭解黨校真正蓋子是劉少奇，盧國英反而抓李廣文。這時老賈同志才插話說：你們這種人在「紅戰團」是不少的，把李廣文……（略）

## 康生對青島市造反派談兩條路線鬥爭（1967.1.19.）

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只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更加集中的更加尖銳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它是長期就存在著的東西。

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本質的東西是什麼？同志們可以回想一下。它的本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自從全國解放、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這個問題就立刻地、尖銳地、明顯地表現出來。我們的國家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佈成立的。就在那一年的五月間，劉少奇就作那樣一個報告，也就是他從天津視察工作回到北京所作的那個報告。（這是我們後來從一個文件上看到的，那時我們還在山東）這個報告概括地說就是兩句話：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工人階級不被資本家剝削反而很痛苦，被資本家剝削反而很舒服。結論是什麼呢？五三年劉少奇在組織工作會議上所得的結論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實質上是說，中國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還得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種理論不是什麼新的，而是修正主義、社會民主黨反對馬克思主義共同的東西，從考茨基、蘇漢諾夫到托洛斯基、布哈林……儘管說法不同，但是共同點和結論卻是一樣的。就是說，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充分表達，生產力沒有達到一定的水準，農村還是落後分散，處在這樣條件的國家，在解放後就不能立刻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應該是讓資本發展到可以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再走。這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共同的東西，即生產力論。

可能你們圖書館裡有那麼一本內部參考書，即一九三零年考茨基寫的《陷入絕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他明顯地吹噓：十月革命應該是開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按俄國的環境，當時不能實行社會主義。他還狂妄地說：列寧完全違犯了馬克思主義，如果列寧是對的，那他多年以來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就要全部垮臺。其實，這種理論並不是一九三零年才有的，而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不久，俄國就有了很多這樣的理論。

當時孟什維克有個經濟學家蘇漢諾夫著了一本書《革命札記》。在這本書裡，蘇漢諾夫講：俄國城市的資本主義工廠發展水準很低，農村中的農民沒有文化，很落後，所以俄國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後來布爾什維克內部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也是這種理論。布哈林就說過：「發財吧！」

對於這種反動的理論，列寧都給予堅強而有力的駁斥。列寧在一九二三年所寫的《論俄國革命》這篇很短的文章裡，就駁斥了這個觀點。他說我國工人數量比其總人口是少的，但它可以與農民相結合，俄國的農民是贊成實行社會主義的。雖然生產力不如歐洲一些較發達的國家，但是從什麼書上見過有這樣的理論說不能這樣做；工人和農民的相結合，為什麼就不能先革命，再發展生產力呢？列寧還引用拿破倫的話：「先投入戰鬥，然後見分曉」；先把幹部培養好再去建設社會主義，那麼為什麼就不能在革命中培養幹部呢？

鄧子恢在一九五五年不是說過，合作社成立那麼多，會計就不夠用的了嗎！所以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沒有讀考茨基、蘇漢諾夫的書，但是階級的本能，修正主義的思想是沒有分界的。拿我國的具體情況講，我們的工業比俄國的更落後了，農村也更落後了，更沒有文化，所以有人就講「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中國工人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因此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基本東西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不只是在建國初期到現在存有這樣的問題，就是在今後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裡還會有這個問題。從農村合作化來說，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走社會主義道路，很難設想可以被富農經濟所包圍。如果有那樣的社會主義，也是假的。波蘭有百分之幾十的農村是個體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它在名義上是社會主義，而實質上則是資本主義的。那有農村是資本主義而城市是孤島的社會主義！？毛主席在解放後不久就立刻贊成從互助組發展到合作社。當時劉少奇是反對的，他認為沒有拖拉機、電氣化，就不能實現合作化；如果要實現的話，那就是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冒進的。那時山西老區要大搞合作社，劉少奇就提出反對。我前面引用的就是他（劉少奇）的批語，而毛主席就特別支援組織合作社。人民

不是沿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道路前進，而是沿著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道路向著社會主義前進的。於是合作社風起雲湧，有如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起來了。這樣就嚇壞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要動手砍掉。毛主席當時就批評了這些人是小腳女人，不相信群眾。《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就講了這個問題：歷史的前進是這些人無法抗拒的！低級社向著高級社發展，同樣遭到這些人反對。當著高級社轉為人民公社時，這一下子可不得了，彭德懷、黃克誠從軍隊裡跳出來，加以反對。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經過廬山會議，把這些人的反對打下去了。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兩條路線鬥爭的結束。當著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背信棄義，我國又遇到了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單幹風就在全國許多地方刮起來了，劉少奇、鄧小平又要起了他們那一套，特別是鄧小平說過：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單幹也好嘛！極力鼓吹單幹。這些人就像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一樣並沒有開過會，但單幹風、翻案風卻搞得很厲害。北戴河會議，十中全會，毛主席說形勢大好，講了階級、形勢和矛盾，澈底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人民公社不斷地發展、鞏固和壯大。

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沒有結束。資產階級在解放初期進行的這種鬥爭，主要是圍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具體地講也就是三大改造，改造所有制。所以這種鬥爭突出表現在經濟範疇。這不是說沒有政治範疇，有肅反，有抗美援朝運動。也不是說沒有思想範疇，有時有對《武訓傳》、《清宮秘史》、《紅樓夢》……的批判，但是重點是經濟範疇。這場鬥爭的結束基本上解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到了五七年，這種鬥爭主要表現在政治範疇，這就是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提出了「輪流坐莊」反動口號，但並不是沒有經濟範疇，如圍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上就有鬥爭。

從六二年起，思想範疇就更加突顯出來，開始是吳晗的《海瑞罷官》、孟超的《李慧娘》隨後就是周揚、習仲勳搞的《劉志丹》小說。還有薄一波等人搞的他們坐牢的小說（未發表），階級鬥爭深入到了靈魂。這裡邊也有經濟鬥爭相配合著，與單幹風結合在一起。去年有楊獻

珍的「合二而一」和劉少奇的形「左」實右，最後通過對彭、羅、陸、楊的鬥爭，開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為什麼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消除一切產生資本主義的因素。進行文化思想範疇的階級鬥爭，是因為資產階級懂得要推翻一個政權，就要首先從思想上做好輿論準備。《海瑞罷官》以至《劉志丹》小說，都是為製造輿論準備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殘餘，所以要觸及每一個人的靈魂。在文化大革命中，劉、鄧反動路線就更加暴露無遺了。

十七年來的歷史，就是在政治、經濟、思想範疇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為主的歷史。它的本質就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鬥爭以前有，現在有，今後還有。六三年的「二十五條」即《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就講清楚了這個問題，它遇到了抗拒，像譚啟龍這樣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絕不是偶然的！

蘇聯現代修正主義誣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天天寫文章、作報告，好像不寫文章罵我們，他睡不著覺。有兩種睡不著覺，我們忙得睡不著覺，修正主義嚇得睡不著覺。它們的文章反過來，覆過去，無非就是那麼幾句話。我們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說不是無產階級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我們說是文化革命，他們說這不是革命，是破壞文化。修正主義者已經墮落到連群眾運動的常識也不懂得了。革命運動總是先從學生、知識分子開始，然後發展到工廠和農村。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都是這樣。那是在資產階級專政時期。現在不同了，今天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革命運動的規律是相同的。這次運動從學校到了社會、機關，然後到了工廠、農村和軍隊。

不曉得你們青島的幹部對於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工廠有沒有抵觸。我知道有些幹部是很抵觸的。他們有一種理論是：工廠不同於學校。這句話抽象地講沒有毛病，當然工廠不同於學校啦！學校可以停課，工廠不能停工，否認它是不對的。第二種理論是說，工廠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工廠是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完成生產任務，品質也高，品種也好，

當然這些成績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得來的。這個不能否認！但不是說，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有一種理論是，工廠總是無產階級大本營，工人階級與學生不同。還說，工廠的幹部天天是搞生產，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抵觸情緒。有一次開會，我就講了這個問題，同志們想一想，一個是工廠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鬥爭；二是工廠有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三是社會主義的工廠能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四是社會主義的工廠能不能變為修正主義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工廠如果沒有，就不要搞了；如果有，工廠的文化大革命就某種程度上比學校的更重要。他不僅接觸上層建築，而且還接觸到經濟基礎的問題。

社會主義階段有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上有，工廠裡就沒有了嗎？工廠有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比學校裡還很厲害，他掌握人權、財權。學校頂多是留級、開除。工廠有人權，一開除就不得了，就要失業；要不就不給你提級，比學校裡抵制得還厲害，劉少奇搞工廠，雖然有些理論上沒有講，但實質上是以利潤為原則的，是利別爾曼的那一套。這樣，工廠裡有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就很明顯很清楚了。工廠能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幹部懂得農村是小生產，可以產生資本主義。工廠搞大生產，社會主義的工廠能否產生資本主義，很多幹部就沒有想過。什麼叫社會主義工廠？第一要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的，因為生產資料完全變了，是公有制，與過去不同了。因而工人勞動的性質變了。過去是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現在是為社會、為國家而勞動。因此，它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工廠。第二，為什麼社會主義的工廠還會產生資本主義？按列寧講：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存在資產階級的法權，還有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癥痕。具體說，生產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分配卻是以商品等價交換為原則的，是按勞付酬的。按馬克思的說法，這是資產階級法權殘餘。按勞付酬，現在還不能取消，相反的還要保護這個方針。因為它可以促進生產的發展。按勞付酬是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是資產階級法權殘餘。所以工廠裡一方面生產是社會主義的；另一方面報酬卻是資產階級法權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五章裡講，這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按勞付酬其實是不公平的。

一個沒結婚的青年小夥子，每月六十元，他一個人就是六十元，和一個有幾個孩子的老工人比較起來就很不一樣。另外還有等級差別，這就不可能不產生資產階級思想，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在農村是富農經濟，在工廠是廠長、經理等高薪階層，在文藝界裡有肖洛霍夫……。這樣上層建築就不知不覺地「和平演變」了，就由社會主義演變成資本主義。

劉少奇提出的新工廠要用合同工，主要是利潤原則。劉少奇說過，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能走向共產主義。這實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讀與劉少奇的有著根本的不同。瞭解這些情況，才能懂得工廠為什麼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起來。

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就會使革命進行的更加深入，更加澈底。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到這樣一個新階段：全國的全面性的階級鬥爭。只有在全國全面地深入地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鞏固！

工廠裡還有個思想，就是去年工交會議上，鄧小平作過這樣的報告，把革命同生產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說生產第一、政治第二。這個相當普遍。有的人說，我又革命，又生產，兩者並重，一半一半。最近報紙上摘錄了毛主席有關反對經濟主義的論述。林彪在軍隊問題也講過要突出政治，堅持四個第一。實際上這也是老問題，你們去翻翻看。

《列寧全集》的第32卷的《再論工會》裡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濟同政治比較起來說，政治是第一位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知識。布哈林說：也從政治出發，也從經濟出發。這是典型的折衷主義。如果不是以政治為第一，就會使蘇維埃制度滅亡。

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黨的建設，還是軍隊建設，經濟建設，都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黨的建設首先要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不是首先從組織解決問題，而是政治第一，政治是靈魂。紅與專的關係問題，軍隊問題，都是政治第一。甚至在科學方面也是這樣。同志們想一想，為什麼我國原子爆炸發展得這樣快，資產階級不懂得這一點。他們說，科學就像上樓，就像樓梯一樣，「共產黨不要樓梯，一下子跳上去



了！」他們覺得不好理解。但是我們說，我們的躍進，都是因為有毛澤東思想掛帥。他們是不可能懂得這一點的。在工廠裡，人的思想革命化了，精神變為物質。

六四年底，我到天津去，順便問了一下工廠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情況。因為一九五七年我去天津，到幾個工廠開過座談會，談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和哲學問題，我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工人階級直接掌握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件大事，楊獻珍在黨校時反我，說我提倡工人學哲學。我說，反我好，那還不是我提出來的，我還沒有那大本事啦！其實是工人自己搞的。所以六四年底，我到天津又問起這件事，總覺得工人階級掌握毛澤東思想是件大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人階級掌握毛澤東思想才是防止修正主義的重大措施。我看了工人一篇黑板報稿，說學習毛主席著作總要占點時間，從這個意義講，學習和生產的關係是減法，但人們學習了毛主席著作以後，人的思想變化了，機器變化了，生產變化了，在這個意義講，學習毛著又是乘法，文章寫得好，寫得生動，很辯證！要說這樣的文章，我們在房子裡是寫不出來的。我還問過近郊農村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人，他們對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很易理解，我就想到大學裡學哲學，越學越糊塗，而普通工人、農民很容易懂得這個問題。學了毛主席著作，人的思想變了，生產增加了，所以毛主席講《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革命不會破壞生產，相反地革命會促進生產。這個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會大大發展馬克思主義。

最近中央文革講不僅要讀語錄，還要讀一些毛主席著作。如「古田會議」、《反對自由主義》、《青年運動的方向》、整風的兩個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等等。這個問題很重要，左派力量大了，左派本身就要觸及到靈魂。有沒有自由主義、宗派主義？是大公無私，還是小公無私？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也要造我們頭腦中四舊的反。林彪說：「既要作為革命的動力，又要作為革命的對象。」最近林彪又指示：一個是革命性，一個是科學性，一個是組織紀律性。革命是火車頭，要有革命首創精神。你們就有這種精神，不是要接管嗎？但又要有

科學性，必須調查研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掌握毛澤東思想。又要有組織紀律性。你們要好好注意，我經常這樣想，我們文革小組在毛主席沒回北京前，劉、鄧使文革小組受壓抑，我覺得很放心，因為受壓抑的時候總要慎重，也不會翹起尾巴。毛主席回來了，把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打，文革小組威信起來了，解除了壓力，我很擔心，怕文革犯錯誤，因為這很容易驕傲、粗暴、倉促處理問題。左派也是這樣，壓抑解除後，要特別謹慎謙虛，戒驕戒躁。

有時候我們忙得不能坐下來把問題多思考一下，所以不容易放眼世界，現在運動到了左派要團結起來，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時候，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有兩個原因。有的幹部問：「十六條」指出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這個省也不好，那個省也不好，那麼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合不合《十六條》？你們犯了錯誤啦！保字型大小常常拿這個來反對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幹部也有這個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但是不曉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的意義上講是「整幹」運動，每個幹部都要整整，倒不是說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說要觸及靈魂嗎？觸及你的靈魂就不行嗎？你沒有靈魂嗎？你就那麼乾淨？北京紅衛兵說：「我們不是想把你打成右派，而是想把你們打成左派！有的人就不懂得這一點。」

現在又有個新問題，來了個奪權。又有問題了，實質上是像毛主席說的：過去我們到一個地方，是用解放軍打江山的辦法，解放那個地方接管了，不是通過群眾暴動，從底下起來接管的。軍隊佔領，軍隊接管，包括許多留用人員，當時是需要這樣的，現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眾運動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路就在這裡。接管有各種方式方法，有的完全接管，因為那些傢伙全是黑幫。

（我們插話：青島市委是不是全部接管？）那要看你們的具體情況，青島有個好條件，還有個王效禹。第二個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但對於某些人還要撤職留用，因為我們還有些具體事情，我們不熟，今天一個條子，明天一個條子，鬧得你頭昏眼花，不能

抓文化大革命了。第三種，輕一點的可以停職留用。第四種更輕一點的可以監督使用，你聽我的！這裡有的全部接管，有的撤職留用，有的停職留用，有的監督使用，這要看具體人，具體時間，還要看自己的力量怎麼樣。可能還有反覆，接了又下臺。你們要看見具體的情況。青島有個好條件，經過幾次反覆，還有個王效禹。譚啟龍讓王效禹當市長，可能是想拴住他，搞不好再把他轟下去。所以要有革命性，又要有科學性，要注意不用陷入被動狀態。具體問題你們來研究。革命不是繡花，但革命又是藝術，是有政策的，它也不是簡單的一衝就完了。……

## 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一） （1967.1.22.）（存目）

##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同體育界座談紀要 （1967.1.23.）（存目）

## 康生陪同阿爾巴尼亞希斯尼·卡博與清華大學學生 座談的講話（1967.1.25.）

希斯尼·卡博同志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毛澤東思想熱烈讚揚，對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讚揚，對我們中國紅衛兵的讚揚，我非常感謝（鼓掌）來清華大學訪問，這是我們全體同志、全體紅

衛兵戰友的最大的光榮。感謝他，他是代表中國人民的親密的朋友，阿爾巴尼亞的老戰友，在一九六〇年的布加勒斯特會上，我們是同赫魯曉夫戰鬥的朋友，歷史的教訓是很有趣味的，在那個會上同修正主義作鬥爭時，只有我們兩黨啊！（鼓掌）我們是少數派啊！（鼓掌）修正主義是多數派啊！同志們，可現在怎麼樣呢？現在馬列主義組織普及到五十多個國家，七十幾個組織。赫魯曉夫怎麼樣呢？從他的骯髒的道路上滾到墳墓裡去了。少數的看起來是微弱的。但進步的、革命的必然大大的發展，形式上大的，表面上是多數，但如果是反動的、反革命的，那麼他必然要一天天地衰亡下去。你們清華大學少數派的鬥爭就證明瞭這個真理。我們在布加勒斯特的鬥爭也證明瞭這個真理。上海工人造反派十一月時才一千多人，現在經過兩個月的鬥爭，已有一百萬人。這都證明瞭一個真理：只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沿著毛澤東道路走的時候。他的前途才是偉大的、光明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劉鄧路線一天天地崩潰下去。清華大學八個月的文化革命運動，我是第一次來。那時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排斥我，但是他們並沒有放過我。

七月二十七日，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單獨找我談話，他認為我是支持少數派的後臺老闆。當時我對你們的情況還不清楚，他們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們；對清華大學和師大一附中的看法我們之間有分歧。我說這兩個地方我沒有去過，我情況不太清楚。他說：你不清楚，我們清楚。你們談清華鎮壓蒯大富是錯誤的。我說：蒯大富是革命的。他說：不是。他們講：你們說是鎮壓，是不對的，不是鎮壓。我說：不是鎮壓是什麼？是辯論？世界上那有這樣的辯論，把人家關起來，把團籍搞掉了，這叫辯論嗎？他武斷地說：在辯論的時候，這樣也是有的。

陳伯達同志來過清華，比我瞭解情況，把陳伯達同志也請來。要辯論有三個條件：一、領導者不能先作政治結論；二、辯論雙方有平等權利；三、領導者要保護少數。清華不是這樣的。革命的、先進的，開始時常常是少數。保護少數問題，他同意了，沒話講。他怎樣保護少數呢？七月二十九日的講話中間談到了保護少數問題，李世權那樣的反革命他就去保護了，這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當時，我不認識蒯大富，也不認識你們，階級鬥爭也就是這樣。修正主義沒有國界，馬列主義也沒有國界。我們國家在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在霍查同志領導下，也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我們進行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熱情地讚揚了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讚揚了紅衛兵，霍查同志也讚揚了中國紅衛兵的。那怕我們隔著千山萬水，我們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

同志們聽到卡博同志的熱情談話，就可以看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阿爾巴尼亞人民，如何熱情地支持我們。我們黨，人民和紅衛兵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霍查同志和阿爾巴尼亞人民高度評價毛澤東思想。我們讀毛主席語錄，阿爾巴尼亞人民也同我們一樣，讀這本書。

在我訪問地拉那的時候，知道霍查同志從頭到尾地讀了這本書。一節一節地記下來。他是用法文版讀的，他並且要求我們能出阿爾巴尼亞文的。我們希望能很快出版，卡博同志回去的時候，可以帶回去。這就要求卡博同志多訪問一些時候。（卡博同志插話：這是一件好事情。）阿中兩黨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我們兩黨、兩國的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基礎上的。我們兩黨的團結是有著思想、歷史、戰鬥的基礎。我們兩黨是按照十月革命列寧主義原則基礎建立起來的。我們兩黨是沒有歐洲會議傳統，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一建黨就投入了激烈地戰鬥中的，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奪取政權的路線的。

我們兩個國家的解放是我們的人民，靠我們的黨，靠武裝起來把敵人打出去，推翻了敵人，建立了政權。而不像某些國家那樣，是蘇聯軍隊去的。靠我們自己，靠我們的人民，靠我們的黨，自己解放我們自己。請同志們看一看，我們兩黨的友誼是建立在這種共同的基礎上的。在反對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時候，我們兩黨親密地戰鬥在一起，親密地結合起來共同戰鬥。我們那個時期的事情同你們現在做的事情一樣的。什麼事情呢？這就是我們現在向資本主義道路的，頑固堅持反動路線的當權派奪權。在世界上我們支持各國革命派向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

國主義陣營，蘇聯赫魯曉夫集團的修正主義，以及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奪權。站在天安門，放眼全世界。不僅向中國的修正主義奪權，而且要支持世界上的革命左派向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去奪權。我們的任務是很大的，前途是很光明的，任務是很繁重的。你們不但在中國要奪權，你們也有支持各國革命派向世界上的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反動派奪權的義務。當我去年去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時候，中國的紅衛兵寫信給我，要我帶他們到國際上去串連。（笑）我說，現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阿爾巴尼亞人民，阿爾巴尼亞青年也同我們做一樣的事情。我們可以同他們聯合，同世界上一切革命派聯合，聯合一起共同去向莫斯科奪權，向美國華盛頓奪權，紐約奪權。因為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是能夠在全世界取得偉大的勝利。（掌聲）我們兩黨是這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我們兩個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戰鬥的集體。我們兩黨、兩國人民的這種友誼像亞得裡亞海的海水那樣深，像喀喇崑崙山那樣的崇高。所以毛澤東同志在給霍查同志的賀電報中講過：

「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賊集團，比起你們來，他們都不過是一杯黃土，而你們是聳入雲霄的高山。他們是跪倒在帝國主義面前的奴僕和爪牙，你們是敢於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戰鬥，敢於同世界上一切暴敵戰鬥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

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兩黨、兩國人民，一定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今天歡迎卡博同志、什圖拉同志到來的時候，表達了我們這種友誼的心情。清華如此，北大也如此，在北京如此，在上海也如此，學生如此，工人也如此，男同志如此，女同志也如此。我這個老頭如此，青年人也如此。（卡博同志插話：我們到青年學生中。我們感到年輕了。）

卡博同志，你們到了中國的任何地方，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感到我們的偉大的牢不可破的萬古長青的友誼。

讓我們高呼：以我們親密戰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偉大領袖恩維爾·霍查同志和我們的偉大領袖，阿爾巴尼亞人民的親密戰友毛澤東同志共同建立的友誼萬古長青！（熱烈鼓掌）恩維爾·霍查同志萬歲！（用阿文重複一遍）

（卡博同志用漢語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講話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參考）

轉抄《井岡山》報一月二十六增刊<sup>13</sup>

##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講話（1967.1.27.）

我完全同意伯達、江青同志的講話。我告訴你們一句話，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在工農起來了，真正馬列主義者是擁護我們的。蘇修天天罵我們，一個月出幾百篇罵我們的文章，空洞無味。罵我們無外三條：一、不是革命的；二、不是文化的；三、不是無產階級的。同學們要牢牢掌握毛澤東思想。我參加了一個會，林彪同志告訴我一句話：最最重要的是立場問題。最近接待外國朋友時，毛主席告訴我們：你們對大字報要一分為二，有的是革命的大字報，有的是不革命的大字報，有的是反革命的大字報。毛主席的詩詞有三十、有四十首的，有一個工廠叫我審查，其中有五首未發表的，其他絕大多數是假的，有的是黑幫分子鄧拓的，你們要注意。

革命要分清敵我，你們和敵人聯合反對自己人，革命的科學性是調查研究，我在學校裡向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楊獻珍、林楓作了十年的鬥

<sup>13</sup> 哈爾濱工農兵大學紅色造反團駐京聯絡站、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編，中國科學院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三集）。

爭。當時我說中央黨校是毛主席的黨校，不是楊獻珍的黨校，後來他們反對我，有劉少奇、鄧小平、安子文，決定校長是王從吾，權在他們的手裡。六四年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他反對毛主席的一分為二。黨校的十幾年來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堡壘，很痛心。

我告訴你們，學校有個劉××是林楓的走狗，他是「紅戰團」的，林楓是「紅旗」揭發出來被撤職的。「紅戰團」反對李廣文是轉移目標，「紅戰團」有個頭子王××同李洪山是有關係的。結果盧××就跑了，跑到你們那裡去了，造了許多謠言。資產階級造謠就是垂死掙紮，你們千萬不要上當。反動頭子是盧國英，還有蘇振華的兒子××，也是「紅戰團」的小頭子。還有一個海軍大校的兒子×××。

我要感謝你們，你們從反面幫了一個忙，現在我可以肯定講「紅戰團」是一個保林楓的黑組織。

我在黨校同他們做了十年的鬥爭，你們在黨校反對，實在不對頭，要提高警惕，要防止反革命破壞。搞革命一個是革命性，一個是科學性，另外還有一個紀律性，你們要從教訓中加強革命警惕性。<sup>14</sup>

## 康生、王力接見中共中央某部機關革命造反總部代表的談話（1967.2.2.）

【被接見者：某部機關革命造反總部兩名代表和有關同志】

康生同志：

（一）不讓我們的工作人員向已經參加你們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外國同志講文化大革命的情況，這種話不管什麼人說的都是錯誤的。

<sup>14</sup>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首長講話彙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北航「紅旗」翻印，1967年4月。



（二）向你們機關已經參加運動的外國同志談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時，要如實地反映情況。不能歪曲事實，挑撥兩黨的關係，任何人都不能這樣，這樣做是錯誤的。

（王力同志插話：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絕對不許我們任何人對兄弟黨同志進行挑撥離間，散佈流言蜚語，破壞兩黨的關係，如果有這種的情況，必須立即受紀律處分。如有反革命活動，要法辦。）

（三）至於外國同志之間有不同的觀點，比如說，兄弟黨的同志各寫各的大字報，談自己的觀點，這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的。

（四）（當康生同志問到在座一位同志的孩子的情況時說）要加強對孩子的教育，光聽小孩子的話是靠不住的。他們現在向你保密，千萬要注意，千萬要注意！現在不少高級幹部在這個問題上栽了跟鬥。現在外面有風聲，說「聯動」在中聯部有據點，在統戰部也有據點，這個教訓一定要注意。現在兒子和女兒講的一套不能完全聽。劉菊芬是劉寧一的女兒吧，成了清華的一個反面頭頭。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劉少奇的女兒劉濤，李井泉的兒子李黎風，還有喬冠華的兒子，我們千萬不要主觀。毛主席說過：「親者疏」，就是說我們要從疏遠的方面來看待自己的親人。你們要他們好好學習軍委八條，特別是最後一條。我跟好多人都講了，要勸勸他們。（王力同志插話，對著在座的一位同志說：我們應該有鮮明的態度，要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亮相，要站到毛主席的路線一邊，這個時候還不晚。最近毛主席指示，社論上也反覆講了這個問題，我們一些老幹部都要亮相，要站出來，表明自己的態度。機關那一套舊規章、舊制度統統要打垮，要群眾自己起來搞，群眾來監督。要打破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那一套。）

（五）外邊學生不能進來插手，不准到你們機關來奪權。（王力同志插話：堅決不能讓學生進駐，來了立即請他們出去）

（六）（革命造反總部的代表請康老對復興大路十八號的文化大革命作指示）今晚沒有時間了，以後再看吧！你們自己搞吧，我相信你們可以自己搞，自己放手幹。如果要我提意見的話，我就提一點意見：我覺得你們自己相信自己不夠，放手幹不夠。

你們三個部長還專門給我寫了一個奪權的請示報告，說「形勢很好，要奪權」，你們機關的請示太多了，這個也要請示，那個也要請示。部長請示我，要奪自己的權，這怎麼講得通呢？這還要給我寫報告？這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笑話，我在請示報告上面劃了一個大問號，不答覆！這像話嗎？真是荒唐！（王力同志插話：這是誰幹的，簡直荒唐得很。）

（這時，革命造反總部的代表扼要的說明，第三聯絡站還沒有成立，部裡向康老的請示就寫上了，伍修權同志就知道了「三聯」的領導人是誰，其矛頭是指向誰。革命群眾問伍修權同志怎麼知道的？他說：「憑印象來的」，「印象就是印象」，「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等等）

哦！我還不知道，單憑這個報告，就是大笑話，荒唐！

（王力同志插話：十七級以上的幹部要亮相，態度要鮮明，要站到革命造反派一邊。對他們要區別對待，根據社論上講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所有的革命幹部都要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勞。我們應該很好地參加這場文化大革命。）<sup>15</sup>

## 陳伯達、康生、江青審查一九六六年國慶影片時的講話（1967.2.4.）

【二月四日晚，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同志重新審查了重新錄製的電影《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現將審查時的意見整理如下。】

放映前我們向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彙報了生產情況，並彙報說：這部影片是在師大「井崗山」，礦院「東方紅」和地院「東方紅」

<sup>15</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2）》，1967年3月。

等院校革命造反派同學大力協助下製成的。康生同志問：有沒有北航「紅旗」？我們說：我們去請他們了，他們太忙，抽不出人，沒有來。

片子放完後，江青同志說：「這部片子，我看過三次了，他們搞的比上次好。」

康生同志說：「我看過一次，這次搞的很活潑，政治上好一些。」  
「幾次國慶日，這次人最多，高舉毛主席語錄，表現主席思想真正深入人心，許多大場面，像是人的海洋，很好，應該多些。」

江青同志同意康生同志的意見，並說：「遊行結束後，人們擁向天安門的場面非常好，如潮湧。」

江青、康生同志意見，讓在影片中加上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等同志的鏡頭。

康生同志提議加上紐西蘭共產黨海因斯的鏡頭，江青同志說：「不加也可以，外賓已經不少了。」江青同志讓把元帥的鏡頭剪短些，太長了。

對太陽升起後，第一次出現毛主席的鏡頭，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都認為不錯。但畫面是天安門的東角，像是在告別，江青同志讓換上一個毛主席正在招手，情緒好的鏡頭。

江青同志三次提出解說干擾效果的問題。她說：「近景氣氛聲音小，效果氣氛不好，老聽一個人解說，超過了效果，」現場人們的歡呼「毛主席萬歲！」和「我們要見毛主席！」的聲音最真實、最興奮、最能激動人心，那時人們都注意看，解說聲音不能提高畫面的效果，應該聽群眾的聲音和講話。

陳伯達同志說：「前面的鏡頭，工人農民少了。」

我們問康生同志對解說詞有什麼意見。康生同志說沒有。

關於吳德的問題，研究了半天。最後，江青、康生同志的意見是：能做技術處理就重拍。把他卡掉。不能處理的話，就換成群眾聽的鏡頭。我們說：「有些重要鏡頭遠處還看得出劉少奇、陶鑄等人。」

江青同志說：「我們沒看見，你們看的次數太多了。」

關於文革小組成員的鏡頭，江青同志說：「去掉畫面穆欣等兩人，留下右邊二人。」後來又說：「沒有關係，一晃就過去了，不認識。」

我們彙報說：晚上看焰火時，王新亭在主席身邊。康生同志說：「主席情緒很好，不要剪。」江青同志說：「王新亭沒有什麼大問題。」並問康生同志的意見，康生同志表示同意。

最後決定不看影片，看第一個拷貝。

審查《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雙片後，又看了我廠攝製的《橫掃五氣》、《在激流中》、《詩人杜甫》三部毒草片。

在看《橫掃五氣》時，江青同志不止一次氣憤地說：「太醜惡了，太醜惡了！太糟糕了，簡直亂七八糟。」在看到五氣的醜態表演時，江青同志生氣地說：「我們的幹部就這樣呀？簡直是糟蹋我們。」

《橫掃五氣》剛開始不久，陳伯達同志就說：「簡直不敢看」，氣憤地離開了，影片快放完才回來，還一再氣憤地說：「簡直不敢看。」

看到魁星點出了「橫掃五氣大躍進」字樣時，他們都非常氣憤。江青同志說：「新聞片可以放這些東西？」康生同志說：「怪事！」

看《在激流中》時江青同志看到筏木工人在激流中搏鬥中時說：「這很危險嘛！」我們說：「這是故意搞的。」工人操作時都是有保護帶的，他們拍片時讓工人拿掉。工人和過去一樣，生命沒有保障。我們還彙報說：「這部影片得到了鄧拓的讚賞，還得了『百花獎』」。看到一些驚險鏡頭時，江青同志問：「是怎樣拍的？」舒世俊同志作了介紹。江青同志說：「你們很下功夫哪！」聽到一些解說詞，我們說這都是黑話，江青同志點點頭。

看到《詩人杜甫》，我們介紹這部影片拍攝時的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看到職員表時，康生同志說：「噢！阿英、馮至、王冶秋，是這些人搞的呀？」

看片的過程中，江青同志說：「這些東西符合阿英他們的陰暗心裡，這個表現手法很隱晦，工農兵看不懂，只能麻痹革命意志，但是他們的人聽得懂。」當聽到解說詞中引用杜甫的詩句時，江青同志問：「是怎麼拍的？舒世俊同志做瞭解釋。」江青同志說：「他們花了許多功夫，拿著國家的錢，任意揮霍，還放毒。」

我們彙報說：「一九六二年膠片很困難，他們把《農村簡報》都停了，工農業片子很少拍，但卻花很多膠片去拍這些片子，他們說：『拍工農兵沒有形象。』」江青同志驚奇地問：「什麼？拍工農兵沒有形象！」影片的後一部分，杜甫死後拍一個滿地落花的鏡頭，江青同志看了很氣憤地說：「很灰暗，怎麼這樣表現？」

看了片中毛主席參觀杜甫草堂時，江青同志氣憤地說：「真糟糕，旁邊還有個李井泉。」我們說：「他們故意亂用主席來抬高杜甫的身分。」江青同志點點頭。

影片解釋詞說：「毛主席翻閱了各種版本的杜詩，對杜甫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江青同志說：「那才不是哪！毛主席才不那麼喜歡他們的詩哪！」康生同志說：「影片中引用的杜詩都不是杜甫的好詩句。」江青同志說：「他們選的都是很陰暗的，符合他們心理的詩句。」<sup>16</sup>

##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團時的談話（1967.3.2.）

【時間：3.2夜至3.3凌晨，地點：人大會堂西會議室。出席：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穆欣。】

### 一、關於如何對待人民解放軍

康生：南京有衝軍區的沒有？（代表：八一醫院發生過）你們要和他們（指八一醫院）鬥爭，要反對，到處貼他們的大字報。

當前對待解放軍的態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嶺，是一個標誌。因為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部隊，是林副主席在那裡親自領導的。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是保衛

<sup>16</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2）》，1967年3月。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有力工具。要奪好權、黨好權、主要靠你們，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軍。一定要擁護解放軍、支持解放軍、依靠解放軍。不管什麼理由，在當前情況下，衝擊解放軍就是反革命行為。要堅決執行軍委八條命令，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簽字的。

軍隊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是正確的，但不能支持一派、打擊另一派，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不然的話，就會捲入他們的宗派鬥爭中去了。

## 二、關於「亮相」

康生：「亮相」好像是說化了妝出來唱戲，下了妝後還是原樣，這不叫「亮相」。要有革命行動，要真正出來革命才行。

態度要鮮明。提倡什麼，擁護什麼，反對什麼，贊成什麼，必須鮮明，不能折衷。亮相不是為了保烏紗帽。

關鋒：亮相就是公開站出來揭發問題。

王力：亮相必須有鮮明的旗幟，真正站出來和群眾一道揭發他們是怎樣搞陰謀的，怎樣鎮壓群眾的，並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然後跟群眾一起鬧革命。「亮相」這個詞是可以借用的，但要作科學的解釋，不能作庸俗的理解。領導幹部要到群眾中去亮相才能算數，才能看得出來（真假）。

## 三、關於「三結合」

康生：根據「紅旗」四期社論，對老幹部要全面的看，要從他們的整個歷史，也從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表現來全面的分析。在一定時期，對他們加以保護是一回事，把他們作為革命領導幹部，搞「三結合」又是另一回事。因為「三結合」是指革命的「三結合」，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三結合」。

叫江渭清來北京，是要開導他，承認錯誤，是很好的檢查。中央並未對他說「三結合」。

伯達：你們可以考慮一下，那些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誰可以作為「三結合」的核心人物，這要從實際行動中考察。只要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差一點（指能力）也可以。那麼多幹部總會有的。大致上是不错的，旗幟是鮮明的，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就可以。有的是要爭取團結他們，但不能作為「三結合」的核心。

關鋒：請他們掛帥，作領導核心，跟爭取團結他們是兩回事。

#### 四、關於江蘇省委

王力：江蘇省委幹了些什麼事，要充分揭發。對於江渭清，單憑江蘇飯店「一·三」事件，就應該打倒。江蘇省委已經搞到頂點了，夠嚴重的了，應該徹底揭露江蘇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決問題。江渭清好？還是高嘯平好（代表：沒有多大區別……江渭清更壞。）你們要冷靜考慮，不要感情用事。根本的界限是看他站在那一邊。

關鋒：李世英、陳光，你們不起來揭發江渭清、彭沖在過去幹的那些壞事，憑什麼搞「三結合」？！

康生：我有兩句話。一句是杜方平說：「至今還看不見省委有什麼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線上、原則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張建山說的：「直到現在還看不到省委有什麼革命行動。」（王力：直到現在，他們對中央文革還是敵對的！）建議你們省委聽聽他們的意見，拿這兩句話，很好地檢查自己的行動。

以江渭清為首的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些什麼事？反對了什麼？……我們還是希望他們挺身而出，堅定的站在主席一邊，反對劉、鄧路線，和革命同志一起將江蘇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革命的組織打你們，不是為了把你們打成右派，而是要打成左派。自己要爭作「三結合」的對象，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堅定的成員。我們對這些同志寄予希望，但自己也要創造條件。李世英、包厚昌參加了生產委員會，你們不要以為有人支持，就有資本了，已經亮相了。參加生產委員會，並不等於在原則上（和錯

誤路線)分裂。希望省委挺身而出。旗幟鮮明。

## 五、關於宣傳工作

康生：你們要把宣傳工作好好檢查一下，從你們的報紙上看，你們的宣傳工作不太好。……馬路新聞不要相信。……你們在北京住了這麼多天，好的東北要學，不好的東西不要帶回去，比如有個「百醜圖」你們不要搞那個，那是自己給自己抹黑。本來他們是一小撮分散的，被群眾包圍著的，你們把他們集中到了一起，本來他們沒有組織起來，你們卻把他們組織起來了。結果群眾一看，呵，這麼多！而且很快傳到香港登了報，兩三天就又到了莫斯科。大高帽子、持黑牌子……，你們要說服群眾，不要這麼搞。毛主席說造反有理嘛！這麼幹說明你們沒理可說了。還有「砸爛×××有狗頭」，陳伯達同志說要把這個「砸」字砸碎。罵人不等於戰鬥。比如說：「×××混蛋」，這能增加他們攻擊我們的資本。我們的講話，你們不要出大字報，不要登報紙。

關鋒：報紙必須成為無產階級的報紙，不能成為一個集團的，不能成為「集體所有制」。

## 六、關於幾個口號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內部必須大亂」，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搶萬歲」，你們那裡是「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所有這些，都是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為中心提出來的。中央的精神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們提出這樣的口號，內部互相打，放鬆了敵人，這才是真的形「左」實右，要堅決反對！「革命的打、砸、搶萬歲！」那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動。（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為！）

一九四九年我們解放上海、南京時，工人還組織起來護廠，而現在都要砸？！

關鋒：「江蘇的天下是『紅總』的天下」的口號，是宗派主義的口號。



江蘇是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天下，是江蘇人民的天下。

## 七、關於「私心雜念」、「內部整風」

康生：你們到北京來，總理接見了幾次，不要回去就寫大字報說總理接見了我們幾次，用來壓對方。這樣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實際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主席著作、中央文件、《人民日報》和「紅旗」社論以及報紙上的好文章，要好好地學。我看你們學的不夠，天天鬧鬧嚷嚷。你們主動檢查自己好，人家報紙上有錯誤，你們報紙上有沒有？人家有些缺點，我們有沒有？人家有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看自己有沒有？你看人家奪權委員會中有幾個成員不大好，可不可以檢查一下自己組織內部純不純，是否也有不大好的？共產黨內還有彭、陸、羅、楊，我們不相信一個群眾組織內就沒有。敵人不但在外部反對我們，也會鑽進我們的內部來反對我們。思想上的整風很重要，組織上的純潔性也很重要。我們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破私立公，改造我們的世界觀。我們反對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同時我們腦子裡也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也有敵人，也必須反對它。

## 八、關於反動、保守組織

康生：赤衛隊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壞人總是一小撮，多數人是可以爭取的。

關鋒：要把群眾和核心領導人分開，多數人是可以爭取、團結、教育的。<sup>17</sup>

<sup>1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1967年4月。

## 陳伯達、康生談蕭華（1967.3.3.）

（1967年3月3日晚）

三月三日晚，中央軍委辦公室在人大會堂召開總政部門幹部會。周總理、陳伯達、康生、葉劍英、聶榮臻、蕭華、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等中央領導同志出席了會議。蕭華同志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時間內所犯的錯誤作了誠懇的沉痛的檢查。

陳伯達同志講話指出：

蕭華同志從一個紅小鬼到現在總政主任，一直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親自培養下，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四十來年的鬥爭中，一直站在毛主席一邊。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堅持毛主席路線，反對彭德懷、王明的路線，在東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方面，支持林副主席，反對彭真。解放後，歷次運動都起了積極作用。在反對饒漱石、高崗、彭德懷、黃克誠等鬥爭中，都站在第一線，尤其在與彭、羅、陸、楊的鬥爭中，是很堅定的。在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中，也是堅定站在毛主席一邊的。由於長期有病，直到八月十日才回來，在一段時間內犯了些錯誤。但從他的整個歷史來看，他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康生同志說：

蕭華同志在與羅瑞卿鬥爭中起了積極作用，在去年四月和五月都與彭真作過堅決鬥爭。五月十六日中央發的通知，蕭華同志堅決要把彭真的名從紅紙上去掉。

##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3.5.）

【根據記錄整理，未經首長審閱。接見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側廳會

議室。被接見的：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團26人，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33人。】

周總理、康生等同志走進會場，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高呼「毛主席萬歲！」

周總理、康老進來後，總理說：張建山樣子有點像蒯大富，是蘇北人樣子。

康老說：那裡，都是蘇北人的面孔嘛！

總理問雙方代表：全來了吧？（答：都來了。）葛忠龍呢？葛忠龍回去了？（答：回去了。）丁日泗也回去了吧？（答：回去了）雙方都回去人了。回去罰跪是他（指丁日泗）嗎？（答：不是。是曹洪濤。）今天沒有更多的話要說了，康老已代表中央文革說了話，中央文革同志也在這裡，伯達同志也代表中央文革說了話，我也多次接見，說過了。因情況複雜，所以耽擱的時間長了一點，今天商量了一個共同的認識。江蘇一月份形勢確實很好，正在開展，但有個最大的弱點，就是省委領導人裡沒有站出來檢討批判，一直未站出來，這是對奪權鬥爭很不利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軍隊得到通知，支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革命的「三結合」比較晚，在二十日之後，正式文件是二十三日發的。本來有個好處，參加工作組的解放軍是支持左派的，同情你們，但不能介入，只能在外面同情。最直接的問題是造反派本身，首先表現在學生，工人和其他方面。革命造反派中形成幾個派別，主要是兩個，本來是一道，八月份起來鬥爭的。從南大「八·二七」開始，然後影響到其他學校。南大門爭更早了，以反匡亞明開始，北京、西安、南京是全國最早的，三大：北大、南大、西交大，我們一提起來就想起這三個學校。文化革命發展半年多了，工人起來了。今年一月三日，有一次鬥爭發生了武打，「一·三」之前，十一月份，比上海還有個有利條件，上海發生安亭事件，受上海影響，工人就起來了，受上海的影響嘛！上海有張春橋、姚

文元，是中央文革派去幫助的，在上海取得了經驗，我們從群眾中取得經驗，在工人中除了紅衛兵外可以組織，憲法上有個自由嘛！只要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大方向下，成立組織是許可的。同意了上海，原則上就同意了全國。這時正好，南京工人起來了，我們同意了南京工人組織，工人組織也就起來了！跟著，江蘇省委和上海市委一樣，犯了錯誤，比上海更嚴重，用赤衛隊對抗，「一·三」就交鋒了。跟上海一樣，保守派也來請願了，實際上後面有人指使。我們打過多少次電話，阻止住了。後來發生了江蘇飯店流血衝突，革命造反派取得勝利，這還是個好形勢。

南大八·二七起來了，工人運動發展啦，「一·三」是保守派挑起的，革命工人與學生站在一起，取得了勝利，這個形勢向好的發展。但是，到月底造成了分裂的形勢。嚴格說來，排斥南京「八·二七」，排擠一派，奪權派應負主要責任。我給文鳳來，張建山講，他們也承認了。最關鍵的是奪了權了，《新華日報》也在這派手裡。準備在「一·三零」召開大會，三十萬人。南京「八·二七」這一派寫了個聲明（指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等單位二十九日的聯合聲明——整理者注），承認這個奪權，但認為有嚴重錯誤，還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個態度很好。那是個關鍵，如果《新華日報》同意登了，就好了嘛，但奪權方面拒絕了。第二天南京「八·二七」去了五萬人參加大會，照顧團結，把奪權鬥爭推向前進。可是奪權派找了個反對南京「八·二七」的中學生上臺發言，批評了南京「八·二七」，說他是站過來了，這樣不僅不登聲明，犯了嚴重錯誤。聲明很好嘛！這個態度很好嘛！很合乎我們的要求。第二天還當場指責人家，這樣越走越錯，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錯。奪了權，不是向好處發展。奪了權有嚴重錯誤，不是糾正錯誤，而是錯上加錯。關鍵是聲明，是「一·三零」大會。確實，奪了權，在公安機關設起監獄，掛起牌子來了。你們行使了權，對方就受壓制。你們提的口號是在壓制人的，「誰反對一·二六奪權就是反革命」。在《新華日報》上登了：「誰反對一·二六奪權就是反革命」，「一·二六奪權好得很」。一直登到十八

號，還在登，還有文章，長篇文章！這樣向錯處發展，錯上加錯！這就是就幾個大的方面說的。

「一·二六」之後打、砸、搶發生了，打、砸、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這不僅不是革命的「三結合」聯合奪權，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我們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革命的「三結合」奪權。「三結合」暫時沒搞起來，有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也是允許的。但這樣變成一派的權力機關，這樣的權力機關，我們不能承認。我們必須考慮另外的辦法，不能看這趨勢發展了。這不僅我這樣說，就是奪權的負責人，回去之後，回來，我找了張建山，葛忠龍。張建山一見我就說：認識到奪了權掌不了權要犯罪，不改正就成了犯罪。我很感動，這還是誠懇的。他說：各廳局都來問我這事，那事，我還是未畢業的大學生，怎麼知道，不好回答。這個態度還是好的。

這不僅是沒有「三結合」，就是「三結合」晚些，總應該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我們根據雙方表示，覺得應在革命派聯合之前，「三結合」條件成熟之前，搞一個過渡，實質是軍事管制，但不宣佈，在邊疆搞了也不宣佈。我們現在抓生產也是請的軍區。從二十八號到三月二號開了個農業生產會三天，也是省軍區主持的，有省、地、縣三級參加。現在「抓革命、促生產」也委託軍區。用什麼組織什麼形式，將來大軍區、省軍區一道宣佈。怎麼行使還要軍區同志說，由軍區同志宣佈。現在由軍區行使臨時權力，這是中央肯定的，已向毛主席報告了。你們回去不要忙於在報紙上宣佈，一般不宣佈，貼告示，回去要把意見說清。

只有這樣，軍管的臨時機構才能推進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有利於推動省委，人委各部委人站出來檢討，向群眾表態。由群眾作統一尺度，決定於群眾。（轉對在場的省委幹部講）你們問了康老，問底，康老說了，我們的底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底是群眾。今天跟省委幹部也說了，任何人都要在群眾面前接受考驗。一個是認識自己的錯誤，當然主要責任是江渭清負了，既要劃清界線，又要把自己的責任說清楚，軍事權力機構幫助。另一方面抓生產，搞好工作。主要是軍事機關負責，但你們也要抓，立功贖罪，將功補過，要有行動，要實踐。否則，口說無

憑。只有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派。

因為發展快，隊伍一大，主要方面是革命的，是左派，但由於組織擴大，中間，偏右的也吸收進來啦。學生組織中有，工人組織中有，各機關組織中也有。各組織自己本身要有一個整頓，大聯合本身要有整頓，這也是要臨時軍管權力機構推動。南京主要三個學校，南大、南工，這兩個比較大，還有其他的。你們可以搞軍事政治訓練嘛！要開門整風。工人組織也需要整風，軍事機關幫助。你們實行軍事政治訓練，實際上是整風。還是以政治學習為主，學習「毛著」時間要長，要比軍事訓練的時間多。也可以選一、二個工廠，利用生產業餘時間訓練，作典型，由軍區安排。最近毛主席已經批了北京學校軍訓的經驗。工廠怎樣訓練還是新問題，將來總結好經驗，將來公佈。這是說明整頓組織的好辦法。

思想整頓，組織整頓，大聯合啦，省市某些幹部又為群眾通過了，真正能參加「三結合」，軍隊也有準備了，革命的「三結合」也就水到渠成了。剛才說了一、二月的曲折，還不如把奪權時間拖長一點，也不是二次奪權的問題，而是真正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三結合」奪權。這是一個總的方面。

具體來說，在軍事管制中，既要抓革命，又要抓生產。一個班子還是兩個，由軍區商量後再公佈。生產方面，不僅要抓農業，還要抓工交，財貿。江蘇有力量搞，江蘇有大軍區，而且有省軍區，還有野戰部隊，條件很好，完全可以抽出力量到農村、工廠、學校去，還可以搞宣傳。有緊急行動時，可以調動。東北有這種情況，工廠中幾派鬥爭，經常離開工作崗位，爭論不休，特別不按貴陽棉紡廠的按系統組織，開會各系統都有一部分人參加，就要有一部分人停工。這就要按報上登的貴陽經驗推薦，很多地方都這樣做了。凡是做了的，生產趕上去了。江蘇大中城市比較多，但野戰部隊也不少，不僅抓工業農業，還要抓財貿交通。江蘇不僅供應江蘇，還有供應上海的任務。上海不僅要靠郊區十個縣，還要靠江、浙二省。工人要按照這樣的系統來調整。儘管一個工廠有幾派，譬如說屬於「紅總」，「八·二七」，可以協商，按照生產行政系統組織嘛！業餘時間開會，生產時即使在一個小組裡，也不能互相

爭論。如果有這樣的規定，大家是會守秩序的，工人同志是懂得這個道理的，這對生產有利嘛！對工人階級，對整個國家有利。不管哪個地方奪權都要以本單位的革命造反派為主。二月二十一日軍委發了一個通知，除第七條外，地方也適用。我們做了五點補充。奪權以本單位造反派為主。除了必要時，才由外單位協助。從十一月到現在已四個月了，自己的力量已培養起來了，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了，總要離開襁褓嘛！這是講組織方面，生產方面。下面更具體一點：

(1) 首先是專政機構。除軍隊外，就是公安機關，就是要鎮壓反革命，還要管制違法亂紀分子，保護人民，保衛文化大革命。公安系統不能成為一派的。決定公安廳，公安局軍事接管。外部造反派都退出，內部經過一段時間，培養出新生力量。北京已這樣作了。這樣才能照顧全域，就能真正地不算一派了。這樣就能真正地實行中央的有關指示，真正的反革命案件，反革命分子就能得到審查，捕獲，革命秩序可搞得更好。當然公安系統也可能有兩派，在為人民服務方面，即使觀點不同，但還要服從全體，服從軍事管制，服從命令，服從整體利益，還要堅守崗位，不能消極怠工，不允許搞小集體主義。

(2) 報紙是黨報。造反派奪權之後，在一個長時間內，成了派系報紙。裡面有些口號是錯誤的，是很錯誤的，不符合革命要求的。當然，最好是協商，改組，現在看來不行，還是軍事接管。外部的都要退出。內部若有力量，能夠很客觀地報導，就出報。否則就停它一個時間，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還有力量就印上海的報導。戴國強在嗎？為什麼這樣？那天你坐在哪兒，把我的講話打電話傳回去了，這就不對嘛！本來找你們，說好了是談心！既然是造反派嘛，要求大同存小異，叫你們協商研究，結果你們傳出去了，這樣很不好。康老和你們的講話，也弄出去幾個，根本不符合事實！

康老：（生氣地）這樣做法很不好！這不是革命派的做法！是一種造

謠，是騙人的扒手做法！

總理：……現在看來報紙還是軍管好。報紙寧可停一下子，聽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聲音，介紹其他地方的經驗，很好的學習。廣播台，有線廣播台也如此，也採用同樣的方法。郵電局有沒有接管？（代表作了回答）郵電局也在這個範圍內，不然，這派電報發得很快，那一派慢，扣壓另一派電報。怎麼能壓人家電報呢？只有反動的，反革命的電報才能扣壓，就是中間派的也不能扣壓，要一視同仁。

（3）工廠方面，特別是軍事工廠，很長時間搞兩派鬥爭，生產搞得不好。工廠怎樣軍管，正在考慮。用哪種形式還在考慮。有的派軍代表，有的派軍隊保衛。不叫外面去串聯，看情況。

這樣可以使你們目前南京馬路上，表現出不恰當的種種錯誤標語，做法，對罵，打、砸、搶，譬如說群醜圖，不應該有。不僅你們來之前有，你們來之後，還翻印了這個東西。事情已經過了，會議是十六號，二十二號開的，曾邦元同志不贊成戴高帽子，過早下結論，提出了不同意見，就因這個，就鬧分裂。到北京來了，為了證明你們做得對，還趕印了，補印了，還用那麼漂亮的紙，用一等道林紙。（看著那張群醜圖）把國家的財富，這麼浪費！當然你們反對的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何必表面醜化呢？我們要觸其靈魂，批判思想，不是表面醜化。北京也有這種情況。還要追查一下，那裡來的紙？

康老：當權了就這樣，國家非滅亡不可！

總理：山西工人講得好：打、砸、搶，打是打的階級兄弟，我再加上一句革命學生；砸是砸的國家財產；搶是搶的人民財富。

康老：這個只有帝國主義，國民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贊成，你們這就叫大方向正確？！

這是污辱文化大革命！反對文化大革命！（總理：西安提「革命的打砸搶萬歲！」）一個革命者看這些怎麼能看得下去？！你們這樣搞下去，我們國家像什麼樣子？！

總理：曾邦元一月十六號提出反對是有道理的。不同意見你們不聽，這



就是形「左」實右。

康老：這說明你們心裡狀態不是革命，聽不進不同意見。（指群醜圖上）這還有毛主席的詩，這是污辱毛主席的詩！污辱毛主席！這哪裡是自發的！自發的這麼搞，我們國家自發成這個樣子還行！

總理：當然你們說對方也搞了，也畫了文鳳來。不過是油印的，只是個別單位。

康老：超過了北京，紙還這樣好（指群醜圖），北京還沒有掌權。

總理：（對康老）北京掌權了，要超過他們了。

康老：恐怕要出畫冊。

總理：這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當然不是一派，對方也有，局部的。這是最典型，這是掌權了。回去好好整風，軍訓，政治學習為主，工廠也要這樣。南京六月以來好的氣象，這兩個月搞的不好。我們不贊成打、砸、搶。就是抄家也要各革命組織商量，通過公安組織。

康老：你們看到連講都不講。你杜方平參加他們組織，看到連講也不講。怎麼不說話？你還像不像個解放軍？

（杜方平：在家沒有看到。）

康老：都帶到北京來了，在南京不會看不到，在南京也看到。什麼「三結合」？！一方面搞這個（群醜圖），一方面又「三結合」，這不是開玩笑，兒戲嗎？

總理：這不能促進人家的分化。我一直到今天才收到，今天才收到（那張圖）。聽說在北京也散了？貼了？

（控告團答：在北航，火車站……都貼了。）

康老：什麼叫文化大革命？！這是出我們的醜！

總理：還有，主席提倡的，回去整風。不管工廠、學校，以革命造反派本身為主。現在有的是一派，多數分為兩派。整風主要檢查自己。我們講了大原則。回去不要抓住人家一點就攻。不管怎樣，自己總有些缺點吧，檢查自己，不但不會降低威信，反而會取得別人同情，你正確的話，人家就容易接受。別人缺點多，也還總有些優點吧。局面都是闖出來的，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學

性、組織紀律性。要有革命性，沒有革命性，就沒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學生闖得最早。闖勁我們是提倡的。但是，光有闖勁不行。在這個時候，就要有科學性了。現在就要分清是非，區別對待分清兩類矛盾。當然，不要抹殺初期的成績。整風很重要。整風時，要檢查自己，把自己的缺點承擔起來，這樣就容易前進。首先檢查自己，就容易團結，這樣就能求大同存小異。所以我剛才強調張建山說的話，他懂得這個困難是好的。特別是同學們是知識分子，雖然不少來自農村，也有工人，職員，但畢竟是知識分子，社會經驗少，沒有參加過戰爭，沒有參加過社會上的階級鬥爭、農村階級鬥爭。你們還小就進了學校，沒有參加長期的勞動，三大鬥爭，差得很，一下子掌權還差得遠。不搞「三結合」，不向解放軍學習，是不行的。機關也如此。要排排隊，當然也不要人人過關。主要是黨委領導，執行了反動路線，有輕有重，有的沾了邊的。不要人人過關，不要打倒一切。這就是「紅旗」十三期與今年二期社論所講的，還要繼續發表，你們要好好學習。只有這樣，才能把工廠生產，機關業務搞起來，抓起來，我們相信，絕大多數工人是能抓起來的，會搞得好的。三月份就會有起色，四月份就會上升。機關搞好了，第二季度就會變化。學校進行軍訓。這樣就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三結合」準備了條件。時期不會很長，你們要創造條件。學校主要是整風，這要你們共同努力，認真抓兩頭，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就是語錄，也要學透，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也很好嘛！何況還要學「毛著」、「老三篇」、「古田會議決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央文件，《人民日報》文章，「紅旗」社論，去年的和今年的，好好地學一下。

還有一點，你們機關有兩派，太龐大，要縮小，工人回工廠，學生回學校，少數人留下來聯繫工作，這樣才能把工作搞好。不然舊的機關癱瘓了，又成立了新的機關，機關加機關，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成個官僚主義機構。你們掌權的一派自己也

說，忙得很，忙於事務，到處逼著簽字，被群眾追得跑來跑去，像舊省委一樣。張建山回去了十天，他取得了經驗了，文鳳來也講不知怎麼搞法好。要學習「十六條」，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奪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三結合」。革命的「三結合」，也不是復辟。把所有的人員用起來，那是復辟，復舊，不能搞復辟。這點很重要。學校如此，機關如此，特別是省市機關。所以我們要通過軍管，做好「三結合」，就講這些。

**康老：**

我擁護總理的講話，希望大家冷靜地考慮考慮。補充幾點：

第一，「一·二六」之後，南京革命群眾團體大辯論，「一·二六」大方向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把這個問題搞得這麼尖銳化。

凡認為「一·二六」奪權是不對的，反對「一·二六」奪權，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當然就「鎮壓」。在一個很長時間內，直到來北京，大家還辯論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辯論方向正確不正確，首先第一條把敵我關係搞清楚。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按照「紅旗」社論（總理插話：十二期），「十六條」，總結我們的方向對不對。我只舉一個例子，奪權派把「八·二七」，曾邦元說成是反革命。到底「八·二七」，曾邦元是反革命，還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點我想了，我認為想一想，容易看得清。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我們的階級敵人還有地、富、反、壞、右，彭、陸、羅、楊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們現在革命對象就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難道說南京「紅總」面前的敵人就是「八·二七」嗎？敵人就是曾邦元嗎？這一點看來，這一時期把真正的敵人放鬆了，把自己的朋友當著敵人去反對了。我講這個問題，不光「紅總」這方面，不光奪權派這方面，「八·二七」這方面也應該查。控告團也有這個缺點，在一個時期忙於宗派鬥爭，放鬆了敵人。首先不

要從宗派主義，小集團，小圈子出發，要真正分清敵人朋友。你們兩派鬥爭給了敵人可乘之機，赤衛隊最近活躍了，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利用你們的分歧，挑動你們。希望你們注意，判斷方向正確不正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奪權派奪權一個多月了，你們檢查一下，一個月來你們自己的實踐怎樣？不要提口號去壓人，人家不僅看一個口號，一個標語，一張傳單，人家還要看實踐。剛才總理講了這情況，你們自己去看看，大方向對頭不對頭，符合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你們大反「右傾」，在造反派內部提出了「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到底合乎不合乎中央的政策。革命造反派內部還沒有聯合，就去奪權，到底合乎不合乎中央的政策。要自己檢查一下，對不對。不能掌了權就強迫人家承認大方向正確，否則就是反革命，這個看起來很強大，實際上是虛弱得很。

所以你們看看敵我關係，看看實踐，就容易把問題看清楚。剛才你們說了，三月二號我們接見你們奪權這一派，你們就到南京去說了，我們肯定你們的大方向正確。我們沒有肯定，現在也不可能肯定！同志們！再重複一遍，沒有肯定！同志們很容易看清楚，不管什麼，剛才總理講，實行軍事管制，為什麼？什麼叫軍事管制？就是沒有肯定你們「一·二六」奪權。當然解放軍還和你們合作，不會排斥你們。搞「三結合」，革命的「三結合」，像中央所講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權。實行「三結合」，大聯合，這是解放軍的任務。

第二個問題，你們兩派無論那一派，要正確對待解放軍，解放軍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親自統帥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進行的保證。解放軍不僅是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聲譽是很高的，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是保證我們不被修正主義篡奪，不使我國資本主義復辟，保證無產階級專政不變顏色。她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親自領導下取得了光輝的成績，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都要學習解放軍。當前對解放軍是反對還是擁護，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嶺。同志們要好好執行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這是毛主席親自批的。不能有任何反對解放軍，侮

辱解放軍，衝擊解放軍。即使解放軍某個部門，某個事情，某個問題，某個情節犯了個別錯誤，也要善意說明，不能反對。我直爽地說：現在杜方平是站在文鳳來這邊的，就是這樣，「八·二七」對解放軍也一點不要動搖。梁、杜、吳這是很多人知道的，要同他們好好團結，這一點「八·二七」的同志要注意，特別要注意！要與他合作，更不要因為一個人就對解放軍產生一些看法，動搖，不滿這是不應該的。

看來南京問題的解決，解放軍的幫助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能促進你們的團結，革命化，特別是促進團結。抓革命，促生產，「三結合」，大聯合，也起很大作用。在這方面意義很大，這一點我想你們兩派都會同意的。過渡時期怎麼辦？要相信解放軍，依靠解放軍，幫助解放軍，這是決定南京工作的關鍵。順便說，解放軍在左派內部不能支持一派，反對一派，應該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方面去做工作，不能受宗派主義影響。應該成為執行毛主席指示的模範，要以身作則，教育廣大群眾，這是第二方面。

協力廠商面，同志們回去後，要一起把南京砸機關，抓人，鎮壓的行動立即停止，不管那一派。我們軍事接管，也必須首先解決這一條。這樣發展下去，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到嚴重影響。我們要堅決反對。

文鳳來同志也許不知道，據曾邦元等同志反映，控告團一代表同志回去以後，罰跪了五個小時，這不僅侮辱了「八·二七」，也侮辱了你們自己，也侮辱了我們！

這是什麼大方向？哪有這種無產階級專政？！到底哪一個是我們的朋友，哪一個是我們的敵人？

另外，我們看到「八·二七」這方面的報紙（指南工《紅色造反者》報），說「砸爛文氏黑店」，這也很不好，很錯誤的，把他們當作敵人，還有什麼「好個屁」，首先自己是「屁派」，真糟糕。

總理：他們說好個屁，就被說是「屁派」。

（文鳳來：他們先叫「好個屁」的，以後我們再叫「好得很」。曾邦元接著說：「屁派」是別人加給我們的。）

康老：宗派不分先後！你們傳單上「文記」很多，這樣不好，不僅人身

攻擊，對群眾也不好。當然一分为二，這報紙也不能說不好，倒也有好處。（康老指《紅色造反者》報）下面是「迎頭痛擊砸搶風」。

但是上面又說「砸爛文記奪權委員會」，下面又提「迎頭痛擊打、砸、搶風」，這不是「迎頭痛擊」是「迎屁股痛擊」。

我那天問過，曾邦元說「紅總」抓人，砸機關，那是不好的。也談了你們「八·二七」砸了三個地方，可能多一點。

康老對北京赴甯學生說：現在沒有「三司」了，不能以「三司」壓人，去招搖撞騙。不回去了吧？（答：不打算回去。控告團代表插話：我們不歡迎他們回去。又插話：要他們回去檢查。）

康老：留在北京檢查也一樣。特別工廠，保護工廠，保護機器，軍事接管後，按工業「十條」。尤其使我擔心，大家擔心，南京梅山鐵礦生產大大下降。（工人代表彙報鐵礦生產問題。）你們宣傳工作要重新整頓一下，不要再宣傳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現在是大聯合。你們提倡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不僅是宣傳，而且是方向問題。中央提倡大聯合。

有人提出什麼「革命派內部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那怎麼能大團結？那怎麼能大聯合？這是大方向問題。你們還有廣播電臺，《新華日報》，傳單標語，到處宣傳，這很不好！與中央唱反調。剛才總理講了，對敵人有利的，就對我們有害。雙方都要把互相攻擊性的標語，大字報刷掉。我看雙方回去聯合起來，通通把街上這一類標語刷掉。那類宣傳（群醜圖）是反宣傳，出你們的醜，也出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醜。

我看你們雙方同志先不要開會，把這些標語刷掉，不管奪權的也好，反奪權的也好。

總理：（拿看守所照片）看守所是對待敵人的，對待違法亂紀分子，不能對待革命群眾。

康老：宣傳，報紙，我上次談過了。總理講《新華日報》要軍管，黨報，不能成為派報。

第四個問題，要學習。總理講了，兩派要好好學習，要開門整風。

有一個條件：澈底地實行自我批評。不要去攻擊人家，先攻自己宗派主義，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等。整風的目的，是檢查自己的思想，言論，行動符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中央精神，「紅旗」社論。檢查自己，不會降低自己的威望，恰恰會提高自己的威望。至於學習什麼東西，你們自己去訂。總理提出軍訓，恐怕很需要。

第五，要純潔組織。不管哪一派，難免有混進來的不純分子，敵人會想辦法鑽進來。這方面要特別注意一下。

第六，最後一條，省委、人委的同志，市級、廳、局長同志，要真正覺悟起來，檢查自己的錯誤，澈底揭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惡，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派的一邊，用實際行動取得群眾信任，把生產，業務好好地抓起來。我們相信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有的犯錯誤，要允許改過，允許立功，要幫助他們站到革命這一邊來，給他們補過的機會。但是這些幹部同志應該誠誠懇懇，不要耍兩面手法，蒙混過關，這不是蒙人家，而是矇騙自己。大多數是好的，要接受批評，特別是自我批評。

南京、江蘇的工作，中央曾經關照過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毛主席也關照過，要他們不僅要把上海的工作搞好，而且要利用上海的經驗幫助浙江，江蘇把工作搞好。我們還要找軍區幾個負責同志來北京談談，你們要與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發生聯繫，吸收他們的經驗，接受他們的幫助，把你們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澈底！

已經講了很久了，今天大家回去，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千萬不能忘記敵人，敵人沒有睡覺，被鬥的還不是死老虎，敵情觀念千萬不能忘記。要講原則，我們很擔心，宗派主義如鴉片煙上癮，一下子很難改掉。雙方要注意！

總理：康老剛才講了。大方向問題從敵我方面講就清楚了，把朋友當敵人，大方向就錯了。過去掌了權，「誰反對一·二六誰就是反革命」。後來到了北京，吃到一點空氣，知道犯了錯誤。南京也提出「誰反對反一·二六奪權就是反革命」，也是不對的。

康老：你說我是反革命，我說你是反革命，結果都不是反革命，敵人在

邊上看笑話。

總理：我不能簡單的說，說了以後，恐怕一方又壓過去。現在軍管是為了促進大聯合，「三結合」。今後你們南大「八·二七」要負更多責任。「八·二七」打電話回去，頭腦不要發熱，你們別的不砸，恐怕「文記」要砸的吧？大家都不應砸！聯合起來，你們要警惕。

他們要改正錯誤，你們要防止錯誤。過去是奪權派要多負責任。今後你們要多負責任。

搶的東西，能歸還的就還給人家。我建議你們宣傳車少搞一些，大家走路嘛，南京城就那麼大。宣傳車，大卡車歸還國家，回去促生產不好嗎？雙方要整風，兩方對吵，兩個大喇叭對著吵，再吵軍隊就要干涉了！我們還要請軍區的同志來談一談。

（總理看了代表團遞上去的條子）剛才說十一人接見的座談情況，你們傳出去了，戴國強說沒有傳，總是你們這派傳出去的。同樣，二日的接見情況你們也傳出去了。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你們領導同志要自覺，有些人就是不自覺。

與上海聯繫很重要，要實事求是向上海學習，要學習好的方面，才能得到幫助。這樣，把上海，浙江，江蘇都聯繫起來，把革命，生產都搞好。

（曾邦元問：以前好幾次接見，回去傳達，是不是以今天為準。）

總理：對！今天是帶結論性的，還要你們去消化，去認識，這也是一個考驗。

問題都談了，就這樣吧！

（杜方平表態：錯了就改，沒有跟得上就再跟上，我自己知道有錯，不知道有這麼大。

杜方平向「八·二七」同志表示，你們批評，要怎麼批評就怎麼批評。我欠了「八·二七」的債，有多少，還多少，我支持了奪權的一派。）

總理：你剛開始支持還是好的，邢文舉開始也支持的嘛，後來他們做錯了，曾邦元二十九日不也是支持的嘛？當然後來又收回了。鬥爭是在發展的。



康老：要說支持文鳳來，我比你還早。

在圍攻文鳳來的時候，梁、杜、吳的態度怎麼樣？

（邢文舉答話。）

總理：鬥爭很複雜，事態是不斷發展的。

康老：文鳳來也要發展變化的，不要吃老本。

（控告團代表：軍隊不能支持一派，壓制一派。）

康老：左派之間不能支持一派。話又說回來，如果是一個左派，一個右派，就是要支持左派，反對右派。

（控告團表態：我們不要債，我們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康老：過去你們沒有梁，吳等同志的支持，軍區的支持，你們現在的形勢就不會這樣。

（杜方平：我的指導思想是支持一派，團結另一派。支持以後，實際上支持了一派，打擊了一派。雖然對南京「八·二七」有團結的願望，但過早表示了態度，事情發展就難以控制了，沒有能力把他們拉在一起，沒有完成任務，心裡很著急。）

（文鳳來發言。我完全擁護中央決定，堅決執行，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原則性，方向性錯誤，回去以後先要奪「私」字權。歡迎「八·二七」，東方紅幫我們整風，和解放軍搞好關係，支援解放軍。回去一定好好幹，一定做團結的種子，絕不做分裂的苗子。要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共同敵人江渭清是一致的，過去由於受壓制，對壓制過自己的同志有意見。後來學「毛著」少。）

（張建山：中央首長對我幫助很大，我一定要奪「私」字的權。最近南京黑字兵很猖狂，更重要的江渭清這一派還在起作用。我們做了一些事，的確是違背了中央指示，反正群眾要幹就幹了，有人說我們的後臺是江渭清。）

康老：隨便提揪後臺，誰是誰的後臺，這個提法不好。人家說北京地質東方紅的後臺是林×，林×的後臺是關×，關×的後臺是我。另一派又說我是譚力夫的後臺。實際上，我一個台也不是。

要從政治上看問題，要看事實，不要隨便猜測。

（張建山：我自己有決心，解放軍接管，我們雙手歡迎，否則收拾不了。）

（當談到學校裡宗派鬥爭影響到社會上時）

總理：南大，南工的同學都抽回來整風。

（曾邦元發言：首先擁護中央的決定。不欺騙黨中央，不陽奉陰違，這是革命者起碼的品質。為實現大聯合，「三結合」而鬥爭，澈底揭開江蘇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我們來因為受壓制，是帶宗派情緒的，我們也要從掌權派所犯的錯誤中吸收教訓，請首長放心，我們一定保證按中央指示去做。剛才杜方平講欠債，我們說，不是欠債還債的問題，我們都有錯誤，對革命是損失。）

（外地駐寧聯絡站代表：我們外地的也犯了很大錯誤，提出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

總理：你們初期還做了些好事。

（外地駐寧聯絡站代表：這是無政府主義，我們要作觸及靈魂的檢查。）

（代表團一個工人提出合同工問題怎麼解決。）

總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藉口取消合同和扣工資是不對的，中央有規定，你們按規定辦理嘛！

康老：有的地方還有工作做，就可以延期，沒有工作做就可以回去，具體情況具體處理。

（代表團姓張的工人：我們不瞭解情況，簡單的支援「一·二六」，說了一些錯話，犯了一些錯誤，回去不要吵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有的代表提出：赤衛隊最近很活躍。）

總理：回去以後你們調查，報告軍區。

（南體「一一·四」代表提出新運會問題。）

總理：那個問題我們解決，我們還要商量，你們回去等電話。

康老：我關照你們一下，你們對王范怎麼看？

（南體「一一·四」代表：我們還要調查一下。）

康老：還要調查？！他公開罵毛主席還要調查？

（南體「一一·四」代表回答：王范肯定是叛黨分子，王范死了以後，又死了一個，……問題比較複雜。）

康老：從北京看來，體院同志特別要努力整風，長期以來，榮高棠的影響很壞，另外又常常出國，沾染資產階級習氣。北京體院在社會上名譽不好，作風不好，一小撮壞傢伙常常利用你們體院的學生去當打手。不知道你們南京有沒有這種情況。王范是叛徒，榮高棠也是叛徒。所以你們這一方面要特別注意。我最瞭解王范，他變質啦。原來在上海當巡捕，同情革命，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坐了牢。原來看還不壞，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來到延安學習，還樸素。全國解放以後，我在上海看到他，他完全變了，成了饒漱石的走狗，所以這個人走到叛黨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總理：你們對這個問題重視了就對了。

（有人提到江渭清問題。）

總理：牽涉到軍隊問題，可以與軍區聯繫，與別的省有關的，可以通過中央來調查，一定要揭省委的蓋子，不能因為江渭清不在就不揭，還有其他人嘛，應該繼續做。重點放在各機關內部，造反派來解決問題，也可以聯合嘛，沒有什麼限制。機關幹部總是有自己的業務，既要揭問題，又要搞業務，這更能考驗。

剛才有人講，南京在搶幹部，如果幹部把問題揭開來，好嘛，亮相嘛，應該是把立場轉到造反派這一邊，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方面。與軍隊有聯繫，更方便。

「一·三」事件，不管「紅總」和革命學生中有多少缺點，都不能否定，不能動搖，這個事件是革命的，是件大事。我們跟你們分別，合起來都講過，不能因為有缺點，就有別的看法。因為赤衛隊要像上海那樣來北京告狀，我們阻止他們，叫他們回去，他們回去跑到江蘇飯店搗亂，工人起來自衛，學生後來增援，把他們打退了。這是革命的勝利。從那次以後，赤衛隊瓦解了。總之，這是革命的行動，不要動搖。

（有人提出有關長江大橋問題。）

總理：關於長江大橋的事，我們已經知道了，還看了圖，已經派人去調查了。

關於和張春橋同志聯繫的問題，中央直接通知他們，我們把今天會議記錄和重要材料轉過去。

你們聯合去也好，分別去也好，反正今後總是要聯合起來。

軍事管制機構也要和上海聯繫。

（控告團代表反映，舊省委壓制革命造反派問題，當彙報到南京已經開了揭發江渭清大會。）

康老：揭發會好嘛，不要搞武鬥，坐飛機，要改變鬥爭方式。

（控告團代表又彙報了省級機關文化大革命情況，省委怕革命造反派，用小幹部守大門。）

康老：我建議你把小幹部守大門這件事寫出來。

（代表團提出要把江渭清帶回去揭發批判。）

總理：江渭清的問題，你們要繼續揭發，並不因為他不在南京就不能揭，可以背靠背，更好地揭。

（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團整理）

版本二：

【周恩來、康生、王力、關鋒、穆欣等接見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赴京控告團談話記錄；被接見的有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三十三人，控告團二十六人。】

（1967年3月5日晚10：12—3月6日凌晨1：27在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

周總理一進來後就對著康老說：「張建山樣子有點像蒯大富。是個蘇北人樣子，他是蘇北人。」康老說：「我認識他。」接著總理問道：「代表全來啦？還有些人沒到嗎？回去了？啊，葛忠龍回去了？」控告團有人說：「丁曰泗也回了。」總理笑笑說：「雙方都回去人了。」

## 周總理講話

今天沒有更多的話要講了，康生同志已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講過了，伯達同志也代表中央講過了，我們也分別談過。你們江蘇情況比較複雜，所以時間耽擱長了一些。我們商量了一下，有一個共同認識。江蘇本來一月份的形勢正在開展中，但有一個最大的弱點是省委領導人沒有站出來檢討、揭發，一直沒有站出來過，這是對奪權鬥爭很不利的方面。另一個方面，軍隊得到通知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推動革命「三結合」的時間比較晚，正式文件一月二十三日才出來。本來參加工作組的軍隊同志同情受壓制的造反派，由於當時不介入，只能在外面同情。最直接的問題是造反派本身，首先表現在學生、工人形成幾個派別，主要是兩個，本來是一道的，八月份在一起鬥爭的所以叫「八·二七」，從南大開始影響到其他學校，南大比較早，從鬥爭匡亞明開始。全國起來鬥爭最早的是北京、西安、南京。三大嘛，北大、南大、交大三個大學最早，我們常談起這三個大學。第二，半年多，一月三日有個鬥爭，在這以前，十一月份受上海影響，工人起來了，中央就叫文革副組長張春橋、姚文元去幫助解決安亭事件，取得了經驗，工人可以建立革命組織，矛頭對準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成立組織是許可的，憲法有這個自由，原則上同意了上海，也得同意全國的。因此南京也起來了，我們也就同意了。接著江蘇省委犯了比上海市委更嚴重的錯誤，辦了官辦的赤衛隊進行對抗。在一·三事件中交了鋒。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也跟上海一樣，要到北京來請願，保守派請願實際上後面是有人支持的。我們打了許多電話方制止了他們來京請願。後來他們用軍用汽車運回南京，造成了江蘇飯店的一場衝突。革命造反派取得了勝利。本來是學生起來的最早，十一月，工人運動和革命組織發展起來了。一月份又有一次保守派挑起的戰鬥，革命工人和學生一起取得了勝利。形勢逐步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月底造成了一個分裂的形勢，嚴格說來應該是排斥南京「八·二七」的奪權派負主要責任。文鳳來、張建山他們也認為不應

該排斥。最關鍵的是已奪了權，《新華日報》也在這派手裡。一月三十日開三十萬人大會以前，南京「八·二七」寫了聲明承認奪權，但說有嚴重錯誤，應做人民內部矛盾討論，態度很好；這是一個關鍵。如果當天《新華日報》登了，第二天南京「八·二七」還帶五萬多人參加這個大會，照顧團結，推動奪權鬥爭前進，可是奪權這方面拒絕了登這個聲明，在三十日大會上，奪權派還找了一個反對南京「八·二七」的中學生上去發言，批評了「八·二七」，好像他們是站過來了。他們那個聲明很好，第二天還指責他們，這種態度越來越錯，發展趨勢走向錯誤。奪了權後，不是向好的方向發展，不是逐步糾正錯誤，而是錯上加錯。關鍵的問題是二十九日聲明和三十萬人大會。確實在公安機關設起臨時監牢，掛起牌子來，行使權力。另一派就受到壓制。當然武鬥發生在雙方。但口號是壓制對方的，誰反對「一·二六」奪權誰就是反革命，說「一·二六」好得很，一直到十八日還有長篇文章。這是錯上加錯。這都是舉幾個大的來說。南京打、砸、搶的事情發生了，奪權後一個多月，打、砸、搶、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這不僅不是一個「三結合」的聯合奪權，也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而是一派奪權。我們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聯合奪權，「三結合」沒有搞，無產階級革命派先走一步，這樣的例子是有的，也是可以的。但是一派奪權，這樣權力機關就不能支持了，要另外考慮一個辦法。這不僅是我這樣說，連奪權的人張建山由南京趕回來他也承認，回去看了十天，深刻認識到許多問題都來問他，如再不改就要犯罪，許多廳局來問他，無法知道怎麼辦。我聽這話很感動，是誠實的話，這個態度是好的。不僅要「三結合」，就是革命群眾組織聯合起來力量才大。根據雙方的態度和聯合的情況，在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之前，我們覺得應該採取臨時措施，實行實質上的軍事管制，來實施權力，但不對外宣佈，像邊疆一樣將來可以出個通告。現在我們在生產上已經採取這個辦法，開了農業會議，二十六—二十八日省軍區開會，由軍分區、縣武裝部把省、地、縣抓起來，找了一些人參加會議，委託軍區，抓革命、促生產都要抓。至於用什麼組織形式，我們還要叫軍區來談，將來軍區向你們宣佈。臨時權力機構由軍區

行使，已經肯定了，由中央決定的，已向毛主席報告了。現在一般軍事管制，但不在報紙上宣佈，出個佈告，回去要把道理說清楚，只有軍事機構行使權力，才能有利於推動大聯合，推動省委、省人委的幹部站出來檢討，向群眾表態。表態得怎麼樣，要以群眾同意不同意為尺度。你們不是問過底嗎？底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底是群眾，任何人都要在群眾中受考驗。當然，主要責任要江渭清負責，既要和江渭清劃清界限，又要說清自己的責任。將來，這個軍事管制機構幫助你們過關。能不能過得去啊？另外，要抓生產工作，主要由軍區掌握，也要動員他們參加生產工作，將功補過，立功贖罪。在這樣情況下，才能把廣大真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現在形勢發展，隊伍一擴大，有些地方發展多了，它本身的比例很大，可能這個組織主要方面是左派，但中間偏右的人也進來了，在工人、學生、機關中都有這種情況，自己要有一個整頓，首先在本身要有一個真正的大聯合，這也是要經過軍事管制幫助推動，如南大、南工比較大的學校，還有其他學校可以進行軍事政治訓練開門整風。工廠、機關也可以由軍隊幫助軍事、政治訓練。以政治訓練為主，學習毛主席著作，時間占得多一些。也是選一兩個工廠在生產業餘時間搞一下，樹立典型。主席最近批了一個在北京軍訓試驗文件，工廠怎樣搞還要研究。這也是整頓思想、整頓政治、整頓組織。革命的組織能夠做到大聯合了，省市某些幹部又被群眾通過了，真正參加了「三結合」。不過這是少數，軍隊作了準備了，革命的「三結合」就水到渠成了。既然有了一個月的曲折，建立革命委員會時間拖得長一些，但也不是二次奪權的問題，是為真正實行無產階級大聯合、為「三結合」建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做準備。具體說，軍事管制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產，要有兩個班子，生產不僅抓農業，工業、財貿一起抓。等與大軍區商量好了再宣佈。總之要抓好生產。南京有這個條件，有大軍區、省軍區，還有野戰部隊，都可以幫助，有緊急任務可以調動。如東北幾派鬥爭，離開生產崗位爭論不休。要按照貴陽紡織廠的辦法來搞，按行政單位來搞。生產時間不能爭論，業務時間放在一個系統去搞。現在是跨系統，調出來開會，被調的組就停工一部分，這就要亂了。必須按報

上登的貴陽的辦法，那樣辦，許多地方已開始這樣做，這樣做生產搞得快。將來部隊來宣傳推廣。江蘇力量多，大中城市多，野戰部隊也不少，很可以抓好。交通也要抓，鐵路公路河運成網。江蘇還要供應上海。必須按這樣系統來調整。儘管有兩派，有紅工、有「八·二七」，也可以協商，按生產系統、科室系統來組織。如果有一個規定，你們可以遵守的，對生產也有利，對工人階級有利，對整個國家有利。不管那一派，應以廠裡本身的造反派為主，必要的外力為輔，按軍委一月二十八日發的八條除第七條外都可以用，還是個五點說明。工人運動從十一月以來有四個月了，可以自己為主，可以離開保姆了，南京各廠革命派力量培養起來了。具體地講幾個問題：（一）首先，除軍隊外，公安機構、專政機構要鎮反，管制壞人，以保護革命秩序、文化大革命運動。公安系統不能成為一派的公安機關，要由軍事接管，外邊力量退出，內部造反力量在軍事管制下培養起來。和北京一樣不屬哪一派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就得到鎮壓，把革命秩序搞得更好，消防工作也有人做。當然，可能公安有兩派，要為人民服務，不能有派系觀點，在服從革命整體利益下不能服從那一派，服從整體，服從軍事管制，服從命令，不許怠工，不許消極，在為人民服務方面，即使觀點不同，還要堅守革命崗位。（二）第二個問題是報紙問題，報紙應該是黨報。造反派奪權以後，很長時間變成了一派的，有些口號是錯誤的，有時還是很錯誤的，不符合革命要求。本來可以協商，現在看來很難，所以採取軍事接管，外部的力量退出。裡面如有力量，可以客觀地報導革命的主張，就辦下去，否則就停它一個時候，轉印《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上海報上的報導材料。一直到十八日還登「一·二六」好得很的文章。十七日晚上的談話，戴國強就把談話打電話傳回去了。既是造反派，就要求大同，存小異。我的談話供你們研究的，你們捅出去就很不好了。康老的話也捅了，根本不是事實。說高嘯平是政治扒手是中央點頭的，沒有這回事。（康生：這樣的做法很不好的。簡單講，不是革命造反派的的做法，這是造謠的，這是一種騙人的扒手做法。）看來報紙還是接管好，寧可停一下子，把中央的聲音、毛主席的聲音傳下去，要好好學習。無



線電廣播採取同樣的辦法。郵電部門也是這樣，否則要有壓制的行為。這一派的就行，那一派的就壓。只有反革命的反動的才可以扣壓。一般的中間的也不能扣壓，要一視同仁。軍事工廠方面很長時間兩派鬥爭。軍事管制用那種形式還在研究，根據具體情況來定。有的派個軍代表，有的用武裝保護一下，不叫外面串連，看情況。目前南京馬路上出現的各種不恰當的互相謾罵的標語，就要處理。再有如群醜圖的漫畫（拿出一張鬥江渭清的畫），不要這樣的東西。十六日那次會上曾邦元不同意戴高帽子有道理的，是對的。從那次起就鬧分裂。一月十六日、二十二日開了兩次會，當然是一小撮當權派，何必醜化，要觸及靈魂，不必表面醜化，這樣不能觸及靈魂。你們來京後家裡還翻印了一個圖送來，很漂亮的紙趕印的，還製版，哪來的紙，很漂亮的紙，浪費了。（關鋒：當權了，就這麼搞啊！）（康生：把權交給你們，國家非滅亡不可，你們當權，這樣做行嗎？）山西工人提出一個很好的建議，反對打、砸、搶，難道看著人民財產受損失嗎？砸的是國家財富，搶的是人民財產。這些只有極少數的是黑幫。（康生：帝國主義、香港、《真理報》馬上會翻印，這些國民黨、蘇修贊成的，這叫大方向正確嗎？上面還有毛主席的一首詩，這是對毛主席的侮辱。王力：這些人性質未定，本來是分散的，你們把它集中一起，到底長了誰的志氣，要擺事實，講道理，將來還提供翻案證據。康生：這樣做是侮辱反對文化大革命。一個革命者看了怎麼能過得去呢？國家交給你們，將成什麼樣子。）你們不叫不同意意見，這就走到形「左」實右。（康生：把百醜圖拿起來這是自發的嗎？那有自發的是這樣的？）當然對方也搞了一些漫畫。（康生：這已超過了北京，北京還沒有掌權，掌了權也要超過你們，要出畫冊了。）當然不是一派的事，對方也有，這是最典型的。回去好好整風，在學校裡進行軍訓，政治為主整風。把南京一個月以來的氣氛……應很好的冷靜地想一下。我們不贊成抄家，抄家要得到革命組織的批准（王力：江蘇省還沒有裂痕，戴了這樣帽子能「三結合」嗎？）（關鋒：我們從來都不同意戴高帽子，這是打擊自己，孤立自己。）聽說在北京還貼了一些。（康生：什麼叫文化大革命，怎能「三結合」，這是兒戲。）（關

鋒：你們——指反對派，搞的這張漫畫也很不好嘛！以後都不要這樣搞了。）你們回去整風，不管學校、機關、工廠都要整風。現在有兩派，主要檢查自己，不要抓住對方一點就攻，那就不好。要學主席那樣謙虛謹慎，回去自我批評多一些，另一方即使犯的錯誤多一點，但還是有優點的，開始有闖勁的，局面是闖開了。林副主席講了三個性：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首先是革命性，沒有這一點，革命局面是打不開的。全國學校中，中學闖得最早，組織了紅衛兵也影響到南京。文化革命到全面奪權階段，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光有闖勁不行，要有科學性。當然不能抹煞以前的成績囉。對幹部要區別對待。先承認自己的錯誤，如不講自己的錯誤，勢必小同也找不到。張建山的話懂得目前的困難，這是好的。同學們都是知識分子，儘管有工人、貧農家庭出身好的，但畢竟是知識分子。從家門到學校，究竟社會經驗極少，未參加過戰爭和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別參加生產，但不是長期參加勞動鍛鍊，一下子掌權差得很，不「三結合」是不行的。現在機關造反派起來了，要給幹部過關。主要的目標是一小撮。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輕有重，不要人人過關，不能打倒一切，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十二期到今年第四期的社論要好好地學，這樣才能把工廠生產、機關業務搞起來。我們相信絕大多數工廠是會好好搞起來的，時間不會很長，只要認真抓，四月底就會看出來的。不但由軍事管制組織，領導起來，一抓起來就會看出起色，為大聯合、「三結合」準備條件。認真地抓兩頭，很好地整風，把語錄學好，不但要學習老三篇，還要學習《古田會議決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還有一點，機關兩派建立機構太龐大，應該縮小，絕大多數同學回學校去，留下少數人作聯絡員，方能把工作搞好。舊機關已癱瘓，又增加新機關，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不管那一派奪權都沒有辦法。張建山回去十天，已取得了這個經驗，文風來也講不知奪權後怎麼搞法好。要自我批評，才能把扣子解得開。總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六條」綱領上，更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掌握大方向，團結大多數，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不是復辟的「三結合」，不是復舊。

學校如此，工廠如此，機關如此，特別是省、市機關更要如此。對犯嚴重錯誤的幹部，在勞動、工作上考察他們，另分配工作。

下面請康老講講。

### 康生同志講話

我完全贊成總理講話，希望同志們冷靜考慮。我再補充幾點：

第一個問題，自從「一·二六」奪權以後，南京的革命群眾團體辯論「一·二六」奪權大方向到底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把這個問題搞得那麼尖銳化，凡認為「一·二六」奪權不好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應該鎮壓，直到來了北京還辯論這樣的問題，我看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鑒別方向正確不正確，第一條，把敵我關係搞清楚，毛主席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現在看一看，按這個標準看，方向對不對，「一·二六」奪權派把南大「八·二七」的曾邦元說成是反革命，到底「八·二七」的曾邦元是反革命還是朋友，這一點冷靜想一想，就容易看清。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國內是地富反壞。我們的敵人是彭陸羅楊反革命集團。我們現在的革命對象就是革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難道說，在南京「紅總」面前，敵人是「八·二七」嗎？敵人是曾邦元嗎？看來這個時期把真正的敵人放鬆了，而把自己朋友當作敵人來反對。我講這個問題，不僅「紅總」這方面，奪權派這方面，就是「八·二七」方面，同樣要檢查這個問題。這對控告團方面也是一個批評，他們這個時期忙於宗派鬥爭，放鬆了敵人。很值得我們警惕。不要從宗派小集團、小圈圈的利益出發，首先要真正分清敵人、朋友，這是首要的問題。你們兩派鬥爭時，給敵人有可乘之機，赤衛隊最近活躍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會不利用你們的分歧，不會不去挑動、製造你們分裂的。第二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檢查奪權以後一個月實踐怎麼樣，這是很重要的標準，不要用空空洞洞的口號嚇唬人，人們不僅看一條標語，一張報紙，一張傳單，而看實踐。剛才總理談了一些，看看方向對不對？（關鋒：合乎不合乎中央政策。）

大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合乎不合乎？大動盪、大改組、大分化合乎不合乎？革命派內部未聯合好就搞奪權，合乎不合乎？自己檢查一下，對不對。不能以勢壓人。掌握了權力，強迫人家承認，看起來蠻行的，實際上虛弱得很。第一看一看敵我關係，第二看一看實踐，這樣就容易把問題看清楚了。三月二日我們接見了你們，你們就到南京去說，我們肯定「一·二六」奪權大方向是對的。沒有，肯定沒有！現在不可能肯定。我再重複一遍，沒有肯定。同志們很容易看清楚，什麼叫軍事接管，就是沒有肯定你們的「一·二六」奪權，把權移交給解放軍。當然解放軍決不是排斥你們，還要依靠你們，還是要「三結合」，實行大聯合的。還有謠傳高嘯平是政治扒手，中央點了頭。沒有。我不熟悉高嘯平，不瞭解高嘯平，不認識高嘯平。高嘯平可能有缺點、錯誤，但他還是共產黨員嘛，現在，他還是起來革命嘛，他反對江渭清嘛，不能把高嘯平和江渭清平列起來。我曾同曾邦元講過，高嘯平缺點錯誤也不能掩蓋起來，不能以宗派主義情緒來對待問題，來對待同志，應該用毛澤東思想來對待同志。

第二個問題，你們兩派，不管那一派都要以正確態度對待解放軍。解放軍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軍隊，是林彪同志親自指揮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是勝利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保證。解放軍的聲譽，不但在中國，在世界也是很高的。全世界沒有超過解放軍這樣聲譽高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先進的軍隊，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保證我們國家不准修正主義篡奪黨權政權，保證我們國家不准資本主義復辟，保證我們無產階級國家不變顏色，這幾年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領導下取得光輝成績，黨曾經號召全國人民都要學習解放軍。在當前情況下，反對還是擁護解放軍成為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嶺。要很好地執行軍委的八條命令。這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不能用任何的方式反對、侮辱、衝擊解放軍。如軍隊因某個人某一部門某件事情未看準犯了錯誤，要善意說明他，不能反對他。現在杜方平同志站在文鳳來一方面，「八·二七」方面也不能在這方面做什麼動作。杜方平同志過去在南大工作組是革命左

派，梁、杜、吳做了許多工作（過去文鳳來同志就向我反映過），好好團結，好好合作。「八·二七」要特別注意，不能因此對解放軍不滿。南京問題的解決，看來是解放軍的幫助有重大作用，很重大的作用，促進你們團結，促進你們革命化，在抓革命促生產反對敵人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有重大意義。這一點，兩派都同意，那天張建山聽到軍隊幫助，特別高興。相信、擁護、支持、幫助解放軍是解決南京問題的關鍵。解放軍同志在左派之間不能站在這一方面反對那一派，要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立場上，不能憑宗派主義印象去工作，要做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線、林副主席指示的模範。

第三個問題，同志們回去把南京的打人、砸機關、抓人等立即停止，不管哪一派，實行軍事管制時，必須首先注意這一條。讓它發展，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生產上都受很大損害，要堅決反對。你們有沒有人說過：「只要承認大方向，就保證你的人身自由」，有沒有說過？（「八·二七」同志答：說過，是唐康說的。）最近控告團一同志回到南京，就被抓起來罰跪五小時，這不僅侮辱了「八·二七」，侮辱了你們，也侮辱了我們，那有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關鋒：要很好學習最近《人民日報》介紹的團結大多數的經驗。）這算什麼大方向正確。對敵人才能專政。這到底是我們的敵人還是人民？（關鋒：你們兩派，那派撇開那派，都是掌不好權的。）另外我們看到「八·二七」這方面的（翻開了南工的《紅色造反者》），說「砸爛文氏黑店」，這也是很不好，很錯誤的。「好個屁」自己稱自己是「屁派」，真糟糕！（曾邦元：屁派是別人加給我們的。文鳳來：是他們自己提的，說：「明天的天下是屁派的天下。」還說「屁派萬歲！」總理拿起我代表團遞上的對方所寫的謾罵我們的標語口號，說：你看這一本子，都是這樣的口號。）不要管先後了，宗派主義不分先後。（關：拿出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氣概來。）「文氏黑店」，這不僅是對文鳳來的人身攻擊，這對群眾也是攻擊，這麼多群眾支持奪權是支持「文氏黑店」嗎？當然這張報紙不是全不好，如另有一個標題是「迎頭痛擊搶、砸風」，不過上面標題「砸爛文氏黑店」，下面提「迎頭痛擊搶、砸風」，這不是「迎頭

痛擊」，是「迎屁股痛擊」了。有位同志說，「紅總」抓了許多人，砸了人家總部，你們也砸了人家嗎？（曾邦元答：我們砸了三個。總理、王力：還要多一些，不止三個。）可能不止三個，會多一些吧。總之，要立即停止。現在首都三司在南京聯絡站沒有了吧！以後不能再用三司的名字招搖撞騙了。（首都三司駐寧聯絡站海峰同志作了回答，並說準備回南京作檢查。康：問人民大學吳貞順，你們回不回去了？南京「八·二七」有的說，不要你們去了。有個女同志說：「要去檢查，不能溜跑。」）在這裡也是檢查嘛，現在的事情多得很！你們找這個事幹什麼？特別是工廠，要保護工廠，保護機器，保護生產，堅守崗位，按工業「十條」規定辦理。尤其擔心的是淮南煤礦，產量是一直下降（王力：淮南不是江蘇的），哦，是江蘇南京旁邊的一個什麼礦（答：梅山鐵礦），現在還集工生產，要好好保護。雙方都要徹底整頓宣傳工作，首先不要宣傳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現在是大聯合。中央提倡大聯合，你們提倡革命派內部大分化、大改組、大動盪、這怎麼大聯合呢？這是個政治方面問題。你們還有廣播電臺，《新華日報》，要徹底洗清那些東西。不要搞反面宣傳（拿起群醜圖說），這是出中國醜，出文化大革命的醜，出自己的醜，這不是革命。建議你們回去後，先不要開會，搞個聯合行動，把南京街上那些互相攻擊的標語漫畫都蓋掉（拿出一張醜化文鳳來的漫畫）。你們這個漫畫也很不好嘛！（總理：他們是油印的。關鋒：不要再相互把標語收集起來往上交了，自己去刷掉，奪權的也好，反奪權的也好，都要這樣。總理：回去搞個良好的開端，把標語都蓋掉。）一切不正確的鬥爭方式都收起來。《新華日報》是黨報，不能成為一個派的報，要實行軍管。電臺也是這樣。

第四個問題，要好好學習，整風，兩方面都要好好學習。開始可以關門整風，慢慢的可以開門整風。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徹底實行自我批評。不要讀了文件光攻人家，首先要攻自己。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宗派主義。反奪權派也有權可奪，首先要將私字權奪掉，首先檢查自己行動、思想、言論，合不合乎毛澤東思想，合不合乎「紅旗」雜誌社論精神。自我批評不會損害、降低自己的威望，確實能提高自己的威望。

什麼形式，怎麼搞，根據你們情況研究決定。總理提出軍政訓練，很需要，工廠根據具體情況確定。

第五，清理組織，不管那派，力量都不小，都有不純，不純分子混進來了，階級敵人想辦法破壞我們，不僅在外面，還會鑽到內部來。

最後一條，省委、省人委的同志，廳局長同志們，要真正覺悟起來，檢討自己的錯誤，澈底揭發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惡，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派方面，用實際行動取得群眾信任，好好地把生產、業務抓起來。相信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有的犯錯誤了，允許改過，允許立功，給他檢查機會，補過機會，立功機會。但是這些幹部同志們應當誠誠懇懇，不要玩兩面手段，蒙混過關，這實際上不是蒙混別人，是蒙混了你自己。

南京的工作，江蘇的工作，中央曾經關照過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毛主席已關照他們，要上海的同志用上海的經驗幫助浙江、江蘇，還想找軍區同志到北京來商量，與張春橋、姚文元接上關係，學習他們的經驗，接受他們的幫助，共同使省裡的工作健康地發展，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得更好，更澈底。在這裡已經待了很久了，回去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敵人。敵人沒有睡覺，被鬥的人不是死老虎，敵情觀念要特別注意，階級鬥爭千萬不能忘記。

關鋒：兩個團回去傳達，是不是宗派主義這是一個考驗，不要說「我們勝利了，他們失敗了」。

康生：要講原則。宗派情緒，像鴉片煙癮，一下子很難改掉。

總理：剛才在會上就流露出宗派情緒，如果把自己人當敵人，大方向就錯了。過去掌權的說「誰反對『一·二六』奪權就是反革命」，現在你們又有人說「誰不反對『一·二六』奪權誰就是反革命」，這樣一搞，大家都變成反革命了。（康：真正的反革命在旁邊發笑，打倒一切，結果就是打倒自己。）今天這樣一說，實行軍事管制，是為了推動你們大聯合，過去奪權派要負更多責任，而另一方面頭腦不要發熱了，今後南京「八·二七」要負更多責任。不要各取所需，不要去砸了，什麼「文氏奪權委員會」也不要砸了。要聯合起來，把不正確的口號去

掉。今後南京「八·二七」要負更多的責任，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現在你們應該警惕，我提醒你們這一點，他們是改正錯誤，你們要防止錯誤，你們不注意，錯誤犯的更凶。搶的東西能送回的都還給人家。宣傳車，我主張少搞一點，應投入生產。雙方整風。雙方對吵，兩個大喇叭對著吵。再吵，軍隊要干涉你們了。所以，要請軍區的同志來北京談一談。剛才說的那天座談情況傳出去，戴國強說沒傳，也許他們反映情況有出入，總是你們派傳出去的。同樣，二日的接見情況也傳出去了。要有自我批評精神，領導同志要自覺，有些人就不自覺。與上海聯繫很重要，但要把真實材料送去，要實事求是，才能得到上海的幫助。這樣把上海、江蘇、浙江都聯繫起來，把革命生產都搞好。（當時控告團有人說以往幾次接見不要傳達了，以這次為準）今天談的是帶結論性的，去傳達，你們自己認識，自己消化，這也是對你們的考驗。

（在幾個同志表態時，首長插話。當杜方平同志彙報時）周總理說：「你一開始支持奪權是對的，那文革也是支持的，後來他們走錯了，你沒有制止。」曾邦元二十九日不也是支持的嗎？肯定大方向正確，但有嚴重錯誤，後來慢慢轉化嘛，事態是發展變化的。康生同志說：要說支持文鳳來，首先是我，「在圍攻文鳳來時，梁、杜、吳的態度怎麼樣？」邢文舉答：「在梁、杜、吳三同志中，在這個問題上發現、認識最早的是杜方平同志。」康生同志說：「那不錯。」關鋒：「杜方平同志是個好同志。」康生：「群眾對梁、杜、吳的反映是好的。」總理：「鬥爭很複雜，事物是不斷發展的。」康生：「文鳳來也要發展變化，不能吃老本。」又說：「右派堅決要反對，但左派之間不能只支持那一派。話又說回來了，如果是一個左派，一個右派，就是要支持左派，反對右派。」關鋒：「互相都不要要債了。」康生：「你們的運動，沒有梁、杜、吳的支持，沒有軍區的支持，就沒有今天。」當杜方平同志講：「我的指導思想是支持一派，團結另一派，不是支持一派，打擊一派，雖然對南京『八·二七』有團結的願望，但過早表示了態度，事情發展就難以控制了，我沒有能力把他們拉在一起，沒有完成任務。」這時，康生同志說：「你功很大，功大過小。」



當文鳳來講到回去怎麼做時，關鋒同志說：「具體做的時候，不要匆忙，要與張春橋商量一下，不要一下子傳到群眾中去。另外的一派要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採取合作的態度。」

文鳳來同志表態之後說：據我所知，我們代表團從未向家裡（南京）的同志說：「『一·二六』的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央已經肯定了，高嘯平是政治扒手，中央已經點頭了」的話。我們往家裡傳達的原始記錄和當時的長途電話錄音都完好地保存在那裡，我們完全可以立即送交中央審查（我們三月二日晚上曾當面請示過，陳伯達和康生同志是同意把那次接見的內容往回傳達的。）康生同志接著說：「你們沒有往回傳達就好了，就算了，不要再交中央審查了。」

當張建山同志表態，提到有人說江渭清是我們的後臺時，康生同志說：「不要隨便揪出後臺，這個不好。北京地質學院的左派，人家說後臺是林傑，林的後臺是關鋒，關鋒的後臺是我，另一派又說我是譚力夫的後臺。實際上我一個台也沒有。要從政治上看問題，不要隨便提，看事實嘛！」當講到學生中的宗派鬥爭影響到社會上宗派鬥爭時，總理說：「南大、南工的老同學收回來整風嘛！」

當張福厚同志代表工人表態後，提出晨光廠赤衛軍活動情況時，總理說：對赤衛軍，你們回去要進行調查，團結教育爭取廣大群眾，孤立少數頭頭。

康生同志問體委王范問題時說：「從北京經驗看出，體院同志特別要整風，長期以來榮高棠的影響很壞，另外常常出國，沾染資本主義習氣，所以要特別重視整風。有的學校就成了打手。王范是叛徒，榮高棠也是叛徒。叛徒當了權更要注意。王范，我最瞭解，原是上海的巡捕（即洋員警），後來同情革命，坐了牢，抗日勝利後，釋放，到延安學習，後在保衛處工作，作風還勤勞樸素，解放後我在上海碰到他時，完全變了，所以這個人走到叛黨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當聽到南京準備開江渭清等的揭發批判會時，康生同志說：「揭發會，不要搞武鬥，要改變鬥爭方法。」

代表團遞了幾個條子，提出幾個問題，周總理作了如下回答：

- 一、（代表團一同志遞上一張條子說：「我們堅決要打倒江渭清，反對和江渭清結合，而某一革命組織的負責人×××在首長面前提出要和江渭清結合，同時反而在南京放風說和我代表團和江渭清勾勾搭搭。」「當我們提出打倒江渭清時，×××提出來不同意並責問群眾，你們憑什麼打倒江渭清？」我們在江渭清問題上和×××是有原則上的分歧。）

總理回答：關於江渭清不要以為不在南京就不能揭，可以繼續揭，可以背靠背，更好地揭，不能直接調查的可以通過軍區、中央查，重點放在機關造反派。

- 二、（當代表團一同志遞上一張條子說：「『一·三』事件我們堅決認為是赤衛隊挑起的，而某一革命組織的負責人×××卻認為是『紅總』挑起的。」）

總理回答：「關於『一·三』事件，不管『紅總』方面、革命學生方面有任何缺點，都不能否定，不能動搖，這是革命的事件，必須肯定的。我跟你們分別的、合起來都談過，不能因為有缺點，就有別的看法，這是革命的勝利，從那次以後赤衛隊就瓦解了。」

總理：關於長江大橋的事情已經知道了，也看了圖，已派人去調查。

總理：到上海找張春橋聯繫問題，由中央直接通知，你們聯合去也好，分別去也好。軍事管制機構也要和上海聯繫。

當首長們起身要退席時，關鋒同志對我代表團坐在前面的同志說：「你們要滿懷信心地回去，滿懷信心地工作，為革命的大聯合、『三結合』而努力。」

## 康生對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指示（1967.3.8.）

【康生同志對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文工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毛澤東思

想宣傳隊、紅旗公社、全總機關《國際紅旗》公社等四個組織主辦的「紅旗」第一期上發表的《揪出反革命兩面派劉寧一》（康生同志在該標題前面打了個大問號）一文的批語】

劉寧一同志不是反黨反毛主席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他不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把劉寧一同志誣讎為反革命分子，並且到處散發，這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劉寧一同志不是「三和一少」路線的制定者，相反，寧一同志是首先揭露和反對「三和一少」的人。此報誣讎寧一同志是「三和一少，路線的制定者和忠實執行者」，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替真正制定「三和一少」的人打掩護。

此報盜用「紅旗」黨刊主席的題字，作此報的報頭，製造混亂，魚目混珠。我將這些意見寫給了富春同志，富春同志已寫信給全總寫這篇文章的四個組織。信的內容可問富春同志。

康生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sup>18</sup>

## 中央文革參觀八一學校「聯動罪行展覽」時的講話 (1967.3.8.)

【中央文革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王力、關鋒同志於3月8日凌晨來到八一學校參觀了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派總部舉辦的聯動罪行展覽，上述同志與造反派談話整理如下：

我們首先向康生同志彙報了三月五日一小撮家長破壞我總部舉辦的家長座談會情況，首長非常氣憤。】

<sup>1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1967年4月。

康生同志說：「你們根據軍委八條寫一篇文章。」

謝富治同志說：「登《人民日報》。」

我們說：「我們要求家長按照軍委命令八條認真教育子女，有人說這是我們壓家長。」康生同志連連點頭。

在展覽室內，我們彙報，我校不能開學的原因以及有人說我們不開學是對抗中央的情況。康生同志說：「個別情況應嚴格區別。」

在參觀場路上，又問到開學問題。康生同志說：「這個學校要澈底解散，重新招生。」「這兒那能沒有軍隊？這兒是老窩？」謝富治同志說：「要解決一下問題，這個學校要住軍隊。」康生同志說：「下通知，讓他們都來嗎！」

康生同志又氣憤地說：「都來，都來，用兵圍起來，把大門關起來，一個一個地整，一個一個地檢討，一個一個地審查，整完統統滾蛋！」

康生同志在參觀路上看到一個大門上寫著過去的當權派的題詞：「培養新一代」。康生同志不滿地說：「培養那個階級的新一代呀！」

在參觀完被聯動破壞的不像樣子的標本教室後康生同志氣憤地說：「土匪、匪，完全是土匪！」康生同志氣憤地問：「誰是校長？！」

我們彙報了情況並說：「學生說校長是二百五幹部（即傻瓜）？」康生、陳伯達、謝富治同志哈哈大笑。我們向中央文革反映我們的展覽，家長等都不看，康生說：「要看！」去參觀「大觀園」時，康生說：「這裡比頤和園還好嘛！」我們向康生同志建議：「紅代會舉辦聯動展覽會址應該設在八一學校。」康生同志說：「這裡挺好嘛，一看就知道聯動，修正主義是怎麼分裂出來的！」這時關鋒同志說：「高幹子女再也不能集中在一起了。」「幹部子弟學校不能辦了。」康生、伯達同志連連點頭。參觀路上，總部同志向首長彙報說：「我們要解散這樣的學校，讓學生到工農子女中去，參加一段勞動。」康生、伯達同志連連點頭說「這倒是個好辦法」。走到水塔附近，伯達同志講：「這個地方當個療養院還不錯。」我們反映說：「參觀展覽的工農兵群眾也說這裡可以做療養院。」我們彙報了聯動分子現在還在活動，還在展覽會門前點火，伯達同志講：「還這樣啊？！」謝富治同志問：「查出來沒

有？」他還說：「這裡就是培養聯動的社會基礎。」最後康生同志說：「明天讓幹部（指「紅旗」雜誌社幹部）統統都來，把會調開，座談會不開了，明天參觀時可以談更詳細一些。」

康生、伯達、謝富治等首長離校時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sup>19</sup>

## 康生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3.10.）

（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

請到會同志們原諒。原來準備和同志們座談，不是來作報告，到場後同志們來個不發言，這就逼著我講話，這樣一講難免要犯錯誤，這就相當為難。現談幾個問題。

一、關於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問題。首先請同志們打開語錄204頁，把第二十四節標題《思想意識修養》改為《糾正錯誤思想》。同一節的208頁，倒數五行起「劉少奇……你的還是我的」。

（大笑）這一段刪去。為什麼把標題改了？這是劉少奇的語言，是不通的，不科學的。在毛主席著作中，從來不用思想意識修養這個詞。思想和意識有聯繫。但又是兩個概念。講思想是一回事，講意識那就含意很廣。意識是指人的頭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在一定意義上講，在生理學上講，意識和知覺有相同的意義，失掉知覺，就失掉意識。意識，是包括感性知識和理性知識兩個方面在內的。思想有獨立的含意，它是指人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對社會現象的反映。與這相同的語言，有時又叫思維，主要是講通過感性認識達到理性認識。看來劉少奇這個「馬克思主義」是不通的。

毛主席講過，劉少奇的這本書是欺人之談。革命的根本問題，在這

<sup>19</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1967年4月。

本小冊子裡只談個人修養，個人道德，根本不談奪取政權問題。離開了政治，離開了階級鬥爭，自然就會陷入唯心主義的泥坑。同志們有時間可以看看這本書。

劉少奇說，共產黨員修養要有很好的共產主義道德，他的共產主義道德是能「愛」人，能「惡」人。又說，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完全是孔孟之道。

劉少奇說要有最大的勇敢，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這是他說的共產黨員的最大勇敢。

劉少奇在這本書中，說到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時，說什麼沒有偶像的崇拜。可以看出，這是暗示攻擊毛主席的。他在講到忠誠坦白時說，要能「無事不可對人言」。照他這樣說，黨的機密也是可以告訴蔣介石的。

劉少奇還說，要「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愛心」。請同志們注意，他的所謂自愛心是「保護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這是赫魯曉夫的活命哲學。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叫安子文、薄一波去自首。這就是他的所謂「修養」。

從這本書裡，可以看出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本質和醜惡靈魂。同志們提出，要對這本書進行批判，是很好的。這本書在國內外流毒甚廣。毛主席說，要寫文章批判。

二、昨天，我把毛主席同謝胡、卡博、巴盧庫等同志的談話向同志們傳達了。我想同志們的問題原則上是可以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毛主席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還要奪權。毛主席領導下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還會產生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的問題。我們的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為什麼還會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從這裡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

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天天寫文章罵我們。《真理報》一月份就發表二百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和帝國主義腔調一模一樣，沒有什麼新的東西。無非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不是革命的；說不是發展文化，是破壞文

化。毛主席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革命人民的看法。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深入發展，是觸及人們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的大革命，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發黑暗面的大革命。因此，這場革命運動，是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史無前例的偉大的革命運動。它使毛澤東思想深入億萬人民頭腦中，使億萬勞動人民直接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直接掌握了馬列主義。這是馬列主義一百多年來發展的新階段。這不僅對中國革命有極其偉大的意義，對世界革命也有極其偉大的意義。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和馬克思主義者，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相反，他們歡欣鼓舞，熱烈擁護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影響很大。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罵我們，說糟得很，一切革命人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異口同聲說好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這是世界上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映。

對任何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總是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兩種不同的看法。我們研究歷史教訓，對於認識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好處。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農民在鄉裡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裡消息傳到城裡來，城裡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另一方面，革命的人民則認為完全是對的，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這是四十年前毛主席對偉大的農民運動的看法，我們今天重讀這一段，仍感到很現實。」

同志們還可以想一想，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整風運動的歷史。毛主席說，這次整風運動是無產階級思想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機會主義的鬥爭，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通過這場

鬥爭，大大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粉碎了王明路線，奠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思想基礎。對待這個偉大的運動同其他的革命運動一樣，也有兩種截然對立的看法。毛主席和絕大多數黨員和幹部認為好得很，而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則認為「糟得很」。

同志們，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毛主席提出的這三面紅旗，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全國人民絕大多數黨員和幹部認為好得很，而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反黨集團則認為「糟得很」。

所有這些說明什麼呢？有些人是站在敵對的階級立場上來反對革命的，有些人是反黨分子，他們利用群眾運動中的個別缺點，利用延安整風審幹中的個別缺點，他們利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個別缺點，抓住不放，向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攻，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他們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有一種人一時看不清楚，分不清主流非主流，主要非主要，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固定一點，看不見運動的發展，看不到缺點錯誤已經或正在糾正。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其結果容易把是非顛倒了。

同志們可以想一想，認識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線，並得到全黨的信任，是經過許多曲折，許多鬥爭的。從黨創立時算起，到七大是經過了二十四年。有個代表人物叫王明，住在莫斯科，化名外國人罵中國共產黨，直到現在中央委員會裡還有人否定延安整風，比如張聞天。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就更多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譚政等等。彭德懷最近又寫信給毛主席為廬山會議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的會有兩種立場，兩種看法。有的是黨外的敵人，有的是混進黨內的敵人，也有一些同志一時看不清楚，有懷疑。所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了相當勝利的時候，解放軍同志必須吸取歷史教訓，看清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這個運動像延安整風運動一樣，年限越久，意義越大，時間越長越看得清楚。同志們要堅信毛主席。今天到會的同志，包括我在內，擺在面前的是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講的那種情況。毛主席說：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要從主流本質和運動的發展看問題，吸取歷史上的教訓，看清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

### 三、什麼叫兩條路線？兩條路線鬥爭的實質是什麼？

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個兄弟黨的領導人談話，指出了這個問題。什麼叫兩條路線鬥爭？什麼是劉鄧路線的本質？有一個概括的說法，毛主席說，兩條路線的鬥爭，實際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銳更加集中地暴露出來罷了，其實他是長期存在的東西。什麼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本質的東西是什麼？本質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對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消滅一切私有制，而且逐漸消滅產生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劉鄧路線就是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堅決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全國解放，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在這一年五月間，劉少奇到天津視察工作，向天津的工人代表會議公開聲明說，中國今天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否則就違背人民的利益，違背工人的利益，這是劉少奇的綱領。同一個時候，他還在幹部會議上講了兩句概括的話，他說，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勞動人民不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一九五零年劉少奇曾提出中國不是發展社會主義，而是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這句話後來鄧子恢也講過。這些是修正主義、社會民主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共同論調。考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人，雖說法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結論：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沒有發展到一定的水準，農村分散落後，這樣的國家，無產階級即使取得政權，也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能讓資本主義發展到可以走社會主義的時候，才能發展社會主義。這個理論，在蘇聯十月革命後，大大發展。他們說，一定的經濟基礎，才能有一定的上層建築；一定的生產力，才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經濟不發達，怎麼

能實行社會主義，如果實行社會主義，就是反馬克思主義。1930年考茨基寫了一本書，叫《陷入絕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他在這本書裡講，十月革命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了道路，按照俄國的條件，不能發展社會主義。他狂妄地說，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如果列寧是對的，那麼他幾十年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就全部垮臺了。在蘇聯，有個蘇漢諾夫說，城市工業水準低，農村很落後，在俄國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列寧在1923年寫了一篇文章《論俄國革命》，嚴厲駁斥了這種修正主義觀點。列寧說，俄國生產的發展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工業還有一定的基礎，農民雖然落後，但同無產階級一同革命，農民是贊成革命贊成社會主義的，你們是修正主義者。在哪本書上看見過先要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建設社會主義。蘇聯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一九二八年才實行農業集體化，這裡除有各種原因外，主要是資本主義逆流的影響。

為什麼講這個問題，列寧在論合作化的文章中說，如果只有城市的社會主義，廣大農村是資本主義，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就不鞏固。只有農村實行集體化，合作化，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靠的基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的一個社會基礎，就是蘇聯農村存在的個體經濟，東歐的一些國家也是這樣。這樣的國家是什麼社會主義？是名義上的社會主義。

再看看劉少奇，陳伯達同志已經講過了。劉少奇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辦互助組合作社，在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是錯誤的，不實現工業化，農業就不能合作化。一九五二年，他批山西省一個報告說，把農業勞動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水準，企圖戰勝自發勢力，這是錯誤的，危險的，是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批語曾發給馬列學院的學生和中央各組委。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在城市發展資本主義，在農村反對搞合作化，主張發展富農經濟。後來大砍合作社，事實上也是他的主張。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對黨校學習毛澤東思想。一九五九年在廬山反彭黃時不積級；一九六二年又大搞單幹風；一九六四年搞形「左」實右；在文化大革命中實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切是有聯繫的，絕不是偶然的。毛主席說過，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社會主

義道路的鬥爭，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存在。

#### 四、「三結合」的問題。

基本論點已經在「紅旗」第五期社論上說了。這個社論，主席親自修改，增了下面一段話：「從上至下，凡要奪權的單位，都要有軍隊代表或民兵代表參加，組成『三結合』。不論工廠、農村、財貿、文教（大、中、小學）、黨政機關及民眾團體都要這樣作。縣以上都派軍隊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這是非常之好的。軍隊代表不足，可以暫缺，將來再派。」林副主席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我們一萬句。這個「三結合」是對我們解放軍的最大信任。如何執行這個任務，請同志們好好討論。對於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問題，當然要注意。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有的省委雖然有戴高帽子的，實際上問題並沒有真正揭開，不要去「和稀泥」。

奪權問題，同志們有很多很好的意見，很好的經驗。現在軍管奪權，與解放初期不一樣。這是大民主條件下的軍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的軍管。軍管一定要毛澤東思想掛帥，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這是最重要的問題。軍管中可能發生一些矛盾，要放手發動群眾去解決矛盾。解放軍不要走工作隊的老路。

我的講話完了。<sup>20</sup>

## 康生接見安徽奪權代表時的講話（1967.3.17.）

【時間：凌晨】

一、向同志們宣佈，從現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縣要到北京來捕人，一定要經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准，任何人，任何組織

<sup>20</sup>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不得在北京擅自捕人，你們已經沒有經過一定手續在北京捕人的過去就不咎了，以後不經過公安部、中央文革批准擅自捕人的要依法懲辦。

- 二、取消對陳明遠的通緝令，如果他有錯誤，有罪過可以向中央報告，但你們自己不能擅自下通緝令，過去下的通緝令應當取消。
- 三、在合肥的現在奪權的一派的同志要求你們通知家裡，通知合肥，不准再亂捕人，允許大家辯論，不許對持不同意見的實行鎮壓逮捕，已逮捕的一般應當立即釋放。
- 四、任何一方不准武鬥，贊成1.26（奪權）也好，反對1.26也好，不准武鬥，不准挑動武打，不准用標語，報紙挑動武鬥。
- 五、中央在調查安徽的問題，希望你們不管哪一派，不能隨便去製造謠言，不然中央解決你們的問題將更慢、更遲緩。15日你們就打傷了幾十個人，中央正在解決你們的問題，你們奪了權的一方更應該允許不同的意見麼（關：可以到北京來談麼）在北京能談，在合肥就不能談麼？不能開會解決麼？是說明中央解決你們問題還是製造困難呢？因此希望同志們冷靜地從大的方向解決問題，不要宗派主義，不要違抗中央精神，不要違反毛澤東思想，要解決你們的問題，團結起來，把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搞得更好。把李葆華一小撮的問題揭開，掌握中央政策。

奪權正確的有兩種奪權，一種是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種是奪自己頭腦中的權，這一點誰都要做，要修正錯誤。<sup>21</sup>

## 中央首長第三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 (1967.3.18.)

【時間：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早三點二十分至六點三十分。地點：人民大會堂小會議室。接見人：總理、康生、肖華、李天佑、王力、關

<sup>21</sup>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鋒、戚本禹、徐立清等負責同志。被接見人：內蒙古軍區：吳濤、肖應棠、劉昌、黃厚。內蒙古黨委：高錦明、李樹德、李質、郭以青、張魯、王鐸、王逸倫。呼市三司代表郝廣德等五人。「紅衛軍」代表張三林等五人。】

（總理、康老等中央負責同志進入會議室坐好後，即問郝廣德同志最近回呼親自看到的情況。郝廣德同志哭訴「紅衛軍」等同軍區某些人結合起來鎮壓革命造反派的情況。當彙報到軍區派兵在北京抓軍區造反派的同志時）

康老：在那裡逮捕的？（答：在北京）逮捕的什麼人？（答：內蒙古軍區革命造反派的同志）

（喬萬寶、郝廣德同志介紹了軍區派人在北京政法幹校和三機部招待所抓捕人的情況）那一部分解放軍？查一下。

肖華：一個管理局長，帶他老婆來北京，軍區說失蹤兩個多月了，也派人抓走。

總理：你們派多少兵來北京？（肖應棠：一個班）經那裡批准的？（黃應棠、黃厚：報軍委了）你們派一個班進來，我們不知道，就是北京衛戍區同意就行嗎？衛戍區是保衛毛主席的呀（告秘書：請衛戍區傅崇碧同志來）！跑來一些人，勸說回去是可以的，怎麼能抓？把人家夫妻兩口子在西單大街上抓走？

康老：怎麼能在毛主席，黨中央所在地派兵抓人？（查問了傅崇碧同志內蒙古軍區派兵來京抓人的情況）

總理：你們派武裝來北京街上捕人，這也是特殊的哩！這件事情，是在發生之後我們才知道的呀！

康老：你們把部隊拿出來對付群眾？

總理：你們一方面在家亮了政治態度；一方面在北京商談，這樣，還談什麼？你們（問劉昌）是怎麼處理不要對群眾組織（如對「八一八」）宣佈是什麼性質的組織的問題的？

（劉昌：我們沒有宣佈「八一八」是反革命組織。「八一八」代表楊民眾同志：不光宣佈了，還抓起來不少人，打了不少人。）

戚本禹：在總理面前你都不講事實，你怎麼對待總理？（劉昌：你不要嚇唬人！我聽總理的）

關鋒：你們膽子太大了！真是膽大妄為。你們把我們的記者都抓起來。你們知道不知道「紅旗」、《解放軍報》記者是中央文革派的？如果他們有問題，該槍斃回來槍斃，可是你們就扣押了起來。直到肖主任打了電話才放了回來！

康老：（念劉華香的電話記錄）「十八號的大會暫時不開，什麼時候開？以後再研究。」總理告訴你們不要開了，你們說什麼時候開以後再研究。你們就是這麼對待總理的電話。倒是你們眼裡有沒有中央？你們眼裡有沒有毛主席？你們完全目無中央。

關於省市自治區一級奪權問題，總理都得請示主席。你們說你們研究。師範學院不准圍攻，也告訴你們了，有問題中央解決，你們不聽。你們究竟願不願意中央來解決問題？還是你們自己解決問題。總理的電話，你們是怎麼回答的？不讓你們開會，你們還說「什麼時候開再研究！」不回答中央的要求。三司有無錯誤？有錯誤。

王力：還不一定，就從他（指劉昌）今天的態度看，你倒是軍閥？還是解放軍？到底是那個錯誤嚴重，就像你們所說的也好。他們（指三司）不敢反對中央。「紅旗」雜誌是黨中央的刊物你們竟敢扣押「紅旗」的記者。你知道《解放軍報》是誰領導的？（劉昌：解放軍唄！）是林副主席，我們毛主席是最高統帥，你們把《解放軍報》記者也扣了起來，把筆記本沒收，至今不還！

總理：（問黃厚）有沒有這件事：你們為什麼不報告？這件事我今天才聽說。把那兩個記者請來。

戚本禹：倒是你大？還是中央大？是你大？還是毛主席大？是你大？還是肖主任大？肖主任打了電話才放了兩個記者！

肖華：是派武裝押送回來的。

徐立清：葉總辦公室打過電話，我也給他們談過。

王力：對我們都是這樣，何況對群眾？你們按主席思想、黨的政策、人

民解放軍傳統冷靜地想一想。

總理：十八號你們要開會，十七號報告，還要飛機，這是先斬後奏，不讓我們解決問題。「八一八」可能打人，組織可能不純，但是幾千人的組織怎麼能宣佈為反革命？軍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們要求的。中央的話實際上你們不聽，我們不能不耽心內蒙古軍區站在什麼立場？不讓你們包圍師範學院，你們不聽。用這種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肖華：他們是獨立王國，無組織無紀律。

關鋒：他們是「中央」。

康老：奪權得中央、毛主席批准才行的。三司可能有錯誤（總理：他們已經作了檢討），但比起你們所犯的錯誤究竟那個大？他們不敢反中央。你們冷靜地想一想，按照毛主席思想，黨的原則，軍隊的光榮傳統衡量一下，在具體問題上可能各有多少錯誤，但比起你們這種思想來，究竟怎麼樣？總理給你們講的，究竟算數不算數？

總理：不算數。你們表面上似乎聽中央的話，實際上你們不聽。我們辦事都得請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們不是這樣。你們這種情況，我們不得不擔心內蒙古軍區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上。你們把那麼多群眾組織宣佈為反革命，同群眾搞得那樣對立。內蒙地處邊防，背靠蘇、蒙修正主義，我們怎能不耽心？吳濤同志，你是第一副政委，你應該兩方面負責，派你去呼市看一下，你敢不敢？（吳濤：總理決定了我可以回去）中央文革也去人，聯絡員也去一個。

康老：你們要開大會，是要把你們的意見強加於中央。你們要飛機，還要登報？你們眼裡有無中央？總理要在北京親自主持解決問題，你們就要按你們的意見辦？你們都是老幹部、負責幹部，我們對你們就要嚴格要求，一定要按毛主席思想辦事嘛。

總理：由於學生在軍區門口靜坐，發生了問題，調你們來商談解決問題，找你們幾方面談。二月十七號定了四條，你們是同意的。但一個月來你們並沒有按這四條辦事。找你們來商談，是要把內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聯合、奪權，但這一段你們不是

按中央意見辦事。

第一、你們竟然在軍區門口把「紅旗」和《解放軍報》記者扣起來。四大自由嘛，記者沒有這個自由？肖主任打了電話，你們還要押送回來。扣留了筆記本，在黃厚手上一個月不報告。記者報導如不符合實際，你們可向上反映嘛，怎麼能扣留？這件事就是對抗中央，沒遵守軍委的命令。在軍區門口發生學生靜坐以前，劉華香就請示過要調兵的（徐立清同志：葉總辦公室曾告訴過他們不要調兵）。

第二、劉華香開完會，本來想要留他商談解決問題的，他不招呼我走了。他回去後一個來月，辦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圖的，越走越遠。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過你們，不讓你們宣佈「八一八」是反革命組織，表面上你們聽中央命令，但你們在下面宣佈，這是要兩面派麼。

第四、宣佈人家好多組織為反革命，怎麼能這樣壓制？即使是保守的組織，也要教育提高，怎麼能壓制？完全不是對待群眾組織應抱的態度。這是劉、鄧路線（康老：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第五、你們派部隊來北京，就是你們要指揮中央，你們目無中央。北京衛戍區是保護中央，保護毛主席的。你們派兵來大街上抓人，是要為所欲為。

第六、還有這樣的傳單（指軍區印的陳鼎寫的材料），還加上了按語。清華附中的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寫的，也要勸說他不要寫。你們還加上了按語，印發傳單？如果是你們寫的。這樣做不是破壞解放軍信譽嗎？這怎麼能這樣對待紅衛兵？何況對紅衛兵，你們對中央文革的記者都那樣對待，這是對抗中央！

第七、你們包圍了師範學院，據這位同學（指郝廣德）講已經三天了。一個群眾組織，怎麼能那樣對待？這是你們有指揮的，要把一個群眾組織搞垮嘛。對這個問題，打電話你們沒有回



答，還要中央去調查！這一個月來你們進攻，不照中央的意圖辦事。清華附中同學的信，如調查屬實是你們強迫寫的話，你們就要犯更大的錯誤，你們欺騙中央。

第八、開大會奪權，說是搞呼市的慶祝，實際上是奪區黨委的權。權星桓、康修民實際上是讓你們掌握的群眾組織抓起來了。對區黨委書記，你們軍區政治部就定了性？你們比中央在先把名字點了，不奪權也等於奪權了，你們有這麼大的權嗎？七、八號奪權（指呼市）根本沒有報來，十五號登報，明天要開大會，還要批准登報，都不是商議，是給我們下命令，統統是先斬後奏，你們犯了多大的錯誤！

這一系列的事情，我們不能再忍了。這些你們都沒請示過中央。你們想過了沒有？這麼做對不對？（郝廣德：他們把十八號開會的事在廣播電臺廣播了）噢！報紙、廣播怎能有同中央不同的聲音？你們掌握了報紙、廣播，就登、就廣播？廣播問題的四點指示不生效了？（郝廣德、高樹華：他們把二十二問中央文革，在京參與反中央文革活動的「抗大」，在報紙上、廣播上稱為「左派」，要大家學習）這是反動的！你們（問「紅旗」、《解放軍報》記者）認為「抗大」是什麼組織？（記者答：「抗大」炮轟中央文革，是反動組織！）

王力：這同他（指劉昌）思想一樣，他也炮轟中央文革嘛！

總理：你們（問記者）的筆記本讓他們沒收幾本？（記者答：一個三本，一個五本）把中央文革派的記者的筆記本都沒收了！帶來一個月不報不交（黃厚：這是我們的缺點）！什麼缺點，這是反抗中央！

你們（問記者）有勇氣再去呼市一趟嗎？（記者答：有）好，吳濤同志帶隊。聯絡員也去一個（肖華，徐立清同志；軍委文革也去一個）。把你們抓的人都放出來（念了權、康、雷及三個秘書的名單）。

總理、王力：你（向吳濤）去了要按黨的原則，實事求是辦事。

總理：這是對你的一次考驗。坐飛機去，可住在機場，調查方便。可找

幾方面的人談，到現場去看，先到師範學院去看。

幾派的人正在這裡商談解決問題，怎麼能把一派壓的垮了？你們這樣做，我們怎麼能信任你們。軍區領導人你們面臨很大的危險！你（問吳濤）是第一副政委嗎？肖主任說了，我們信任你，立即恢復第一副政委職務。

王力：你們到呼市後，願意到那裡就那裡，願意找誰談就找誰談！

總理：這說明你們（指軍區）的立場問題，是執行劉、鄧反動路線。你們說群眾大會不開了，還是要開向中央示威？是真不開了，還是搞什麼？這都要看一看。對區黨委的六位同志要立即恢復自由！

肖華：肖應棠你馬上打電話，要保證中央調查團的安全，出了問題要由你負責）。

總理：今天會上談的不能向外傳，四方面各負其責。

戚本禹：今天是內部調查會，內容嚴格，不能向外傳，一定要維護人民解放軍的聲譽，不能把矛頭指向解放軍。

王力：問題到了今天，不能不嚴肅指出，但要用適當方式宣佈。你們認識了，改正還來得及。

總理：你們回到京西賓館好好討論檢討。回頭，肖主任、李副總長還找你們談。

康老：一般的解決這些問題是，首先要承認錯誤，而後再區分性質；把矛頭和群眾分開來。

總理：李副總長你去一下呼市，不能多待，可待三、兩天。

## 中央首長第二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記錄 (1967.3.21.)

【時間：夜至22日凌晨，地點：政協禮堂。出席：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肖華。】

王力：宣佈一條，這裡什麼話都可以講。

陳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點多鐘戒嚴了，11點左右……

肖華：兩點左右，樓有多高？

陳伯達：有五層多高……有爆炸聲不是手榴彈就是……我們也不敢看了，過了一會兒，×××就都進來了。……我親眼看見一個解放軍講：昨天你還和我辯論，捍衛隊就打你。

戚本禹：捍衛隊打人？

陳伯達：打，×××也有人打人……

張惠英：我在報社，哪裡都可以去。事後他們對我講，這些死人都是從帳篷裡拉出來的。

戚本禹：你多大？爸爸幹什麼？（答……）報社有沒有槍？

張惠英：沒有。我有證件哪兒都可以去。

肖華：報社樓上有沒有槍？

金萊：我在報社，樓上我都去過，沒看見槍。

戚本禹：二十三日你們誰在樓上？

王建義：我在。……沒看見有槍。

戚本禹：小橋死人最多？

陳存秀：我在小橋。……軍區的喇叭先宣佈「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本禹：軍隊的車宣佈的？

陳伯達：……有人叫我把頭低下，我就聽到前面有槍從北向南打。

肖華：誰先開的槍？

陳伯達：軍隊從北向南打。

王力：步槍？機關槍？

陳伯達：步槍。

（肖、王、關看圖）

關鋒：第一槍喇叭沒打壞？

陳伯達：11點停止廣播。他們叫我們11點停止廣播，否則一切後果由「八·一八」負責。

王力：他們11點10分開槍。

陳伯達：……有四五排手挽手……（肖分外注意、戚微笑、關吸煙安詳視肖）

關鋒：四五排？工人、學生？

陳伯達：工人們都手挽手站著。……（突然咽住不講）

關鋒：講吧。（無聲）那些人怎麼死的？

陳伯達：……兩點左右從賓館打來兩顆信號彈，兩個教練彈，天空有炸開飛的紙機，聽到的全是機槍聲。

關鋒：不是報社裡先開的槍？

相喜：我們的同志在裡面。

陳伯達：工人們一排排的倒下，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們撤……我們被抓，下午四點捍衛隊來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臉腫，剩下的人，我們學「語錄」，唱想念毛主席……後把我們紅衛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勢緊張，我們有精神準備，因為知道11點要採取行動。

肖華：哪個賓館住了隊伍？

濱友：裡面有機槍、探照燈，可以打到小橋。

關鋒：為什麼能打到？

王力：那個地方高？

肖華：幾挺機槍？

濱友：兩挺吧，不詳。

戚本禹：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來看）

于桂梅：……北郵的宣傳隊出去宣傳……下一時，打起了槍，不知打到哪兒，只聽槍聲，報社裡面的師傅指槍膛說：「你朝這兒打。」軍隊叫：不要慌，我們把槍對準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會兒，一點多時，形勢緊張，一會兒外面槍聲緊，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車×××在打槍，朝前面一堆人掃射。當時我想不會打死人，沒關係，有假槍。後來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邊也倒。後來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來了，臉上全是血，我們才知道人打死了。後來車上的人都下來衝進報社了，……叫報社

裡的人交證件、主席紀念章。……後來了人，照名單宣佈反革命，（主要是堅守報社的「八·一八」和紅宣兵）當時抓起一些人捆起來打一頓。一直沒見的捍衛隊這時全出來了，（關、戚冷笑）來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點，押我們，勒令舉手，我們不舉，就×××××，半路叫我跪下報名……到了省委，他們叫我們按單位分開……後放了，路上見全城戒嚴。

關鋒：這是二十四日了！

于桂梅：我們剛一進廠，捍衛隊就喊「站住」，我們沒進，到蘭州，想彙報中央。

肖華：（向小陳）你們那天廣播了什麼？

陳伯達：「首都紅衛兵報」「通令」

肖華：沒別的？

陳伯達：沒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關鋒：（問帳篷裡的情況）（康老、伯達進廳，熱烈鼓掌）（戚將麥克風頭轉向伯達，伯達又風趣地把麥克風頭轉向戚）

相喜：（重複13日彙報……康十分注意聽）

（伯達翻閱《青海日報》）

王力：……我挨了一拳。

戚本禹：誰打的？

王力：不知道……我清醒過來以後，有四個背槍的×××……他們打我，給我一張紙，我寫了個強烈抗議，他們上來個人打了我個耳光，打完了以後提出了我這是19日。23日就發生了事（重複十四日事）（李平安、孫祥梅入場）。在我們牢一個人受了傷，臉上挨了槍子兒，頭被砸爛。我們的男、女同學都被綁起來。有的同學被打的厲害。我們聽了第四期社論之後非常難過……給我們同學帶上鐐拷。每天給兩張紙，一張寫交代，一張寫揭發……。放風的時間一天就五分鐘，陰森森的。我們的一個同志在現場也沒回來。擊倒了一個郵電管理局的同志，從腹部穿過。（康生、伯達一直注意聽著）又擊中劉鳳池……有七十多個人被打得滿臉是

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約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們沒有看到「八·一八」有槍。他們講「八·一八」有槍，又拿不出來。一個×××又講沒槍。三月一日下午五點鐘，他們把我們從監獄裡押了出來，送到了黨校，進行「整訓學習」。（實際上，當時黨校是一個監獄外的監獄，首都三司和外地紅衛兵並沒有獲得解放）當我們四十四個剛從南灘監獄裡出來的同學，被押到黨校，強迫我們去禮堂開會，聽「衛戍區司令部首長」報告，我們剛進會場，一個「衛戍區司令部首長」問我們是從哪裡來的，我們回答說：「南灘監獄裡來的」！！當他聽我們的口氣不對時，他講：你們不是從南灘監獄裡出來的，你們回去後千萬不要告訴你們的同學和老師。你們是「集中審查」的，是因為沒有地方，借那裡（指南灘監獄）的房子用。……（除康老外，眾首長皆笑）我們大的二十二歲、三歲，最小的十五歲。（康老笑問張惠英多大？）

戚本禹：他（指張）在報社，你談談吧？

張惠英：……沒想到我們是反革命。（眾首長皆笑）我們聽到是炮聲，同學們講是槍聲。（眾首長又笑）

肖華：你聽過槍聲嗎？

張惠英：連串的沒聽過。……三司的宣傳車講我們要堅守崗位。三司的念語錄、演節目，許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們問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兩點左右槍聲特別密。我們都嚇醒了，……刺刀對準了我們，叫我們舉手，我們不舉，他們講你們這樣頑固，用槍托打我們……他們念名字許仲仁……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們互相檢舉，我們都不說話，他們就讓進來的捍衛隊、「火車頭」認本單位的人，認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頭目，抓小頭目，再抓廣播員打……一個工人受了重傷，醫院不給包，這個工人活活地打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們的同學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廁所他們不叫，我就跑，罵我小頑固，（康老冷笑）我出來以後，他們就

打。……我帶你院裡參觀，朝裡院說：「好，你們『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燒死，腦袋都打掉。」這時已經過了三、四個小時了，不叫別人看，只叫捍衛隊看，對我講：「你看這個小女孩，腦袋都被砸爛了……」他們說：「你們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們『八·一八』」！以後他說：「這些人都是我們從帳篷裡搜出來的，已經燒死好多天了。」……有些帳篷我經常去，根本就沒有見過死人，他後來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學講了，同學們都不相信。一個×人上來就打，揪掉了我的頭髮，邊打邊罵，還搶我的紀念章，我裝在口袋裡不給，旁邊一個人講：「紀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寫條傳與伯達，伯達傳與戚、關……關喚人，關、戚交換意見，伯達過去了。）……他們不光有槍，還有圓盤的槍，（康老點頭）……我們上了車……，

肖華：（向張）與你講話的人（說「八·一八」打死解放軍的人）從哪兒進來的。

王相喜：（答肖）……在火車上抓我們在車上的同志……他們講打死了戰士，用棺材遊行，上面寫著「×××烈士」，士兵們的腳趾頭都受了傷，「火車頭『真』勇敢」（重複14日情況）……一個子彈打傷了脖子的同志，本沒死，被剪刀絞斷了咽喉死了。

肖華：沒開槍解放軍怎麼傷呢？

王相喜：（解釋）

伯達：你們的同學回來沒有？（答：沒有。）應回來反映情況。

肖華：打了電話，昨天……。

康老：你們有數沒有？

眾：交了。（指同學名單）

戚本禹：（對康）給他（指肖）了。

肖華：（對金萊）我打了電話了。

戚本禹：你們在場的人在報社看到槍了沒有？

眾：沒有。……我們裡面擠著睡。

戚本禹：裡面睡了兩千多人。

康老：裡面是哪個工廠的工人？

眾：（對小張）你去帳篷裡去看燒死的人有幾個？

小張：四個。

肖華：死人像幾天了？什麼樣子？比如臉……

小張：和別的死人的樣子一樣。

肖華：是燒死的嗎？

小張：×人講是燒的。

小賈：我們參觀時，他們講是硫酸燒死的……

（戚對肖笑）一個××講抄去四挺機槍、子彈是在地道裡，我們要看，他講地道口還沒找到呢？……血還是鮮紅的。

肖華：有槍眼沒有？

小賈：他們不叫去，劃了一道白線，說是現場。

肖華：是現場？

小張：我看時，他們從帳篷裡找出來的，不是現場。

肖華：你們參觀屍體有多遠？

小張：……

肖華：幾個燒死的？

小張：四個。

肖華：（對賈）燒死幾個？

小賈：我見燒死的有一個，胸口有一灘血，其他都是打死的。

（戚拿出一迭照片給參觀過的人看）

戚本禹：是不是你們參觀過的？

小張：我看不出來。

（康老點幾個有關的學院）

眾：……

康老：（指了一下王相喜，問各學校的同學）（對農機三人）你們二十三日在現場，你們看到有槍沒有？

三人：我們14日進去沒看到。

康老：工人換班，有沒有可能帶進槍去？



眾：沒有。

王相喜：……（伯達出去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有幾個××××同意開槍動武。

康老：是那個×××師。

眾：×××部隊。（肖對康耳語）

呂生：我們怕××栽贓，我們進去時連小刀全不讓帶。……

相喜：根本沒逮捕證，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萊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訊」，問：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問肖主任。給肖華）

（金萊向穆欣答：林總那個是假的，蘭州那個查一查，看是否青軍欺騙蘭軍）

王建義：……

康老：……

王建義：我們廠的「老捍」，有人穿著軍衣，領章一樣不差，有四個人我們認識他，其他廠也可能有，我們廠的四個人我認的准。報社中的帳篷，我負責搭了一部分，每天我們都去帳篷裡看一看，有沒有烤火，燒壞了的，所以我保證裡面沒燒死人，聯絡點我也去，保證沒有槍。

康老：他們有一種說法：……報社裡有許多人原是「八·一八」，後不贊成「八·一八」，報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這13個人中有沒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眾：沒有，造謠。

王相義：……

（金萊向穆欣，難道燒死的還有血跡嗎？穆對金萊耳語：他們軍區做了許多假象，核對一下，可以駁倒他們）

相喜：……「八·一八」在堅持文鬥，不用武鬥上非常好，當我們拖住報社裡「執行任務」的解放軍時，他們全有意見。（康頻頻點頭）

王建義：解放軍吃餅乾時我們送水，他們問，你們那麼多人怎麼燒水？我講就是我們不喝水，也要讓解放軍喝水。（當時他們的連長不

在)他們講你們好，不過我們是執行命令。

康老：你們怎麼辯論「六·三」社論？這與我有關。

眾：我們認為好，現在他們要翻案。

金萊：《青海日報》有個人要找您辯論。

康老：要把我抓走。(笑)陳逸怎樣？在北京？

金萊：他在青海沒有生命安全，現在要抓他。

康老：他現在在哪兒？

答：在地院。

康老：怎麼在地院？

金萊：「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馮是地院東方紅的，他談一談。

馮老：(談黑材料)

康老：是不是要燒？

馮老：都要燒，據說已經燒掉了兩車。

康老：陳逸那時就來了？

馮老：……

康老：程光遠怎樣？

馮老：……

金萊：趙永夫態度惡劣。(述談判情況，去蘭州情況)

康老：(問一些現象)軋死一個女工怎麼回事？

(關、戚在一邊談笑自若，肖聚精會神)

康老：不是硬衝的！噢，噢……(康老關心二·三事件。談得有些亂)

胡長生：(述二·三事件)

濱友：(介紹劉賢權，送上「簡報」，關鋒同志交給康老)

康老：楊植霖怎麼樣？

胡長生：(介紹楊)楊後來支持「八·一八」。(康點頭)

康老：高克亭怎麼樣？

濱友：「八·一八」叫他寫材料寫了不少、……

胡長生：他被「八·一八」遊過街，也被捍衛隊遊過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老：為什麼對高克亭遊街？

胡長生：他搞經濟主義，「八·一八」遊了他一回。

濱友：李芳遠也支持「八·一八」，原來他轟王昭，最近聽說和軍區發生衝突有點問題。

康老：韓明呢？

陳武軍：……

康生：軍隊除了趙永夫以外，你們認為誰還不好？

濱友：××……

胡長生：一月三十日晚，××和劉賢權接見外地紅衛兵時講：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劉司令員，時隔不久，完全顛倒過來，大罵劉。

濱友：馮國良、相喜：電訊從二月二十三日斷絕。

馮老：2月23日我感覺……因為沒電話了。

金萊：（遞給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沒收的紅衛兵財物，請求肖指示青海軍區歸還，肖閱後向金萊點頭）

濱友：軍區內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戚：你對肖主任講）

肖華：多少人？

（答：十一人）。

康生：你們有幾個中學生？（舉手）這麼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聲）你是廣東的。

吳生：對。

康生：怎麼串連串青海去的？

戚本禹：青海好玩？……（場內十分活躍，……）

康生：「八·一八」發展組織街道上不純？

胡長生：……「八·一八」組織大部分是純的。

戚本禹：有個王仲山搞有許多女人嗎？

胡長生：有個人經常跟著他，但決沒有這樣的事。

戚本禹：不是一個人！

康生：你們有人偽裝解放軍把槍運走了？

眾：（十分氣憤）根本沒有！（金萊對穆欣：造謠造到這種程度了！  
穆欣笑）（康把麥克風轉向肖）

金萊：《人民日報》三月十二日二版頭條最後一段怎麼辦？

王力：恐怕要更正。

關鋒：今天講的大家出去不要說，什麼那個同志參加了，……

康生：我們正在調查，你們不要給我們製造困難，你們一說中央文革支持你們，結果你們倒楣。你們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無理才急。在調查時間不要亂說，不要打電話，發信。

眾：他們抓人！

康生：在北京不許抓人！要抓必須通過公安部、衛戍司令部，還有中央文革，這一點可以講。

王力：今天就到這兒吧！（鼓掌歡送眾首長）<sup>22</sup>

## 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 (1967.3.24.)

【時間：24夜—25日凌晨，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接見首長：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楊成武、關鋒、王力、戚本禹、穆欣、肖華。被接見單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原首都三司駐青海聯絡站全體人員、北航紅旗赴青戰鬥隊、首都及外地赴青紅衛兵。青海方面人員：青海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副司令員張江霖、青海省委第五書記楊植霖、書記高克亭。其他人員：趙永夫（青海軍區副司令員）、王昭（青海省委第二書記）、張曉川（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洪（×××副師長）。】

<sup>22</sup>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因去晚了，前邊有一段話沒聽到）

總理：今天開會，以前的情況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憑什麼權力撤銷劉賢權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

趙永夫：我們沒有權叫他工作不工作。

總理：是他自己（指劉賢權同志）不工作嗎？

趙永夫：（結結巴巴，滿頭流汗）

總理：停止了劉賢權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二十多天了，難道你不知道嘛？……你不是黨委委員嗎？你們成立了「指揮部」，上報了蘭州軍區和中央軍委沒有？

趙永夫：沒有。（態度極不嚴肅極不老實）

總理：現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問題，你態度必須老實！

康老：你到指揮部，代表你個人，還是代表軍區？

趙永夫：我代表軍區。

總理：你們沒有得到了軍委批准，停止了劉賢權黨內外一切職務，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

趙永夫：我不知道。（態度相當惡劣）

總理：你代表軍區嘛，怎麼什麼都不知道？！

趙永夫：（支支吾吾）

總理：蘭州軍區來的答覆，你們認為怎樣。

趙永夫：（沉默）

總理：（十分憤怒）蘭州軍區三條指示，你們執行了嗎？

趙永夫：他們都不同意。

總理：你同意嗎？

趙永夫：我也不同意。

總理：你為什麼違抗上級軍區？

趙永夫：××、×××、××都不同意。

總理：圍攻《青海日報》社誰下的命令？

趙永夫：大家研究的……

總理：你是個軍人，你怎麼這樣回答問題？（十分嚴厲）

趙永夫：（沉默）

總理：趙永夫，你剛才沒說清楚，劉賢權同志二十多天都沒有自由，你講一講，是怎麼回事？

趙永夫：劉賢權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負責任，有情緒。軍區黨委王文英負責，他在場。

總理：（聲色嚴厲的）軍區誰負責？

趙永夫：（詭辯）王文英副政委……

總理：你沒有責任嗎？你們成立聯合指揮部，你報了軍委和蘭州軍區嗎？（十分嚴厲）

趙永夫：報了，批沒批不清楚。

總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實說！

趙永夫：（支吾）我不清楚報沒報。

總理：軍區的指揮權讓給指揮部了！你是軍區副司令員嘛！那就把軍區的指揮權讓給聯合指揮部了？

趙永夫：不是讓給，不讓給已研究好了，我給常委彙報了。（支吾）

康生：你是代表軍區還是代表個人？

趙永夫：代表軍區。

康生：你是代表軍區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

趙永夫：我是軍區代表。

總理：十六號電報蘭州軍區沒回電就這樣幹了？誰派劉斯起到蘭州軍區去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給你的電話呢？二月二十三日對報社革命群眾進行武裝鎮壓，（質問）指揮部誰指揮？

趙永夫：×××指揮。

楊成武：（質問）

總理：×××部隊張洪回答。

康老：（嚴厲）誰下的命令？

張洪：領導小組決定……

戚本禹：（生氣，重令）誰下的命令。

張洪：……

趙永夫：指揮部下的命令，我去執行。

總理：你的鎮壓反革命組織報告，你給我的信，白紙黑字，你負責。寫報告，打劉賢權，彙報中央文革都是你趙永夫。

趙永夫：我不知道。（支吾）

康老：你什麼都不知道！

肖華：那天你還在樓上指揮。（總理、楊成武、康老同聲追問趙永夫）

趙永夫：（不正面回答，亂扯）

總理：你別談了，別占時間。（問××師師長）你和趙永夫誰指揮誰？

××：不歸他指揮。

總理：那天你們行動誰指揮的？

××：……我們派了兩個排。

總理：誰派的？

××：共同研究的。

總理：你是軍人，你怎麼這樣回答問題！

××：當時×××、×××……

總理：你們都不老老實實的講問題。劉賢權同志你簡單的講清楚。

劉賢權：十號上午開常委會，我們通知趙永夫開會，他單獨行動不來。佈置圍攻報社的事，部隊幾乎全是軍區的部隊，主要是獨立師、獨立團的。主要是趙永夫調的。

總理：對於軍區黨委停止你的一切職務，你表示怎樣？

劉賢權：我根本不知道，他們什麼都不告訴我，剛聽同學講，才知道停止了 my 職務。

總理：張江霖同志，你還有什麼要講的？

張江霖：聯合指揮部名為造反指揮部，實際上是趙永夫指揮。一月三十一日「機關造反派」叫我們答覆問題，不答覆就跪下。趙永夫在後邊坐著。（總理：他是「造反派」的頭子嘛！）……林山想提意見，王文英講，提也不行了，部隊已經調好，調了二百多輛車。

總理：（對二〇五張曉川）誰調的車？

張曉川：趙永夫。

總理：你的任務是青藏公路，為什麼調車？總共有多少輛車？占多大比例？

張曉川：有××輛，接到中央關於支持左派的命令……（囉囉嗦嗦地從頭說起）

總理：你把話說簡要一點。

康老：組織指揮部是你先找趙永夫，找××師陳立英，怎麼不講這個問題呢？

張江霖：是。我想講的就是這個……（眾諷刺地大笑）

康老：（不滿的）我講的是遊行，那是組織指揮部。

張江霖：……

康老：你們的指揮部什麼時候成立的？

張江霖：二月十八日。（總理：不對）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講的是劉司令員不能工作，不要組織指揮部，可現在你講，一月十八日就組織了。

張江霖：（重複，囉嗦地談起來）（眾首長不滿）

總理：二月三日武裝鎮壓，你參加了沒有？聯合指揮部討論了？

張江霖：討論通過了。

總理：誰指揮？

張江霖：用衛戍區司令部名義。

總理：現場上誰指揮？

張江霖：趙副司令員，×師長。×××在前場指揮，趙副司令員在賓館樓上指揮。

總理：從指揮部成立你就參加活動，還是一月二十七、八號，你就參加聯合行動了？

張江霖：在以前就參加活動了。

總理：你對「八·一八」有什麼看法？

張曉川：沒調查之前，從整個來說，我對「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較好，衝勁較大，但對「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看法不一樣。



總理：差別在那兒？

張江霖：組織不純。

康老：……有個別壞分子，就不是革命組織了？

張江霖：大方向不對，對準貧下中農。

總理：誰見到了？

張江霖：北小街……「四不要」，黨團員不要。為四清翻案。

康老：有文件嗎？你聽誰說的，還是看見的？

張江霖：調查的。

康老：誰調查的？

張江霖：各兄弟部隊。趙永夫的兄弟部隊，張洪的兄弟部隊。

康老：哪個兄弟部隊？

張江霖：剛才講的。

康老：趙永夫的，是吧？

總理：你對《青海日報》有什麼看法？

張江霖：部隊反映比較大，不能如實反映情況。在元月二十九日奪權，軍隊支持問題，實際上是送權，楊植霖同志幾次開會，決定送給「八·一八」。那次報導不真實，開會一萬一千多人，報導十幾萬人。我們認為沒有按主席指示辦報，《青海日報》變成「八·一八」戰報。

關鋒：不登捍衛隊的就是「八·一八」戰報？

總理：出了多少天報？

張江霖：（支吾）三十二天。

關鋒：三十四天！三十四天報都看了？

張江霖：都看了，要背背不出來。

關鋒：三十四天報紙，他有沒有傳達中央精神？你們講，不登《人民日報》社論、「紅旗」社論、《解放軍報》社論，完全不是這回事！三十四天報紙我們都看到了、社論都登了。他們還自己出了文章反對經濟主義。只有一天遲了一天。

總理：你們就是想找藉口，下那麼大的毒手。報社有槍，趙永夫你有什

麼證據？

趙永夫：……（總理：簡單點，你的報告上都有！）以前瞭解有槍。

總理、康老、關鋒：現場有沒有？

趙永夫：（囉嗦，文不對題回答）

康老：你就回答有槍沒有？

陳伯達：有，沒有？

趙永夫：當時沒搜出來。

戚本禹：為什麼報告裡說有槍？

趙永夫：（語無倫次）不是在報社裡有，其他地方開槍了，（全場諷刺地大笑）但沒搜出來。

總理：現場上怎樣？

趙永夫：有彈殼。

（眾首長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問）沒槍，怎麼彙報有槍？

趙永夫：沒搜出槍。

總理：沒槍，你開第一槍，打死這麼多群眾！

（馬浩：你說我們三司四人是機槍手）

趙永夫：據一些人的口供。

（又一同學說：他們是逼打成招的！並舉了一例子）

總理：（十分生氣）沒槍你說有槍，打死那麼多群眾！

趙永夫：賓館上有槍眼。

總理：制高點上有幾個方面的槍交叉的，你回答！

楊成武：制高點都被你們控制了。

趙永夫：以後佈置我就知道了，我們看到從人民浴池打到賓館的。

總理：打死那麼多群眾。

葉群：（氣得流淚了）放槍，對革命群眾那麼殘酷，還造謠，偽造林總來電。

總理：全部把他們包圍起來了，你還沒搜出來！（憤怒地站了起來！）  
除非你偽造假槍！謊報軍情，欺騙中央！

趙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總理拍桌子，葉群、關鋒同志站了起來！）

葉群：（嚴厲地責問）你還說林總來電，還感動得滿臉熱淚，什麼時候給你來的電？

趙永夫：我接電話，問是不是林副主席，對方說是。

葉群：林彪同志沒有打電話！林彪同志三個秘書一個也沒有接到電話。

24號聽到此事，毛主席、林總非常氣憤，下令調查此事。

伯達：你是造共產黨的反，造無產階級的反。

楊成武：純粹是造謠！為什麼造謠！

戚本禹：當面造謠！

楊成武：（萬分憤怒）沒打嘛（指電話），你為什麼說打。

總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趙永夫：死傷二百六。

總理：你去現場看了嗎？

趙永夫：沒有。

總理：這麼大的慘案，你身為副司令員還不到現場去看？

葉群：（憤怒）你沒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軍。解放軍沒有你這樣的！真正的革命戰士都哭了，你慘無人道。

總理：對！你只揀到一些彈殼。

（趙想推給蘭州軍區）

總理：你欺騙了蘭州軍區。他們也是根據你們的調查材料，也沒有看到槍。

葉群：前幾天在京西賓館介紹經驗的是你吧！有聲有色，全部功勞都是你的！現在怎麼都沒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紙黑字，不知道？

總理：到現在你還認為是對的嗎？回答這個問題！

趙永夫：經調查研究，瞭解情況，通過常委共同研究，統一認識的。

劉賢權：我不同意。

總理：劉司令員就不同意。

趙永夫：他不同意。據說是有槍。

（眾氣憤）

總理：別說了。面對這麼多群眾，你還有點兒共產黨的氣味嗎？

趙永夫：（沉默）

康生：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趙不答）

總理：你是哪兒人？

趙永夫：河北正定，參加了遊擊隊。

戚本禹：誰的遊擊隊？那一年？

趙永夫：三七年。

總理：你怎麼到的江西？

（趙談歷史）

總理：你什麼出身？哪個莊子？還有人嗎？

趙永夫：貧農。李家莊。還有父親……

康老：母親呢？

趙永夫：母親早死了。

康生：你小時候讀過書嗎？

趙永夫：沒有。

康老：怎麼識的字？

趙永夫：參軍以後認的。

康生：參軍以前幹什麼？

趙永夫：務農。

康老：還幹過什麼？

趙永夫：當過二年國民黨的兵。

康生：所以我問你國民黨還是共產黨！

戚本禹：擠到了邊才說。

康生：誰的軍隊？

趙永夫：教導縱隊。

總理：哪兩年？

趙永夫：三三年到三六年。

總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麼地方？

趙永夫：在南京。

總理：怎麼跑南京去了？

趙永夫：當地招兵。

康生：什麼人招的？

趙永夫：不知道。

康老：招到哪兒去了？

趙永夫：檢查身體後到了保定。

康生：你不是務農嗎？怎麼當兵？

趙永夫：生活困難。

康老：多大歲數了？

趙永夫：51歲。

康生：在南京受過訓沒有？

趙永夫：受過訓，教導縱隊。

康生：加入國民黨沒有？

趙永夫：加入了。

康生：在哪兒？

趙永夫：在南京。

總理：你的教導縱隊和我們打過仗沒有？

趙永夫：沒有。

康老：受訓多久？

趙永夫：兩年多。

總理：三六年？你哪一團隊？

趙永夫：（支吾）只有兩個團，大概是一團。

總理：哪一連？

趙永夫：記不清了！

總理：哪個團？哪個連？

（趙：答不出）

康老：原來你是國民黨蔣介石的人啊，教導縱隊。

趙永夫：哪一連我記不清了，團以下是營、連。

（康老直笑：你是軍人怎麼流這麼多汗？）

康老：下文呢？36年以後呢！

趙永夫：回家了。

康老：為什麼回家？

趙永夫：沒錢給我。

總理：我問你，在西寧你捉了多少人？

趙永夫：報社數字我不清楚，報社有兩千多，後來大部隊都放了。

總理：你幾號離開的？

趙永夫：24號到了蘭州軍區，以後到了這兒了。

總理：你們用了南灘監獄嗎？

趙永夫：不清楚。

總理：他們都是從南灘監獄出來的。

張洪：用了，在南灘。我以前去過，我們搞警衛，關的什麼人我不清楚。

趙永夫：可能……

總理：你知道「二·二三」後同學、工友共關了多少人？

張洪：不知道。

趙永夫：統計是一千七、八百人。（眾怒）

總理：十七、八天了，你的××師作警衛，關了多少人數都不清，你怎麼這樣回答問題？

張洪：……到最後。

趙永夫：總理請允許我講。

總理：講什麼？

趙永夫：軍區。

總理：你不是來搞「三結合」嗎？你在北京講過。

趙永夫：沒有。

關鋒：那天康老、伯達都聽了，有錄音，有記錄。

康老：那天晚上你談話有記錄。「三結合」對象是誰？你認為那個好？

趙永夫：我沒說誰是，沒這樣講。

康老：有記錄，你怎麼講的？

伯達：你講了一個人。

趙永夫：王昭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他沒講什麼。

康老：你這個人一點不說老實話。

戚本禹：你這個人怎麼一點兒臉皮都不要？一點兒臉皮都不要。死不要臉！你講王昭這個人好，有幹勁、有魄力，群眾擁護，說過沒有？

趙永夫：我說了。但是……

總理：王昭在嗎？王昭你說，你原來認識不認識趙永夫？

王昭：不認識。

總理：你什麼時候摔傷的，到哪兒去了？

王昭：在陸軍第四醫院，一月十二日離開西寧，以後到了洛陽。

總理：怎麼到了洛陽？

王昭：到洛陽不用開刀。

總理：誰跟你去的？

王昭：一個秘書，姓宋。

總理：哪天到洛陽？

王昭：二月十三日。

總理：不對？

王昭：一月十三日。

總理：在西安待多久？

王昭：二月六日離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總理：寫信（給我們）是幾號？

王昭：三月十九日。

總理：你是個省委書記，中間這麼長時間，中央不知道，家裡也不知道。

王昭：家裡和誰也聯繫不上。

總理：怎麼不向中央報到？

康老：為何不向中央報告？我們還以為你在西寧呢？！一個多月，到處找不到，為何一點不向中央講？

王昭：我養病……

康老：你一點兒也不說真話。

王昭：打電話說中央允許我休養二個月。

康老：什麼時候？給誰打的？

王昭：給辦公廳。

康老：辦公廳就允許你了？

王昭：後來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聯繫。（眾笑）

康老：（笑）後來？後來才聯繫？！

總理：你老婆在北京幹什麼？

王昭：在北京市委市監委，休息了好幾年了。

總理：光拿工資，不做事？

康老：包庇嘛！

（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說中央准你兩個月假嘛？）

康老：「八·一八」紅衛兵找你不在？

總理：這麼說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對了。

王昭：開始時是，以後我不介入了。雙方都不介入。

（旁邊的人：你昨天還講「八·一八」要殺你！）

總理：在西寧時，公安、政法都歸你管嗎？

王昭：××師管公安。

總理：××師以前歸你管吧！

劉賢權：軍區都歸他管。

總理：誰參加了聯合指揮部？

王昭：公安廳廳長鄭孝先、×××。

劉賢權：趙永夫也參加了。

總理：（對王）趙永夫參加你就不講了，有王仲芳嗎？

劉賢權：他停職反省。

伯達：青海這麼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

王昭：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總理：你同楊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兒？

王昭：對「八·一八」紅衛戰鬥隊。



總理：你是反「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的？

王昭：我認為「八·一八」紅衛戰鬥隊不好。

康生：你僅僅認為「八·一八」紅衛戰鬥隊不好，你就為這一點反對他們？

王昭：組織不純，作法上有點不講政策，到後來才知道是反革命組織，……我講「八·一八」要改正錯誤我才支援。

康生：也就是說你不支持？

（旁邊兩同志講：你昨天還講有三個人不支持！）

王昭：宋林、楊西林。

趙永夫：我要講清楚。

總理：你的報告很清楚了！

趙永夫：（強行要講）請總理允許我講兩句。

康生：你不要講了。

伯達：你是造無產階級反的頭子，你是造共產黨反的頭子！

趙永夫：……

總理：不聽你的了，青海兩位工友同志來了沒有？你們還有什麼要講的？

王建義：我就把報社的情況談一談，我是「八·一八」紅衛戰鬥隊公路局的負責人。（重複二十三日發言）我可以用我的頭保證，帳篷裡沒有一個死人，我到處走，沒有槍。周總理：青海來的同學哪一位要講一講？

李滌環：……坐牢後期，我們和解放軍熟了，他說「解放軍當時也流了淚」，我說「我也流了淚」。那位解放軍說：「他們流淚和你們不一樣，因為他們知道馬上就要開槍了。」有小孩要進報社，解放軍不讓進去，因為他們知道，馬上就要開槍了。

康生：清華大學許寶生來了沒有？

許寶生：到。

康生：聽說他……

許寶生：（敘述自己的遭遇）……一個×××要我們舉手，我們手挽手站成一排，他頭一低，往後一退，用機槍掃射過來，當時我旁邊的一個同志就打死了，另一個同學旁邊的一個女同志的腦袋都打

碎了……。（他哭訴了抓後被鬥情況）

總理：你知道不知道，還有多少外地同學被關在監獄裡？

許寶生：×××、×××（王建義補充了他們在公路局看見捍衛隊穿解放軍衣服的事）

總理：楊植霖同志講一講。

楊植霖：我有許多錯誤，繼續檢查。過去支持「八·一八」，他們說「八·一八」是反革命組織，林總來電了，我是帶著向毛主席請罪的心情來的。……講「八·一八」有三挺輕機槍，「二·二三」以後，送我的二個幹部講，林副主席專門給趙永夫打電話，鼓勵他，表揚他……。據他們說，抓了三千多人。

總理：不止，剛才同學們講有一萬多。

楊植霖：我回去以後搞了一個萬人鬥爭大會，掛鐵牌子，說我是大叛徒。  
（三司同學：那一天我們也參加了）

總理：誰主持大會鬥你？

楊植霖：有個常委韓明站出來了，公開站出來批判我，說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內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難保證，生命也很難保證……小孩拿石頭打……，口號不喊打倒王昭，第二個喊打倒高克亭。

總理：高克亭同志來了沒有？

高克亭：來了！

總理：哪兒的人？

高克亭：陝北！

楊植霖：現在人心惶惶……下一步怎麼辦？

總理：支持革命，反對反革命，堅決革命下去嘛！

葉群：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

總理：廣播學院黃澤泉同學有什麼情況要講？

黃澤泉：趙永夫說「八·一八」先開槍，解放軍還擊，這是欺騙中央……。

×××：……一個女孩身上中了三槍，×××問誰打的，她說是×××打的。那個人講，你說是「八·一八」打的，我給你養傷治療，

你講×××打的就送你進監獄。那個小女孩講，我看見是×××打的。於是被送進監獄……（底下陸續有人發言）。

康生：劉鳳池同學來了沒有？

劉鳳池：來了！

康生：你是怎樣受傷的？

（劉講述自己受傷經過）

總理：我問一下，張曉川！

張曉川：有。

總理：你哪兒人？何時參軍？

張曉川：河北灤縣，38年參加地方武裝，十三旅。

總理：你何時到青海？

張曉川：到青海一年多。65年11月由北京後勤學院去的。

總理：解放後在那兒工作？多大歲數？

張曉川：在冀東，四十七歲。

總理：現在結束調查，青海情況開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來，真相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經過調查，搞清實質，宣佈：

（一）趙永夫，青海軍區內部的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趙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騙了一些人，推倒了劉賢權同志，篡奪了無產階級的黨權、軍權，就是他指揮的。

（二）趙永夫篡奪了黨權、軍權後，勾結了張曉川，二人從一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竄來竄去一個月，對西寧的革命組織「八·一八」進行了殘酷的法西斯鎮壓。死傷百餘人，逮捕革命群眾一萬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假說「八·一八」有槍，這是他自己說的。我們向革命群眾調查，根本沒有槍支，現在證明毫無根據，這件事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但他向中央彙報都說有，欺騙中央和群眾。他說他也派人作調查，蘭州軍區派人調查，都沒有找到槍。

（四）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組織，和青海省委王昭

是有關係的。

根據以上情況，報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統帥，處理辦法如下：

（一）中央軍委將發佈命令，由劉賢權同志全權處理青海問題。因為劉賢權同志沒有被罷免，這是反黨的人做的事。蘭州軍區也沒承認，總政根本沒有批准。由劉賢權同志全權處理，由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幫助調查。需要說明：林總根本沒打過電話。

（戚本禹：林總很少打電話。葉群：林副主席三個秘書一個也沒接到電話，二十四日聽到此事，死亡那麼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氣，他們下令調查此事，林彪同志執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調查這個事件。他們是反革命「三結合」的經驗。）

（二）在青海的部隊由劉賢權同志指揮獨立師、獨立團。八零六一部隊、八一二二部隊、二零五部隊，在此問題上也統一由劉賢權同志指揮。

（三）向群眾宣佈，「八·一八」是革命群眾組織。「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趙永夫一夥人，包括張曉川在內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撫恤烈士家屬。受傷群眾代為治療。因為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眾一律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對受欺騙的群眾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無產階級風格，要帶著無產階級氣概團結他們，教育他們。採用整風的形式來解決。

（五）應該說明：我們的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光榮的，偉大的。應當相信解放軍，這次受蒙蔽的十三個連包圍了他們，這次事件中他們也流了淚，證明他們是好戰士，革命的工友、同學、戰士要團結在一起，揭露這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這一小撮叛徒。

（六）劉賢權同志回去要成立軍管會軍管，籌備建立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軍事管制委員會。全部實行軍管，通過軍管，幫助青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為革命的「三結合」作好準備。

（七）趙永夫應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解放軍同志，把他們三個帶走！

（解放軍上去揪趙永夫、張曉川、王昭的領章、帽徽，把他們押解下去。王昭在門口哀叫：「我和他們沒有關係！」）

（在場同志熱淚盈眶，高呼口號，總理和各位首長和同志們親切握手退出會場）

（總理當時宣佈決定時，被接見人員無比興奮、激動，專注於聽，所以記的不完整。請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關於青海問題的七條為準。整理者注）<sup>23</sup>

## 周恩來、康生接見安徽各方代表的講話（1967.3.28.）

【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

周總理：

今天開會經過幾次會議，雙方觀點都擺出來了，現在宣佈中央的決定也與安徽軍區代表談了，現在康生同志宣佈黨中央解決安徽問題的辦法解釋一下。

康生：

關於安徽問題，中央和中央文革和安徽的同志進行了多次接觸，對一·二六奪權贊成和有意見的代表都找回北京來了，把安徽軍區的同志也找來了，把南京軍區軍管委員會錢鈞同志也找來了，根據多方面的意見，經中央詳細研究、討論，並報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出決定，現傳達：

今年三月間，中央召集了安徽軍區負責同志，安徽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代表和持有不同意見的各左派群眾組織的代表，省市機關的幹部，舉

<sup>23</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3）》，1967年4月。

行了多次座談，並分別作了多次個別談話，因此中央對安徽問題作出如下決定：

在未作出決定之前，中央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向各方面作調查研究，中央不只聽一方面而且聽多方面的，贊成一·二六奪權的，反對一·二六奪權的，甚至被通緝的，這一點希望同志們注意和學習主席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毛澤東同志的方法。中央把各種意見的代表人物，都叫到北京來座談、調查，聽取各方面意見，不是單一方，希望同志們今後無論遇到什麼問題，不能單聽一方面的，無論什麼組織，大聯合也好，「三結合」也好，今後成立革命委員會也好，幫助他方解決奪權鬥爭也好，這種方法必須掌握，必須經過多方面的調查研究，中央不會倉促作出決定的。安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關係到三千萬人民的問題，關係到中國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分。

#### 第一（略）

對一·二六奪權基本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認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確的，甚至講反一·二六就是反革命，誰反對一·二六奪權就要鎮壓。另一種認為一·二六奪權是假奪權。中央考慮各方面的意見，沒認為這種奪權是假奪權，也沒有認為這種奪權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比如北京奪權奪了幾次，中央未作出結論，也沒有說那一方是正確的，說反對一·二六奪權是反革命有問題，說一·二六奪權好得很也有問題，這二種意見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問題，沒有實現「三結合」，沒有把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奪權是非常倉促的，開始認為省委的權不能奪，據講是受山西消息的影響，另外還聽到了不真實的情況，說程明遠篡黨篡軍，軍區也來不及看你們的文件很匆忙。因此，必然大聯合彼此商討來不及，據反映八·二七內部也有不同意見，這種匆忙中間就將應該聯合的革命群眾組織沒有聯合，為什麼說矛頭沒有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難道我們奪權不是奪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嗎？奪李葆華的權嗎？奪權後矛頭指向何處？對並肩作戰的革命組織實行鎮壓，而不是澈底揭開省委階級鬥爭的蓋子，矛頭指向革命群眾組織，將其領導人逮捕了、通緝了，這些組織

被解散了，這是大錯誤，在奪權後對革命組織進行鎮壓，這個矛頭不是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戰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該聯合的沒聯合，而去鎮壓，沒有集中力量去聯合所有的革命組織，奪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奪權，當然是奪黨委的權，但奪權的打擊對象是同八·二七並肩作戰的「紅衛軍」，省暨合肥市機關職工革命造反司令部，這是在奪權前，奪權後沒有實行革命的「三結合」，這一點從同志們告訴我們的，你們結合的幹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結合」，不要說任質斌、張祚蔭、黃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長期養病，過去也不是真正澈底揭發李葆華的，而且有些問題上自己也有責任，什麼五條、七條，弄到現在五條也沒有了，這怎麼叫革命的「三結合」呢？指揮部的個別領導同志，在奪權前和奪權後實行了一系列錯誤政策，主要是打擊了一部分革命群眾，把不贊成自己意見的人搞成反革命。壓制了左派團體和革命幹部，實際上情況是這樣，中央文件是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的，我們應當說明這一點，安徽奪權沒有報告中央，未經中央批准。

我們要來彙報，中央還沒有安排，因為你們的材料我們沒有來得及研究，你們自己來了，我們對一·二六奪權是有一個認識過程的，第一次李勝利同志彙報，曹在凡同志補充時當時你們的問題只有一個問題，是要中央承認，沒有其他問題，使我們感到問題不大，但又覺得不放心。因此我們提議多來幾個同志，多反映幾點情況，把有不同意見的人也找來談一下，應當說，第一次覺得有問題，思想是傾向於承認你們的。我們覺得沒有多大問題，但是又覺得不放心，開始沒有說你們的大方向是完全對的，但是覺得問題不大，後來經過繼續調查，所謂沒有問題，實際存在很多問題，這一點是指揮部的同志沒有如實地向我們反映，後來通過記者及不贊成奪權的同志的反映和揭露，覺得問題很多。這些問題就是文件上寫的，當權前沒有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沒有把矛頭指向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安徽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的個別領導人實行了一系列錯誤政策，壓制了有不同意見的左派群眾組織和革命幹部。問題揭露後，總

指揮部代表李文安、李勝利同志也覺得一·二六奪權沒有成功，存在著問題，我們也考慮這個問題，同時南京軍區也向我們建議安徽一時大聯合、「三結合」不易解決，也建議實行軍管。在三月二十一日，他們向中央提出軍管，並且提出以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錢鈞同志為首組成軍事管制委員會。這個軍事管制委員會由安徽軍區司令員嚴光同志、政委宗文同志、廖成美同志、楊廣立、王文模同志、鍾國楚同志、蔣開元同志、李士槐同志，這是他們提出來的軍管會的名單，中央贊成實行軍管，並且以錢鈞同志為首。

## 第二（略）

為什麼要專門提出打擊以李葆華為首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安徽流傳中央要保李葆華的說法，這樣就影響了一部分群眾，影響了奪權鬥爭中把矛頭指向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第二條要提出這一點。

## 第三（略）

## 第四（略）

我們覺得現在的軍代表是不夠稱職的，到那裡鎮壓了革命群眾組織，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軍事管制的目的。所以立即接管公安廳、公安局，重新選派能正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得力幹部做軍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澈底揭露這二個機關的陰暗面，切實進行整頓。要堅決糾正亂衝擊，亂逮捕的錯誤作法。必須說明一點，有一個壞分子，有一個反革命，他也不同意一·二六奪權，也對一·二六奪權有意見，假如這些人是真正的反革命，那怎麼辦呢？文件上講得很清楚「因為對一·二六奪權持有不同意見被逮捕的革命群眾、革命幹部一律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嚴防壞人利用專政工具鎮壓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真正反革命，那是反革命的問題，要和贊成和反對一·二六奪權分開。不能因為反對一·二六奪權，因而就逮捕，就打成「反革命」。

## 第五（略）

這是因為報紙是黨報，不能成為哪一派的報紙，不能宣傳一·二六奪權是正確的，反對一·二六奪權是錯誤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他不



看是不是實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不是打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用贊成和反對一·二六奪權為革命和反革命的標準。這裡必須說明一個問題，不是說報紙能夠出版也不出版，而是說不能正常出版的情況下，可出新華電訊稿。

#### 第六（略）

本來八·二七是革命組織，長久是不發生問題的，工人聯合委員會是革命組織，也是長久不發生問題的，他們是長期與李葆華作鬥爭的左派革命組織，中央文革小組是支持的，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防止另一派不能因為他們犯了錯誤，或個別領導人犯了錯誤，因而認為他們不是革命組織，所以要重申這個問題，使不贊成一·二六奪權的明確這個問題。這二個組織過去是，現在也是革命組織，不能因為個別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們，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因為八·二七革命到底聯絡站、紅革會、工人同一司、三司等組織不贊成一·二六奪權，因而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反動組織，因此肯定從他們現在情況看來，他們也是革命組織，當然還有許多組織，比如奪權時二十多個組織，不能夠一一都寫上。因此，八·二七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這些都是革命組織。這些組織不是都沒有缺點的，都要進行自我整風，著重進行自我批評，但是有原則上的不同意見……。

#### 第七（略）

#### 第八（略）

為什麼要單獨寫這一條？我們認為八·二七也好，工人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也好，犯了一個很大錯誤。因為沒有支持早站出來的革命幹部，因為我們知道，要真正鬥倒以李葆華為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機關幹部起了很大作用。安徽的有利條件是機關幹部起來較早，比其他任何幾個省都有利，原因是李葆華在三六事件對革命學生實行血腥鎮壓，使機關幹部覺悟起來了。這些人受壓制，這是揭開省委階級鬥爭蓋子的一個損失，同志們要注意，地縣也好，要注意奪權中要支持機關幹部起來革命，特別要支持早站出來的革命幹部。

#### 第九（略）

中央決定一共九條，另外說明一個問題，劉秀山同志的問題，沒有寫進來，因為主要是談奪權問題，劉秀山問題應該調查，你們供給材料，但與奪權無直接關係，不在這裡佈置了，這不是說不要調查這個問題了。

周總理：

剛才康生同志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宣佈了九條決定，在座的各方代表還有什麼意見要談。（發言……略）

我們希望你們的態度是真誠的，問題不在於請罪，凡是你們要承認，在軍管會成立之前，軍區代行職責，不能再有打、砸、抄、抓，不准武鬥。軍分區要向軍分區、基地傳達，你們要向家裡佈置，打電話回去，首先停止武鬥，通過全省、各個線的有線廣播說服他們。首先要打電話回去，看誰執行的真誠，準備、軍隊、軍區、軍分區委非常謹慎，要勸說、說服，不要動武器，這樣情況就會好的，要做說服工作，如果雙方是真誠的，不要說得太多，看實際行動，看誰的主席思想紅旗舉得最高，人民內部矛盾要通過鬥爭、批評，達到新的團結，認識要從行動上證明，如果不是這樣，就暴露了他們，一大批人軍區要說服，很可能被包圍，甚至會衝軍區，好人鍾國楚一下，他們會走的，壞人鍾國楚一下就暴露了，經過說服最後剩一、二個或三、四個人，人們就認識了，要改變過去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挑撥離間的狀態，如果你們覺悟了，認識到上了當，不覺悟就要走到錯誤道路上去，嚴重的錯誤允許你們改正，希望你們同志回家後在軍管會的領導下，在中央九條的指導下，允許改正錯誤，真正揭露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談到有人提出要三司同志回安徽），三司同學不回去了，你們回去見諸於行動，相信你們有這個能力，在座的各方代表都有，不需要北京的同學再回去參加（關鍵：你們要有信心嘛！）同志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政治掛帥，團結起來，軍管會幫助一步還要過渡到大聯合、「三結合」，建立革命委員會，相信你們會搞好的。<sup>24</sup>

<sup>24</sup>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古黨委代表談話紀要 (1967.3.30.)

【時間：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晚九時四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時。地點：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出席接見的有：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及中央文革、總理辦公室、國務院秘書廳工作人員。被接見人：自治區黨委代表中支持三司的有：高錦明、權星桓、王再天、李樹德、康修民、李質、郭以青、張魯；支持「紅衛軍」的有王逸倫、王鐸。】

（接見開始，總理一一問了區黨委代表姓名，民族等，接著總理問最近呼市情況，由二十九日剛從呼市返京的李質、張魯同志作了彙報。）

當彙報到「無產者」、「軍代表」採取集訓、寫自白書等辦法對待革命群眾時）

康老：僅公安廳，公安局就集訓109人。

王力、關鋒：什麼集訓，就是集中營，思想犯訓練班，學的國民黨反省院那一套。

（區黨委代表小組的同志彙報到××二師尤××說，中央調查團有八個右派時）

總理：調查團一共有九個人怎麼有八個右派？（彙報到呼市街上三司開始貼出「打退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標語，軍區曾派人照像，說是「反動標語」時。）

康老：連提擁護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說成是反動宣傳。在三月九日軍區給中央的電報上就是這樣說的。

（彙報到近日來呼市大放王逸倫攻擊高錦明同志的錄音時，總理要去，並看了王逸倫三月六日攻擊高錦明同志的傳單即「錄音稿」。）

康老：你（指王逸倫）的講話毫無檢討，頑固堅持劉、鄧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根本問題是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呼市這一時期發生

那麼多打人，抓人事件，你怎麼看法？你表示過什麼態度？向誰表示過態度？高錦明，權星桓同志的問題我們不做結論，你們辯論去，有他們的帳在。我就問你對群眾的態度問題。

（王逸倫答：我不贊成；向家裡打過電話；向軍區、「無產者」都談過。答話時口口聲聲康生同志、康生同志。）

伯達：「無產者」實際代表有產者。

江青：現在是我們在問你！我看你一口一個康生同志，是質問的口氣，很不尊重康老，很囂張！（王逸倫：我怎麼囂張？）

江青：是你囂張！

王力：你很囂張！我看呼市資本主義復辟這一套，就是你指揮著幹的，可惡！

康老：王逸倫，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在你的講話裡對路線問題怎麼不表示態度呢？學生衝軍區是錯誤的，三司已經承認了錯誤，做了檢討。但對柳青打死韓桐你怎麼看？表示過態度沒有？把《解放軍報》社記者押起來你認為對不對？你和軍區誰談過這件事？軍區派武裝來北京，來毛主席住的地方捉人你認為對不對？你光相信軍區的話，你相信不相信總理的話？你認為包圍師範學院對不對？你為什麼在十八日早晨總理接見時不表示態度？

（王逸倫作了回答。當區黨委的同志揭他的一些問題，王一再說「造謠」時，）

江青：人家提出問題，你就是「造謠」二字。有的是三對面都對清楚了，你怎麼裝糊塗！

總理：是頑固的堅持劉、鄧路線，又是烏蘭夫的人。烏蘭夫保過你。

康老：是烏蘭夫的暗藏分子。

（彙報到近日間仍然有的單位打人、抓人時，王逸倫說三司近來有活動，是三司挑起的。）

王力：你還讓他們永遠不活動嗎？

（彙報提到王逸倫的二兒子在二中是打人兇手，被革命群眾曾送公安局拘留，王逸倫的大兒子是二司的發起人時）

康老：你（指王逸倫）支持「無產者」看來是有血緣關係的。

康老、王力：內蒙古都像你這樣的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那裡能貫徹？

（當王逸倫提到過去對各群眾組織都是同等待遇，沒有偏向時）

康老：那你對「抗大兵團」也是同等待遇的了！

總理：你不是說在二月六日以前你和區黨委一致的嗎？區黨委支持三司  
分明了以後你怎麼樣？

（王逸倫講到三司砸、搶、打時，）

康老：那麼「無產者」他們就那樣好嗎？

王力、關鋒：近來「無產者」這麼樣的亂砸、亂打、亂抓時，你表示過  
什麼態度？

總理：在你的這麼長的報告裡，對此根本沒說一句話。是不是因為你和  
他們「三結合」了？你這個報告是不是「三結合」的綱領？

總理：（問王鐸）你怎麼到北京一個多月後又倒過去？你的信上為什麼  
對軍區的錯誤一句未提？

（王鐸答：我的認識有改變。）

康老：他就投降了。

總理：是搞投機。

（王鐸敘述他改變觀點的三個理由：對學生衝軍區的問題；對三司的看法；對高錦明的問題。當他談到學生衝軍區，高、權、李質等同志沒有  
堅定地做學生工作時）

康老：你去作過工作沒有？

（王鐸答：我當時做別的群眾的工作，以後也去作過工作。）

總理：你是要同他們「三結合」了。

伯達：你作工作，你代表什麼階級去作工作？你倆是代表地、富、資產  
階級，戴了頂「無產者」的帽子。

（當王鐸談到他堅決執行主席革命路線時）

江青：那個主席？是我們的毛主席還是你們那個劉主席？

伯達：你們那個資產階級立場不改變，其他都談不上。

康老：在全國，向群眾打第一槍的是內蒙×區！你們知道不知道？（王

鐸：不知道。）

總理：你怎麼不知道？你的信是三月十五號寫的嘛！你去做工作了沒有？你是要同他們搞「三結合」的了。

康老：像王逸倫你們這樣的人要是成為「三結合」的對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內蒙古就失敗了。

（當區黨委的同志談到「無產者」現在正四面出擊，聲言要同三司搞「大聯合」時）

伯達：（指二王）你們要搞什麼大聯合？我們談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你們搞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大聯合」。

總理：原來想聽聽你們有什麼檢討，你們這個地主、資產階級立場不改變，怎麼能檢討？

康老：你不是口口聲聲說內蒙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嗎？今天你們兩個的表現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

總理：是沒有烏蘭夫的烏蘭夫反撲，是沒有烏蘭夫的烏蘭夫復辟。

康老：你們一點群眾感情，一點階級感情都沒有！是沒落的階級，還談什麼文化大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從當權派中把你們這些人清除出去，是很危險的；不清除出去，中國那有社會主義？那有共產主義前途？

伯達、康老：你們倆是沒落的、死亡的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

（當王逸倫不承認內蒙現在情況仍處於恐怖狀態時，康老讓中央文革張同志介紹調查團十八號去呼市宣佈了中央對軍區的批評後，遭到了軍區一些軍官和林蔚然等圍攻情況時）

康老：這麼一個大事實你硬不承認。你們看看這些，這都是你們支持的。你們是支持白色恐怖，這完全是反動統治，你們兩個就是代表。

王力：是法西斯統治！

康老：高錦明、權星桓同志有錯誤，有他們的帳。我問你們：軍區政治部宣佈高錦明、權星桓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你們同意不？你（指王鐸）的信上提了沒有？

（王鐸：我不同意，我給軍區談過）

康老：我問你的信上提了沒有？你們回答問題，一不講中央，二不講群眾，你們對中央究竟是什麼態度？你怎麼對待中央？

總理：原來還想你們有點自我批評，但一點也沒有，看來得見見群眾。你（指王逸倫）不是說你們支持三司嗎？要看看三司的同志們怎麼說。

康老：王逸倫你哪年入黨？（王答：三二年）在哪裡入黨？（王答：在北京）誰介紹的？（王答了介紹人名，一個死了，一個早就不知道下落。）在哪個組織生活？有哪個人可以證明？（王答：在內蒙特委，那時的人都已死了）還活著的同志沒有嗎？（王答：在上海住黨訓班時管事的一個趙大姐還在）你被捕過沒有？（王答：沒有）（高錦明同志插問：你到蘇聯路過蒙古不是被扣過嗎？）（王答：那是被扣留審查，是社會主義國家。）到蘇聯後誰審查的？（王答：我寫過材料，好像記得是孔原審查的。）孔原？怎麼審查的？（王答：那我不清楚了。）你不清楚？那時凡是去蘇聯的中共黨員都要逐個面對面的審查，但是你沒有經過審查。我聽說你到過莫斯科，我就負責審查工作，但是我沒審查過你。你住什麼學校？送到哪個學校，都是要經過我審查，經過中共代表團審查的，你和劉仁等在河套幹什麼我清楚。你是不是蘇聯情報機關送去的？你是有經驗的了。怪不得你這樣頑固。

總理：你（指王逸倫）的黨籍問題說清說不清？（王逸倫：我認為說的清楚）

康老：王逸倫，我問你哪一年從蘇聯回國的？

（王答：三八年從新疆回國，三九年四月到延安的。）誰送你回國的。

（王答：一個中國同志，名字忘了。孔原那時還在莫斯科。）

那時還在莫斯科？

（王答：噢，那是三五年。）

康老：這就是說，在莫斯科時，我們沒有承認你是中共黨員。

（王逸倫：訓練班承認是黨員，一個叫墨爾曼的女同志，她是管訓練班工作的。）

康老：那是一個外國人嘛。我問的是中國人。

（王答：我見過康生同志，我還到過莫斯科郊區。）

康老：你還到郊區去過？

（王答：不是人多的那個地方。）

康老：那就不是我們的地方了！

總理：你到延安後在烏蘭夫辦的中央民族學院工作過沒有？

（王答：沒有，那是王鐸。）

總理：今天就談到這裡。

（轉向區黨委其他同志）這裡支持三司觀點的還有那些代表性的同志？

（區黨委幾個同志談了些，提出家裡有些同志還需要來）

總理：你們回去提個名單。同三司的同志商量一下。

## 中央首長與福建省赴京代表團的談話（1967.3.31.）

【地點：人民大會堂。首都三司、北大、科大11·23等南下赴榕回校同學參加接見。在座的還有康生、江青、葉群、王力、張春橋、關鋒、戚本禹、肖華、楊成武、曹耿等。】

總理：收到你們一封信，你們很急，一直沒有排上隊，一方面想多些同志來談談，昨晚到了幾位同志，所以今天見了大家，先請廖海光同志談談籌備情況。

廖海光：根據山西、貴州經驗，準備奪權，當時最突出的是幹部問題，一致同意的是金水、黃亞光、劉家生。經過調查，范式人等同志過去有的受過葉飛打擊，與葉飛鬥爭是堅決的。（像葉松、高盤九、任洪萍、王禹）。當時革命群眾對他們有懷疑，因為運動初期還很不理解，對紅衛兵運動有抵觸，和稀泥，與葉飛鬥爭不堅決，經過擺開來說，是解決了。群眾組織經過運動，福州有些革



命群眾組織出了毛病。有的衝了一下軍區，比較好的是「二·二九」以及小的單位。群眾基礎在「一·二六」以後這一段，只剩下「二·二九」，後來工人，機關，一部分學校又起來和一部分同志合起來，力量這還不夠雄厚，特別是福州，經陳伯達同志建議又來了九位同志，現在檢查起來，我們的做法有問題。對一·二六問題處理上，現在看來一·二六衝擊軍區當然不好，不應該衝，當時毛著積極分子會時，當時部隊未開展四大，衝是不對的，當時衝了以後，特別是陳伯達同志指示以後，很多群眾團體表示要請罪。

伯達：那個電報不可能關係到請罪的問題，為什麼請罪呢？一·二六找你們談話，不要把群眾找你們談話都看作壞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當時還消毒……

伯達：消什麼毒哪？

廖海光：這樣問題就大了，就發生了批判鬥爭。

總理：有勒令解散的嗎？那幾個？

廖海光：我們勒令解散12個「紅衛軍」，交通系統革命造反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沒有解散。

伯達：有沒有提黑組織、傳單中有說過這話，為什麼要提黑組織？不能叫黑組織，領導上要表示態度嘛。

廖海光：領導上沒提過黑組織，也表示過不行，隨便把一個組織打成黑組織，當時還有師院「紅聯師」，他們群眾提出了解散這個組織，福建軍區表示支援。這樣就出了毛病，打擊面過寬，下面再談，當時，地富反壞右出來活動要打擊，但掌握不好，在下兩面……

伯達：不是開了很多聲討會，當場抓人示眾？

廖海光：姜觀問題開了一次會。

伯達：不要開這樣的大會。

王力：福建從一·二六以後抓了多少人？

同學：「一七·八」抓了300多人，泉州有逮捕證的是74人，福建中醫

學院400多人抓了11個，扣留了14個，3月26日召開聲討大會，大會上取締了革命職工造反團……，會上宣佈以前造反派掌握權是篡政。聯合總部僅參加二·七大會也被解散。當時二·一一大會宣佈二十多個組織為黑組織，不許打旗號參加，我們二·一一請罪了，要求參加大會。

伯達：為什麼要請罪？

王力：不要請罪嘛，軍區應出來講話。

康生：同志們到中央開會，第一召集了各方面意見的同志來開會，可能有的同志，特別是軍區同志不習慣了，這恰恰是毛澤東思想。

王力：你們認為是左派，右派，反革命的，抓到監獄裡來的都要來。

康老：你們要學習這種方法，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是第一條。第二條是到中央來。在我們這個會上，各種意見都可以講，各種問題都可以批評，不存在打擊，反對解放軍的問題，都可以暢所欲言，第三條在外面不要傳播。

同學：二·一一開大會，宣佈二十幾個組織不能參加。

總理：你們把二十幾個組織對一下。

廖海光：紅衛兵小將犯錯誤了，我們採用不原諒的態度，這是不行的，以後國家怎麼辦？衝擊軍區當然不是好事，本來中央給我們很大支持，但我們處理不當。本來應保衛革命銳氣，保衛革命小將，革命小將有小錯就嚴追……

伯達：把抓的人都放掉，把關的人全放出來！（很氣憤）

王力：還要寫檢討，有什麼檢討可寫的。左派犯錯誤嘛！

廖海光：犯了這個大錯，對保衛革命小將這一點思想認識不足，混淆了兩類矛盾。

總理：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合法和犯法的界限要劃清囉！

同學：彙報玻璃廠的情況。

康老：玻璃廠的方元官來了沒有？答：沒有。

康老：方元官抓起來了沒有？

……（同學讀到了伯達給韓先楚同志電報問題）

仙遊：「南下同學說軍區扣留了12個同學，2.13——2.22開三次全縣大會，到3月5日已捆起來遊街武鬥、掛牌子。」「你們三司是右派組織，」「三司紅旗永遠不倒！」「在福州是反動口號，還揪到農村去鬥，在廟裡每天關有一百多人，六點左右，抓了12人出去打，他們要我們受『階級教育』，部隊發通令，部隊執行任務抓右派時，任何人不得阻礙，要讓群眾來收拾右派。」

總理：抓人這件事軍區有關吧？朱躍華（朱是福建軍區司令員）。

朱躍華：（站起來）到！

康老：抓人怎麼會沒有呢？是你們知道不告訴我們！

總理：這種情況下不制止是很危險的。你們馬上發電報。今天晚上就發。

廖海光：前幾天已經發了。

總理：發了？那你把命令交給我，滿足我的要求，按那四點：（1）取締通緝令，（2）取消取締黑組織，（3）停止抓人，抓了要釋放，（4）寫了檢查的要全部交還本人。馬上打電報給全省所有的縣。（揚成武：還有江西的）一·二六被打成右派的統統放出來，寫檢查書的停止，檢查一律交還本人燒掉，這一些都是工作組搞的，我們不要搞。

葉群：主席教導「言者無罪」，這是主席思想，請罪是不對的。福州軍區應該引起嚴重注意。

康老：錯誤是掩蓋不住的，越掩蓋，越嚴重。你們現在是掩蓋錯誤，必須懸崖勒馬，改正錯誤。

廖海光：是！（汽車學校「福建前線紅衛兵」發言：講話同學被搜身的。）

王力：搜身是封建制度，不搜身是小民主，現在不但大民主不給，連小民主也不談了。

葉群：搜身是包身工制度。

（沈義德發言）……

王力：現在福建都在抓姜觀之流，不要用這個口號。

康老：一個參謀就能宣佈一個組織解散？！

（福州七個代表談到：東海兵戰要武戰鬥隊，回家坐車過年，平常常不參加文化大革命，睡懶覺，打撲克，划船等）。

周總理笑問：那是東海兵吧！答：全是！而這些人現在是左派，因為他們沒有喊一·二六好得很！總理：「哦！」

談到有的幹部不願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東海兵那兒時，總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們本來就是一夥的。此時三司同學遞上了一·二六《福建日報》上刊登福建軍區政治部寫的八篇文章。

周總理看了看很生氣，敲著報對朱說：這是你們政治部寫的，把一·二六做為標準，人家說你是有證據的。（總理念了一段報）講你們28日來的，26日還寫這樣的文章。

王力：白紙寫黑字！

總理：好！現在八·二九談談！

柯糾耿：一·二六以來兩個月心裡很痛苦。一方面堅信毛主席親手締造的解放軍，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們一起戰鬥，被打下去了。我們一再把這些意見反映給軍區，軍區一直站在保守派一邊，軍區處理一·二六問題粗暴，簡單化。軍區屁股沒有坐在造反派一邊。對事態沒有制止。只剩下一個光禿禿八·二九有什麼用？發現的問題跟軍區提都沒有得到支持，晉江專區問題特別嚴重。希望引起注意。我們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們群眾基礎很單薄，造反派不起來，我們就沒有群眾基礎。例如師院聯合應以「追窮寇」為核心力量，卻以「紅聯師」為依靠來組織聯合。當時我把責任全歸罪三司，認為他們害的。

如何對待農民運動是當前一一個大問題，現在對老臣態度是不對頭的，老臣被搞進城犯了缺點錯誤，但應看到他們支持了革命的紅衛兵暴露了這次運動是十七年來兩條路線鬥爭的必然產物。可是軍區做的是簡單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擊他們，這種做法不妥當。軍區對老臣問題有原則性的錯誤的。

三司：念語錄（接班人五條最後一條）

科大：柯的發言文過飾非，把一切罪過都推給軍區身上，新北大幹到底也是怎樣，屁股坐在東海兵一邊。柯蘇，張莉莉，都是這樣熱衷於組織革委會，聽不進去我們的意見，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問題，柯處理不對的。

工業：肅清一·二六遺毒有必要，有好處，比如有益學毛選，現在有一個鐵打的毛選學習時間，再一個解放軍威信空前提高。什麼都是部隊說了算的……

康老：你剛才講話被敵人利用，敵人抬高的是誰，解放軍威信提高了？解放軍說錯了話算數，做錯了錯高了，到處抓人也提高了？一·二六遺毒出現了這麼多件事？這算肅清一·二六遺毒的。

總理：今天不能再繼續了，也不可能多方面全聽。軍區可能有意見，這有幾個人要來，可能要隔二、三天，這時期可以準備材料。造反派被壓制的，可以多寫材料來。剛才四點再加二點。

(1) 在一·二六事件及二·七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視的要把他們統統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剛才（遞條）有兩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見允許嘛。

（廖：他現在沒有具體工作，本來把他調到其他單位去。）

他不是福大工作組嘛！不同意調離，應該讓在原單位工作嘛！不同意見可以發表嘛！不要歧視。（同學，還有軍區文革辦公室張寶炎）不僅軍區的，任何機關都要這樣。

由大軍區通知省、縣、江西、福建軍區。

(2) 彼此之間不許武鬥，不許打、砸、抄，俘虜還不搜腰包呢？何況同志。<sup>25</sup>

<sup>25</sup>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 中央首長在四川彙報會上的講話（1967.3.31.）

有的同志說：他們人用槍押著我們的同志。

江青同志說：他們帶的槍沒收！

有的同志說：他們抓了我們好多人。

康生同志說：誰抓人把誰抓起來！

有的同志談到所謂二·一七中央軍委給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團和川大東方紅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說：二·一七號所謂的中央軍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曉得，我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葉群同志說：為了證實這個信，我剛才坐車到林彪同志那兒去了，這個所謂中央軍委的信，根本是造謠。林彪同志說：他根本沒有看到這封信，他也根本不會寫出這個信！我也親自問過林彪同志辦公室的同志，他們都說沒有見到過這封信，這封信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會議結束後，總理與康生同志講話。

總理：四川問題不是一個晚上能解決的，但是既然抓起來了，就要解決。北京的一些同學要打回去，當然需要你們去戰鬥，中央正在考慮，當然是我們陪著你們去！下面有幾件事說一下（從略）

明天不要都來了，我們分頭去解決，一個個地解決，同志們放心好了，我們就要追到底。

康生同志說：有這麼幾點請同志們注意。

- 1.是抓了人的，請同志們交上名單，凡交上名單的，我們會立刻辦；立刻打電話，要他們放人，並且要禁止繼續捕人。
- 2.我們不允許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來抓人，請同志們注意一下，如果有人來抓，你們要堅決拒絕。我們說清楚，如果沒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 3.大家對接待站的意見，我們要轉告。（王力同志插話：以後開這樣的會也叫他們來，受受教育。總理問：是那個接待站，是不是

國務院那個接待站？）

4. 所有你們聽說的，看到的所謂中央軍委給四川的什麼信和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個組織是反革命組織統統是謠言。同志們要幫助闢謠。
5. 請同志們注意，特別是三司聯絡站的同志們注意。毛主席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眾，第二要相信解放軍，第三要相信我們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是世界上從來沒有的一支人民軍隊，有了這支軍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順利地進行。我們的解放軍在支左、支農、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的缺點是支流，不是主流。軍隊裡頭有壞人，但我們要相信人民解放軍，我們的同志講話中不要講「黑軍隊」、「黑軍區」，我們的部隊絕大多數是好的。

同志們不要到外面去談這個問題，到外面去談四川軍隊的問題。（總理插話：更不要寫大字報）不能在紅衛兵報、井岡山報上登載這樣的消息報導，昨天清華井岡山報打電話請示我們，他們問有關軍隊的問題能不能登？我們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這樣做，對我們解決四川問題是有阻礙的，今天談的，也不要打電話、寫信回去，打電話、寫信也談不清楚，也不要亂出去傳。<sup>26</sup>

## 中央首長接見宜賓地區代表時的講話（1967.4.1.）

【出席首長：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謝富治、肖華、楊成武、李天佑、葉群。】

<sup>26</sup> 《中央首長講話》（3），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1967年4月。

總理：現在開會，今天就根據前幾天主席的指示，我們找你們來關於宜賓問題，叫黨政負責人，群眾代表都來，四川軍區，成都的都來在這裡，劉結挺同志控訴，來檢查四川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已經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聯的同學，回來反映了許多問題，到北京告狀的反映許多問題，宜賓、萬縣、古靈、成都、重慶，看來不單是宜賓了，原來也不認為單是宜賓，成都有個鎮反報告也牽連到各地區，先要解決一下宜賓的問題，先請劉結挺同志講一下。（劉結挺開始控訴……接待我們時說：小平同志非常關心這件事……）

康生：誰講的？

總理：幾號講的？（劉結挺：中央辦公廳的人講的，九月十二日，說什麼小平同志非常關心這件事，他們要我們趕快離開北京，不然事會鬧大……）

康生：電話講的嗎？（劉結挺：是直接接見講的，二十七個被接見的人揭發了這件事，就被軍分區抓了……）

康生：二十七個人中間一個揭露了這件事，被軍分區抓到監獄，叫什麼名字？（劉結挺：叫高玉文。）

總理：辦公廳接見的人叫什麼名字，你們不曉得？（劉結挺：我們沒參加。）你們沒參加，接見了他們。（劉結挺：對，接見了他們。）高玉文是誰抓的？（眾：王富德。高玉文還在關著。）王富德同志，高玉文還抓著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組織抓的，我還不知道呢。）你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來。（……郭林川沒有來）郭林川在那裡？（眾：在宜賓。）

康生：怎麼沒找到？讓王富德同志找他來，把他送來，保證他的安全。（眾：王富德要抓他……）

總理：（問王學明）你說在什麼公社？（答：郭林川在××公社）（王富德：接到電話，我們找了，沒找到。）甘渭漢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證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證送到北京來。（……）

（談到用飛機散傳單，抓人一事）



王力：對陳伯達同志）飛機一來，下面就抓。

伯達：甘渭漢同志，散傳單是誰批准的？（甘渭漢：葉副主席。）

康生：用飛機散發傳單是誰同意的？（甘渭漢：葉副主席。）

康生：飛機散發也是嗎？（甘渭漢：飛機散發沒有說。）

（會議爭論很激烈）

總理：同志們冷靜一下，我們現在在這裡把問題講清楚，他們原來那樣對你們，你們不要那樣對待他們，擺事實，講道理！

甘渭漢同志，電報講，在監獄的請負責放出來，在外地的請負責找來，以上人員，請甘渭漢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3月30日派飛機來接，可你們，把底下這些人還看管著，當犯人，到了北京還這樣。

楊成武：打電話給他們，昨天才知道，說這些人是犯人，不發出入證，他們是中央請來的客人。打電報時也打了電話，你們根本問題是沒有執行主席的指示。

（眾：還有四個沒有來……）

總理：哪四個？是哪兒的？李良在哪裡？（眾：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漢同志，給你四個名字，加上高玉文，（眾：劉結挺的女兒也被抓了。）幾個？（眾：三個）有人照顧嗎？（眾：劉結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漢同志，要把這五個同志找回來，三個孩子，告訴他們送回家。（汪宗清：三個孩子沒有抓。）你軍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訴）

康生：牟海秀在這裡嗎？你曉得宜賓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曉得。）你不曉得，你在中央面前聲明你一點不曉得？記下來。沈學理你對抓人的情況曉得不曉得？（沈學理：我3月5日才放出來……）你到處作報告，你成了「三結合」的對象，抓了人沒有？（沈學理：我在中央面前聲明抓多少我不知道，聽說是抓反革命。）好，記下來。

總理：講你放出來以後嘛，出來四十多天了啊，（沈學理：宣佈了幾個

反革命組織，方面軍，反修戰鬥團，前哨，覺醒，現在地委沒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記下來！（……）（有人說：四川有人講，李井泉還是李政委，牟海秀還是政委。）

康生：現在還是「他們的政委」嘛！（……）

（談到軍分區到京抓張西挺一事）

王力：軍分區派的公安部的三個幹部，來抓張西挺，他們以為劉結挺不在這裡，我和關鋒同志通知把這三個人抓起來，後來我們瞭解這三個幹部原來是支持劉結挺、張西挺的，是帶功立罪的，就放了他們，讓肖華同志辦公室通知宜賓專區。

（1）劉、張、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麼樣，後來回去就找到了。（溫國良：到公安局，就不讓我們出來。）總政下了通知嘛！軍閥十足軍閥！（……）

（王富德：我沒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負責，沒派人，我抓工農業生產去了。）

（爭論激烈）

（王富德：我們都可以說話嘛，元月25日方面軍跑到我們那裡要我們派軍隊，軍隊根據文件只能軍管。1月28日把一萬多人包圍軍分區，把我拉出來打了一頓，打壞了，養了一個多月，有醫生證明，後來省裡讓我管生產，我就抓生產去了。）

王力：你講話要講事實。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講假話，抓人我不曉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這樣的，開始我不知道，在軍區開會時，甘渭漢同我有三個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總理：誰派去的？

（汪宗清：軍管小組，參謀李勤然，他是市武裝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組長。）他自己決定的？沒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沒有。）（……）

（談到2月17日和榮複軍）

總理：這個問題和軍分區和榮複軍沒關係？

（王富德：我們不同意成立榮復軍。）

總理：有沒有關係？

（王富德：我們對他們做正面教育……我們沒關係。）

總理：又沒關係了？！（……）

總理：今天結束這個會，這個會還要繼續開，軍分區，地委的要申明他們的意見，控訴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個一個問題弄清，你們激動心情我們理解，你們回去，今晚，明天上午開個小組會，哪個同志談哪個問題，不要談細節，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月28日，2月10日到京抓人，劉、王、張、郭問題都清楚了，以前他們也有材料，毫無疑問要平反，不光是這個問題，還有四川全面開展鬥爭，三個省份的問題，劉結挺、張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問題集中一下，四川要鎮反這個問題，集中在那裡。

康生：我們得到消息，甘渭漢同志說19日去的飛機，我們聽說18日去的飛機，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飛機散發所謂中央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發這封信以後據說20分鐘開始大逮捕。

韋傑，在不在？散發傳單的事你曉得不曉得？（韋傑：軍區決定的。）萬縣開槍開死人，你們報告沒有？（韋傑：當時沒報告，大約五、六天后報告的。）五、六天是不是？還沒有報告，什麼形式報告的？什麼名譽發出的？（韋傑：電報式，以軍區名譽。）

王力：打死多少人？（韋傑：五個。）一直到現在還沒報告名單。

關鋒：是否是五個？就是五個？

總理：你們打了報告，鎮反的報告，說還不夠，還要繼續，離座談情況差太遠了，今天就停止，因為劉結挺提出，從宜賓情況到全省在我們看，拿宜賓來說，先鎮壓革命群眾，革命組織，2月底到三月集中揭發大的事件。萬縣、左靈、自貢、成都、重慶，通告包括地方很廣了，要化一點時間，不是一、二天解決的。

第一件事：成都軍區要負全責，趕快把這個事停止，梁新忠

同志監督，馬上打電話去，今後如這樣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來，也不要馬上就放，不然會不知下落了，你們一個一個軍分區打電話，軍管電話給你們，一個個軍分區傳達到武裝部，對革命群眾不能再歧視了，對真正反革命組織要區別頭頭和群眾，明後天要發通知。

第二，請在座的解決這個事，是局部問題，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看大形勢，要記住毛主席的話，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麼力量呢？第一相信群眾，第二相信解放軍，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搞革命的「三結合」嘛！

解放軍起了保衛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的柱石，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解放軍的個人犯嚴重錯誤是個人責任，我們要相信群眾會聽主席、林副統帥的命令，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條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嘛，過去的情況揭發就可以解決，不要對解放軍抱情緒。

未解決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單位講，在這裡可以談，把問題談清楚，在外面要談，對聯絡員，記者可以談，更不要在報上，井崗山報，紅衛兵報上登，也不要寫大字報。軍區打電話，你們不要打，四川很緊張，你們打了，大字報就出來了，這樣複雜緊張了。全國七千萬人的一個省，李井泉是我們揭發的，對黨內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澈底解決。

康生：請同志們注意，我有幾點說明：

- 1、有一同學說：成都有傳說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鎮成都指導鎮反，這完全是誣讒，造謠。
- 2、二月二十七日所謂中央軍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對這封信的。
- 3、聽了這個情況，林副主席很生氣，親自擬了幾個命令寄報中央，堅決禁止開槍殺人，堅決禁止亂抓人，堅決禁止任意宣佈某組織是反革命組織，要經中央討論，毛主席批准發下去，這

是中央林副主席對解放軍的最大支持，最大關懷。

總理：會就到這兒。

高呼：毛主席萬歲！

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sup>27</sup>

## 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 (1967.4.6.)

【時間：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二十時三十二分至七日二時十二分。地點：人大會堂一樓西側北會議廳。接見人：總理、伯達、康生、江青、肖華、張春橋、王力、戚本禹、葉群、徐立清、李天佑以及各大軍區負責人共25人。被接見人：高錦明、權星桓、李質、張魯、吳濤、劉華香、黃厚、王良太、楊德松、尤亞民、華民。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共五十八人。「紅衛軍」代表九人。王鐸、王逸倫沒讓參加。】

二十點三十二分，總理、伯達、康生、江青等步入會場，全場起立，熱烈鼓掌歡迎，並高呼「毛主席萬歲！」。

總理：同志們，現在開會。以前的代表都講過了，今天由新來的同志講。軍隊也來了幾位。每件事一、兩個代表講講就夠了，已經講過的就不用重複了。我們聽新的，不用占得時間挺長。哪個開始呀？從軍區開始吧！

王建平：感謝黨、感謝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總理：冷靜點，不要激動。

王建平詳述「一·二五」事件（略）

總理：你們打過黃厚嗎？

<sup>2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王建平：沒有。

總理：有推推搡搡的現象嗎？

張淑琴：那是二月三日晚上。

（王建平繼續講她和張淑琴被打、被鬥經過）。

總理：你被剃了光頭？

王建平：沒有。那是軍區造謠。

總理：是你們說的嘛！

張淑琴：當時，就剩下我一個人有自由，在北京，聽軍區內部傳出來的。他們隨便打人、抓人，剃光頭還算什麼，我就相信了。

總理：你們那三四位同志放出來沒有？

王建平：分批放了，他們三月二十日還抓人，韓文達還是從南京逮捕回來的。

於喜淵（軍區通訊總站副教導員）：揭露軍區個別領導人預謀槍殺韓桐事件；對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指示；向戰士灌輸三司是反革命等罪惡事實，並揭露了柳青（軍訓部副部長）槍殺韓桐同志經過。

侯鳳英（於喜淵的愛人）：（哭訴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一家人受迫害的經過。她又談了冒死傳遞韓桐事件三封信的情況）軍區有些人說，中央來的代表團有八個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我們內蒙軍區就是黨，光聽中央就是奴隸主義。王逸倫是左派書記等。

（總理、康生、王力、本禹、春橋大笑，並說：王逸倫是左派書記？戚本禹搖頭。）

總理：錫盟代表許名揚同志。（許名揚站起來）你是什麼報的記者？

許名揚：《錫林郭勒日報》！一個小學生說烏蘭夫是黑幫，盟委的一個書記用槍對準小孩說：「再說槍斃你！」貼「打倒劉少奇」大字報的學生也被捕了。

于樂泉（昭盟代表，十七歲的學生）：敘述自己被鬥、被打、被捕入獄的情況。

陳振中（巴盟代表）：揭露巴盟和烏達資本主義復辟的情況。

陳樹鍵：揭露軍區某些領導人對內部革命派的迫害。

總理：你在軍隊工作幾年？

陳樹鍵：六五年十月到內蒙軍區。下連隊當了一年兵，然後到戰士報。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參加運動，二月三日被打成反革命。

劉鈞（軍區管理局局長，長征幹部）：揭露柳青開槍殺韓桐同志，以及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在北京被逮捕經過等。他又說到自己被地方同志掩護來北京反映情況，軍區某些領導人說他是逃跑投敵（中央首長全笑了，並議論紛紛。康老說：這是什麼話呀！）

肖華山：（「八一八」代表）：略。

總理：你是前天來的？

肖華山：我是月底來的。

總理：抓你們的人放了嗎？

肖華山：共逮捕125名，現在有兩名未放，其他在四月三日放了。他們還說：「派調查團是總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誰知道周總理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呢？」（總理大笑，全場都笑了。）

總理：你們多少人？

肖華山：二千人左右。河西公司軍事接管以後，宣佈「八一八」是反革命組織，要採取「政治攻勢」，要分化。

總理：分化，中央講的是對反革命組織，不是指「八一八」嘛！

張鴻喜（公安廳）：揭露了公安廳反奪權，以及公安廳成了資產階級專政工具的情況，並揭發××二師宣傳科科長、廳軍事代表趙金寶說：北京商談是「重慶談判」。

總理：你們講，站起來回答。（楊德松、尤亞民、華民三人都站了起來）你們把中央解決問題說成「重慶談判」，你們是國民黨，我們是國民黨啊？（這時楊德松坐下了）

康老：（生氣的站起來）那個（指楊）你叫什麼？（大家回答：楊德松）你就是那個師長，總理讓你回答問題，怎麼坐下啦？什麼態度！

（楊德松站起來說：「這是造謠。」眾紛紛說：我們那裡也有這樣說法。張鴻喜說：「你抵賴。」楊說：不是抵賴。郝廣德說：王良太部署的。張鴻喜進一步揭露談的時間、地點、當場人。）

總理：從你們口裡說出來的嘛！公安廳是誰管的？

華民：我們。

總理：工學院還有你們多少人？

華民：四十四人。

總理：怎麼還不撤？

華民：其他是派去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總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怎麼住到學校去宣傳啊！（總理接著念了鐵路的一份材料。中心意思是「你談你的，我奪我的」。其中有一句「中央文革干涉了我們」。）

江青：我們中央文革什麼時候干涉了你們，我們派了兩個記者還被你們捆起來！

總理：「你談完了，我也奪完了。」（放下材料又說）實際上也是如此，你們還宣傳，抄家……你們回去好好考慮向中央交代。

侯鳳英：王良太說：「你有你的少數，我有我的多數，多數沒有了，還有警衛營。」

總理：這是什麼口吻！

李雨樓：他們在審判我們時也說，不要把希望寄託在談判上。

馬伯岩：（呼市軍分區副參謀長、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揭露公安局資本主義復辟情況。

伊盟代表：三月五日，劉昌還去伊盟活動。（康老擺手讓華民等三人坐下）

李雨樓：揭露「紅衛軍」、內蒙監獄保守派等在×區某些人指使下，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總理：監獄還押多少人（指造反派）？

眾：一百多人。（有答二百多人）

周權（醫學院學生）：揭露自己在監獄裡所受的迫害。

王海波（軍區家屬）：揭露迫害家屬罪行。

黃寶玉（農牧學院）：我校軍代表也宣傳現在支持的沒錯，如果錯了，丟下槍回家也不支持三司。



包頭代表：軍代表說包頭奪權是向軍委備過案，中央點了頭的，誰再「反奪權」誰就是反革命。

總理：我們不知道，你們（指軍區的同志）回答吧！

包頭代表：軍區有些人說李天佑來了刮了一股妖風（首長都笑了！李天佑沒聽到，張春橋後轉身子告訴他，李天佑又大笑）當談到奪權下半旗時。

總理：在那裡、在那裡？（當時全場氣氛沉重）

包頭代表：內蒙二機廠。

張鴻喜：楊××在澡堂說中央代表團有八個右派。都是誰！

眾怒：指出名字來！站起來！

總理：我們還是擺事實講道理。

楊德松：這是造謠。

眾：你抵賴！

張鴻喜：我就是在雪地被劃地為牢站了二十三個小時的。

華民：是不是讓我講？

總理：你回答嘛！

華民：為他們支持紅革聯在公安廳奪權問題上辯護，並說沒有宣佈他們（指公安廳革命造反派組織）為反革命組織，只是說保守派。

霍道餘（華建）：我見到公安廳院裡大字報中寫的反革命組織（華民繼續辯護）。

總理：你說簡單一點。

華民：是（後來檢查說有錯誤）。

葉永凱（呼鋼）：劃地為牢我當時在場！

段建勳（二毛）：所謂抓解放軍的問題，不是那回事！

華民：沒有給反對派（指造反派）貼大字報！

總理：（沒聽清，以為他說反動派）反動派就是三司嗎？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剛才已經讓準備了，衛生系統的說吧！

鄭建德：（內蒙醫院）控訴內蒙醫院反奪權後對三司觀點的病人和醫務人員的迫害。其中談了有意不給一位闌尾炎病患者治療，致使穿孔。

總理：結果怎樣？

鄭建德：沒死。我們醫院軍代表名字還保密（全場笑了）。

霍道餘：我們那裡也是說是軍事祕密（都笑了）。

康老：名字還保密？！

侯鳳英：我去醫院看病，有傷只好說為家務事兩口子打架打的。只能說是愛人打的才能看病，不敢說××軍打的。

總理：不僅僅是為了看病，你還維護了解放軍的榮譽，寧肯說是愛人打的。今天只一方面講，無產者遞了一個條子要發言，誰呀？連個名字都沒有。（一下站起來兩個）（指張三林）你不是過去說過嗎？

何貴（「紅衛軍」）：全區廣播大會上宣佈我被押。

總理：高錦明同志，有這事嗎？

高錦明：全區廣播大會上宣佈的，一個被拘留，一個逮捕，後來放了。

張繼功（鐵一中）：他講的不是那麼回事，是他橫衝直撞進會場，打了人。

何貴：請問你們總理，我要打人一拳坐十年勞改，踢人一腳判二十年徒刑（指手劃腳）。

康老：一句話，你打人沒打人吧？

總理：（看高錦明寫的一封糾正信）這件事已經解決了，不是平反了嘛！

何貴：全區廣播大會上宣佈的。

總理：工資都發了，已經解決了。我們不是斷案的。在座的被打的比你們厲害的多，現在還沒有解決，我們也不能一個一個解決。糾纏了大家很時間，不繼續說了。今天不能解決問題，今天不繼續談了。我們又聽了第二第三批同志談，還準備訪問你們，節省一些時間，會後由聯絡員趙剛，記者找你們，也可提出材料。三司的也好，不是三司的也好，把情況用書面寫來。

第二件事，內蒙×區開始有一點認識，有了點檢討，順著這條路要繼續認識，深刻檢討，吳濤同志帶頭。還有獨×師、獨×團，現在你們只在呼市，在各盟也有，而是帶全區性的，要很好地檢查。如十八號（3月18號）那天我約定放人，不要再捕人

了，過去捕的要放，河西「八一八」的也要釋放。我說了有二十天了還有沒放的。其他地方還有。你們一方面繼續檢討，深刻認識錯誤，回到住處，馬上打電話回去，都放出來。

有傷的好好治療。你們支持一方，把另一方壓下去宣佈解散是錯誤的。你們應一方面深刻檢討，一方面很好的解決問題，但沒有很好解決。回去的要給工作，工資要照發。時間到現在已經兩個月了，先解決這部分問題。就從這一點你們就是有想法的，看出一條線。中央在談判，你們下面奪權，你們說中央是「重慶談判」，這是反動思想，把中央放到哪裡？把你們置於何地？要深刻的檢查出來。

你們繼續錯誤地支援一派奪權，把一派壓下去，你們說奪了權，中央就承認，根本不可能。你們在全國放了第一槍，打死了革命群眾，已經查清了！怎麼能說中央同意呢？你們回到住地，要好好檢討，把責任負起來，要和各單位講清。

打槍的人法辦，當然把這事登在報上也是不妥當的。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是林副主席親自領導的。是可以信賴的。毛主席最近說：我們敢於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三個信任：一信任群眾，二信任解放軍，三信任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要高度保持解放軍榮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只要傳達下去，就可以解決問題。那位女同志，侯鳳英同志，很懂得保護解放軍的榮譽，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

在這個會場上可以這樣講，不在這個會場上就不要這樣講，平心靜氣把道理講清楚。

解放軍個別壞人是有的，開槍的人是犯法的，這是個別分子。解放軍有個把壞人，但處理解放軍的問題是內部的事情，不能對外宣傳。

在這裡是允許你們激烈地批評的，對外不要宣傳，不要在內蒙以外的無關的人傳達，不要宣傳，不要打電話，不要出宣傳車，不要廣播，不要出傳單，否則一搞，傳到香港、外蒙、美

國、日本都知道了，這是敵人喜歡的，讓敵人高興。革命組織的同志，要遵守紀律。

事情起來了，要慢慢解決。內蒙有民族團結問題，反修問題，有四千里長的反修前線，更應該注意。被打的同志是受了不該受的待遇，是為革命嘛！正義伸張就行了。今天就這樣吧！

（郝廣德提出經濟封鎖，被扣押的人問題）

總理：我馬上下命令解決。

郝廣德：哲盟、通遼出現「畏罪自殺」。

總理：以後再談，否則會就開不完了。軍代表（指學校的）要完全撤出來，學校不要去嘛！推遲一下。（對吳濤）現在軍區什麼事都管了吧？繼續管吧！現在散會。

## 陳伯達、康生與呼和浩特市農民代表周文孝的談話 （1967.4.7.）

【時間：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下午三時至五時三十分。地點：中南海。接見人：伯達、康生、國務院聯絡員趙剛、朱文明。周文孝：貧農出身，是呼和浩特郊區農民革命造反公社參加總理主持的內蒙四方面會談的代表，呼和浩特市東方紅農民。】

康生：你叫周文孝？昨天本來你想發言，但因時間關係沒發成，你很守制度。如發言就恐怕把會場打亂，昨天的會議主要是讓×區認錯，昨天你沒有發言，總理讓我們今天和你個別談話，你要談的詳細一點。

周文孝：我是代表郊區農民造反公社的。

康老：郊區共有多少人？

周文孝：原有十七萬，經過六三年劃出去的，留下十三萬多了。

康老：他們那個組織叫什麼名稱？

周文孝：「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紅衛軍」。

伯達：他們共有多少人？

周文孝：農村共有四萬多。

伯達，康老：你們現在有多少？

周文孝：原來有四千多，現在有六千多。

伯達：啊！三司正處在白色恐怖之中，你們的人為啥還增加？

周文孝：根據二月十八日我們英明的領袖毛主席給全國貧下中農的一封信，我們要開抓革命促生產的萬人大會，當時正是星期日，遭到了「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的很大打擊。三司學生下去送肥，中午宣傳毛澤東思想、「十條」、「十六條」，正在這時候受到「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的圍攻，把學生送肥的汽車，摩托都砸爛。

康老：農村也是這樣？

伯達：他們這個組織多會兒成立的？

周文孝：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元月初。

康老：他們組織以啥為主？

周文孝：以榮、複、轉業軍人為主，許多是舊社會當過傅作義的兵，解放時當了俘虜後轉業回家的。拿我們村來說，榮複轉退軍人有地主、土匪的兒子、勞改犯、舊軍官的兒子、富裕中農的兒子。像廠漢板大隊，牛鬼蛇神甚至有地主翻天四不清幹部上臺，對貧下中農進行專政、鎮壓。三月十六日晚，我們一個同志叫岳萬林從上海回來……

趙剛：去上海幹啥去來？

周文孝：上海有一個農民總部，我們去上海學習「三結合」經驗，回去遭受圍攻，毆打，三月十六日晚「工農兵革命委員會」要開鬥爭大會，當場由王心寬（流氓）宣佈：「讓反革命，三司觀點的岳萬林交代去北京告狀，去上海學習反革命經驗的事實，讓他老老實實交代。」這時岳萬林掏出主席語錄要念，有郊區公安局尹占山去搶了語錄，給撕爛了，從板凳上揪下來毆打，四不清幹部

趙寬親自拳打腳踢。岳文城跑去講要文鬥不要武鬥，按總理四點指示辦事。他們說總理四點指示是對你們專政的，就把岳文城捆了一繩。正在這時有三輩農民李順順喊堅持「十六條」、「十條」、按主席思想辯論，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時由勞動大學拉來一汽車人，問李是什麼觀點，李答：三司觀點，就被他們圍攻、毆打、有一人往李順順嘴上打了一拳，他的拳頭碰到李的牙上破了，反而說李咬了他的手，當即由郊區分局孫寶山出面把李逮捕了。晚上郊區分局尹占山對岳萬林說：「球大個人，你幹反革命鬧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給你的小孩也立下這筆帳了。」他們還把四個耕讀學校老師都拉去勞動改造。

康老：啊！農村也抓人？

伯達：真不像話！

周文孝：廠漢板大隊情況就這樣。「××公社小滾大隊有一個婦女，被工農兵革命委員會」圍攻毆打，這個婦女說按毛主席「十六條」辦事，另一個婦女叫董秀珍是個地主老婆，說毛主席十六條不管用了，我就代表毛主席。還有一個說，毛主席不打好人，還不打灰人？

康老：啊！他就代表毛主席，他叫什麼名字？

周文孝：叫董秀珍，××板公社就這樣。還有毫沁營公社毫沁營大隊，有十八個小隊，有八個小隊都被打成反革命。

康老：啊！農村有那麼多反革命？

周文孝：不但打成反革命，連勞動都不讓。每天讓開會，「工農兵革命委員會」還撕爛窗戶往家裡扔土，不讓學習主席著作。這些整人的就是四不清幹部，還有四類分子。

趙剛：主席著作都不讓學，真厲害。

周文孝：在桃花公社百什戶大隊，有十六歲的一個同學，被他們圍攻毆打，還拉上遊街。

康老：啊！還拉上遊街，他叫什麼名字？

周文孝：叫楊懷用。

趙剛：楊懷用不是來了嗎？

周文孝：來了。

康老：他們誰主持這樣做的？

周文孝：有公社的武裝部遼福寶，大隊婦聯主任丁玉芝，他們倆人操縱整個主權，說遊街就遊街，說鬥爭就鬥爭，把十六歲的一個孩子還打成「現行反革命」、「三司的特務」、「人民公敵」、「社會的敗類」、「民族分裂分子」。

康老：這麼點小孩能成了人民公敵？能成了反革命？

伯達：豈有此理！

周文孝：還有百什戶的楊全套，七十來歲，被他們圍攻毆打。把三司觀點的搞得很厲害。

康老：農村越來越不像話，郊區有人沒有？

周文孝：有，軍區抓郊區，自上而下，郊區武裝部長白玉山抓公社武裝部。

趙剛：自上而下抓的，由郊區抓的。

周文孝：不僅下去大砸、打、槍、還給「工農兵」頭頭都發了槍了。

康老：農村還發槍。

周文孝：桃花公社武裝部給「工農兵」發了十七枝步槍，七十五發子彈。

康老：他們的槍是從哪來的？

周文孝：不知道，反正他們有槍，我有把握，有的人說軍分區給的，有的說郊區武裝部給的。他們每天還揚言說：誰敢來大隊、公社造反，看不見老子有槍！軍區已經開槍了。老子怕什麼！把社員鎮壓的不能活動。

康老：真不像話，真是個專政了，這個武裝部長姓啥？

周文孝：叫遼福寶，還有土旗來人反映，他們來告狀向我反映，鐵帽大隊有一個地主兒子，把一個貧農共產黨員三等殘廢軍人捆到馬尾巴上，拉了三十裡。

康老：啊！什麼？說的清楚一點。

趙剛：把一個人捆到馬尾巴上拉了十五公里。

康老：這麼厲害。

周文孝：他們把原支部書記推下臺去，把一個沒入過黨，沒入過團的，真正當過二年土匪的人抬上去當了支部書記。

伯達：他們叫什麼組織？

周文孝：叫「紅衛軍」。還有八拜公社，軍區去了一個所謂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串連為名，實際去挑動群眾鬥群眾，製造民族分裂，搞得很嚴重。說三司是反革命，不要受蒙蔽了，立即退出。他們說蒙人沒有好東西，原來這個村蒙漢團結很好，從他們宣傳後，民族對立搞得很嚴重，小孩出來也罵蒙人，整天宣傳蒙人沒好人。

康老：這個軍人姓啥？

周文孝：不知道。還有撬密梁村，他們組織了一個「壞人戰鬥隊」。整個都是地富反壞右，有個支部書記沒入過黨，利用職權把自己的中農成分改為下中農，在他的策劃下，讓四類分子、下臺幹部對貧下中農進行專政，凡是三司觀點的都被打成反革命，實行專政。

康老：你一個公社一個公社地介紹，什麼叫「壞人戰鬥隊」？

周文孝：就是地富反壞右，不只「壞人戰鬥隊」，還有「捉鱉戰鬥隊」、「捉鬼戰鬥隊」。

康老：南甸的。

趙剛：以什麼人組成的？

周文孝：以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四不清幹部掌握，對貧下中農專政。他們去了一個軍官給宣傳：總理已經點頭了，「工農兵」、「紅衛軍」、「無產者」是革命組織，總理已批准讓我們支援，是左派組織，三司是反革命組織，你們受蒙蔽的立即退出，我們要抓三司的首要分子。也不知道是哪個中央批准的。

康老：真胡扯，誰批准他們的？！

伯達：豈有此理。

周文孝：這個時候有個不同觀點的上去辯論，遭到他們村的「工農兵」圍攻毆打，這個人就喊毛主席萬歲，這時有個姓包的首長就說「不要拿紙老虎嚇人」，這個同志說，我們要按總理的四項指示辦事，姓包的首長又說：「四點指示是對你們專政的，總理只是



代表他周恩來個人，中央那麼多人，他代表不了。」

康老：哼，真無恥。

周文孝：這陣農村，拿郊區來說，普遍是這樣的，凡是三司觀點的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拘留的拘留，抓的抓，打的打。

康老：周文孝，你有什麼要求？

周文孝：我忘了一個事，我們郊區三月十八日反奪權就把劉仁逮捕了，這是我們農民公社最主要的一個領導，他對郊區的情況最瞭解，他知道郊區有多少貧農，多少地主、多少反革命，郊區鬧的挺凶，所以把他抓起來不放。要求康老、伯達同志，要求總理給往出放一放。

康老：你是不是讓他來北京。

周文孝：就是。

康老：好，好的。<sup>28</sup>

## 中央首長接見天津駐軍及幹部群眾代表的講話 (1967.4.7.)

【參加接見的有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葉群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接見的有李雪峰同志、北京軍區首長鄭維山副司令員。被接見的有肖政委、鄭三生，革命的領導幹部有解學恭、胡昭衡、趙曙光、江楓五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四十九人，勞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崗山等為特約代表。10：05分中央首長進入會場，會場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首先周總理向鄭維山說：「鄭維山同志，是你講還是肖思明同志

<sup>2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講？」

周總理接著說：十多天，我想弄清情況，有很多事情要辦，有四川、內蒙要辦，不是故意卡你們。有的比你們來得晚也接見了，他們的問題比較大，天津的問題算什麼，我先聲明一下。

肖思明同志說：「天津駐軍於1月23日按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和廣大革命群眾一道作了一些工作，由於我們的同志學習不夠，出現了不少的缺點和錯誤。

- 1.在促進革命派大聯合方面，雖然開了五個代表大會由於時間倉促，還有一些革命組織沒吸收進來，由於調查研究不夠，少量幾個保守組織也進來了。
- 2.在幾個代表會期間，我們跟革命群眾組織和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進行了協商，從全域看，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不民主，這樣，應該選的代表，沒吸收進來，如3月23日籌備小組的選舉，結果使原來想吸收進來的沒有吸收進來，職工代表會和中學代表會也反映了這個問題，總怕把觀點強加於群眾，違背「十六條」，沒做細緻的工作，想選的沒選上。
- 3.對張淮三一手炮制的七個野戰兵團，處理慢了一些，態度是明朗的，反覆討論了幾次，請示了上級。這麼龐大的組織處理要慎重，在上級沒有批示時，作他們基層工作，分化瓦解。這樣作不能解決問題，又請示，發表了公告，態度明朗，採取了措施，發表了聲明，沒有點名，實際上是提這些組織，最近才點名。雖然作了點工作，希望對軍隊提出批評。」

鄭維山同志說：天津的同志到北京已十幾天了，十幾天與同志接觸很少，基本上沒有什麼接觸，開會接見，我個人來講應很好接觸，表示抱歉。軍隊在天津作了許多工作，但也出現了一些缺點，我作為北京軍區負責人，我應擔負更大的責任。

對天津大聯合的幫助很少，北京的大聯合是總理中央文革直接指導的。按北京大聯合經驗指導天津大聯合，如果天津出現缺點錯誤，首先是我的責任。2月6日我到天津搞工作，按中

央和總理的指示去天津，聽鄭三生同志、肖思明同志講了野戰兵團的問題，野戰兵團是保守組織，我沒有及時詳細報告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直到野戰兵團來京才報到中央軍委。1號肖思明同志、鄭三生同志親自來抓，直到同志們這次來，肖思明同志、鄭三生同志當面彙報給總理，才把這個問題處理下來，處理慢責任在我。天津駐軍態度明朗。周總理接見我們對天津有很多指示，我們要儘快照辦。我相信在中央指示後，在今後大聯合中，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關懷下，工作會搞得更好。接著總理又把中央首長一一介紹給代表，以後有代表隨便發言，發言時，有工礦企業的李勇，還有勞二半「八一八」王德明，反修錦綸廠的張成明，還有天工八二五的帥關仁發表了反面意見。（「八·二五」、勞二半等彙報情況從略）

（反修錦綸廠彙報很長時間，總理打斷他的話說：江青同志要講話。）江青同志說：戰友們，我對天津情況瞭解的不夠，但對天津造反派印象很深刻，在去年，萬、張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迫害你的時候，你們二次徒步到北京，半路上，北京派車把你們接來的，值得我學習。我3月28日聽了一次彙報，這方面的問題聽了一些省分 and 個別專區的彙報以及群眾組織的辯論，事物總是要有比較的，多方面比較一下，我對3月28日66軍負責同志肖思明同志的彙報的印象很深刻的。人民解放軍作群眾工作滿腔熱忱，愛護革命左派，這個印象也是很深刻的，當時我的印象是66軍作了大量工作，對沒有團結進來的革命左派組織滿腔熱忱、愛護就是不知怎麼作好，有老好人的心情，這樣好的軍隊，有的地方就不是這樣，抓人很多，天津抓人很少，比北京少，有的地方抓幾千、幾萬，甚至有慘案，這就不必細談了。這麼一比較，我覺得天津軍隊是較好的。我希望也算作建議吧，大聯合外的左派組織也要想一想他們的苦衷。另一方面，對張淮三操縱的野戰兵團的處理，不是他們故意搞晚的，因為涉及到十多萬人的群眾組織採取慎重態度是對的。向中央報告了，他們的

報告送來好多，給軍委又給總理，又給中央文革。另外本來應該選進委員會的沒有選上，他們認為是錯誤的，他們今晚還說是有錯誤的，我覺得應向沒參加進來的左派組織說明這個情況，我有這個責任。我們的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大多數是好的，支左不是那麼容易的，如果我們一下子接近群眾也會出現錯誤的，但是知錯必改，犯錯誤的左派組織要說明他。把我瞭解的情況講出來，是不是沒有參加進來的左派組織，心裡應該平一些。我不認識他們（肖思明、鄭三生）但是，今天我覺得有必要替他們說話，我不是保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我希望在這個座談會上，通過辯論來解決。天津駐軍是好的，軍隊不多全市下去一萬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沒開槍。天津由一個反革命大亂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時間並不算太長，這和軍隊做工作分不開的。有的人可能說，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這樣，我不是和稀泥，我覺得我應該這樣說，我就要退席了，我就講這些供同志們參考（掌聲雷動）

接著反修錦綸廠張村民又講，總理打斷他們的講話，說：同志是不是可以集中一點談，你們25個單位的材料，我們印發你們的材料，贈給我們一些。

（當反修錦綸廠說到天大八·一三炮打康生時）

康生同志說：我說幾句，有幾個學校受高級黨校個別少數的人，彭真、林楓影響下，有些時間收集我的材料貼我的大字報，成立全國委員會，調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這裡面北京的也有，清華的也有，體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後問題揭穿了，是高級黨校「紅戰團」個別頭頭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屢次聲明受蒙蔽的，覺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爭論這個問題，我在清華講過，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講過，對其他幾個單位不要把這件事作為攻擊他們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們請罪，我不贊成這樣作，一時受蒙蔽的常有，列寧曾說過：上帝允許別人犯錯誤，我們共產黨人比上帝強得多，為

什麼不允許別人犯錯誤呢？（熱烈掌聲）

有人說：八·一三炮打張春橋，八·一三代表說，我們是堅決支持張春橋同志的，張春橋同志可以做鑒定嘛。張春橋同志當即說：

「我做鑒定，我與八·一三的關係很好。」

周總理的幾段插話：「天津衝擊警備區的抓人了嗎？沒有抓這不就很好嗎？天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衝擊中南海我們都沒有責備他們嘛。」有人提到紅代會，紅代會有多少保守組織的時候，周總理說：「北京80%參加了紅代會，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們是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組織是必要的。」後來還說對天工「八·二五」帥關仁和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一個姓張）說：「你們趕明天好好地談一談吧，衛東和南大「八·一八」也好好地談一談吧，都各有各的長處，應在一起互相談一談。」戚本禹同志插話說：「南大「八·一八」是有功勳的。」其他首長都點了頭。咱們的代表要發言駁反李雪峰派造的謠。周總理說：「這樣好嗎？今天是我們第一次接見你們，我們就不一次表示出態度了，你們在一起好好談談，好好想想，我們今天有別的緊要事情，後天再接見你們好嗎？」（熱烈鼓掌）<sup>29</sup>

## 中央首長第五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 （1967.4.12.）

【時間：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時五分至十二日一時四十五分。  
地點：人大會堂安徽廳。接見人：總理、伯達、康生、肖華、張春橋、王力、關鋒、姚文元及總政，總參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徐立清、李天佑、韓先楚、宋任窮、張國華、陳先瑞等。被接見人：區黨委代表：高錦

<sup>29</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明、權星桓、康修民、李樹德、李質、郭以清、張魯。軍區代表：吳濤、劉華香、肖應棠、黃厚、劉昌、王良太、姜文啟、諸方玉、教長鎮和獨立二師楊飽松、尤亞民、華民等。軍區造反派代表：邵仲康等24人。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高樹華、郝廣德等57人。「紅衛軍」等保守組織代表：張三林等9人。王鐸、王逸倫沒讓參加。】

總理：現在開會，內蒙古情況大致清楚了，已經兩個多月了嘛！今天請後來的同志再談談。

郝廣德：（給總理介紹）這是張孝同志。

總理：那個學校的（翻材料）？

郝廣德：「火車頭」的。

總理：有名字沒有（指是否登記過）？

趙剛，宋學孔：沒有，今天才來的。

總理：那一部分的？

郝廣德：「火車頭」的。（張孝說了一句，聲音很低）

總理：你能說話嗎？火車頭代表替他說說。

張孝：能！（旁邊兩人扶起）

總理，康生：坐下吧！坐下吧！

總理：不是還有一位火車頭的同志嘛？

包長勝：有，我叫包長勝。

總理：你替他談一談吧。（包講張孝受迫害經過，談到殘廢時）

總理：治不好了嗎？快送到北京醫院！

張孝：我說兩句。

總理：坐著說吧！（總理抬起頭）你談吧！（對趙剛）快點送醫院去看。（張孝：控訴被迫害經過）

曹文生：他講的與事實不符，他們寫過反動標語。

總理：什麼標語？

曹文生：「青松不怕火燒，『火縱』不怕狗咬」，攻擊解放軍。

康生：就為這件事，應該不應該把人打成這個樣子？

曹文生：誰打的，我不清楚。要嚴懲兇手，我們要為受害者申訴。（大家冷笑）

（包長勝：嚴厲駁斥曹文生等人在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中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等罪惡活動。）

總理：（對曹文生）我問你，現在為什麼不放人？這是不是事實？！

曹文生：據說是放了。

總理：就因為這條標語就抓人？

曹文生：寫的是反動標語。

總理：這樣的標語，在北京都有，怎麼能是反動標語呢？怎麼能是攻擊解放軍呢？

康生：沒有說解放軍嘛！解放軍你們說擁護，中央指示你們擁護不擁護？

曹文生：擁護！

康生：擁護為什麼到現在還不放人？

總理：擁護？！早就說了，你們到現在還不放人。

高利陶（軍區宣傳部幹事）：揭發張三林造謠惑眾的事實。

張三林：我不願解釋個人問題。（眾笑）

總理：你是不是三司的？

張三林：不是，我是「紅衛軍」的，橡膠廠的。

總理：先說這件事，你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還不放人？

曹文生：下午曾打過加急長途電話。他們製造停車事件，他們是不符合公安六條的。

總理：那一條？你們扣了幾個人？

曹文生：八、九個人。

總理：什麼時候扣的？

曹文生：二月五日扣了兩個，五個是二月八日扣的。

總理：二月八日到現在已有兩個多月了，為什麼到現在不放？

康生：中央命令在你們那裡算數不算數？

總理：四點指示有效沒效？

張三林：有效，今天又打電話回去了。

總理：有郊為什麼還不放人？北京的同志來了沒有？

李天佑：來了。（陳先瑞走到前面去）

總理：北京軍區是一個小部隊，軍事接管呼和鐵路局。（眾：起立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總理：你們為什麼不放？就算有點嫌疑，已經扣了兩個多月了嘛！

康生：抗拒兩個多月了嘛！

總理：（對曹）你還有什麼辯護的？（曹文生沒吭聲的坐下了。）（包長勝繼續揭發鐵路局兩條路線的鬥爭及曹破壞生產的罪行。）

總理：鐵路局問題知道了，現在由郵電局王連奎談談。王連奎揭×區控制郵電、非法偷聽電話等罪行，談了郵電局二月九日成立保守組織，十號就反奪權。這時總理、康生等首長都笑了）

總理：你們有幾派？

王連奎：兩派。

總理：你們三司觀點的有多少人？

王連奎：我們三司觀點的三百人，無產者一百多人。並說二月十號反奪權，他們叫「三結合」。

總理：他們叫「三結合」？

王連奎：郵電局還調動農民保權！

總理：保什麼權？多少天？

王連奎：三天。

侯鳳英：還搞錄音。

眾：（他們對打電話都偷聽，還延續時間。）（王連奎繼續揭發盜用中央名義打電話等）

總理：郵電局駐有多少軍隊？

王連奎：一個加強連。

總理：現在聽聽地方的。錫盟許名揚同志講講。

許名揚：現在還有十三人沒放出來。

總理：你們那裡還不放人？

許名揚：不放。



總理：什麼時候問的？

許名揚：中午問的。

總理：吳濤同志，這個事情交給你解決。

（吳濤：馬上打電話）

（烏盟玉寶講扣押人的情況，哲盟郭玉講一人「畏罪自殺」問題。黃寶玉補充哲盟農村資本主義復辟情況。）

陳振中（巴盟代表）：聽說部隊支持煤礦奪權後，現在停掌子面。現在三十多人未放，他們說是中央軍委指示的。

肖華、王力：這是造謠！

總理：（叫起蘭州司令員說）你們處理。（又對吳濤同志）注意，我們還要和你們單獨談談。（又問了《內蒙日報》社情況。）

李雨樓：報社壓制得很厲害，現在軍隊和「紅衛軍」非法佔據報社。

總理：報社幾派？

王力：報社有保守派嗎？

李雨樓：兩派。他們還有一百多人。

總理：報社誰管？

李雨樓：他們掌權著呢！

總理：登什麼內容？

李雨樓：沒聽總理指示，登了地方問題。

眾：登「抗大」，登軍區。

總理：有報紙嗎？

李雨樓：沒有帶，我是從監獄出來直接上火車的。（黃寶玉、高樹華等送上兩份報紙。）

總理：高樹華同志談談「聯動」情況。

（高樹華談了中學生中「聯動」分子問題。）

總理：讓二中講講。（二中代表任衛東講了「聯動」「罪惡的槍的問題。」）

高樹華：他們還有電臺。

總理：還有電臺？有名單嗎？給我，有多少人？

任衛東：十幾個。

高樹華：還有反動標語：「打倒康生」等。

梁音亭（軍區後勤部）：他們遊行時打著劉少奇的像。

黃寶玉：新華書店一千多張劉少奇的像都被他們拿出來了。

眾：還舉起像高呼口號。

張三林：我們從新華書店拿出來燒的。

康生：你們拿著劉少奇的像遊行沒有？有沒有四個像？

張三林：不知道。（霍道餘揭露他們批判劉少奇是假的）

高惠娟：二中趙玉花說，蘇修、蒙修支持三司，周總理也支持三司。

總理：捏造！

韓文達：他們在火車上審問時說：王力是個大混蛋，是三司的後臺，要挖王力的根子。（總理、王力等大笑）

曹燕玲（軍區紅色造反團）：軍區文辦正在整理王力同志的材料。

包力陶：懷疑中央的根子，這是軍區某些人，他們要挖王力同志的根子。

總理：王逸倫的報告是不是都聽了？

眾：聽了。有的是三月三十一日，有的在四月七日。

包力陶：（詳細揭露×區問題）他們說造反派在「一·二二」、「一·二五」事件上是吃裡爬外。（眾站起來指王良太：說過沒有？）

王良太：說過。

（包力陶揭露軍區某些領導人造謠蒙蔽群眾，劉昌傳達反革命策略問題。）

康小春：德山（呼市軍分區副參謀長）曾念過一個特好消息說：「中央叫各大軍區學內蒙。」

總理：（手揮一份傳單）我這裡也有一份，純屬造謠。

陳永華：今天六點半來電話說：××二師協助保守派對工學院等革命造反派實行武鬥。

張鴻喜：我也揭×師情況。……

總理：王志有談談。

王志有（「八一八」）：他們說有兩條黑線，一個黑根，要揪李富春、

李雪峰、要揪黑根！（回頭質問王良太）你說黑根是誰？

眾：（質問）王良太站起來！（總理沒讓王講。）

總理：不要問了，很顯然黑根就是中央嘛！

王志有：河西公司反奪權後，報喜時，我們提出意見，說不要讓外邊的人到廠子裡來。他們說是總理點頭，林彪同志也在場。

總理：真是！造這種謠言。（蔚洋：揭露電臺軍代表造謠和反奪權問題。）

總理：全部是造謠。

王力：造謠。

蔚洋：他們說，林副主席說：「你們打的不狠，手太軟！不如青海，進度不快。」

總理：青海文件你們看到沒有？

眾：沒有。

總理：（對於順昌）你們記者有文件，明天給讀一讀。

蔚洋：他們造謠說：李天佑根本不支持三司。

李天佑：我白天去東縱，晚上又從東縱東門到樓上，他們純屬是造謠。

總理：電臺有多少軍隊？

蔚洋：由一個班增至一個排。

總理：周文孝把農村發槍情況談談。

周文孝：給桃花公社發17枝槍，30發子彈。

總理：今天會到此結束了。明天九點鐘再開一次，內蒙問題就結束了。讓肖華同志與軍區同志談一談，還有記者和聯絡員同志同大家談一談，還有什麼材料送上來，明天開會時間九點。不要再增加了，觀點不要說了，已經很清楚了，已經兩個多月了嘛！不然人越來越多。群眾不要互相對立，不要著急。你們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要等待一下。內蒙古自治區地區大，分區多，還有各旗縣，還有牧區，電話傳達不到的可以派人嘛！

鐵路局去的部隊明天天亮就到了。鐵路那位同志，明天送到醫院，總是可以治好的。

明天晚上九點開會，有材料還可以送上來。要等待中央的佈置。同志們受苦了，這是為革命嘛！我們一定要把邊疆的問題解決好。明天結束這個會，要靠革命造反派團結起來。散會。

（全體起立，鼓掌歡送總理及各位首長，總理等招手致意，大家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康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4.13.）

【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

同志們：

林彪同志和軍委的同志要我在會議上講一次話。我對於軍隊的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都沒有實踐經驗。參加這次會議，主要是向解放軍同志們學習。既然要我講話，要我講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那麼，我就把一些不系統的想法，提出來和同志們交換意見。

一月廿三日中央關於軍隊支持革命左派的決定，是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決定。這個決定的第五條指出，必須「在全軍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決定。因為支左最根本的就是支政治、支毛澤東思想，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支持革命左派，就是要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堅決的鬥爭。林副主席講過，我們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我覺得，軍隊支左正是我們帶著問題學習毛主席著作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林副主席講，學習毛澤東思想、學習毛主席著作，必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軍隊支左就是要在運用毛主席著作上狠下功夫。因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執行劉、鄧的路線，這是劃分左、中、右最基本的一個標準。我對於毛主席著作和兩條路線鬥爭

的問題學習是不夠的。只是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不系統的意見，提出來供同志們參考，不對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

前次軍級幹部會議我講過，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同一個兄弟黨的領導人談話時，談到了兩條路線鬥爭的本質。當時毛主席指出，兩條路線鬥爭的本質，就是中國走什麼樣道路的問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進行階級鬥爭，依靠群眾，依靠無產階級，依靠黨的領導，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就必然要依靠資產階級、反對群眾路線、反對階級鬥爭，妄談什麼「共產黨員的修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講，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長期存在著的。中國革命幾十年來，一直存在著這種鬥爭。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還會存在。就是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整個的過渡階段，必然貫穿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

下面我想從幾個問題上來談一談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

### （一）

過去有一種說法，把劉少奇說成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譬如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就說劉少奇在白區工作中如何正確，說劉少奇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個模範」。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個決議，對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確的論述，但是在有些問題上是有錯誤的。譬如對瞿秋白的說法，對劉少奇的說法，是不對的。這個決議不是毛主席寫的，作為《毛澤東選集》的附錄是不恰當的。徵求過毛主席的意見，《毛澤東選集》將來再印行時，這個決議要抽掉。

劉少奇到底是不是一個「白區工作中策略思想的模範」呢？我們從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來看一看。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在《「共產黨人」

發刊詞》中說：「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劉少奇是不是「白區工作中策略思想的一個模範」呢？那麼就看看他在這三個基本問題上，他的主張是什麼？

毛主席說：「我們黨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遊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這是毛主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略思想。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恰恰是背道而馳的。他不是主張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不是主張進行武裝鬥爭，不是主張去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而是迷戀大城市，引導無產階級放棄政治鬥爭，在城市工會工作中實行經濟主義。一九二六年，他就說過：「工會為工人之經濟組織」，「今後職工運動之方針，應作各種經濟鬥爭，工人在任何時期都不能離開其經濟上之利益，經濟問題，工人在所必爭。經濟鬥爭的發展，即為中國職工運動的發展。」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掛帥，這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共同的一個特點。劉少奇在白區工作中，實際上是實行機會主義，經濟主義，放棄無產階級政治，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掛帥，放棄武裝鬥爭。

再來看統一戰線問題。毛主席說，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是「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毛主席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政黨統一戰線問題上，一方面反對關門主義，另一方面反對把共產黨變成資產階級的尾巴，反對投降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消滅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企圖。強調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

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恰恰又是背道而馳的。他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實行投降主義，放棄黨的領導。他不是像毛主席所說的，把統一戰線看成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是要把人民的武

裝交給蔣介石去統一領導。早在一九三六年、三七年，他在北方局白區工作時，就用陶尚行的筆名寫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在資產階級的刊物上發表了的。在這篇文章中，他宣揚投降主義，主張把華北的人民革命武裝交給國民黨，完全接受了王明的投降主義。因此，王明對陶尚行的那篇文章大加讚賞，這不是偶然的。

再來看關於黨的建設方面。毛主席說：「黨的組織，這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的實行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就是說，要把我們的黨建設成為能夠進行武裝鬥爭的黨，能夠保持黨的獨立性並掌握統一戰線的黨。毛主席又說：「在過去發展的黨組織工作中，雖然中央著重提出了『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的口號，但實際上是混進了許多投機分子和敵人的暗害分子。」「大資產階級在思想上企圖『溶解』共產主義，在政治上、組織上企圖取消共產黨。」因此我們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要鞏固黨的組織、純潔黨的組織，劉少奇的組織路線恰恰同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背道而馳的，他是實行一條資產階級反動的、招降納叛的投降主義路線。同志們看到的那份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幾個人自首反共叛黨的材料，就是劉少奇實行招降納叛的投降主義路線的鐵證。這正如中央在三月十六日關於這個問題的批語上指出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餘人自首投降出獄以後，由於劉少奇的包庇重用，「長期隱藏在黨內，竊據了黨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的重要職位」，直到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才把這個叛徒集團揭露出來，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我們黨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這個叛徒集團，只是一個具體例子。在座的劉格平同志知道，薄一波出獄以後，劉少奇又派他到閻錫山那裡去，貫徹劉少奇的叛黨路線，把太原第一監獄的一些人同樣按照這個辦法去自首叛變投敵。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喬明甫就是一個。過去楊尚昆那個辦公廳的副主任龔子榮也是一個。北京這六十幾個人，只是劉少奇的叛黨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

在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上，即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

這三個基本問題上，就明顯地看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尖銳鬥爭、長期對立的。這是在基本問題上，原則問題上的對立。所以說，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只是在現在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出來，而是很早就存在的，只不過是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更集中地更突出地表現出來罷了。

## (二)

上面所說的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這三個基本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解決中國的政權問題，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的人民政權問題。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政權問題上，我們看一看劉少奇的反動路線是怎樣表現的。

從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到一九三九年，民族危機加深，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國民黨一直採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一九三九年，正是國民黨投降反共活動的逆流猖狂的時候，也正是蔣介石宣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毛主席寫了一系列的文章，號召全黨全民積極投入革命戰爭，去爭取勝利。針對國民黨的投降分裂活動和倒行逆施，毛主席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由於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方針，我們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打退了國民黨反共投降的逆流。同時，毛主席號召全國革命青年投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消滅日寇，在思想上和在各方面準備打倒反動的賣國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主席出席了延安的「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在會上，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著名講演。在這篇講演中，毛主席告訴全國青年說：「五四運動所反對的是賣國政府，是勾結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壓迫人民的政府。這樣的政府要不要反對呢？假使不要反對的話，那麼，五四運動就是錯的。這是很明白的，這樣的政府一定要反對，賣國政府應該打倒。」在這篇講演中又說：「現當全



國人民奮起抗日的時候，大家鑒於過去革命失敗的經驗，下決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並且不容許再有賣國賊，不容許革命再失敗」。毛主席告訴青年，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毛主席號召青年，必須同工人農民群眾相結合，這是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分界線。毛主席說，口頭上講馬克思主義，講社會主義，是不算數的，要判斷「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 and 廣大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我們覺得，毛主席這段話對於我們今天去支左，具有重大現實意義。我們今天支左，是真支左，還是假支左；是真奪權，還是假奪權；是真實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是假實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實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有一個重要標準，就像毛主席所教導我們的，要看對廣大的工農革命群眾的態度和關係怎麼樣。

正當毛主席號召群眾打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建立新中國的時候，一九三九年七月，劉少奇為了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線，拋出了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個小冊子。大談什麼「思想意識修養」和為人處世的封建哲學，要人們離開當前尖銳的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而去作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修身養性。毛主席說，這本書完全是欺人之談。革命的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到底要不要奪取政權，能不能奪取政權，怎樣奪取政權，對於這些基本問題，這個小冊子避而不談。根本不談奪取政權，不談無產階級專政，離開了政治，離開了階級，離開了階級分析，離開了階級鬥爭，完全是一本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反動的、不觸及蔣介石一根毫毛的東西，是一株資產階級的大毒草。

關於這個問題，這幾天報上有很多文章，昨天陳伯達同志也講過，我不詳細說了。但是必須指出一點，在《修養》的許多地方含沙射影，惡毒地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比如他談到學習馬克思、列寧的時候，談什麼沒有偶像崇拜，實際上是影射毛主席的。應當說，這個黑《修養》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為了批判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九四〇年一月，毛主席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這本名著。我這裡順便說一句，毛主席並沒有看過這本黑《修養》，只是在一些場合中聽到劉少奇的一些謬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全面的、深刻的、系統的總結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基本經驗，揭示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革命的規律，粉碎了企圖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夢想，科學地規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並且指出了從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這一本書，同劉少奇的黑《修養》針鋒相對，一開頭就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緊接著就提出「我們要建立新中國」，毛主席說：中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是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個階段。然後，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本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著作，明確地規定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和步驟，澈底地粉碎了王明、劉少奇等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反動路線，澈底粉碎了他們的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把劉少奇的黑《修養》同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兩相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線，誰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誰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誰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政權問題就更加尖銳地提到面前來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發表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著名演講。在這個演講中，毛主席指出中國存在著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鬥爭。他說：「從整個形勢來看，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蔣介石說是要『建國』，今後就是建什麼國的鬥爭。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複雜的鬥爭。目前這個鬥爭表現為蔣介石要篡奪抗戰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的篡奪的鬥爭。這個時期如果有機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不力爭，自願地把人民應得的果實送給蔣介石。」毛主席這些話是有深

遠意義的，是針對黨內的投降主義路線而講的。我們過去學習毛主席著作，總是有些糊塗，不是像林總所講的那樣，帶著問題去學，對林總這句話體會不深。現在把劉少奇那些文件、講話拿出來，再同毛主席著作中那一年，那一個問題上講的一對比，事情就非常清楚，兩條路線的鬥爭在基本原則問題上，的確是明顯地對立著的。

毛主席在這一篇文章中，提醒大家說，內戰是不可避免的。他說：「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確定了。」他明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在我們黨正準備同蔣介石進行戰爭的過程中，像昨天總理所講的，有一個插曲，就是毛主席到重慶去談判。這個談判的原因昨天總理已經講了。毛主席率領代表團到重慶談判，方針是很明確的，就是要盡一切可能揭露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內戰的陰謀，要揭破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同時也是為了我們爭取備戰的時間。現在我們看看《毛澤東選集》，毛主席在《關於重慶談判》這篇文章中指出：「國民黨一方面同我們談判，另一方面又在積極進攻解放區。」「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毛主席又說，「國民黨向我們進攻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反擊，也是很自然的」，「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劉少奇的反動路線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完全相反的。劉少奇在抗日戰爭以後，害怕戰爭，害怕革命，幻想和平，提出一條投降主義路線。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他作了一個《和平民主的新階段》的報告。這個文件，昨天伯達同志作了很好的批判。我不多重複。總而言之，就是在這個報告中大肆散佈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幻想，宣揚階級投降主義，宣揚議會鬥爭，取消武裝鬥爭，主張取消黨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把人民的革命武裝交給國民黨統一指揮。他說：「軍隊也要整編，我們的軍隊成為國軍、國防軍、保安隊、自衛隊，我軍的支部黨委員會、政治委員取消，在軍隊中個取消黨的組織，整編，各黨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指揮，統一

於國防部」，「我黨與軍隊的關係要作到和國民黨差不多。」

同志們！毛主席說：「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劉少奇不僅是交一支槍，一粒子彈，而是把整個軍隊，整個黨都出賣掉了。如果按照劉少奇的投降主義路線去做，中國人民永遠不會翻身，永遠得不到解放。但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劉少奇的錯誤路線破產了。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革命的大道闊步前進，終於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這裡，我們就看到在政權問題上，哪一條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哪一條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三）

中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我國要建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要走什麼樣的道路呢？在這個問題上，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堅持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路線鬥爭特別激烈，特別尖銳。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我們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報告。這一篇報告，最近毛主席還講到，說看來有一些人對這個報告，對於二中全會決議，根本沒有實行，也根本不想實行。今天必須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注意。所以，我就想讀一下這個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毛主席提出要促進中國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各方面應採取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毛主席在這個報告中，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各種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逐步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地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本道

路。這個報告，已經形成了我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綱領。

毛主席在這個報告中強調指出，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後，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即將成為國內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提出這個基本問題到現在，已經十八年了。當時，毛主席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他教導我們全黨警惕這些不拿槍的敵人用「糖衣炮彈」來進攻我們的危險，要求我們學會同資產階級作公開的或隱蔽的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和文化鬥爭。在這個報告中，講到人民解放軍的問題，今天特別值得我們注意。毛主席說：「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支戰鬥隊，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在國內沒有消滅階級和世界上存在著帝國主義制度的歷史時期內，我們的軍隊還是一個戰鬥隊。對於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特別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綏遠方式解決問題的時候是這樣。隨著戰鬥的逐步地減少，工作隊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天來學習毛主席十八年前的這個指示，有很大的現實意義。現在，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又是宣傳隊，又是生產隊。毛主席在十八年以前，就是這樣信任我們的解放軍，相信我們的解放軍，依靠我們的解放軍。今天又給了我們支左、支農、支工、軍訓、軍管這樣極其光榮偉大的任務。我們就要像林總所講的，要勇敢的去實現這個任務，同時又要謙虛謹慎地來進行這個工作。因為許多工都是新的。沒有經驗。某一個時期，某些同志，某些地區，犯一點錯誤是難免的。但是，在毛主席、林總的領導下，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軍委的領導下，這些錯誤是會立即得到改正的。

關於中國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黨的生日，毛主席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作了進一步的論述，這篇文章，大家是很熟悉的。毛主席在這篇文章中，全面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及其對內外的基本政策。

毛主席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是在我國條件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或者說，人民民主專政

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毛主席在文章中又強調指出：「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地位。」「人民手中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為了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了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劉少奇在全國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的講話，大力提倡剝削，鼓吹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劉少奇帶著王光美到天津的那個親戚王光英家裡去，就是劉少奇稱王光英為二哥，稱王光英的老婆為二嫂的那個家裡去。在那裡，他經常同一些大資本家混在一起，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代表資本家講話。在此期間，他先後對天津市委、東亞毛紡廠職工、天津國營企業職工、工商業資本家、天津職工代表大會、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作了講話。這些講話，以及同年三月十九日他從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出了一套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綱領。他的主要論點是：

第一，說什麼「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不是資家太多了，而是資本家太少了」；「不是私人資本家工廠太多，而是太少了」。

第二，說什麼工人階級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工人階級「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人剝削比沒有人剝削好」、「剝削他們一下，他們倒滿舒服，如果不剝削他們，他們就不舒服，覺得痛苦得很」。因此，「要發展資本主義剝削」，要「多剝削」，「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而且有功勞」，「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這個功績是永垂不朽的」，「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這些，都是他那些文件上有的，不是我們造他的謠言。

劉少奇為了讓資本家多剝削，宣揚應降低工人的工資。他說，「工資太高應該降低，使資本家能夠維持賺些錢，使工廠可以發展，對工人對國家對社會都有利」，如果「工資提的過高，……就要發生錯誤」。

第三，宣揚共產黨員和工人要和資產階級、資本家搞好關係，要向資本家投降。他說：「和資本家要搞好一點，不要怕罵投降了資

本家。」「有人說和資本家拉好關係，就是失掉立場，這是錯誤的說法。」他還胡說：「關係搞好，又不失掉立場，這就是馬克思主義。」

他這一套投降綱領的結論是什麼呢？昨天伯達同志已經講過了，就是劉少奇自己說的，「今天在中國正是資本家建立功績的時候，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是年老的、腐朽的、反動的，而是青年時代，還能夠發展」。這就是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也是中國資本家青年時代的開始。他還說，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進步性」，應該讓它在提高生產力方面建立「功績」。他猖狂地說：「中國今天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否則將違背人民利益，也違背了工人利益。」這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劉少奇公開反對毛主席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

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劉少奇在一系列的報告中，不斷重複上述論調，並且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口號。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上說：「要大大地加強和鞏固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礎。」同年十一月，他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學習座談會上，再一次鼓吹「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同年五、六月間，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在政協民主人士學習會上，又反覆宣揚資本主義剝削「有進步作用，剝削得好」，「工人要你們剝削，不剝削人家苦得很」，「社會主義問題是將來的事情，現在提得過早」，等等。在那幾年，他是大張旗鼓地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毛主席在二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綱領。

劉少奇不僅反對對城市、工廠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且也反對農村合作化，反對對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依靠互助組、合作社、代耕隊實行農業集體化，實行農業社會主義化，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幻想的農業社會主義，這是錯誤的。」「不實現工業化，農業就根本不可能實現集體化。」一九五一年七月，他在對山西省委一個報告的批示中咒罵說：「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個文件已經印發給同志們了。

在反對農業合作化的同時，劉少奇大力鼓吹發展富農經濟，昨天伯達同志已經講過，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劉少奇在對東北農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三馬一車一犁的農民，「不是富農，是中農」，應該「大力發展」，「在數年以後應該發展到百分之八十，其中百分之十應是富農」。他胡說：「現在剝削是救人，不准剝削是教條主義。」他反教條主義和赫魯曉夫是一脈相承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在政協會議上所作的土改報告中公然宣稱，保護富農經濟「是一種長期的政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中，都要保護富農經濟」。他所講的發展資本主義，保護富農經濟的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恰恰是毛主席所講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劉少奇這種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路線，完全違背了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所以毛主席同這種反動思想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特別表現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那個講話中。這個講話全面深刻地分析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澈底的批駁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講話是針對劉少奇的，文件沒有印發，我不妨念幾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且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我們的各項工作，應當遵循總路線，為總路線服務。離開了總路線，就犯錯誤。我們必須過渡，把社會主義看作『遙遙無期』是不對的，過渡只能是逐步的，企圖『一步登天』也是不對的。」

有的同志，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我國農業的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



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通過發展農業合作化，逐步建立農業中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限制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在這個基礎上增加農業生產，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才能鞏固和擴大我國的工農聯盟。農業支援工業，促進工業化，工業支援農業，幫助農業合作化。這就是過渡時期工農聯盟的新的經濟基礎。手工業的情況也是這樣。我們必須對個體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集體化，引導手工業勞動者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卻不是這樣看問題，他們有幾種錯誤觀點，是必須批駁的：

第一，有的同志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會秩序，時時刻刻處於發展變動之中，例如，我們的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年年在變，月月在變，天天在變，不斷有新的東西代替舊的東西。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我們現在的革命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澈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第二，有的同志提出，「確保私有財產」。這種提法，當然更是錯誤的。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在不斷前進，農民的個體經濟必然要被集體經濟所代替，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就生產資料方面說，我們不能永遠「確保私有財產」。「確保私有財產」的口號實際上是代表資產階級和富農利益的口號。這個口號，只能束縛我們自己的手腳，束縛廣大群眾的手腳。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看來沒有大的錯誤，但是不明確，也不符合實際情況。「走向」社會主義，就是還沒有走到社會主義，只是在向著社會主義的目標走。我們不能在整個過渡時期老是「走向」社會主義，老是不「走到」社會主義。事實上，我們的國營經濟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會主義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提法，可能使人認為我們現在並不是處於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不能明確認識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責任。所以，這種提法也是不恰當的。

上面所說的是右傾性質的錯誤。

現在把這個文件看一看，就會懂得當時的鬥爭是相當尖銳的，是針鋒相對的。

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僅存在於建國初期，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每一步發展，都存在著這種鬥爭，劉少奇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反動路線，在社會主義前進中的各個時期，都頑強的表現出來。

大家記得，一九五五年，當農村合作化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候，鄧子恢根據劉少奇反對合作化的錯誤思想，大砍農業合作社。全國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為此，毛主席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澈底批判了劉少奇、鄧子恢的錯誤，推動了合作化高潮的發展，並且引導全國人民勝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務。

一九五六年，劉少奇在黨的「八大」的報告中，在有些問題上同蘇共的「二十大」的修正主義思潮相呼應，在相當的程度上，支持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和國際合作的修正主義路線。報告中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說什麼「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

同劉少奇的反動主張相反，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月間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都指出：「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今天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也正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在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的進攻，大肆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大刮翻案風、單幹風。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報告，批駁和糾正了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往後，同志們就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在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提出了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對抗。

在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鄧小平提出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鎮壓革命，實行白色恐怖，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路線相對抗。今天正是兩條路線、兩條道路尖銳鬥爭的時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鬥爭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劉少奇的反動路線在鬥爭中徹底破產。但是，他們並沒有自動的退出舞臺。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利用每一個時機進行反撲。

所有這些，都說明劉少奇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像一條黑線一樣貫穿於各個時期，在每個時期都頑強地表現出來。

#### （四）

劉少奇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他的「理論」根據。一九四九年五月，劉少奇在北京幹部會議上講話中說：「我們國家生產不發達生產落後，今天不是私人資本工廠太多，而是太少。現在不止是私人資本主義可以存在，而且需要發展，需要擴大。」用生產力水準不發達和經濟文化落後，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社會主義道路，這並不是劉少奇的新發明，而是一切老修正主義、新修正主義共同的反動理論。這種理論，人們叫它做「生產力論」。按照這種「理論」，就是說，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沒有充分的高度的發展，生產力沒有達到很高的水準，農村還很分散落後，那麼他就不應該也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應該也不可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發展。按照這種「理論」，社會發展只是生產力，主要是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發展的自然結果，生產力高度發展，新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生產力如果還沒有高度發展，革命階級自覺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鬥爭那是沒有用處的。這種「理論」存在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從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蘇漢諾夫，以及中國的陳獨秀等等，沒有一個不搬出這種「理論」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偉大革命作用，看不到改變生產關係對發展生產力的偉大促進作用。在他們看來，在生產力水準還沒有高度發展的地方，人民是沒有資格，也不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一點，我們查一查修正主義者

們的著作，是到處都可以看到的。舉幾個例子：

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就在他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中提出這樣的思想。一九〇九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中說：「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高度發達的地方，才有藉助於國家政權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公有制的經濟的可能性。」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所寫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一九二七年所寫的《唯物史觀》等書中，都一再重複這種濫調。特別是一九三〇年，考茨基在一本叫做《陷於絕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書中，猖狂地攻擊列寧領導俄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誣衊說，這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是犯了錯誤，使自己「陷於絕境」。他狂妄地說，按照俄國的條件，根本不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俄國發生的革命，只能為充分發展資本主義開闢道路，而且只有在資本主義得到高度發展後，才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蘇漢諾夫以及中國的陳獨秀等等，都是繼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衣鉢，雖然語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樣的。

劉少奇的「理論」，根本不是什麼新東西，像昨天伯達同志所講的，從中國來講，他是同陳獨秀一脈相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國際方面來講，他是同老機會主義、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一脈相傳的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反動理論。

為了反對這種「理論」，列寧曾作過有力的鬥爭。十月革命前後，列寧同這種反社會主義的理論進行了尖銳的論戰，澈底粉碎了這種反動濫調。列寧強調指出，不是什麼俄國沒有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而是恰恰相反，俄國這個帝國主義陣線中最薄弱環節，首先能夠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列寧總是強調革命對發展生產的偉大的作用，強調改變生產關係對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大作用，他反覆闡明俄國有布爾什維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有鞏固的工農聯盟，有蘊藏著無比的革命創造力的廣大工農群眾，在取得政權以後，完全能夠把蘇聯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二三年列寧為批判孟什維克蘇漢諾夫的《革命雜記》，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論俄國革命》，在《列寧全集》第

二十三卷上。這是很短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對於批判劉少奇的反動路線，學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幫助。列寧在這篇文章中，尖銳地批判了蘇漢諾夫之流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不懂革命對發展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列寧說「你們說，『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究竟在哪些書上看到，說普通歷史程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變化呢？」列寧引用了拿破崙的一句名言來激勵革命群眾：「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鬥，然後再見分曉。」

從列寧的文章中，我們就更看到剛才引證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理論，是真正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從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方面，從奪取政權方面，從奪取政權後走什麼道路方面，在這樣一些基本問題上，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兩條路線的鬥爭，最本質的問題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鬥爭。大家還記得，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風的時候，毛主席講過，延安的整風是一種什麼樣的運動呢？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與反無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這種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繼承、保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一條是繼承社會民主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即修正主義、機會主義的路線。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鬥爭在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繼續和發展。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遭到了澈底的破產。

## (五)

鄧小平是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他同樣的一直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毛澤東思想。

(1) 鄧小平惡毒地攻擊毛主席，攻擊毛澤東思想。一九五六年，他在八大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曾經有這樣一個說法：「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個人崇拜是一種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這很明顯是惡毒攻擊和誣衊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是惡毒地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九六一年，他在黑龍江省委彙報會上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同樣把矛頭指向毛主席。他說：「凡是辦不到的，不管原來是那個人說的，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今天顧了，明天顧不住。」很明顯，這是反對毛主席的。同時也是反對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的。

(2) 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鄧小平同劉少奇一樣，他在「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他說：「現在，除了個別邊疆地區以外，我們不但已經澈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而且已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同時，七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所有這些，使得我國的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一九五八年四月，鄧小平在成都會議上講話說：「革命有兩條路線的鬥爭，現在建設也有兩條路線的鬥爭，現在我國還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但主要是兩種方法的鬥爭。……在黨內來說，是速度問題，並非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3) 攻擊三面紅旗，鼓吹單幹，企圖復辟資本主義。一九五九年二月，鄧小平在上海工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誣衊大躍進是「擦粉一尺厚，本來漂亮也就不漂亮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在黑龍江省委彙報會上鄧小平攻擊人民公社「超越了階段」。在三年困難時期，鄧小平同劉少奇一樣，宣揚「三自一包」，鼓吹單幹，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說什麼「前幾年還可以看出優越性，這幾年不行了，不能吹牛了」。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上鼓吹單幹，說什麼「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現在，紅衛兵已經畫出漫畫了，一個白貓，一個黑貓，拉著車子，他在上面坐著。

(4) 反對政治掛帥。鄧小平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馬列主義，否認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特別是去年二月間，他在薄一波召集的工交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政治掛帥的結果，一定要落腳到生產，落腳到科學實驗。」他反對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講的政治掛帥。他要經濟掛帥、業務掛帥。政治掛帥和反對政治掛帥，這不是一般的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同軍事，或者政治同經濟、政治同業務的關係問題，不是一種工作安排或工作比重的問題。這是一個貫徹執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問題。這個問題，從老修正主義一直到劉、鄧是一脈相承的。列寧反托洛茨基的時候，一九二二年寫過《再論工會、目前形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一文，其中有一句有名的話：「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列寧說，政治同經濟比較起來，政治是第一位。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起碼知識。布哈林說，從政治出發也從經濟出發。列寧駁斥說，這是典型的折衷主義。列寧還提出工會工作如果不是政治掛帥，我們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

毛主席在政治掛帥這個問題上，應當說是更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在政治同經濟的關係、政治同軍事的關係、政治同科學的關係、政治同業務的關係、政治同黨的建設、組織工作的關係等一系列的問題上，都明確地闡述這個問題。他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在這個問題上，林副主席是高度地發揮和深刻地闡明瞭毛主席這個思想。

在我們軍隊中。到底是業務掛帥還是政治掛帥，這成為軍隊中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主要問題。因為在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社會中，社會的各個領域都不會是真空的。任何部門、行業、領域，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就必然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掛帥，就必然是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掛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去佔領各種陣地，資本主義思想、修正主義思想就必然去佔領。正因為這樣，要不要政治掛帥就成為能不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對於每個同志來講，就成為能不能永遠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戰士的問題。

所謂政治掛帥，是什麼問題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掛帥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掛帥的問題，是毛澤東思想掛帥還是修正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掛帥的問題。我們講的政治掛帥是毛澤東思想掛帥，馬克思列寧主義掛帥，而他們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的。所以講他們不政治掛帥，是指他們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掛帥，而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從老修正主義一直到劉少奇、鄧小平，都是這樣。

一切修正主義者，在軍事建設方面，都是反對人的因素第一，反對政治第一，都是宣傳唯武器論的。考茨基曾經講過，在現代槍炮技術條件下，人民群眾的武裝起義，根本「沒有成功的希望」。現在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每天在宣傳「唯武器論」，說什麼在核武器的條件下，人的因素已失去作用了，說我們的民兵「等於一堆肉」，說原子武器可以毀滅人類、毀滅世界，而不是人類能夠利用原子科學來為人類服務。羅瑞卿、賀龍等人也就是這種修正主義、唯武器論的代表。他們強調軍事技術，搞大比武，實際上就是反對突出政治。所以這個問題上，我們解放軍，我們黨同羅瑞卿的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修正主義者在經濟工作中，大肆宣揚利潤原則，「利潤刺激論」，「物質刺激論」。蘇聯從城市到鄉村，從工業到農業，天天喊物質刺激，利潤掛帥，這樣就使修正主義氾濫，為資本主義復辟提供了理論基礎。劉少奇、鄧小平也是物質刺激、利潤掛帥的販賣者。劉少奇早在白



區工作時，就實行一套經濟主義。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在工業方面，希望經濟部門的同志，檢查一下劉少奇、鄧小平所散佈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

我們在反對劉、鄧路線中，必須強調毛澤東思想掛帥。我們的支左工作，首先是支政治、支毛澤東思想，支左、支工、支農，一切工作應當以毛澤東思想掛帥，去反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且時刻警惕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撲。從內蒙古的工作中看到，軍隊的個別同志有一種誤解。革命群眾最近提出要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這是指的什麼呢？這是指劉、鄧路線和堅持劉、鄧路線的人在一月二月的反撲。但這個問題軍隊有些同志不瞭解，以為這是攻擊軍隊，這完全是弄錯了。我們的軍隊是毛主席締造的軍隊，是毛澤東思想掛帥的軍隊，是林副主席直接領導的軍隊。我們的軍隊應當同革命群眾以及革命幹部一起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澈底粉碎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我們支左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真支左假支左最重要的標準，是真奪權假奪權最重要的標準，是真擁護毛主席假擁護毛主席最重要的標準。因此這個問題，希望同志們很好的注意。希望同志們很好理解，為什麼一月二十三號的支左五條中，最後著重講一條，就是在全軍不是一般地而是深入地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離開這個問題，我們就無所謂支左，離開這個問題，就一定要犯大錯誤。這一點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都是講過的。我們在這一個時期取得了偉大成績。有些地方犯了錯誤，但這不是主流。有些好同志還沒有完全把毛主席這個思想掌握好，犯了錯誤，經過批評教育，是容易改正的。至於像趙永夫那種人，也會在運動中暴露出來。毛主席再三講過，我們解放軍不能因為在個別問題、個別的時間、個別的地方，犯了一些錯誤，就灰溜溜的。我們應當執行林副主席上次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堅決地、勇敢地、有充分信心地去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偉大任務。毛主席黨中央，全黨相信解放軍是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我們相信解放軍的領導同志已經有，而且將來更會有這種信

心，去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改正個別地方的錯誤，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sup>30</sup>

## 中央首長第六次接見內蒙四方面代表談話紀要 (1967.4.13.)

【時間：四月十三日廿三點卅分至十四日二點廿五分。地點：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接見人：總理、伯達、康生、肖華、王力、李天佑等中央首長。】

總理：

同志們，現在開會。本來昨天說了，不增加人了，今天既然來了就讓他們進來聽一聽。兩個多月了，我們已經都分別徵求了意見，問題已經清楚了，不再發言了。根據佔有的材料，我們得出來的決議，現在宣佈。會後再由中央公佈，不宜拖得太晚。我先講一講，講完了以後再由伯達同志、康生同志、肖華同志補充。

兩個月來，研究解決內蒙問題，我們掌握的材料都研究過了，分別和同志們多次接談，我們現在認為有這樣幾點：第一個問題：內蒙軍區的個別領導人，不是所有的人，二月五日以來在支援左派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從一月下旬報社問題後，本來有很多很好的機會，可以解決得很好，報社問題可以承認錯誤。劉昌開始先承認錯誤，可是回去一商量就變了。以後群眾要求見劉昌，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不見，問題就大了。後來革命造反派還是退了，可是事情並沒有解決，群眾還

<sup>30</sup>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資料室，《康生言論選編》，1979年3月，第36—49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有要求，還有很多，很好的機會，同他們見一下，事情是可以很好解決的，根據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介入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和造反派結合。要支左嘛，對了就結合，錯了就改麼！這還不是決定性質的時候，弄清了情況再支援。

到了二月五日，人們說的「二·五」事件發生了，性質就變了。「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學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醫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請願也好，靜坐也好、會見也好，無非還是要求軍區首長接見，支持他們。他們相信軍區不會對他們怎麼樣的嘛。一月廿八日，雖然軍委有了不讓衝擊軍事機關的八條命令，但靜坐是在門口嘛，不外乎是等待。內蒙的造反派和外地的造反派多次行動的精神，包含一部分河西公司「八一八」的，有吧？（答：有）都還是相信軍區會支持他們的，軍委指示下來了嘛！說明廣大群眾相信軍區。可是軍區不能控制自己，犯了方向錯誤。軍區認為他們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調和了。打了兩發子彈，命中一發。韓桐同志他還不以為軍區會開槍嘛，這完全出乎革命群眾的意料之外。

二月五日以來，還不承認錯誤，繼續犯下去，還說是反革命組織，是反革命活動。軍區內部造反派也受壓迫，所以二月五日以來，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嚴重打擊了呼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大批逮捕了革命群眾。到現在我手裡還收到材料，成百的人沒有放。除四川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中央決定以後就改了。內蒙拖了兩個月。軍區支持了內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等人以及他們操縱的保守組織。

要集中力量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國要批判，內蒙當然是烏蘭夫和他的一夥人，烏蘭夫很早被拉下馬來了，離開內蒙古，撤了第一書記，軍區司令員，政委的職務，名義上留了內蒙古自治區的主席，留在北京反省。把他拉下來，不是問題就解決了。他下面有黨羽，有他的代理人，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還在支持他。以王逸倫，王鐸為首，確確實實

就是他的代理人。在軍區二月五日事件發生以來，他們很活躍。二月七日王逸倫就出來了，到軍區和各處活動，本來生病嘛！不僅在內蒙，就是到北京來也是這樣，還在繼續指揮內蒙古。尤其王鐸更加活躍，王鐸的老婆在內蒙人委工作的嘍（權星桓：內蒙人事局局長），不斷打電話，還到北京勸降。

軍區不是支持了左派，而是支持了烏蘭夫的代理人，支持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支持也支持錯了。跟革命造反派對立，被王逸倫、王鐸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利用，這是必然的。他們原支援的保守組織，本來可以教育，一支援他們，就被利用了，就發展了，跟上來了，問題大了。比如說：「工農兵革命委員會」是跨行業的組織，在北京會談時變成了「無產階級聯合總指揮部」有工人、農民、機關、鐵路、學校、實際上還是個跨行業的組織。等一下我下面還要說。為什麼這樣變化，總有人在後面指揮，所以指出：內蒙古軍區內個別領導人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他們在北京的六名黨委委員也承認這一點。

內蒙軍區黨委某些領導同志，不經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把吳濤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烏蘭夫下去後，吳濤不僅是第一副政委，他還是軍區黨委書記，他還是第一負責人。你們說是群眾把他打成的，軍區黨委沒寫成決議，實際上是軍區黨委決定的。你們支持一部分人，名義上叫造反派，實際不能叫造反派。因為吳濤同志和軍區的認識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吳濤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動受到限制，電話撤銷了，不能辦公了，不能行使職權，軍區沒有正式報告中央軍委。青海司令員兼政委支援左派被免，形式上做了報告，內蒙軍區還不如他們。你們看了青海的文件沒有？（答：沒有！）看了安徽的文件沒有？（答：沒有）聯絡員，把青海文件找幾份今晚回去讀一讀。青海劉賢權也是司令員兼第一書記，把職撤了，他們還承擔錯誤，可是內蒙軍區，還不承認，說是群眾打成的，是三反分子，沒有撤職。

軍區黨委還完全能夠控制局勢，三十多人被軍區黨委捕了，說是群眾組織搞的，事實上是軍區領導人搞的。直到現在不僅在內蒙，還到外省，到北京、南京捕人。軍區黨委的權力不僅在內蒙，還能到外省，有

的同志問他們的手怎麼伸得那麼長，怪不得群眾說有後臺，肖主任，這要有規定。不然軍區濫用有危險。解放軍是光榮偉大的，應該珍惜偉大的榮譽。遵守黨和國家的紀律。軍區黨委是錯誤的，是嚴重無組織無紀律，不能把責任推到群眾身上，這筆帳要算在軍區某些同志的身上，要由軍區黨委負責。不僅如此，另一方面同樣性質的錯誤，還擅自逮捕已經站在革命群眾方面的自治區黨委書記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等同志，並宣佈他們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是中央批准的自治區黨委書記嘛！在組織上、在工作上某些方面，軍區還得受自治區黨委的領導，處理區黨委這是中央的權利，軍區既不向中央報告，也不經中央批准。怎麼能宣佈是三反分子，還逮捕他們。因為他們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保守派組織就趕他們、捉他們、打他們，他們只有找造反派。

這兩件事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軍區在京的六位同志也承認這一點。

至於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過的錯誤，應當接受群眾批評，在鬥爭中改正。他們也承認犯過錯誤，他們推行了劉鄧路線。但逐步認識，逐步改正，站到革命路線上來。我一接觸他們，看到他們的報告，感到他們的態度是誠懇的。他們也向軍區表過態，說明他們自己過去犯了錯誤，希望軍區犯這個錯誤時間要短一些，勸軍區改變態度，這種態度是誠懇的。可是軍區聽不進去，重複錯誤，時間更長，還不認識。儘管如此，到了北京還不認識。他們已經和造反派接近了，但不等於錯誤都改正了。應該接受群眾的批評。即使是保守派，如果不是惡意的、是善意的，也應該接受，在鬥爭中改正。在這次鬥爭中他們已經有所表現。應該要求區黨委領導同志繼續有所表現。今後也一定會有所表現。

內蒙軍區有些負責人，在中央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兩個月來仍繼續採用兩面態度進行對抗中央的活動。李天佑來了？忘了找曾山來。（前面坐）二月八日韓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內蒙調查韓桐犧牲問題，已經查出來，是×區打的，彈頭也拿出來了，口徑與軍區子彈相同。人證物證都在了嘛。兩方組織去調查了兩天，檢查時對四方都說清

楚了。回來後，把幫助化驗的女醫生馬上逮捕起來，他們說是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不好，哪位女同志來了嗎？（田光同志站起來）你身體好些嗎？（答：好些！）押了多少天？（答：卅天）看！化驗一下就押了卅天，這是內務部長叫她幹的，你們就拘留審問。不是因為家庭關係不好，社會關係不好，就是讓她說韓桐的死是學生打的，不是×區打的。這不是對抗中央嗎？（問田光）是不是這樣？（田光答：是這樣的）就是這樣子，面對中央、中央文革，就是這樣，完全是搞兩面派。這件事最突出了，逮捕的人還不放，到今天才放出來（出來了吧），這就沒法解釋了。你看，這不是兩面派？對這件事我們是很不滿意的。拖了兩個來月，遠的地方扣人不講，呼和呢？不能解釋嘍。鐵路局還沒放人嘛！直到今天我們部隊人去才放出來，我們實行管制才行。這不是兩面態度？我們對這個問題很不滿意。我們解決各省問題，從來沒遇到這麼為難，用這麼長時間。

無怪群眾反映，證實了你們說的「重慶談判」。重慶談判是我們同國民黨談判，你們是什麼，我們是什麼？你們認為是重慶談判，以為只要奪了實權中央就承認，那才不會呢！中央怎麼能這樣，只有國民黨才能那樣呢！你們把中央看成什麼！把你們置於何地！我們是無產階級政黨，黨領導槍桿子出政權。黨的最高指示是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黨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軍區談三司組織成分不純。造反派組織擴大了是有不純，純也不是絕對的。

軍區內部也不純，要認識軍區是多方面組成的。十七年了，內蒙二十年是一塊一塊解放的，東部是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的，最早嘛，二十一年半，我們吸收了許多舊的方面來的舊的立場，舊的思想，舊的作風，舊的習慣，這些都在軍隊領導人中生長出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海拉爾就吸收了很多舊的東西嘛！都影響你們，才說出這樣的話。

內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軍區的某些領導人負責。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沒有壞人煽風點火，不會把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開始是王逸倫，後來是王鐸，王鐸到北京還鬧，王逸倫有些被

中央看穿了。王逸倫、王鐸要負主要責任。其次是軍區某些領導人，在內部不完全點名，因為文件發表會到處傳，我們要維護解放軍整體的光榮，不都寫出去好。我相信革命群眾會理解的，我想這會得到革命群眾的支持，這是第一部分問題。

王逸倫是個壞人，我們和王逸倫談過話，康生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識破了他。下面請康生同志談談。

**康生：**

王逸倫是個壞人。軍區某些負責同志認為他是革命左派。同時王逸倫也欺騙了一些群眾和一些群眾組織。同志們會想到，哪些群眾組織被王逸倫所支援的，哪些組織的哪一些人支援王逸倫，要認識到是受了王逸倫這個壞東西的騙了。

軍區一些群眾組織，一些幹部，你們要認識到受了騙了。你們把壞東西認為是革命的，軍區支左，實際上支右，支持了壞人的。絕大多數被他支援和蒙蔽的群眾是沒有責任的。

這次宣佈他是壞蛋大家應該覺悟起來，同他劃清界限，澈底揭露他，把這個壞人揭出來。

我過去不認識王逸倫，一次在接見自治區黨委會上，我見過他。一看，我見他根本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也不是一個普通人。他的一些表現，做法，神態，言行，我總覺得他像個特務。我問他：你到底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呢？他吞吞吐吐講不清楚。我們這些人見共產黨人多，接觸國民黨人也不少（總理：味道不對！）我問他：在哪入黨？他吞吞吐吐的講，日本占了赤峰，他不當小學教員，到北京就入了黨。問他：「什麼組織？」他說是特委會。內蒙有個特別委員會，那是工作組織，也不是黨的組織。問他：你怎麼入黨的？介紹人是誰？他說叫李鐵然、劉剛。李死了，劉在哪他不曉得。他入黨又沒有候補期，很奇怪。入黨以後很快就到上海一個中央局訓練班訓練。為什麼沒有候補期？為什麼一入黨就要訓練？入黨的問題弄不清楚。這裡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入黨這個時候，正是國民黨有一個中統局（中央統計調查局），國民黨

特務機構在北京負責人李鐵鐘，前兩字和他介紹人的名字一樣。此人是他的外甥，是他培養入黨的，是一個叛徒，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北京的負責人。王逸倫是敵人，混進我們這裡來，得審查，是歷來懷疑的。

第二個問題，他去臨河縣委作工作，曾經跑到北京來，那時北京機關被破壞了。他在這個機關住了幾天沒被逮捕，別人都被捕了，唯獨他沒有被捕，我們花費了時間瞭解。這是第二點。

第三、以後他自己與另外兩個人一道從內蒙經外蒙跑到蘇聯莫斯科。我沒見過他，很奇怪。我問他：你到蘇聯幹什麼？他說跑到蘇聯去學習了。我問他在那裡學習，他說在東方大學學習，更奇怪了。那時，我正在東方大學，當時有個制度，去蘇聯學習的，必須經過我審查。我不認識他，他說見過我，我們根本沒承認他是中國共產黨員，我看了他的履歷表，根本不是在東方大學，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研究院。我不曉得這個組織。我問他是不是在蘇聯特務機關工作，否則，怎麼能不知道呢？非黨員去了，如果沒正式關係也是不可能的。

1938年他從蘇聯經新疆到延安，我問他，誰把你派回來的？他也說不清。在延安，組織審查過他，認為這人歷史不明，黨籍不清。他自己也要求做一些教育工作，接受審查，可能是在延安女大當教員（楊鴻文：我在延安女大，1939年沒見過他），有可能沒工作。

1939年組織部派他到敵後冀南，介紹說：「是個黨員，問題沒鬧清楚，」這是1939年，1940年4月15日中央答覆北方局：「此人過去歷史不清，同時，還隱瞞過材料，還沒辦法考查，孔原說他很有問題。」他說孔原瞭解他，這是孔原的意見。他自己要求做些群眾工作，以待審查。他說，加入黨是綏遠的一個組織。

再一條，1934年河北組織大破壞，他跑到被破壞的機關住了幾天未逮捕，很懷疑。組織部給北方局說：「劉桐」（王逸倫化名）有幾點：第一點，黨籍不明；第二點，1934年1月間組織破壞可能被捕，沒被捕；第三點，雖正式黨員，但不宜做機要工作，可在堅強領導下，做一些文化教育工作。（大家笑）。

據他自己講，1932年冬從上海回北京，還找過這特務的外甥。據他



講，此人在臺灣。他怎麼到了熱河？當時想打通同東北民主聯軍的關係，找在社會上與熱河有關係的人，建立交通聯絡，北京市委黑幫劉仁在晉察冀，知道他家在熱河住，從冀南把他調到熱河，建立聯絡點，並不是叫他作黨務工作。他到那裡就組織了私塾房，做了私塾先生。後來又做了敵偽興農創作社的董管事。現在你們有一位同志，叫趙子良，是內蒙古商管局辦公室主任，寫了一個材料講：王逸倫自稱家庭是富農，實際上是地主。從冀南來赤峰搞交通，實際變節了。在他家鄉的敵偽興農合作社當起職員來了。王逸倫吹他所謂的光榮歷史，甚至在××文章上寫過，赤峰解放是王逸倫配合蘇軍進城的，說他是「土八路」，引以為榮。當時，我在赤峰，我是他這段歷史的見證人。赤峰1945年8月9日蘇軍經過激烈戰鬥進城的，8月16日王逸倫才進赤峰，怎能談他配合蘇軍進城？說他是「土八路」，根本沒有的事，而是土匪頭子。因為他會說點俄國話，和蘇軍搭上關係，在地富支持下，搞了二、三百土匪，成為省團，還有偽旗討伐隊姓包的，他自稱司令，老百姓叫他是土匪頭子。後來與八路軍接了頭，談他是地下工作的，蒙蔽了熱北第一書記兼司令。他的大部叛變為還鄉隊。這就是王逸倫的光榮歷史（大家都笑了）！後來在烏蘭夫下當了副主席，自治區黨委書記。

1964年，進高級黨校，在高級黨校不學習，每天晚上找地方跳舞，在跳舞中與女特務孫秀文睡覺去了。你們這個傳單不是有照片嗎？（拿出黨委《井縱》揭露王逸倫的傳單）（總理：還有裸體的照片！（康老拿出孫秀文的裸體照片讓大家看，笑著說）太難看了，不能看！可是王逸倫還覺得很好看呢（大家都笑了）！

孫秀文綽號叫「洋野妓」，經常到保加利亞、印度大使館睡覺。王逸倫對其父，敵偽人員，國大代表稱兄道弟，王逸倫同這個女特務鬼混，職工對此事很氣憤，對他們注意了。一天晚上搞鬼，把他捉住了，他說他是天津運輸公司會計，胡扯！掛電話問，沒有。又扯，又沒有。人家要把他送到公安局，他才說他在高級黨校學習，是內蒙古自治區的書記，副主席。高級黨校半夜三更才接回去了。這件事林楓、賈震沒有嚴肅處理，就把此問題轉到烏蘭夫那裡。烏蘭夫怎麼處理的？（王永

和：根本沒處理，照片是從烏蘭夫家裡抄出來的）這個人一不是共產黨員，二不是革命的，更不是軍區談的革命左派。受他蒙蔽的群眾快覺醒。總理講的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顛倒黑白，把他當成好同志。

總理：

王逸倫是代表一種人。四月五日有個傳單解剖了一下，現在，康老解剖的更清楚了。

二、中央決定由原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同志調內蒙軍區任司令員，劉賢權同志是被趙永夫罷了官的。這個同志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給中央寫了信，很有立場，很有見解。當時，他就支持青海的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趙永夫已經查明，是反革命分子。把劉賢權同志調內蒙，青海還有另外同志擔任。吳濤同志任政治委員。在華北局揭發烏蘭夫時，首先是高錦明同志，吳濤在會上的立場很好。王鐸很壞，和烏一起哭哭啼啼，當時在會上劃分兩方面嘛，以劉賢權、吳濤二同志為首改組內蒙軍區黨委，並對軍區發生的問題進行處理。不要講得太具體了，革命派會理解的，寫在文件上就要出去，內蒙發生問題蘇修、蒙修很快就知道了。在烏蘭夫領導下的一小撮，還沒有清理嘛，不僅是軍區方面。但畢竟是一小撮，不要擴大，也要事實求是。對軍區說的含蓄一些，軍隊還有高度集中，還有總政、總參、軍委嘛。

劉賢權同志來之前，北京軍區調一個副司令員代理一段工作。騰海清同志來了沒有？請他來嘛，同大家見見面。

第三個問題，成立以劉賢權、吳濤二同志為首的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這樣更會促進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革命組織的負責人可以參加籌備小組，革命派有資格。必須左派佔優勢。也不要忘記保守派改變立場態度，保守派經過開門整風，改變立場，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基層有代表性的，也可以吸收個別的人參加，這有好處。他承認錯誤檢討的好，也可以嘛！不要有對立情緒，特別是三司、「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組織要考慮這個問題，今後情況變化了嘛。當然這僅僅是開始。要作個良好的開端。

自治區黨委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等同志，經過革命群眾同意也可以參加籌備小組。他們犯過路線錯誤，經過檢討、鬥爭，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嘛。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籌備，建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領導內蒙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負責處理善後問題，並組織「抓革命，促生產」的班子，把工農業生產和財貿工作管起來。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組織，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釋放，包括軍隊內被打擊的幹部和戰士，包括地方和軍隊，包括各地區、各分區，統統按這個處理（鼓掌，熱烈歡呼：毛主席萬歲！）對殺死韓桐的兇手，要依法處理。二月五日出現，二月六日發出電報就要追查兇手，到現在已七十天才解決。槍殺韓桐的就是×區柳青，內蒙軍區一直不承認，有的人還想替他辯護，而且造謠說是學生自己打死的。吳濤，你打個電話要嚴加管制起來！（侯鳳英：軍區還給他送酒送肉，還過禮拜六。）（吳濤：已經戴上手銬了。）不准跑掉！跑掉你要負責任嘍。這個在文字上就不要寫了，你們知道，群眾知道就行了。上次的電報你們登了小報，犯了錯誤。但是你們態度很好。提醒你們造反派注意，千萬不要再加注解登出去了。對韓桐同志可以悼念，開個追悼會，但不要把這件事過分擴大。悼念韓桐同志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三結合」搞得更好，這就是更好的紀念他。主席有兩句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韓桐犧牲的有代價，內蒙古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了，奪權了嘛！新生了！他也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第五、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問題要在內蒙公開揭露，從各個方面揭深揭透。去年華北局會議就把他揭出來了，拉下馬了，撤了第一書記。司令員兼政委，就剩下名義主席了。從策略出發，主要是考慮蒙修、蘇修問題，沒登報公開揭露。鬥爭是逐步深入的，現在公開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現在天安門也有大字報了，去年我還勸，現在我就不勸了。

烏蘭夫的問題，要在內蒙公開揭露，但不登報，從政策各方面考慮。（郝廣德：我們要求把烏蘭夫揪回去鬥！）先不要把人揪回去，以

後再說嘛！你們的鬥爭對象很多嘛！

王逸倫實行隔離反省，實際上今晚已逮捕了（掌聲，熱烈鼓掌聲）。

王鐸停職檢查，交給群眾鬥爭批判（熱烈鼓掌聲）。你們負責帶回去，保證按政策辦事。

康老：王鐸還要向王逸倫學習哩！（大笑）

郝廣德：我們紅衛兵帶回去，保證安全。

總理：

第六個問題：說明革命組織恢復和發展，籌備小組、軍區支左等單位注意，如軍管地區「八一八」等地按軍管原則辦事，「八一八」還是要存在。各基層組織上面也可以有個總的機構，不要搞跨行業組織。幫助他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很重要的，最高指示嘛。現在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要恢復發展，自己要有個整頓，不要一恢復就猛烈發展。否則內部就變成左中右。把根基搞好慢慢發展，既或少點，但鬥爭精神旺盛，真正推進造反精神。大聯合以革命左派為基礎。保守派的人改正了錯誤，也可以吸收一、兩個有代表性的參加，保持左派占大多數，要保持左派組織的優勢。引導他們把鬥爭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保守組織的群眾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擊報復。一方面要批判劉鄧反動路線極少數幾個人，內蒙是烏蘭夫，現又加上王逸倫、王鐸了嘛！不准把矛頭指向群眾，對保守組織進行教育，有領導的幫助他們整風，不要包圍某一個組織，要教育，要說服，要批判劉鄧反動路線，在內蒙是批判烏蘭夫及其王逸倫、王鐸等一小撮。「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無產者聯合總部」這樣跨行業的上層組織應當解散。我說的是上層，這是蓋子，不是指基層。這個跨行業組織就是革命委員會了。承認無產者聯合總部就代替了革命委員會。安徽的這樣左派組織甚至也勸散了。

你們這個組織本身就是王逸倫、王鐸利用的，受了蒙蔽，發展猛烈，方向錯了，路子錯了。要改變立場，改過來。底下的組織不要取締，有條件的要回去參加造反組織，回去的要歡迎，要讓他們分化。一

時轉不過來的，就先在原組織裡。

（郝廣德：反對中央文革的怎麼辦？）

反對中央文革的，也是個別人麼！只抓幾個頭子。上層組織的頭子解散，回到生產崗位上去，有條件解散，有條件參加群眾組織的人應回到本單位參加，不要他不行。反動的另外法辦。由籌備小組負責考慮，不要打擊。一律不許武鬥，不許打、砸、搶、抄、抓。你們也有些缺點，不要增加錯誤，要減少，不要因為他們很殘暴的打了你們，他們把我們的同志打的「脫白」，這是野蠻殘暴的辦法，不要報復。否則，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氣魄，把最後頑抗的孤立起來。「十六條」說：「右派最後處理」嘛。有聯動思想，有行動，有責任送公安機關。你們不要用武鬥報復。侯鳳英來了嗎？（侯站起），你維護解放軍的榮譽，江青同志很讚揚你，大家應該向侯鳳英同志學習（侯：感謝黨中央、感謝毛主席）。江青同志開會太晚，沒有來（伯達帶頭鼓掌）。個人「私」字一點不要，這就是破「私」立「公」的行動。不要打、不要砸，他們自己宣佈解散就更好了，考驗他們，不應該占的材料，叫他們交出來。王鐸、王逸倫的兒子也得按政策辦事。

第七、結合給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革命幹部平反，釋放被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進行擁軍愛民的活動，加強軍民團結，嚴防壞人挑撥破壞軍民關係。

劉賢權司令員去以前，派北京騰海清副司令員去內蒙軍區做部隊內部工作。青海完全是反革命分子趙永夫搞的，逮捕了很大數目，比你們多。戰士受蒙蔽，是壞分子幹的事。××師不敢出來，怕群眾，「八一八」學生給群眾做工作。不是解放軍錯，而是有反革命壞人。北京三司也派了一些人去。解放軍後來出去仍然受歡迎。我們應該學習青海「八一八」造反精神，希望你們這樣做，做好。你們死人一個，打傷被捕比他們少，青海200萬人，你們1,300萬人，你們是邊境，地大，全國第二，140萬平方公里，青海也一百萬左右，你們這一點掌握好，你們是不是真正革命造反派，這也是考驗。要按產業，按系統組織，學生歸學生，工人歸工人，農民歸農民。學生要開紅代會，總不要搞蓋子。三司

做對了，不要都是三司，不要三司代替革命委員會。每一步都按政策辦事。草案下達以後的許多政策文件，好好學習，你們有沒有這個信心啊？（造反派眾：有！，解放軍還是功大過小，不要軍區犯錯誤，就抓住不放，曾解放內蒙古麼！解放軍的人員還在那裡麼！應該把軍民關係搞好，嚴防壞人挑撥。如王鐸、王逸倫，還有沒揭出的一小撮。

眾：我們信任解放軍！

康生：口頭回答是一回事，還要看實際行動！

郝廣德：我們接受考驗。

總理：軍隊內部也要團結了。不要以為你們對了，回去打鬧。要求軍隊一視同仁，不能歧視。甚至吳濤都有這錯誤，好的信任，不好的，有問題的靠邊站，這不對啊！

吳濤：不是我說的。

總理：記在你的帳上了，把這事說穿了好！要在新的基礎上考驗大家。要向廣大群眾宣傳毛主席關於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大多數的指示。這是毛主席多次向我們說的。由四大、五大（大串連）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奪權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搞經濟主義，搞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一一被擊敗了。更加相信毛主席這個指示。正因為我們這樣做。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有群眾我們才能進行史無前例的、從下而上的新階段的偉大奪權鬥爭。在「三結合」中尤其要這樣，解放軍保衛運動。北京經驗，毛主席接見1,200萬人，工人、農民、市民都參加接待了。前後不過四個月的時間，如果沒有可信的廣大群眾，沒有解放軍保衛，秩序不能這樣好，同時也相信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劉鄧路線就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整廣大群眾。經過一些曲折反覆，我們應該反其道。我們要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大多數。

要通過實踐，回去要考驗，來的時間長，比青海來的人多。回去都要好好傳達嘛！要派人出去宣傳。

第八、要深入廣泛宣傳中央關於青海問題決定的原則。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批語，中央軍委「十條」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軍委的八條命令（一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附注五點）。

針對當時傾向後補充的。主席指示。今年介入，當然早已介入。要支左。支右當然不對，錯了，改正嘛。當然發展到這麼嚴重就不好了。後來二月加了五點。

現在，支左、支農、支工發生了一些偏差，後來發「十條」，八條和十條結合在一起學習，防止另外新的傾向，不要把軍隊搞得灰溜溜的。

中央這些文件中規定的原則要堅決貫徹執行。當然不能把所有問題都說了，比如跨行業組織問題，還有不只王逸倫、王鐸嘛！你們回去還有事做的。奪權要一個部門一個部門的解決。

鐵路不是已經進行軍事接管了，報社當然不能現在這樣繼續下去。

王力：被趕出來的造反派同志要回去。

總理：趕出來的先回去，外單位的也回去。郵電局那種方法就不允許了！不能帶武器看管勞動，不能偷聽。每個問題不能都靠我。你們用點腦筋嘛！原則回答就這些。請伯達同志講幾句。

伯達：

經過很長時間討論，總理宣佈了中央討論的方案。這個方案在座的同志歡迎了，個別的不歡迎。（革命造反派熱烈鼓掌）只有毛主席領導的、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只有無限信任人民群眾，對人民群眾充滿信任的中國共產黨，才能做出這樣的決定。

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偉大勝利！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大勝利！是人民群眾的一個大勝利！是黨的正確領導的大勝利！是整個人民解放軍的大勝利！

關於人民解放軍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剛才總理談的很多，說的很好。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告訴我們：「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我們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要看到這個問題，懂得這個問題，要看到整個人民解放軍的保

護作用。沒有人民解放軍的保護，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不可能搞起來的。所以要看到主流。要看到人民解放軍的主要成就。

有的壞人混到我們的隊伍裡邊來。這些壞人終究是要被揭露的。像剛才周總理和康老所講的，王逸倫，槍殺韓桐的兇手，這就是壞人，混進我們的隊伍裡來幹壞事！當然，也有一些好人做了壞事。另外因為不瞭解情況，把事情看錯了，對好人做了壞事就改，改了就算了！他們要把錯誤引為教訓。這樣，我們的事情就做得要好些。

要重複一下周總理剛才說的。

你們回去不要公開把鬥爭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有意見可以提出來。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嘛！人民是有權利向他們提意見的，要通過適當的途徑提意見，不要公開在街上貼大字報。對人民解放軍有損害的事都不要做，因為損害人民解放軍的榮譽，是敵人喜歡的，毛主席不是告訴我們嘛，敵人所喜歡的，我們就不要做，我們對敵人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做敵人喜歡的事。剛才總理講：要開展擁軍愛民運動，軍民團結。毛主席告訴我們，解放軍最根本的是軍民團結，官兵團結。軍民團結非常重要，這個團結，就像平常講的魚水關係。魚沒有水不能活的，人民解放軍不能離開人民，人民解放軍是生活在群眾中的。

另外一方面，群眾也要懂得，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有幾百萬，正像毛主席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現在又出現了這樣一些情況，有的是壞人做了壞事，有的是好人做了壞事，發生了這樣一些情況，所以我們必須要懂得思考，懂得動腦子。對待人民解放軍的問題，採取比較慎重的態度。

你們現在是勝利者了！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勝利！說這樣一條有好處。對個人要戒驕戒躁，謙虛謹慎，不要損害人民解放軍同人民群眾的關係，要保護這個關係，像保護眼珠一樣。（熱烈鼓掌）

總理：下面請肖華同志講話。

肖華：

我完全擁護中央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擁護總理和伯達同志的指示！



兩個月來的座談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內蒙軍區從一月份介入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個別領導人沒按毛主席指示辦事，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支援保守派，打擊革命派，對軍區內部持不同意見的革命同志，實行壓制、打擊，使內蒙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到排斥。一些同志精神上，肉體上受到嚴重摧殘。我們聽了很難過。如果再不改正，後果是嚴重的。

正如周總理傳達說的，有壞人做壞事，有好人犯錯誤。壞人做壞事有王逸倫、柳青。王逸倫是埋在內蒙的一顆定時炸彈。柳青是第一個向革命群眾開槍的，是壞人，性質十分嚴重，影響很壞。要嚴肅處理。

另一方面，好人犯錯誤，其原因是站錯了立場，沒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屁股坐在哪一邊？矛頭指向誰？是根本問題。是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站在群眾一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革命派的對立面一邊？是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烏蘭夫、王逸倫等人？還是把矛頭指向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立場站錯了，就全盤錯了！還有認識糊塗，不做調查研究，受了欺騙上了當，要好好接受教訓。按毛主席教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犯了錯誤就改。內蒙軍區某些領導人，在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屢次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不但不改，還採取兩面手法，支援保守組織奪權。抓人問題，總理幾次指出，未放，直到昨天夜，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特別說明一點，林彪同志和軍委從來未支持內蒙軍區的做法，他們許多事都未請示報告。

中央做了決定，內蒙軍區要堅決執行，不折不扣。連同青海等地區的命令、文件，在軍區內傳達學習。立即把立場站正過來。公開進行自我批評，堅決站到革命群眾一邊來。只有你們緊緊轉過來，才能有效的說服廣大革命幹部、戰士。

問題不在下面，在於領導。廣大革命戰士是最聽毛主席的話的。只要你們領導幹部態度鮮明，立場堅定，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傳達給他們，把一小撮壞人的欺騙戳穿！是會很快扭轉的。事實上軍區有許多幹部、戰士、家屬、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同意某些領導人的做法。反而採取壓制打擊的辦法，也是錯誤的。現在開始有所覺悟，特

別是中央決定，負責同志的指示，為你們改正錯誤創造了有利條件，我們相信，你們立場錯了，很快能改正過來。某些同志雖有錯誤，你們是老同志，犯了一些錯誤，迅速改變過來的！很快改過。千萬不要錯上加錯，使矛盾轉化。

剛才總理說過：毛主席說第一相信和依靠群眾；第二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第三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毛主席所賦予我們的職責，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非常艱巨，非常光榮。

支持左派，首先是思想上的支援。首先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學的好不好，不只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在這方面應該平心靜氣，誠心誠意向小將們學習。他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表現在始終堅持了大方向。

同志們，戰友們！特別是三司的同志們！你們對解放軍的批評、鬥爭，是對解放軍的愛護，如果沒有你們的鬥爭，他們的錯誤就會越大，造成後果越大。今後，你們還應該採取適當的方式對部隊同志提出批評，更好地互相幫助。

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澈底的為人民的利益戰鬥的，要接受人民的監督，由於歷史原因，內蒙地區的階級鬥爭十分複雜，又處於防修前線，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相信革命的左派，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團結起來，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一定能澈底批判劉鄧路線，澈底地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倒、鬥臭、鬥垮。打退大反撲，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軍民團結一致，把內蒙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熱烈鼓掌）

總理：

需要說明兩點：

需要軍事接管的要很好準備，河西公司也要調整。軍區的同志不能回去，還要商量。三司的同志們也可晚走一天，你們多待一天，不要過於急，已經七十多天了嘛！

明天念幾個文件，如青海問題的決定等，軍委八條，五點補充，「十條」命令等，還要做一些工作。

在北京接洽一下好，包括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同志，走馬上任麼！

另外一件事。財貿辦公室林蔚然來了沒有？（林站起來）向你說清楚，你不是代表，叫你來是要核對王逸倫的問題的。你跟王逸倫多年麼！因為我們情況都掌握了，就沒向你瞭解，你也知道自己的地位。

郝廣德：他（指林）是王逸倫的腦袋。

林蔚然：我好好檢查錯誤。

總理：大家也瞭解他（指林），講清楚，不然也說是作代表的。現在宣佈散會。

（革命造反派高呼口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周總理也領著喊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造反派熱烈鼓掌歡送總理和其他首長，中央首長招手致意。）<sup>31</sup>

## 康生、江青在接見四川赴京代表時的講話紀要 （1967.4.17.）

【到會首長：康生、江青、王力、關鋒、肖華、楊成武、葉群、姚文元

<sup>31</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等。參加會者：四川廿個市、縣中央點名請的被打成「反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告狀代表和鎮壓革命群眾的市、縣的黨、政、軍負責人及首都大專院校的部分人員。】

康生：現在開會了，中央事情很多，時間緊張，各地來的人也很多。前幾天解決了內蒙問題……四川的問題要用一定的時間來解決，我們中央工作也要用一些時間。由於工作忙，我們有好幾天沒有見面了，今天會議只能開到六點半，下面我們還有會議要去參加。發言的不要重複，以前講的現在不用講了，下面準備發言，誰發言？

自貢市的一個同志舉手「我發言」！……（略）

成都代表發言（1）……（略）發言（2）……（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來了沒有？（成都市委副書記）答：來了！康生插話，你今天能發言吧？不能發言休息兩天再發言！江青接著說：你身體怎麼樣？什麼時候到的，住在哪裡？（看樣子身體遭到嚴重摧殘）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頭按住大腦袋）今天不講也行……」

江青：你今天不能講下次講嗎！你可以中途退場。肖華同志：請你安排醫院，趕快讓他住院去，找個好點的醫院……。

成都軍區造反派×××發言和成都軍區××歌舞團發言……（略）

康生：萬縣專區來的14歲小將何如愚同學講一講：

（何如愚在發言中全場二百餘人一瞬間都集目觀注著這位革命小將的發言，當他講到吊打三次昏迷過去中，「我還看見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對著我暖和的笑臉說：孩子，你一定很堅強！我又醒過來和兇手做鬥爭，後來又是一頓毒打就昏過去了，他們用涼水潑在我的頭和身上」。全場無不氣憤，很多人都流下了熱淚。這個小將說：「萬縣市公安局局長：王傑就是鎮壓我們的劊子手！」全場都喊，王傑站起來！王傑臉色蒼白驚慌地站了起來，雙眼直望著中央首長，全場高喊：「打倒王傑！打倒甘渭漢！」等口號，把王傑嚇得發抖。）

康生：下面由萬縣市「主力軍」負責人熊道生同志發言……。

熊道生：我來控訴萬縣地、市委和軍分區內的一些壞傢伙對我們「主力軍」的血腥鎮壓……

萬縣軍分區盜用中央名義說：「萬縣市『主力軍』是中央軍委批准為『反革命』組織。」還有成都軍區給萬縣軍分區轉去的中央軍委的電報批示，現還在萬縣軍分區副司令員王貴章那皮包裡，要求他立即交給中央首長！（這時，全場高喊：交出來！交出來！王貴章的臉色像黃瓜一樣，雙手發抖，在拉皮包拉鎖時，一連拉了幾下都未拉開，全場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這時王貴章雙手抱著皮包，交給了警衛員。）

熊道生同志繼續發言……。

康生：說你二月十七將116人裝在船上準備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中……。

熊道生：他們簡直是放屁！當時我聽到他們對我這樣的栽贓，頓時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我沒有想到，他們會這樣子來嫁禍於我啊……

我有一個要求，請求中央首長；因萬縣問題很複雜，抽個時間詳細彙報。

康生（直點頭）：好！好！

江青：下面讓成都剛來到的×××發言（川大八·二六的一個女學生）……（略）

康生：今天會就開到這裡，下面說三件事：

- 一、這次發言沒有講完的，下次再繼續發言。
- 二、我們已經給軍區說好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把捕革命組織的革命群眾一律釋放。（全場歡呼毛主席萬歲！達三分鐘之久）
- 三、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被冤枉和錯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這時全場又高呼毛主席萬歲！達到最高峰，有的舉起雙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後全場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的歌聲中散會）<sup>32</sup>

<sup>32</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 中央首長在解決山西核心小組問題會議上的講話 (1967.4.22.)

時間：4.22下午四時至九時，4.23下午三時半至八時半

地點：人民大會堂新疆廳

出席：總理、伯達、康生、富春、江青、肖華、成武、富治、王力、關鋒、  
本禹、文元、春橋、東興、維山、格平、日清、劉貫一、陳守中

總理：「開會了，請康老主持！」康生：「還是你主持。」

總理：「誰發言？」

首先，陳守中同志彙報近來太原地區出現的新情況。

（當他說到十四日來了個緊剎車。兵團的負責人說過劉格平叫搞的，現在他不叫搞了時）康生問：「誰搞的？」

（當陳守中說到聽說袁振同志在行動前給兵團做過動員，兵團提出保兩個打四個，袁振同志不同意，改成保兩個，中立兩個，打兩個時）王力說：「你們為什麼只聽那些傳說，又不核實，這叫搬弄是非。」

（當陳守中同志說到這次事是丁磊搞起來的，袁振也承認他說過「先禮後賓」時）

關鋒說：「你們是不是講講核心小組工作上有什麼原則性的分歧，這些問題不清，回去弄清楚。」

總理說：「你們核心小組有什麼爭論可以說出來。」

江青：「貼幾張大字報有什麼了不起啊！王力同志不也被貼了大字  
麼！」

總理說：「上次回去後，你們在政策上有什麼原則上的爭論？」

江青：「冷場了。20號那天，張日清同志和劉格平同志好像有很尖銳的  
矛盾。」

關鋒：「為什麼說是政治大扒手？」

（當陳守中談到人們給劉志蘭提了九條黑線，劉志蘭和彭德懷，彭真生

了該子時）江青說：「越講越出了好東西了，劉志蘭是幹什麼的？」

（當張問陳有沒有根據時）江青說：「聽到就裝沒有聽到麼，都拿出來實在是……」

康生：「你在核心小組了，到底你們核心小組在政治原則性上究竟有什麼分歧，有些什麼不同意見，不同的看法？」

關鋒：「格平、日清你們倆談談吧！」

（當格平同志談到我們原來達成個協議，回去再談，現在談是不是破壞協議時）康生：「還有什麼協議？可以談麼！在中央有什麼不可以談的？」

（當格平同志談到一月二十五日成立軍管會，他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指示時）總理：「你們奪權鬥爭是有個特殊性，一下子就拿過來了的，成立軍管會的事，你們沒有弄清楚。」

（當張日清同志說北京軍區有指示時）總理問鄭維山：「你們發了指示麼？查一查！」

總理：「你們搞軍管會是管工廠，又搞了個總的軍管會。這就不對了。」

關鋒：「現在你們成立省的軍管會這就不對了。」

肖華：「哪個地方應該軍管還是不應該軍管，應該由革命委員會決定，不能由你們決定。」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專政委員會抓人的問題時）總理問：「一共抓了多少？」

張日清答：「二百零幾個。」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軍區召開武裝部長會議他不知道的時候）總理問：「怎麼你還不知道？」

張日清：「有些是傳達部隊的事情。」

總理：「現在解放軍搞三支兩軍，和地方關係密切麼？」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解散革命群眾組織的問題時）總理問：「你們跨行跨業的兵團都撤銷了嗎？基層單位的左派組織也解散了嗎？」

劉格平答：「好多都解散了，要重新組織。」

（劉格平同志談到劉貫一同志叫秘書查電話時）康生：「偷聽電話麼！」

王力：「查領導同志的電話，這是個原則問題。」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劉貫一和張日清叫發聲明的問題時）關鋒：「發這個聲明應該請示中央。」

康生：「這是胡鬧。」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他提出取消第三條，日清同志同意後，貫一同志堅持要求時）康生：「你們問問我們麼！不但是錯的，就是對的，也應該問問我們麼！我們在麼！」

（當格平同志談到太原同時出現了三人電話和四個聲明時）王力：「這兩個聲明都出去了？直到現在你們還沒有向中央報告，你們這樣搞，等於宣佈核心小組分裂了。」

康生：「你們這是要自己把自己搞垮！你們在中央開會麼，群眾會怎樣想呢？一定會以為你們是報告了中央的。」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張日清管18項工作，提到軍管會的事時）總理：「你們查一查。」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核心小組應當吸收一些中下層幹部和造反派領袖時）王力：「這一點我同意。看到你們核心小組的名單時，我很高興，但感到不足，就是要打破框框增加些新的血液，主席早有指示，要改變一下面貌。」

春橋：「老幹部當然有經驗，但習慣勢力很大，要是設有年輕的新生力量進去打破過去的老框框，用不了多久，又要恢復過去那一套了。」

總理：「是呀！習慣勢力！」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群眾的反映見不到領導同志時）春橋：「是呀，聽說省人委加了好多道崗。」

肖華：「我們三座門一道崗也沒有，就是一個便衣。」

周總理：「你們革命委員會成立以後，一道和群眾進行過座談會沒有，核心小組和革委會、常委會應該集體去接見群眾。」



當劉格平同志談到黨團組織是否在鬥、批、改中恢復的問題時，

周：「你們的各種代表會議開過沒有？」

貫一同志答：「沒有。」

（當張日清同志談到劉貫一同志鬥、批、改中關於解散組織的一句被抓住時）關鋒：「劉貫一同志的報告，印了本子，裡面問題很多，有路線性的錯誤，還有批判『停止打內戰』的傳單裡，學生打內戰。只能對他們進行引導，不能叫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王力：「對『打內戰』的提法是不合適的。」

（張日清同志說袁振同志在家裡召開了革委會，和在太原的革委會統一了思想，慢慢地把方向引導的批判劉、鄧、陶、衛、王、王上來）

康生：「你們要養成個習慣，重大問題要集中研究一下，有些重大問題考慮一下，研究一下，給中央打個招呼，不要著急，著急就會出偏差。」

王力：「還有一點，就是你關於形勢的分析，安徽的五條和軍委「十條」出去後就要有反覆，值得考慮，你這樣的估計形勢，就要採取這樣的措施（指聲明）。」

周總理：「慌了。」

關鋒：「七一獻禮也有問題。」

（當張日清說到劉格平在康老面前講「張日清鎮壓革命群眾」時）康生：「我當時沒有聽清是講你。」

（當張日清同志談到劉格平同志對同志支持不夠，信任不夠，比如劉貫一同志的報告下邊有反映時，要加以解釋，不該給東風講，影射貫一同志時）關鋒：「像這樣的報告應該集體研究。」

（當劉貫一同志談到原來有個協議，一些問題回去弄清楚，劉格平同志在發言中還是說了時）康生：「我們認為那個協議不對的，稱這是挑撥中央破壞你們的協議，那有這樣的做法。」

關鋒：「那是我們讓談的。」

（當劉貫一同志談到現在把對劉格平同志的意見提出來時）周總理問：「聽說你們又派人到天津去了？」

張日清答：「沒有，那是他們自己去的。」

周總理：「你們派學生去天津，這是違犯紀律的，上次康老就和你們說了，你們為什麼還要派人去，劉志蘭要是又派人去，那是違犯紀律的。」

劉格平同志說：「他們背著我搞，又不和我說。」

康生：「我上次傳達了中央的意見，你們是同意的了。」

周總理：「康老已給你們講了，為什麼還要派人去呢？李雪峰是毛主席派到天津去的，天津的鬥爭矛頭是萬張反黨集團，你們卻又派人把矛頭指向李雪峰，劉志蘭兩次派人到天津去，是目無組織的，你們批評劉志蘭是不深刻的。」

康生：「這是個原則問題。你們同意的了，為什麼回去還要派人去呢？這不是給中央找麻煩嗎？不管李怎麼樣，他是毛主席派去的麼！你們為什麼反其道而行之？」

（當劉貫一同志談到，格平同志說，中央叫他站出來，我估計是康老說的時）康生：「我沒有。」

（當劉格平解釋時，劉貫一說：「你讓我講完嘛！」）康生：「解釋一下也可以的，為什麼不可以解釋？」

（當劉貫一同志敘述了劉格平同志商量發個支持上海和在山西奪權過程中劉格平同志的態度時）關鋒：「張春橋，你講你對劉格平有什麼意見？」

（劉貫一同志談到他在十三冶金公司給中央寫奪權電報說紅色造反聯絡站的群眾是革命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劉格平不同意，不讓發的。）

王力：「你們認為紅聯站是什麼組織？」

（當劉貫一同志談到劉格平同志不注意總結經驗，他上次寫了一個「三結合」的經驗時）關鋒：「你那個經驗，我和王力看了，錯誤觀點很多，沒有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是為了愛護你，要是發表了，早就有人批判了。」

王力：「貫一同志呀，你剛才講的奪權的問題，思想裡就沒有群眾。」

劉貫一同志說：「我們不是爭功。」

王力：「就是爭功嗎！怎麼不是爭功？」

康生：「奪權的問題，那麼倉倉促促，張日清一個人說就奪權，叫我，我也不同意，張日清做的是不對的。」

王力：「一直到現在山西還沒有把群眾放到一定的位置，你的那個報告，就是路線問題。」

康生：「這是大問題呀，不能倉促決定！」

（當張日清談到奪權前召開了三次會，給群眾講了山西省委的問題時）

春橋：「在你講這以前，群眾不懂得這一點麼！」

張日清答：「懂的，那時我的意見是為了保護革命群眾，保衛革命領導幹部。」

王力：「這個行動是中央支持了的。」

關鋒：「如果成熟一點的話，就應該把群眾的情緒稍緩一緩，你們到後過去研究研究麼！」

王力：「貫一同志在這個小冊子裡把群眾擺到了不適當的位置，突出你們五人。」

康生：「貫一一直堅持這個觀點。」

春橋：「你們的工作做的很好，剛才聽貫一講，使我很吃驚，貫一呀好像十月革命就等列寧回來了啦。」

關鋒：「貫一那個小冊子有路線問題，群眾批評，把你說成是救世主，把群眾說成阿斗，這樣的大問題，你們事先也不討論事先也不向中央報告，我們在沒有聽到你的講話以前，群眾就有反映，我覺得你們把形勢估計得大樂觀了，有點自吹自擂，太突出個人了，即使有個經驗，有什麼值得吹的，你們在代表會上的四個報告都是有問題的，我們沒有發表，一發表人家就要照辦麼！我覺的貫一同志吹虛自己有點太過分，說『三結合』是山西創造的，怎麼能這樣說呢？『三結合』是毛主席提出的麼。『三結合』是個臨時權力機構，你們那個組織條例給定型了，現在都是實習麼，將來要成立省委省人委怎麼辦呢？像這樣的報告，你們也不討論，正副組長是有責任的，這是大事，又不是小事。」

王力：「說得客觀點，還是黑龍江先搞的，去年八月、九月份就開始結合了。」

關鋒：「即使有點成績，也不能吹虛。」

康生：「像這樣的分析，還不如不分析。」

關鋒：「像這樣一個綱領的報告。你們事先應該研究、事後應該報告，你們的正副組長有責任。」

康生：「貫一清楚這一點。如果像你們這樣的分析形勢，就不如象劉格平的、根據毛主席的教導指示精神。你們把劉格平同志的好處說成缺點了，分析形勢不能像你們這樣胡說八道。對中央的東西你們不大理睬。」

關鋒：「在這些原則性問題上，群眾的批評是對的。」

康生：「可要改了！不改、發展下去是危險的。」

王力：「這樣下去不行啊！」

關鋒：「對29號的補充報告也沒有糾正，並且提出了打內戰的問題，說誰要是打內戰，誰就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誰就是反革命，像這樣子，北京就得公審聶元梓，外語學院××在天安門給總理貼大字報，總理也沒有怎麼。」

對貫一同志談到劉格平到北京不給他打電話而給愛人打電話六、七次之多時。

張春橋、王力：「查電話是極端惡劣的，革命委員會內部怎麼能夠這樣搞？」

張春橋：「你們是不是曉得黨的這個紀律呀？」

王力：「這可要嚴肅對待呀！」

關鋒：「現在有人傳說，劉格平的老婆在那裡，劉貫一的老婆在那裡，袁振的孩子在那裡，劉志蘭在那裡，你們就聽這套嗎？當劉貫一、陳守中同志談到各兵團成立了情報組的時候。」

周總理：「革命群眾要瞭解消息，那是另外一回事嗎？」

康生：「學生就有這些，紅代會就有個動態組。」

關鋒：「你們不能受這些東西干擾，你們要是這些東西干擾那就糟了，

有問題，你們核心小組要共同搞。見一些群眾組織談一談，表示共同團結那就好了。」

王力：「內部吵一吵沒有關係，原則問題錯了就改麼。」

楊成武：「要學習中央文革的作風，原則問題要有嚴肅性。」

王力：「外邊一些傳說的情況，和小資產階級思潮不能聽。」

（當劉貫一同志談到兵團原來說保劉格平、袁振，後來傳說出來說袁振保四個，沒有守中時）李富春：「像這樣子的傳說：中央文革也沒法過問了。」

王力：「對總理的傳說也很多麼！」

關鋒：「無原則的爭論，不要受這些傳說的干擾。」

周總理：「你們幾個人就這樣多的問題。（陳永貴談了晉中的問題和崔斌的問題）聽說文水劉胡蘭的媽媽有問題了，她不是劉胡蘭的媽媽，還有的說劉胡蘭也有問題，這是壞分子造謠，歪曲英雄的形象。」

（當張日清同志談到群眾反映群眾組織的代表在革命委員會中是陪襯，文件看不到，只開會時，舉個拳頭作用發揮的不夠時）關鋒：「當然不夠了。」

（當張日清同志談到他給劉貫一同志談到劉格平同志給康老講他反饒漱石的問題時）王力：「貫一同志還要估計一下，劉格平同志馬列主義水準現在是比較高。」

（張日清同志講到格平同志講了好幹工作了，我是想，只要為了工作，不要有私心雜念就好辦事了。）關鋒：「你們正副班長就失職了。（陳永貴講到晉中問題，提到崔斌和王鏞錦長期在一塊工作的關係，並談到晉中被打問題。）陳永貴他提的問題是群眾問題，這點比你們強。」

周總理：「時間長了就有個千絲萬縷的關係。」

張日清同志：我們準備把武裝部調換一下。

周總理：「你們都說完吧！請關鋒講。」

關鋒：「我講一點，講錯了請同志們批評。山西從奪權以來，做了大量的工作，形勢還是很好的。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成績很好，

要把做過的工作都總結起來，能搞多少條，今天是談問題，這些不講了。現在談問題吧！昨天談，今天談，同志們很少談原則問題。到底今天擺在山西革命委員會和核心小組面前是什麼問題？群眾反映三月二十六日，劉貫一的報告是自吹自擂，預驕自滿，盲目樂觀，脫離群眾，急於求成，好大喜功，二十四個字。」

康生：「二十四個字之間，最基本的是群眾問題。」

關鋒：「這二十四個字反映了核心小組的精神狀態。現在我想談一談劉貫一同志報告。第一個是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分析全省的形勢，提出全省總的政治任務。這樣綱領性文件，報告前，核心小組沒有討論，印成小冊子也不討論，引起了這樣大的反映，你們還不認真對待，也不向中央報告，這不是一個『走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康生：「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關鋒：「你們兩個班長都推責任的，照這樣搞下去，我就想山西革命委員會和核心小組能不能立得住的問題的第一段是罵過去的省委，當前的階級鬥爭沒有講。對形勢的分析是空空洞洞的，抄了點社論。下邊是自吹自擂，這反映了對中央的態度，對主席的態度，對群眾的態度，（關念了五個人站出來的一段）下頭就吹起來了，吹了這五個人，又吹了張日清、陳守中、劉志蘭，如果沒有你們，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更要夭折了。」

周總理：「這個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

關鋒：「把黨中央，毛主席放在什麼位置？把群眾放在什麼地方，劉貫一同志這樣的報告你們也不管！」

康生：「群眾是我們的先生，要甘當學生。」

關鋒：「我說貫一同志呀！上次在京西賓館講得也很空，也出了小冊子，為什麼那麼突出個人，《人民日報》不能發表。（關鋒翻了幾頁小冊子繼續說）下面就吹的很多了。一片歌功頌德，不講黨中央和毛主席。下面是論述『三結合』，說『三結合』是山西創造的，奪權當然就形成了『三結合』。除提了一句臨時權力機構

外，下面就是和中央精神相違背了。說什麼不僅對中國的革命有偉大的作用，就是對世界也有偉大的意義。還說有幾個階段，什麼祕密階段，到公開階段等，不能講嘛！真是可笑。」

關鋒：「還說什麼中央文革對我們山西實行『三結合』給了最高的估價，說山西這次革命的『三結合』是東方地平線上的偉大創舉，對中國革命豐富了經驗，中央文革沒有講這個話，這個自吹自擂太厲害了。」

康生：「中央這樣講，你把毛主席放在哪裡去了？」

王力：「太荒謬了。」

關鋒：（念了聲兄弟聲讚揚的話）「吹的太不像話了，我說這是劉貫一的世界觀的問題，不嚴肅對待這個問題，把自己擺到這樣的地位，把群眾、把主席擺在什麼地方？這樣下去，我看劉貴一同志是經不住考驗的。這些多多少少反映了你主觀上的作用問題，對形勢的估計盲目樂觀，說『三結合』一經奪權是很容易鞏固的，階級敵人就認你的帳嗎？正是從這樣一個基本觀點出發，才採取了那麼些措施，吹噓自己，貶低群眾，說到這個，也不講主席了。當然他說了支持了。這僅僅是個支持的問題嗎？大量的吹噓你們自己。對群眾的態度非常嚴重。第二部分是當前全省總的政治任務，說奪權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提出了五條任務，大部分都是些空空洞洞的東西。下面第三部分，堅決將鬥、批、改搞好，說全國進入鬥批改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再就是對幹部的分析，這一段是對的了。提出了三個月完成鬥、批、改，『七一』獻禮。就那麼容易嗎？」

周總理：「這反映劉貫一沒有具體和群眾接觸。」

張春橋：「把階級鬥爭看的太容易了。」

關鋒：「對幹部那幾條是正確的，對群眾就不像話了（念打內戰一段）說誰打內戰誰就是反革命，誰就是破壞文化大革命，誰就要受到嚴厲聲討和處分。」

周總理，「你們事先也不討論，這比衛恆過去還厲害。」

康生：「貫一呀？這個不能說你們不知啊，劉格平同志這個你們不能推卸責任。」

關鋒：「糾正的報告中並沒有糾正，這些誰還有呢你們核心小組究竟是什麼思想在領導？誰在裡面領導？我現在是批評貫一同志，實際也不是貫一同志一個。解散群眾組織這都是些原則性的問題，如果是指定劉貫一報告，口氣也是能那樣大呀，應該誰做，應該考慮，我覺得對這個報告不能等閒視之，像這樣的報告，轟也應該，是正常的，在北京的話，早就轟了。」

康生：「不僅是炮轟，早揪住了。」

關鋒：「格平、日清同志都有責任，日清和貫一同志熱聽（原文如此，編者）他的，對他好的地方看的多了，對貫一批評不夠嚴了，你們都有責任，你們代表會上的好幾篇東西，《人民日報》沒有登出去，摘要的發了個消息。」

王力：「不是實踐來的。」

關鋒：「如果要登出去的話，問題就大了，有些話內部講了就算了，但是為什麼一定印個小冊子，沒有奪自己頭腦裡『私』字的權呢？記控制自己不要讓『私』字專了政，像這樣的東西，在《山西日報》上多少有點反映。第一個意見就是那個聲明。」

周總理：「夠典型了。」

關鋒：「這個問題沒有法解釋，出去了兩個，一個有袁振，一個沒有袁振。」

康生：「如果你們以為是袁振搞的，那麼你們核心小組不同意他發表聲明這不是矛盾嗎？」

關鋒：「我不贊成你們查這個事情，查有什麼好處，群眾就是根據這個查的。」

張春橋：「御林軍的提法可笑。」

關鋒：「群眾有輿論，核心小組又有這樣的說法，你們不要受那些東西的干擾，群眾有，有那樣的想想法不奇怪，奇怪的是你們核心小組也有這樣的說法，你們不讓群眾打內戰，而你們自己也打開內戰



了。現在這樣的大字報很多，袁振也可以說你在搗鬼。你們這個聲明，在大學生中對袁振早就有兩派，一派說袁振是堅定的左派，但忘記了袁振軟弱的一面，另一派說袁振是個叛徒，這個問題早就存在，昨天有人來問，我想這個問題反映了貫一思想上好多問題。我建議山西核心小組不討論這些問題，一同接見群眾，表示一致的意見討論了兩下午，你們沒有一個人提到群眾的問題，你們要多到群眾中去呀？」

張春橋：「對。」

關鋒：「看來你們山西還要打內戰，你們核心小組不要打內戰，多檢查自己，貫一同志講了那麼多，但是沒有聽到你認真的檢查，這個問題不解決，今後能不能經受住考驗呀？個人是這樣，核心小組也是這樣，核心小組可以討論，提一些更接近群眾的年輕人工作，常委僅起個拳手的作用，當然不滿意了，常委可以輪流到革委會工作，吸收些新鮮血液到常委會工作，我看很值得考慮這個問題，我就講這些吧，最近好像什麼也好了，你們得聽我的，副主任中年輕人沒有，核心小組中年輕人也沒有。恐怕下面問題還不少。」

康生：「群眾的出發點還是好的，我看核心群眾對核心小組還是愛護的，對你們愛護的過分了，不然第二天全城就貼滿了大字報了。」

周總理：「康老講吧。」

康生：「群眾對你們二十四個字的批評是對的，貫一同志的報告，首先是對形勢的估計，群眾批評你們是盲目樂觀，我認為這是對階級鬥爭兩條路線的鬥爭的一個看法問題。你們為什麼那樣盲目樂觀？你們覺得革委會成立後，什麼問題也解決了，鞏固了，好像階級鬥爭就不嚴重了，這一點核心小組的同志很值得注意的問題，盲目樂觀似乎是階級鬥爭已經解決了，腦子裡還沒有階級鬥爭的觀念，所謂盲目樂觀，就是對階級鬥爭的錯誤認識，第一個問題從同志的上次的談話中和這次講話中可以看出你們那裡存在

著一個對待群眾運動的問題，這個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貫一的資產階級思想沒有被改造了，主要的思想還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吹噓自己，好像山西革命沒有你們就夭折了，你們是金星下凡挽救了，貫一思想還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這和毛澤東思想是相反的，再一點陳永貴今天講的話不多，但很重要，不但是對待群眾的問題，而且有大問題，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這是階級觀點問題，是對待群眾運動的大原則問題。最後就是對群眾組織的解散問題，這不是偶然的問題，那不是隨便講的，你們兩個組長，對貫一沒有幫助，日清同志對貫一的態度不會對他有什麼幫助，第三個問題關於核心小組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而是爭論的很多，爭論的是一些非原則問題，反而放鬆了對原則問題的爭論，你們的確不團結，我看都有責任，劉貫一責任較多。」

李富春：「小冊的問題不爭論。」

康生：昨天老陳（守中）不講原則問題，講了那麼多亂七八糟的問題，給劉志蘭貼大字報我看該貼，你們還追究後臺，我看不管誰是後臺，貼總是有好處的，在兩天黨的生活中你們都是批評別人多，自我批評少，自我批評實在太少了，群眾說你們是自吹自擂，群眾是有眼睛的，最後我覺得你們對中央的指示，對毛主席的文獻，對《人民日報》、「紅旗」社論的態度不嚴肅，如果好好的學習怎麼能做那樣的報告呢？當然了這也是世界觀的問題，你們劉志蘭對李雪峰瞭解問題中央是和你們打過招呼的，就是不聽，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搞，住在京西賓館不報告中央，搞自己的垮臺聲明。

周總理：「自己打內戰。」

康生：「對待群眾的態度不正確一定對中央的態度不正確，內蒙有個經驗下壓群眾上面一定是對抗中央。」

關鋒：「貶低群眾。必然吹捧自己，自己也一定垮臺。」

康生：「山西奪權的影響很大，我們一貫支持你們的，為了幫助你們不得不把原則的東西告訴你們。」

張春橋：「從《山西日報》上看發出了好多文章，都是從核心小組、革命委員會、省軍區的名義發的，我看應當督促省革命委員會，現在黨政軍完全並列，不完全符合現在的臨時權力機構，核心小組也代表不了省委呀。」

周總理：「像政法部分搞成專政委員會成立以後才報告的，我們沒有批准，你們有意見，可以搞實驗麼，結果好多文告都可以專政委員會出面，中央就沒有以公安部單獨發佈軍政性的文告還有軍管會一整套專政機構搞成兩套了搞成最最權力機構，好些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分散的很，組織機構分散的很，反映了你們核心小組思想分散，政治生活分散，組織生活分散，你們是最早的一個，一月十二日奪了權一月十三日公佈的，在全國的影響很大，中央對你們希望很大，這個內戰不是群眾的內戰，是你們六個人的內戰，當然陳永貴不在了，徐志遠在下邊，六十九軍同志剛去，你們不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嗎？這一點你們就沒舉，你們不是民主集中制統一起來的思想，主席講要相信群眾，要相信黨，而相信群眾在先，沒有群眾那有黨啊！從思想上提高起來，你們犯的比較廣，指導思想是分散的，領導思想必須先吃兩頭，上面是主席思想，下邊是群眾，這個指導思想在你們的組織條例中看不出來，發言中看不出來。我同意關鋒、康老的講話，和中央文革幾個同志的講話，還是劉格平同志水準高，劉志蘭的思想水準太差，她的行動就證明瞭這些，像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經說了話，非去！毛主席讓李雪峰到天津去，考慮把那裡的工作搞好再回來，昨天張日清說了李雪峰的好多問題，當然是問題了。但是那是局部的問題，華北局的會議，也不是黑會，那次會上內蒙的問題搞對了，河北的問題搞對了，山西的袁振搞錯了，這不是局部的嗎？華北局機關的問題也是局部的嘛？昨天張日清同志說，劉志蘭說過：『打不倒李雪峰，死不瞑目。』這究竟搞革命呢？還是搞報復呢？像劉志蘭這樣的思想作風，做核心組的成員，真不夠格。我同意王力說的，劉格平同志不表態比表態好一點，不

然就捲進去了。他的缺點是沒有堅持站出來，提出原則性的問題，現在不作組織結論，先解決你們的問題，你們回去後，將來可以吸收一些青年的小將，增加一些新的血液，改變一下成分，你們先奴隸一個時期，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有些革命小將不是黨員，也可以列席核心小組的會議。

你們這個組織條例，想把好多東西固定下來，這個是不可能的。只是代表會的幾個文件，這個問題表現的很突出。」

張春橋：「臨時權力機構，怎麼能固定下來呢？」

康生：「好多東西在實踐（現），怎麼能這樣？」

周總理：「這個東西多都是腦子裡劃出來的，這樣大的一場革命，你們把階級鬥爭看的太簡單了，還向七一獻禮，這怎麼能獻禮呢？當然你們想建立革命的秩序，但你們的思想保守右傾。」

康生：「我大膽地說一句，明年七一獻禮也就不錯了。」

周總理：「張日清說劉格平右，你們整個都右，你們那聲明貼出去，群眾一看就知道你們的意見不同了，你們對一些不好的組織，不對幾個頭頭採取措施，不能輕易把一個組織打成反動組織。這是告訴你們一個消息，毛主席講還想把抓起來的聯動的人要釋放出來，讓他們在社會上碰釘子，自己教育自己。主席堅持一個真理，絕大多數是會變好的。這也是主席的一個偉大創舉，只有對少數右派才採取措施，你們把那麼廣大的群眾組織，隨便宣佈為反動組織，那怎麼行呢，你們要好好研究中央政策和地方實踐結合起來，你們對自己，特別劉貫一同志的報告，自己批判了，如果現在認為已經建立了革命組織，誰反對誰就是反革命，說誰要打內戰，誰就是反革命，這樣下去，那就要走衛恆的覆轍。你們來這哭一次，我們還不責備你們，你們回去要好好自我批評，先實驗一下，看看行不行。你們對主席思想沒有很好鑽，下邊沒有群眾，那怎麼行呢？山西的群眾，對你們是很愛護的，因為你們奪權早，影響也大，所以群眾也是支持你們、群眾信任你們，你們就要靠群眾好好幹。不能突出個人，沒有你們，還會有革命群

眾出來，不過晚些就是了。我上次到大寨，陳永貴說了好多情況，在這場大革命中，必然要出人物，現在你們的任務還要靠大家的，這樣社會出新人，你們的工作就會做得好一些。昨天陳守中說的話裡，自我批評太少解釋的特別多，林彪同志講話，就是要重新走群眾路線，解放以來我們的軍隊住在營盤和機關是和群眾隔離了，現在全軍幹部都要重新走群眾路線重新學做群眾工作，多聽群眾的意見，我們的工作就會有改變。

劉貫一同志，我同意康老、關鋒、王力的批評，你站錯了。老憑心不行，會搞出亂子來的，不能被別人批評的人，就認為自己都好了。最後必然被打倒，凡是這樣的人，都是如此，你認為你過去受過壓，就一切都好了，很危險，彭真就是這樣的，他反高崗，就認為一切都好了。結果自己還是被打倒了，劉少奇也是這樣，高崗那時抓了他些問題。像『和平民主階段』在下邊亂傳，主席問高崗是不是反對劉少奇，高回答，我沒反，結果劉少奇認為他一切都好，結果垮臺了，這筆帳還是一起算了嘛！你說你反饒漱石，但你也有問題，那天格平沒有提，你就有意見，你把這個變成包袱，就要摔大跟鬥了，格平同志有些不說是好的，有些要提出，否則問題不能放過不管，你們的問題還是回去解決，這是對你們的考驗！聯繫到批劉鄧、批衛王王、聯繫到鬥、批、改，還有個生產問題，山西抓生產多是好的，部分還沒有抓好，縣裡問題很大。」

李富春：回去以後解決問題要在政治上原則上解決問題，讓江青同志講講。

江青：「不瞭解情況，就不要再打內戰了，昨天陳守中講的，我實在有些坐不住了。」

（當劉格平談到這些問題回去加以解決時）康生：「再不要搞那些傻事了，發什麼聲明！」

周總理：「你們能夠解決的問題解決了，有問題打個電話嘛！」

康生：「打電話先起草好個東西，大家傳閱一下，以後也有據可查。」

周總理：「打電話簡短點好。」

（當劉貫一同志表示接受中央首長批評時）康生：「貫一同志有個好處，就是敢於承認錯誤，還是不深刻，以後還要犯。」

（當陳守中表示回去後把對劉志蘭的批評轉告給劉志蘭時）周總理：「是的。核心小組的成員嘛，立刻轉告給她。」

周總理：「晉中問題你們要好好注意一下，調查一下，解決一下。」好吧！結束吧。（完）<sup>33</sup>

## 康生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工作人員大會上的講話 （1967.4.23.）

很久不見同志們了，同志們身體好吧！（熱烈鼓掌）這幾年到黨校來都是陪著外賓，來了幾次，陪紐西蘭的威爾科克斯同志來過一次，陪印尼的艾地來過一次，還有陪褲田來過一次。世界的變化很大；褲田成了修正主義，艾地犧牲了，威爾科克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是變化。

我沒有很多的話和同志們講，我就是和同志們見一見，有個要求就是了。同志們寫信給我，叫我來給同志們講講話。我現在還不曉得同志們要我講什麼東西，所以希望同志們、各個部門的同志，你們提出問題，出題目，然後我考慮一下，能夠講的和同志們交換交換意見，不能夠講的，你們黨校不是常考試嗎？我就交白卷。還是學習毛主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現在還沒有從群眾中來，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所以，一個要求，你們如果願意談一談，就把問題提出來，我考慮一下，研究一下，準備最近和同志們談一談，這是我的一個要求。

第二，就是要求同志們發揮革命的積極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投身到反對劉鄧路線的鬥爭中去。這件事對黨校，對中國文化大革命是

<sup>33</sup> 兵團井岡山翻印1967年7月5日（轉抄）；山西日報（軍支）革命造反總部編印，《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擴大）會議紀要彙集》，1967年7月28日。

一個最大的問題，與我們黨校密切有關的。我聽說各個部門的同志積極開展這個運動，我是非常高興的。今天和同志們見見面，希望同志們把這一個工作更加堅持下去，並且深入地進行這一鬥爭。最近看到一期簡報，看到各單位都在積極進行工作，我很高興，看來我們高級黨校是大有希望了。

如果從八·一五算起的話，揭開林楓黑幫的蓋子以後到現在八個月了，這八個月以來，經過許多鬥爭，經過許多曲折，也經過許多反覆，同志們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特別是反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你們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從黨校的鬥爭中間證明一個真理，這真理就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不管在哪一個地方，總是會取得勝利；而以劉，鄧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管在哪一個地方，它怎樣深，怎樣厚，但是最後還是要失敗的。從黨校的鬥爭中完全證明瞭這一個問題。當然，鬥爭並沒有完。

兩條路線鬥爭最本質的問題就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是《新民主主義論》頭一章，頭一節所講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就是說，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就是民主革命勝利以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全國解放後，把我們國家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要使中國在全國解放以後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問題將來可以同同志們詳細地講。

這問題也不是劉鄧自己創造的，半世紀以來，從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普列漢諾夫、季諾維也夫、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蘇哈洛夫、俄國黨內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有這樣的說法，有那樣的說法，語言不一樣，但基本問題是一樣的，這問題就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從陳獨秀起，經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崗、彭德懷、張國燾，一直到劉、鄧，他們要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所以，劉、鄧路線要走的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這是老的社會民主黨、老的修正主義一貫地反對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問題將來可以和同志們談談。同志們曉得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毛主席的路線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劉鄧的路線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個鬥爭在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在中國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階段中也是存在的，因為這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時期還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必然會反映到我們黨內來。通過這次文化大革命，同志們更加認識了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還存在著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國家還存在著階級鬥爭。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鬥爭是複雜的、曲折的，甚至是激烈的。

從黨校的鬥爭中你們會親身體會到，在黨校八個月的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那就不僅是鬥垮了林楓黑幫，不僅是揭露了劉鄧反動路線，更重要的一個收穫就是通過鬥爭認識到了毛主席思想的偉大，這種思想是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列主義。通過這個鬥爭，你們可以看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毛主席的思想，是戰無不勝的。這種鬥爭不僅對黨校，不僅對北京，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也有重大的意義，在馬列主義寶庫裡增加了重大的財富。所以，同志們應當很重視這八個月的鬥爭。在八個月的鬥爭中，現在同志們可以比較清楚了，當時林楓的蓋子揭開以後，黨校各部門的同志都是要我聽取各方面同志的意見，寫了許多信給我，有這個派別，那個組織的意見，都要我聽。我當時是有意識不來作報告，因為根據「十六條」的精神，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群眾自己來搞革命，要澈底地走群眾路線，不能包辦代替。因為我在中央工作，講話有時同志們容易受到框框，所以要放手讓黨校的同志自己通過實踐來解放自己。當時同志們已經有各種意見要我聽取，所以在八月廿八日晚上第一次聽取了一下各方面代表發言中的意見，一次沒有完，在八月三十日第二次聽取同志們的意見。當然，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可以有這種意見，那種意見，大鳴、大放、大辯論。在這樣大的運動中，在大民主的情況下，允許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應該有各種各樣的意見，沒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反而是不正常的。所以，開始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各種分歧、各種辯論，這不是壞事，這是好事，真理越辯越清楚。所以，那時我主要是聽取同志們的意見，在聽取意見的時



候我只是扼要地和同志們講兩個問題，辯論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我說：黨校是什麼樣的黨校？是長期抗拒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這是我講的，沒有作詳細的解釋。因為是不是一個頑固的堡壘請同志們看一看，是不是抗拒、反對毛澤東思想也可以辯論，也可以有這樣的看法，那樣的看法，可以採取不同的意見。是不是長期的，那也可以辯論，也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所以我出了題目要同志們通過自己的認識，通過自己的自覺，通過自覺的實踐來看這個問題。所以我講，在我看黨校還是一個長期抗拒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當然，在今天這問題也還可以研究，也還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是不是長期的，是不是對抗，是不是頑固的，還是不頑固的，是不是一個堡壘還是不是一個堡壘，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通過八個月逐漸可以看到，這個話到底確實不確實，我自己來看這句話還是不能改變這個看法的。或者是有些事實更加證明瞭這個看法。

第二，我說要把林楓的蓋子揭開，這僅僅是初步的，黨校的蓋子又大又厚又深，至於怎麼大怎麼厚怎麼深，一般地談了一下，沒有詳細談，那時候不可能，同志們應該原諒，那時不可能詳細談這個問題，那時彭、陸、羅、楊的問題已經揭露了，但是劉鄧問題還沒有在全體黨員中揭開，所以我遵守中央的決定，就不能點名，這一點同志們應該知道，即使在今天的各種報紙上，大標語上街的口號都是有的，但是你們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還沒有點名。所以那時只能告訴同志們黨校的蓋子很大很厚很深。

同志們現在回想回想，是不是蓋子很大？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是政治局常委，鄧小平是總書記，政治局常委，那還不大！一般黨員中還認為他是接班人，那還不大！又厚，怎麼厚？揭開林楓、賈震，林楓下面還有王從吾、侯維煜，再下面不是還有楊獻珍，再下面不是還有安子文，再下面不是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再下面不是還有彭真，再下面不是還有鄧小平，再下面不是還有一個劉少奇！你們看，這還不厚嗎？一層一層，十幾層還不厚！很厚的蓋子壓在黨校的頭上。為什麼又深呢？從四八年劉少奇作黨校校長，延安那一段不算，開始叫馬列學院，在阜

平西柏坡成立的，以後進城了，從四八年到去年，十八年了，十八年還不深嗎？十八層嘛！正因為這樣，所以是長期的，十八年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統治著黨校，他還不對抗毛主席的思想？經過多少鬥爭，都是頑固地抵抗，所以說，從楊、王、侯、林楓、賈震，是長期抵抗毛主席思想的頑固堡壘。現在可以講清楚了，那時不能詳細講。

但是，我講了以後大概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有的同志能夠懂得我說的東西，所以我在九月四日就接到黨校同志的信，指出黨校的問題是與劉少奇的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有關係的；另一方面就是很多同志還不瞭解這情況，剛才不是和同志們講，黨校的同志在八月二十八日、八月三十日我講這話了以後，有的同志不大理解，我當時特別說到，黨校的工人同志，做工勤工作的同志，我的意思是管黨校有什麼錯誤，這些同志是好同志，他們沒有關係，他們根本不曉得這事情。我這是好意，把工人同志同錯誤路線完全劃分清楚，那是同志們不瞭解，發生誤解，說我看不起無產階級看不起工人同志。這帽子不小，無產階級怎麼不知道？無產階級什麼事情不知道？實際上他們與黨校的錯誤的事情，長期的頑固的反毛澤東思想的堡壘毫無關係，所以我說他們不曉得，不能怨工人同志，但是，我又不敢說得那麼清楚，所以發生誤會，覺得我瞧不起無產階級，瞧不起工人同志，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完全是好意，難道你們同劉、鄧有什麼關係嗎？沒有關係。他們的事你們都曉得嗎？天曉得，你們根本不曉得，所以發生誤會。這是很自然的，這不怪同志們，很自然的。同志們不要認為那時說了這樣的話，那樣的話，感覺到不對，不要這樣想，很多工人同志是不知道的，大學畢業的青年同志也好，青訓班的同志也好，教研室的同志也好，絕大多數的是不知道，這是我事先預料到的，在一步一步鬥爭中可以認識到的。

我講這話是不是有根據？一方面，當然從我長期瞭解黨校的情況一些接觸中，使我有所瞭解，特別是五七年以後；但是另一方面，我敢於說這蓋子又大又厚又深，是因為八月五日主席在中央會議內部寫了一張大字報，那就是《炮打司令部》，打誰？就是打劉、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司令部。所以，並不是我自己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是我自己

沒有根據，胡說，我是有根據的。因為那時候中央對主席的這張大字報還沒有決定向下傳達，所以我遵守這紀律只能這樣講，我當時也相信主席的大字報傳達下去黨校的情況會逐步瞭解的。

這一點，我說明當時黨校的工人同志不瞭解，這很自然，不能怨他們，引起的誤會很容易講清楚；另一方面，也有的同志不瞭解，說是你把黨校搞得那麼神祕幹什麼？好像神祕莫測一樣，也有人貼大字報，好像故意嚇人，這也不奇怪，他不曉得蓋子這麼大、這麼厚、那麼深，那時不會設想到黨校的問題的關鍵在什麼地方，所以有這個錯誤。

最後應當說，黨校揭露劉、鄧資產階級的錯誤路線並進行批判，比起在北京的各學校也好，各機關也好，是比較早的，十月中旬就開始了，所以，這一點應當說，我們黨校是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的。是不是黨校的同志特別了不起呢？不是的，劉少奇的錯誤路線，劉少奇的這套資產階級思想與黨校的問題比較很直接，關係很大，所以容易使同志們想到這問題，同時我們黨校方面掌握黨內的材料多一些，瞭解材料比一般的學校，北大、清華多一些，這方面提得比較早一些。但是提得早這點，有一些同志不理解，個別的人，一些思想不好的人挑撥一下。貼劉少奇大字報的時候也還不是指名的（李文廣：指名的）指名。有的同志不贊成，不理解，反對，認為這是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其實這不是轉移，恰恰是開始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真正的總的關鍵的問題。當我們現在全國展開批判劉鄧路線的時候，回頭一看，更可以清楚，這是我們黨校的一樁好事，當時不贊同的是一時的、錯誤的、不對的。

但是，這個鬥爭沒有結束，像主席講的，這鬥爭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還會存在。而且關於劉鄧的錯誤路線，就是從黨校範圍來講，我們並沒有批深批透，就是黑《修養》這一本書也還沒有批深批透。所以，這件事還是很艱巨的，但是與我們黨校的鬥、批、改有直接的關係。我不是經常講嗎，我們的方向是什麼？我們黨校叫高級黨校，過去在楊獻珍、林楓領導下，實在不高級，毫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怎麼會高級！不要弄得這麼大，不要吹得這麼厲害，看房子，龐然大

物。那不是高級，是低級。我經常講，如果我們能夠辦成一個學習，宣傳，研究毛澤東思想的訓練班，那我們就是了不起的。因為方向應該是這樣，澈底地把反毛主席的頑固堡壘打爛、打碎，在思想、在理論、在哲學、政經、黨建、各種思想上、各種組織上，黨的工作上澈底地摧毀這一個堡壘，建立一個完全是新的以毛澤東思想為領導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學校，這是我們的前途。所以，我們與劉鄧路線的批判直接有關，對我們今後的鬥、批、改，對今後黨校怎麼建設有重大的關係，能不能真正把黨校建設成為毛澤東思想掛帥的學校，應當說，這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僅僅走了幾步，重要的問題還很多，很多，現在同志們很積極地進行這工作，這很好，我只有幾點意見貢獻給同志們：

第一，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必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因為你要批判劉鄧路線，拿什麼武器？就必須拿毛澤東思想的武器，必須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著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很好的機會。林彪同志講過，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帶著什麼問題？當前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批判劉鄧的反動路線，帶著這個問題去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剛才和同志們講了，我簡單的經驗，分幾個時期：抗戰以前，解放戰爭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看各個時期、各個問題上，劉少奇怎麼講的，看毛主席的毛選裡怎麼講的，這樣對照起來一看，帶著這樣的問題，然後去看毛主席思想，就立刻看出來了。我們過去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選時，是很不深入的，是很膚淺的。反轉來，帶著這個問題學，把毛主席的正確的思想同劉少奇的反動路線、思想對照地看，就更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更可以進一步理解，體會毛主席著作。舉個例子，把黑《修養》用《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對比起來看，抗戰前，毛主席說，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然後看劉少奇，他對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農村包圍城市，建立根據地，搞的是什麼？抗日戰爭的時候，要不要政權，敢不敢奪取政權，如何奪取政權？你把毛選裡所講的問題和黑《修養》具體地對照看一看，黑《修養》最大的問題是不敢接

觸政權問題，因為革命的最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在全國，解放以後中國到底走什麼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看看毛選上怎麼說的，再看看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砍掉合作社的問題，不贊成農業合作化，對比來看，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一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所以我說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澤東思想，就是林總所說的，要帶著問題學，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再增加一句，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批判劉鄧，黨校同志佈置了寫文章，這件事情必須聯繫到當前的階級鬥爭，必須聯繫到黨校的鬥爭，聯繫到劉少奇在黨校放了什麼毒。我提議黨校批判劉鄧路線可以列一個計畫。也來一個一評、二評、三評、四評……九評，看評的怎麼樣就是一個問題評一下，一個問題評一下，根據黨校，也根據他的言論，有計劃地寫，總而言之，要看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是政治問題，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不是單純的理論問題。過去黨校的同志寫文章常常是這樣，我說黨校長期不是政治掛帥。所以，不是政治掛帥，就是不是馬列主義掛帥，不是毛澤東思想掛帥，是資產階級思想掛帥。是脫離現實鬥爭的。我們批判要聯繫到實際問題。

第三個問題，在批判鬥爭中要促進我們黨校革命的大聯合，促進黨校革命的「三結合」，也促進黨校實現革命的委員會。在這方面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同志是願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方面的，願意批判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是願意投身到這個鬥爭中的。在我們的大方向中促進我們革命的大聯合，促進革命的「三結合」。在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劉鄧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的這樣一個原則鬥爭中促進我們革命的大聯合，促進革命的「三結合」。我相信，這是我們團結聯合的基礎。我們黨校是有條件的。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通過這樣的鬥爭，使有些同志的思想解放了。不可諱言，在過去長期劉鄧路線統治著黨校，在彭真黑幫、安子文、楊獻珍這些叛徒們領導黨校的時候，我們有些同志犯了錯誤，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這一點在過去，無論是在楊獻珍時代，王從吾時代，林楓、賈震時代，有的同志犯了錯誤，主要的責任不是這些同志們，主要的責任是他們。

我剛才講了，這個蓋子，那麼大，又那麼厚，那麼深，那時候要同志不犯這樣的錯誤，不犯那樣的錯誤是比較難的。所以，在那個時候，同志們犯了錯誤，特別是老的在黨校工作的同志，應該思想解放，他們自己也可能有缺點，有錯誤，自己檢討。但是，不能把它作為沉重的包袱。應該看到，這是劉鄧路線，彭真、安子文、楊獻珍叛徒們給他們的危害，應該把矛頭轉向他們，應該自己解放自己。自己也這樣看。沒有犯錯誤的同志對他們應該這樣看。這樣，把我們的有些同志，特別是工作很久的同志，思想上解放出來，把他們的積極性、革命性大大提高起來。這不是安慰同志，這是事實。不揭開蓋子，看不清楚這個問題，一揭開這個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沒有錯誤的同志，即使是受楊獻珍打擊的同志，在那種情況下，他們也沒有敢於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紅旗。所以，在楊獻珍時代，在王從吾時代，在林楓時代，犯了這樣的錯誤，犯了那樣的錯誤，甚至有的犯了原則性、嚴重的錯誤，自己自我批評了，同時，又應該積極地看到，要把矛頭對準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這一點，我想沒有犯錯誤的同志，後來的同志，在黨校工作比較久的同志，對犯錯誤的同志，應該諒解他們，幫助他們；不要歧視他們。犯過這樣那樣錯誤的同志，自己通過思想檢討振作起來，不要灰溜溜的，現在容易看懂這是怎麼一回事；應該堅強起來，站在革命方面。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我們通過鬥爭，可以把有些同志，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思想解放出來。當然，這需要同志們自己努力，其他的同志應該幫助他們。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具體地講。過去「紅戰團」的同志，尤其是青訓班，青（34）的同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時候走錯了方向，犯了一些錯誤，我想通過文化大革命應該解放他們。這個問題，本來在一月十一日以後，我就同李廣文同志、武葆華同志、智純同志、桑子楨同志，談過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是這樣的，

它是一種社會思潮，它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對這個問題，我們的方針應該是區別對待，把「紅戰團」有些思想意識不好的、個別的頭頭，同群眾，尤其是青年，完全要區別開來，這些同志絕大多數還是好的，一時受蒙蔽，不能把一些不好的人，像你們所講的盧國英、周維煌、劉揚之等人，通通和青年，和剛從學校畢業的同志，看成是一樣的，應該嚴格區別開來。這是第一。

第二，「紅戰團」這個組織，是經過文革小組批准了的，是反動的組織。但是，不能說加入「紅戰團」的每個人都是反動分子，絕大多數還是革命的。這一方面，當然在鬥爭中，雙方，「紅戰團」，以及工人的組織……叫什麼？（李廣文同志：工人造反團）啊，工人造反團，尖銳鬥爭得厲害，一個時候思想轉不過來，進行適當的批判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扭住這個不放。要允許人家犯錯誤的；人家犯了錯誤，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允許人家革命。接班人的第三個條件，不是還講到要團結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於是反對我們意見的人，只要那些人不是赫魯曉夫式的人，不是反革命。這方面，有些青年犯錯誤，完全不是他們的責任。我講，青訓班的同志們犯了錯誤，這筆帳完全應該由鄧小平、彭真、林楓、郭影秋他們負責任。甚至於，我去年八月份同同志們講了，我談起這個問題，我們自己都有責任，為什麼我家的孩子，陳伯達的孩子不准他們來，你不准來，為什麼叫人家的孩子來，所以，我們也有責任，所以，青訓班犯過錯誤的同志要解放。要幫助他們振作起來。

我經常講，在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是幸福的，要珍惜這個幸福，這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實在是千載難逢的事情。青年一般的都應該有雄心，應該有壯志，既然有雄心壯志，一條就是敢於承認自己有錯誤，有這個勇氣，錯了就改嘛！這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勇敢的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有雄心壯志的青年。第二，就是要認識錯誤，堅決下決心改正錯誤，列寧在《左派幼稚病》裡不是講過嗎？有本領的人，能幹的人，不是不犯錯誤，不犯錯誤的人並不是有本領，能幹的人。有一個老本子上翻錯了說，「聰明的人不犯錯誤」，那個字不是「聰明的」另外，拿中國的話說，聰明的人好像是玩點滑頭，完全不是那個意思，而是「有本

領的人」，「能幹的人」。不犯錯誤的人，不是有本領的人，有本領的人，在於不犯大錯誤，犯了錯誤立刻改正。所以，青年人犯了錯誤，也有一個好處，他經過一個挫折。毛主席講過，他如果覺悟了，還可能壞事變好事，他有了免疫力。所以不要因為自己犯了一些錯誤就抬不起頭來。還有，沒有犯過錯誤的同志，覺得看不起人家，這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覺得，對青（34）的同志，對青訓班的同志，應該幫助他們，教育他們，吸引他們共同在毛主席思想，路線偉大紅旗下，和我們一道共同進行反對劉、鄧路線的鬥爭。在這方面，他們過去並不是沒有作的，不過就是開始的時候，沒有完全把方向擺正。

另一方面，「紅戰團」的工人同志他們更沒有責任。開始八月我講過黨校的問題是長期抵抗毛澤東思想，頑強地抵抗。對我們工人同志來說毫無責任。他們不瞭解，所以他們一時把方向弄錯了。應該說他們絕大多數都是要革命的，他們自己也檢討了，我們應該幫助他們。不要揪住不放，相反應該幫助他們。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還是不允許，這個問題是個原則性的問題。毛主席思想是允許犯錯誤，給他機會改正錯誤。從街上大字報也可以看到，我們昨天晚上根據毛主席的命令把逮捕的聯動的頭子釋放了，統統放出來了。告訴他們，你們願意組織聯動給你們房子，你們組織好了，你願意打電話給你電話，你何必夜晚偷偷摸摸幹見不得人的事情？天天同死人打交道，跑到八寶山去上墳、喝酒、吃貓肉，向墮落的方面走。他們是青年嘛，把他們放出來，一方面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如果不改正錯誤再經過一次挫折嘛。難道共產黨員還不如孔明，不如諸葛亮？諸葛亮還七擒孟獲，七縱七擒。難道咱們共產黨人連一縱也不敢縱，那還行？所以在這方面我講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給改正錯誤的機會，說明他們，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歡迎人家微小的進步。

當然各個單位在鬥爭中是有些問題的，談談是必要的，適當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搞過火了，不要打擊面寬了，不要過於歧視他們，要去幫助他們，要去接近他們。這方面要掌握政策。這是革命造反派內部很重要的任務，不然我們怎麼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而且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覺得通過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澈底批判劉，鄧資產階



級反動路線的時候，要把一些同志們的思想顧慮解放出來，提高他們的積極性，提高他們的革命的精神。青年人敢闖，敢幹，敢講的精神還是好的。這是一方面。

總起來就是說，在批判劉、鄧路線時必須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批判劉、鄧路線必須政治掛帥，必須聯繫到我們實際鬥爭。批判劉、鄧路線要促進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促進成立黨校的革命委員會。批判劉、鄧路線的時候要使同志解放他們的思想，提高他們的積極性，革命性。把我們黨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徹底。把我們今後的鬥、批、改搞徹底。經過鬥爭真正把黨校長期抵抗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徹底摧毀。建成一個新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毛澤東思想學校。這是我們的任務，我們的前途。

今天我就講這幾點。<sup>34</sup>

## 周恩來、康生等談山西問題（1967.4.23.）

王力：自吹自擂，驕傲自滿，盲目樂觀，脫離群眾，急於求成，好大喜功。

（指劉貫一三·二六報告，劉是山西省副省長）……（接談劉貫一問題）

關鋒：思想問題。

康生：原則問題。

關鋒：學過去的省委，當前階級鬥爭沒有講，對當前的形勢分析是空空洞洞的，抄了些社論，下邊是自吹自擂，這就反映了對中央的態度，對主席的態度，對群眾的態度。

周總理：這個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

關鋒：把黨中央、毛主席放在什麼位置上？把群眾放在什麼位置上？

<sup>34</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康生：這是可笑（指祕密活動到公開活動）這是一貫的世界觀上的問題，對待群眾的態度也是非常嚴重。

周總理：這反映了貫一沒有具體和群眾接觸（指三個月鬥、批、改的問題）。他們事先也不討論，這比衛恒過去還厲害了。

（指三·二六報告）

關鋒：這個報告不能等閒視之，像這樣的報告轟也應該，是正常的，在北京的話，早就炮轟了。

康生：不僅是炮轟，早揪出來了。

周總理：夠典型。

關鋒：袁振的大字報很多，袁振也可以說，你在搞鬼。與你們的四人聲明有關。在大學中對袁振早就有兩派；一派說袁振是堅定的革命左派，但忘記了袁振軟弱的一面，另一派說袁振是叛徒，這個問題早已存在，昨天有人來問，我想這些問題反映了貫一同志思想上的好多問題。

關鋒：看來你們以後還要打內戰。

康生：日清同志對貫一的態度，不會對他有什麼幫助。（張日清是山西省軍區司令）

康生：核心小組不團結，劉貫一同志責任多。昨天老陳（守中）不講原則問題，講了那麼多亂七八糟問題。給劉志蘭貼大字報，我看該貼。你們還追查誰是後臺？我看誰是後臺，貼貼總是有好處。

你們劉志蘭對李雪峰的問題，中央給你們打過幾次招呼，就是不聽，你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住在京西賓館，不報告中央，搞自己垮臺聲明。

周總理：劉志蘭思想水準差，她的行動就證明瞭她。像派人到天津去。中央已說了話，毛主席讓李雪峰到天津去考驗，把那兒的工作搞好再回來。據說張日清同志說：「劉志蘭說過『不打倒李雪峰，死不瞑目。』」這究竟是搞革命，還是搞個人報復呢？劉志蘭這樣的思想作風作核心小組成員有點不夠格。我同意王力同志說的，格平同志不表態比表態好一點，不然就捲進去了。他的缺點

是沒有堅決站出來，提出原則性問題。現在不作組織結論，現在先解決你們的問題。……<sup>35</sup>

## 中央首長接見四川代表時的談話（1967.4.25.）

【中央首長：江青、王力、戚本禹、關鋒、楊成武、謝富治也參加了接見】

陳伯達：周總理、康生有點事，等一會來，請大家發言。

代表控訴：（川大八·二六）

王力：同志們，四川的材料，各個縣的我們都印出來了，交給中央首長去看了，是不是大家發言，各專區推選一個代表。

重慶無產階級工人造反軍代表黃康發言：揭露李井泉收買8·15頭頭，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代表發言：問有沒有軍委命令，撤銷「紅總」，楚平、韋傑答覆（韋傑站起來不語）

江青：中央沒有過。

眾呼：毛主席萬歲！打倒韋傑，打倒甘渭漢！

王力：剛才有同志提出，請韋傑副司令員答覆，是不是中央軍委有取締後字242的命令？

韋傑：這個命令沒有，工程學院這個事情是軍區黨委研究的。

問：為什麼盜用中央軍委命令？

韋傑：我們沒有這樣做，可能是軍裡沒有聽清（群眾紛紛揭露他們盜用中央軍委的名譽）

王力：天保放出來沒有？（重慶代表揭露還有許多同志沒有放出來，關在中美合作所監獄。）

<sup>35</sup> 山西太原機床廠《四野》，1967年6月24日。

江青：韋副司令，你聽到沒有？馬上釋放。

眾呼：毛主席萬歲！打倒韋傑！打倒甘渭漢！（重慶地區揭發）

王力：請大家簡單點，四川的情況中央已經清楚了，重慶也很清楚。

江青：請樂山代表發言。（樂山代表發言略）

十時十分總理、康生同志到會，會場高呼毛主席萬歲！

樂山代表談昨天還抓了五人。

總理：昨天還抓五個人嗎？（大家要求發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動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聽不清，講的慢一點，聲音不要太大。

樂山代表：有一軍分區支援的反動組織一面旗子還有江青同志的私章。

江青：我沒有私章。

總理：有個張家口軍事學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見中央軍委，就這裡談吧！

王行虎：有人說，江青同志說：甘渭漢是好人，辦了壞事，我決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說這樣的話。（江青笑了）

總理：南充軍分區司令員自己來揭發，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發對牛鬼蛇神，大掃除，要多抓，抓頭頭，這就是佈署，南充代表談到還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來北京。

總理：他們住在哪兒？

南充：住西直門，具體住哪兒，他們不告訴我們。

總理：把名單開來。現在談萬縣問題。

萬縣代表：軍分區用機槍掃射學生，最小的才六歲，叫舉手，有一個學生提褲子被打了一槍，腸子打出來了，這學生臨死前用手指沾血寫了「我是革命的人」幾個字。

新北大萬縣調查組：韋傑在西苑旅社開黑會，四點指示：（一）原則堅持；（二）錯誤檢查；（三）支左工作他們說錯了，我們說對了；（四）總的由軍區負責。

萬縣公安局打電話回去說：我們一到站就被包圍了。因此，許多保字型大小組織打死人不下五十人，軍分區第一次就打死五人，傷九人。

萬縣的發了言。

總理：請涪陵的發言。

廣元部隊：我是總參三部派往廣元的部隊，（1）綿陽軍分區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個科；（2）二月二十一日軍委（成都軍區電報）說：這是絕密文件，內容：各部隊修築堅強工事準備一個月糧食設置指揮員。（3）調一個營到綿陽鎮壓造反派，部隊打電話詢問中央，軍分區對他們大不滿。（4）派人控制火車站，抓告狀的，組織政法小組。

「十條」以後，軍分區派人去控制7012部隊一個營。

總理：今天開會到這兒，明天請梁新初司令員開個小會，大家談談。

林躍東：控訴新華社四川分社，受成都軍區迫害的情況。

林：韋等質問我們，為什麼要報導成都兵團？要我們報導發行主席著作，說我們配合反革命，小心你們的狗頭。

伯達：今天開到這裡，後天再開。<sup>36</sup>

## 周恩來、康生接見山東代表團王效禹、楊得志等人的講話（1967.4.26.）

【26日晚四點至十一點，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大廳接見了山東王效禹同志，楊得志同志，袁升平同志以及其他山東代表，參加接見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謝富治、張春橋、肖華、楊成武等同志，其中周總理、康生、王力、關鋒自始至終與山東代表團在一起，其他首長因工作忙，不能同時接見，中央對山東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視的，專題接見，晚上和效禹同志一塊吃飯，王效禹同志作了彙報，其他人作了補充，最後楊得志、袁升平也作了彙報，後來周總理講了話，大致是五個問題。】

<sup>36</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 (一) 山東省革命委員會集中領導要加強，部隊除了軍隊指揮大權以外，其他各種大權都歸省革委，大軍區也參加革命委員會，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員，楊得志作副主任委員。
- (二) 回去後部隊要開會，要把思想問題解決一下，包括縣人民武裝部以上的都要參加，一周的時間差不多，中心研究支左工作問題，部隊領導同志要作自我批評，王效禹同志也可以去講講話，給大家鼓鼓氣，中央文革、中央軍委也去幾個人也講講話，表示對大會的支持，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完全撤回整訓。
- (三) 二師要用野戰軍把他吃掉，並從原地撤離，改變性質。
- (四) 濟南公安局的部隊要撤出，要放手讓革命造反派去把他衝散。
- (五) 各地革命委員會，部隊不能作第一把手，根據這個意思，回去起草個核心小組，報請中央。

接著康老講了話，大致四個問題。

- (一) 左派組織。山東的左派隊伍不錯嗎！（指紅衛兵山東指揮部，山東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山東文藝革命造反司令部）。（這時效禹同志插話：只要統一認識，左派隊伍是聽革命委員會的話的，叫幹啥就幹啥）這就好嗎！北京就不行，我們說了他們還不聽，主席講：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王竹泉插話：人家都說山東的造反派太溫和了）這是你們的優點，不是你們的缺點。
- (二) 關於公安局。省革命委員會同志做了彙報說：「造反派不敢動，一動就說反對解放軍。這算什麼解放軍，這是公安縱隊，他們和當權派混在一起，內蒙就有三個獨立團反對毛主席嗎！市公安局的解放軍是屬於地方部隊的，撤出去！」
- (三) 市武裝部。武裝部就是穿著軍衣的地方幹部。
- (四) 公安縱隊所以站在保守派中間，不但山東的問題，是帶全國性的，這有一個教訓，就是反羅瑞卿反的不澈底，（張春橋同志插話，黑字紅衛兵有多少人？黃字紅衛兵有多少人？王竹泉答：黑字兵有五、六千人，黃字紅衛兵有幾萬人。張春橋繼續講：差的太懸殊了，這麼少人，還是保字派！怎麼能支持他呢？）（接著

革命委員會的同志彙報了黑字兵要抓王曆波王路賓的問題）張春橋同志又說：讓他抓，抓才好禮，事情就是這樣，到了一定的火候，就好辦了，一抓基本他們就垮臺了。關鋒插話說：你們對公安局，武裝部太輕視了，他本來就是壞的，圍攻公安廳是他們挑動的，你們安排一下，濟南起火有人救，交通有人管，叫公安廳管起來就行了，公安局放手讓造反派衝，衝垮了完了。我們不提武鬥，如果他們非給我們頂牛不可，武鬥就武鬥，你們造反派要學會爭取群眾，楊毅犯了嚴重的錯誤，要批判，但主要應解決公安局，武裝部的問題，高明智要撤職。肖華插話：山東支左誰主持的？袁升平答：張仁初！肖華說：怎麼能讓張仁初主持工作呢？他是有名的張二瘋子，袁升平你應當自己抓起來。周總理插話說：支左辦公室要撤回，統一歸省革命委員會辦公室管，楊得志插話：我們怎麼聽到的反映和王效禹聽的反映距離太大了！肖華說：這有什麼奇怪的，就是嘛，你的屁股坐錯了，高明智大家批判了他，怎麼能叫他掌握公安局，武裝部呢？怎麼不讓群眾討論呢？康老插話：有些不是調離，而是要撤職，像高明智。<sup>37</sup>

## 中央首長接見內蒙赴京上訪人員時的講話 (1967.4.27.)

【時間：四月二十七日，地點：人民大會堂。接見人：周總理、伯達、康生、謝富治、肖華、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內蒙軍區吳濤、劉華香。被接見人：「無產者」方面數千人，呼三司數十人，北京「紅代會」數千人。】

<sup>37</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 周總理講話

同志們！請坐好，退場的請回來，如果不願意回來的嘛，你們就別回來。請坐好，凡是要回來的，把門打開，讓他們回來（鼓掌）。把簾子拉開，不要擋住！

同志們！現在開會（鼓掌）。現在學習最高指示，打開主席語錄第二百一十九頁。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鼓掌）

最近這些天，因為內蒙古，特別是呼和浩特來了一些人，到北京來，一直到中南海門口去靜坐。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叫我們來給你們開一個會（鼓掌，長時間呼口號）。因為這個會不是簡單的一個會，在北京發生這樣的事情，可以說還是頭一次。所以我們也邀了在北京的紅代會的各方面的人來聽一聽（鼓掌，呼口號）。這個問題是由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發表以後發生的。我們首先請內蒙軍區副司令員劉華香同志把他們內蒙古軍區所作的檢討先講一講。

（劉華香檢討附後）

同志們！（鼓掌）我現在把今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今天在會場上也發給大家了）再作一點解釋（鼓掌）：

這個決定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商量起草，然後又經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我們的副帥林彪同志批准的（長時間的鼓掌，呼口號，我們理解你們的心情，喂！靜一靜！（繼續口號）同志們！同志們！我們理解你們的情緒，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繼續鼓掌）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不要



再鼓掌了，同志們，我們理解你們的情緒，我們理解你們的情緒，你們聽我講嘛！同志們（鼓掌），不要鼓掌，聽我講嘛！內蒙問題是在二月初兩聲槍聲從內蒙古軍區打出來以後中央就過問了。從那時起，經過兩個多月，我們經常把瞭解的情況都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報告過。我們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同志，也經常交換意見。你們來到北京的各方面代表，我們都接觸過。所以，經過各方面接觸，研究，調查以後，並派了兩次調查組去。經過研究以後，最後我們才起草了這個決定，才經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批准的。這個內容我把它講清楚，你們可以冷靜的聽一聽嘛！聽清楚以後，你們再有什麼話，你們再要求、再提嘛！

這個決定一共是八條：

第一條，說明內蒙古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一直聯繫到它的責任。第一段，「內蒙古軍區的個別領導人二月五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嚴重打擊了呼和浩特三司等革命群眾組織，大批逮捕了革命群眾，支持了內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等人以及他們操縱的保守組織」。

這一段我首先說清楚，就是什麼人負這次事件的主要責任，這裡就很清楚了。首先是烏蘭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倫，他是操縱了這次事件的。你們大家都曉得，烏蘭夫已經早就揪出來了，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可以說在內蒙古是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他揪出來以後，就沒有回呼和浩特去了。但是它的代理人王逸倫，現在查明他是叛徒，是反黨分子，他是什麼時候加入黨，經過調查以後也證明是假的，沒有根據的，是混進黨裡來的，並且在日偽的時候，他就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偽滿蒙，然後又成了蘇修的情報員。當時日本投降以後，就是這樣的貨，就是這樣的角色，混進黨，竊踞了內蒙古負責的地位。在這次烏蘭夫這個內蒙古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被揪出來以後，他就在內蒙古起了代理人的作用。還加上一個助手，叫王鐸，和王逸倫是一夥。在這樣人的操縱下（長時間呼口號，還是有人喊，聽不清），是啊！（繼續呼口號）好了，好了，好了，同志們，你們弄清楚了，這次

事件的最大的操縱的頭頭是烏蘭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倫，王鐸之流。這是主要的。你們要相信黨中央的揭發。

那麼，僅僅是他們這幾個人還不行啊，他們一定要有一個依靠啊！所以他就利用內蒙古軍區某些領導人的一些錯誤的想法，錯誤的立場，來操縱，來挑撥。因此，我們指出來內蒙軍區個別的領導人。為什麼不點名呢？我們照顧我們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榮譽，而且我們要考察個別領導人究竟他們承認錯誤是真的，還是假的。有的比如說，這一次這個決定宣佈以後，剛才劉華香同志宣讀了他們五個同志的檢討，劉華香和吳濤同志留在這裡開會，回去的肖應棠同志就站出來作了比較好的檢討，可是其他的還沒有檢討。所以是考察考察，到底這些軍區的個別領導人認識錯誤是誠懇的，還是不誠懇的，我們還要看一看。所以，當時不用點名的方法。這也是給群眾通過鬥爭和運動來鑒別他們（長時間呼口號。有人喊：「我們想念毛主席」！）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同志們！現在（連續呼口號，有些人還在喊。康生同志插談：不要搗亂！）同志們！同志們！（連續呼口號）喂！同志們！同志們！你們要聽我講，我們幾個同志是受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委託給你們講的嘛（鼓掌）。如果你們不聽我們的（長時間呼口號），同志們！（繼續呼口號，吹口哨）同志們！同志們！我再要求你們一次，你們是聽話的吧！你們得聽我講完以後你們再喊口號嘛！（鼓掌）！（康生同志插話：你們要聽黨中央的話嘛！同志們，你們相信不相信我們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相信不相信？群眾答：「相信。」如果不相信的，立刻走出去！我再說一遍，如果你們不相信，立刻走出去！）同志們，冷靜一點，冷靜一點，我還繼續講。因為今天內蒙古軍區部隊個別領導人站在錯誤的立場和錯誤的認識上，就發生了一系列的錯誤。

從二月五日以來，為什麼說二月五日以來呢，就是說二月五日就從軍區裡頭打出來兩聲槍聲，打死一位同學叫韓桐。現在清清楚楚查明了，軍區自己也承認了，就是在軍區外邊，就是軍區訓練部副部長柳青打的，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派了內務部長曾山同志去，帶上化驗員親自去驗屍查明了的，這是真的嘛！所以，年輕的小將們，你們不要受蒙

蔽。有人說，這個槍是「三司」他們自己打的，盡是造謠誣衊，可是子彈頭子在韓桐的身上，我們取出來了，子彈殼子也得到了，證明是軍區內部打過來的，而且這個人就是軍區的訓練部副部長柳青，是千真萬確的事情麼。但是有許多同志受蒙蔽，所以需要給你們講清楚嘛。你們受騙了麼，你們遭殃嘛！因為從那個時候以來，軍區的負責人受了王逸倫，王鐸他們的挑撥、操縱，打了槍，還不認帳，就發生了一系列的錯誤。在支左工作上支錯了，把本來的造反派，打擊了，把他們的代表的人打死了，這不就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了嗎！這不就和劉鄧反動路線一樣嗎？軍區的個別領導人不能推掉這個錯誤、推掉這個責任！剛才劉華香副司令員，他自己給中央的檢討，清清楚楚在這兒念了嘛，白紙黑字，我們收到的嘛，而且在中央的決定之後嘛！是四月十六日他們開了會寫的，念給你們聽了嘛。所以，他們這種打擊和呼呼和浩特的，實際上不止呼和浩特一個地方，還有其他地方的「三司」等等的革命群眾組織，這個事實在做錯了的，不應該打擊，不應該取締的。比如，河西公司「八一八」就被取締了，大批的逮捕了革命群眾，這也是事實嘛！我們去人檢查了。並且一直到四月份還有人被關著，命令他們才放了的！我們見了不少這樣代表在北京，把手捆起來，受了傷，這樣的人不少嘛！我們親自見了的！這種作法，甚至有的被打得神經錯亂了。這都不對嘛。可能現在還有個別地方沒有放完，還要清查。軍區支持了內蒙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等人（就包括王鐸了），這些都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拿槍桿子執行反動路線，多危險嘛！全國第一個從軍區裡打出槍來的是內蒙古軍區。中央看到，立刻打了電報去了。當然，電報提出的那個話，左派登在小報上，我們批評他們不要登報，左派很快地承認錯誤，沒有再登了，可以講道理的嘛！事情是實際，要查清，現在查清了。

至於這一段最後一件事，就是他們操縱了一些保守組織，軍區也支援了。我要講一講，這個保守組織，可能你們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看清楚。什麼叫保守組織呢？就是本來一些組織，或者學生，或者工人，或者農民，或者機關裡頭的一些群眾的組織，可能這裡頭大多數主觀願望

還是要革命的，可是他的領導人，高級領導人，比如聯合起來的組織，什麼「工農兵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就是說上層領導人，他就跟王逸倫、王鐸常常連在一起了，被他利用，被他操縱了。你們不曉得，他就操縱這些組織。號召這些組織去砸三司，砸那個「八一八」，把人家抓起來，說他們是反革命，說他們衝軍區是反革命，把他們捆起來，抓到公安局或者捉到軍區，就做了這些事。實際上呢，變成了保王逸倫了，保王鐸了，保軍區的錯誤了，這不就是保守派嗎！所以，這個保守組織，由於這樣，你們的行動，證明瞭它是保守組織。但是，我們在這裡告訴你們，我們不因為你們是保守組織，就認為不能教育了，我們要教育你們，所以你們到北京來，來這麼多人，當然有人縱容你們來的，我們先不管，對你們這些人，我們要說清楚，只要你們願意革命，我們是支持你們革命的（鼓掌），但是有一條，你們必須跟這些反動的頭子，蒙蔽你們的頭子要劃清界線，應當把你們的頭子揪出來（鼓掌）。你們看吧，今天這個會場上，我們得到主席、林副主席命令來召集這樣大會，要給你們講清道理，就有人吹哨子把你們搞走了，欺騙你們麼，要把你們和中央隔離起來嘛（鼓掌），你們日夜想念毛主席，我們現在向你們傳達毛主席的聲音，他都不讓你們聽（鼓掌），你們想想吹哨子的讓你們走的對不對？（群眾答：不對）是嘛，他們少數人就起鬨，將來叫你們遭殃，他們在旁邊看笑話。所以，我們說你們的組織犯了保守的錯誤，是受他們操縱的，一點不冤枉，你們並不清楚，給你們講清楚，你們就會覺悟了（鼓掌，呼口號）。毛主席，林副主席讓我們接見你們，就是這個意思。你們想革命的好意是好的，我們應該鼓勵你們，但是你們必須要跟那些反動的傢伙，反動的頭子劃清界限（鼓掌），至於保守的組織呢，那還是可以革命嘛，你們只要跟欺騙你們的頭子劃清界限，你們這個組織還會存在麼，我們這個決定上沒有說要取締你們這個組織，只要是群眾組織我們不採取取締的辦法（鼓掌），允許你們在行動中改正你們的錯誤麼。

第二段，內蒙軍區黨委某些同志，不經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把軍區黨委書記、副政委吳濤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還擅自逮

捕已經站在革命組織方面的自治區黨委書記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等同志，並宣佈他們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

這點給你們解釋一下，吳濤同志就在這，介紹一下（鼓掌），我告訴你們，吳濤同志他不是烏蘭夫那個集團的分子，是有人誣衊他，故意的要陷害他。他原來是在東北做工作的，曾經在我們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同志那裡做工作的，他是蒙族，所以把他派到內蒙古作第二政委。去年夏天華北局揭發烏蘭夫反黨活動，修正主義的活動的時候，吳濤同志也是站在黨的正確的革命的路線方面揭發烏蘭夫的（鼓掌）。所以，內蒙古軍區黨委的一部分人陷害他，說他是烏蘭夫分子，並且把他打成三反分子是錯誤的。現在內蒙古軍區黨委承認了這個錯誤，中央恢復了吳濤同志的工作（鼓掌）。而且這件事情做的非常無組織無紀律了。因為他們把吳濤同志作為三反分子隔離起來，抄了他的家，切斷他的電話，都沒有向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報告過，你們想想吧，多大的無紀律行動。我們軍隊是最大的集中的組織嘛，他們這樣的沒有紀律。這回他們承認了。

第二就說到自治區黨委的同志，就是在烏蘭夫離開自治區黨委書記職務以後，我們因為烏蘭夫的問題還要繼續深入的揭發，所以自治區主席的名義還沒有正式取消，當然他不能夠做工作了，停止了他的工作，自治區黨委就重新改組了，由高錦明同志來負責。這個時候王逸倫、王鐸這些人就把高錦明說成是烏蘭夫分子，這也是捏造。因為事實證明在去年華北局揭發烏蘭夫是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當權派之前，高錦明同志是在內蒙古做工作的第一個揭發烏蘭夫反黨的。因為你們都不清楚，所以今天講清一點，他第一個揭發的嘛。後來在華北局的會議上，他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跟烏蘭夫公開的鬥爭，這怎麼能說他是烏蘭夫分子呢？是誰說的呢？就是剛才說的，王逸倫這個叛徒跟王鐸這樣的修正主義分子造謠誣衊他的。在揭露烏蘭夫的時候，王逸倫躲著就沒有來，躲起來，說他病了。王鐸跟劉景平兩人在會議上跟烏蘭夫哭了，兔死狐悲呀！這件事，我們中央是很清楚的！剛才康生同志說的一句話，我們開會前談的，華北局如果說他們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有很多錯誤，但是，這次揭發內蒙古的烏

蘭夫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三反分子，這件事情是華北局，李雪峰同志一個很大的功勞，消除了我們對北方的邊防，面對著蘇修、蒙修的最大的隱患（鼓掌）。這一點，今天給在北京的革命同學來講一講有好處，因為你們也不懂得這件事（鼓掌）。

關於權星桓、康修民，他們的態度很明朗。他們開始也是承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六、七月的時候，是跟著劉鄧反動路線走的，但是，黨的十一中全會以後，特別是十月工作會議以後，他們逐步認識了錯誤，他們就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了，自己檢討自己的錯誤，就站到革命派三司方面。這種態度是好的嘛，我們允許人家改錯革命嘛（鼓掌）！而這個時候他們已經站在三司革命派一起了。內蒙古軍區黨委反而說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逮捕他們，這是嚴重的錯誤。因為他們是自治區黨委書記嘛，你這個軍區怎麼有權捉自治區黨委書記，也不報告中央？所以，從軍區犯的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在全國來說，除去青海反革命的趙永夫那個特殊的情況以外，可以說是很嚴重的錯誤。所以，剛才軍區負責同志，他們承認了這個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

底下一段，至於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等同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有過的錯誤，應當接受群眾批評，在鬥爭中改正。就是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還有其他同志，他們過去所犯的錯誤，在某些方面還沒有檢討的話，允許他們檢討，接受群眾的批評嘛。當然了，今天他們既然已經站到革命派方面，我們就要採取歡迎他們的態度，允許他們改正錯誤，讓他們在群眾中跟我們一道，跟革命派一道，跟廣大群眾一道來首先揭發內蒙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和他的代理人王逸倫、王鐸這些人，也會聯繫到本人的錯誤，這有好處嘛。

第四段，「內蒙古軍區有些負責人，在中央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還採取兩面態度，進行對抗中央的活動」。

這個事實檢討上也說了，因為這個事情，是二月五日發生，中央就找他們來開會，開了兩個多月，中央解決過省市自治區的問題，最長的是這個地區，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因為為個問題複雜，牽連的很廣，所以我們很有耐心的跟他們來討論。當然，因為中央工作很忙，有工

作，要開會，不能每天開會，因而在時間上可能拖了些。他們對這個事件，當面承認錯誤，背後又另外搞一套。比如說吧，很早我們就跟軍區一方面，自治區黨委一方面，三司一方面，另外的工農兵等等的，組織一方面，還有無產者這一方面，我們說好的，我批准了九個要求，大家共同承認了的呀，可是過了一陣子就從自治區裡頭，從工農兵，無產者上層領導者嘴裡說出來，周總理說話不算數，沒有效了，弄得群眾當然就會糊塗起來，受蒙蔽，認為真的是這樣不算數了。後來，我們又派了一個正式調查團，就是由軍委總參謀部副總長李天佑同志為組長、吳濤同志為副組長，去了九個人吧，九個人的代表團，去把師範學院被包圍的情況調查清楚，也到軍區調查站在哪一方面，還調查河西公司的事情。這完全是根據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共同商定去作的。可是去了以後，從軍區裡頭，從工農兵、無產者方面傳出來，說九個人裡頭七八個人是右派。完全是造謠。因為那裡頭去了兩個記者，兩個記者就是在二月五日前後同情呼呼和浩特三司革命派的，他們也被捕了，這兩個記者是中央文革以「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記者名義派出去的。軍區不管他們是中央派的記者，也把他們逮捕起來了，並且還把他們的筆記本，日記本都沒收了。中央打電話去叫他們放，軍區還派人押解到北京來。我們叫他們回去把記者接過來以後，在北京的，他們的軍區一位副司令員黃厚同志；他們正在北京作為代表會談這個問題，他就帶這麼幾個筆記本一直不給我們，等到三月下旬了，三月大概是二十號左右，咱們見到這兩位記者了，才知道黃厚還帶十幾本日記本，等我們問他才承認，才交給我們。就是這樣目無中央。不僅如此，他們調查的情形，就是代表團調查的時候，他們居然聽信王逸倫那一派的人，弄了幾個人向李天佑同志來示威，使他們的調查工作不能很好進行。調查回來以後，居然從軍區，從無產者、工農兵那方面放出空氣說，是談判了，北京我們是找各方面代表來會談，商量辦法，解決問題嘛，他們說北京的談判是重慶談判。你們懂不懂什麼叫重慶談判？重慶談判是我們共產黨跟蔣介石的國民黨談判，那個時候，我就是代表共產黨去的。幫他們（鼓掌），那他們把我們中央看成什麼？重慶談判，我們跟蔣介石談判，那

是拖了，曉得蔣介石要打內戰，我們準備迎接他打內戰，但是要爭取時間，所以跟他談判是拖。居然內蒙古有人，軍隊裡的人，跟無產者、工農兵這些組織的頭子還有王逸倫、王鐸，還有他的妻子去宣傳這樣的話，說在北京談判那麼拖，只要我們這個組織擴大了，奪了權了，中央他們只能夠承認既成事實。你們聽聽這是什麼話，那麼，如果我們內蒙古的無產階級的政權被反革命奪去了，難道我們也承認嗎？（呼口號）是呀，你們受蒙蔽的同志想一想啊，把北京看成重慶，就是把中央看成蔣介石，他們是共產黨，或者反過來他們是蔣介石，我們是共產黨。你們想，他把內蒙古跟中央放在這麼一個敵對地位，居然有人聽，這還不是這一小撮壞人，反革命分子，還有一部分受蒙蔽、受操縱的人在那裡活動的嘛！所以，我們會談的時候遇到這些事情，就曉得這裡不簡單，這裡有人操縱。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軍區某些負責人是耍了兩面派的態度。這個兩面派的態度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停止，等一下再說。所以，我們說他們是以兩面派態度對抗中央。

最後一段，「內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負責」。

只是把這個判斷清楚了，首先是王逸倫、王鐸這個叛黨分子、反黨分子，他們是主要的操縱人。其次是軍區某些領導人，要看他這回在考驗中最後暴露得怎麼樣，表現得怎麼樣！當時我們已經覺察出來有些人不妥當了。現在還繼續再考察一下，最後總要宣佈。

第二個問題，「中央決定由原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同志擔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由吳濤同志任軍區政治委員，以劉賢權、吳濤同志為首改組內蒙軍區的領導，並對軍區發生的問題進行處理」。（鼓掌）

劉賢權是怎麼一位同志呢？他是在青海，他是司令員，被一個副司令趙永夫竊奪了軍權，蒙蔽了一部分機關內部的同志，把劉賢權用三反分子名義打，也是沒有得到他的上級軍區和中央軍委的批准，就把他免職了，把他關起來了。這位同志是受打擊的，受反革命分子打擊的。而劉賢權同志堅持了立場，對青海那次反革命活動，他是反對的，他是支持青海的革命派的（鼓掌），並且他給中央寫了信（後來我們很遲才發現），立場也



是清楚的。因為青海問題他現在去處理，處理得比較好。那個地方還有另外人可以接管他，因為內蒙是一個邊防前線，所以，我們把劉賢權調到內蒙古來作軍區司令員（鼓掌）。恢復吳濤同志政委的職務。他們兩個合作起來，以他們兩個為首改組內蒙古軍區，處理這次事件。但是劉賢權同志不能馬上就離開青海，需要一點時間，所以在他沒有去以前，由北京軍區派了一位副司令員騰海青同志趕到呼和浩特去，領導這個軍區來處理這些事件。但是，情況如何呢？他到了呼和浩特以後，就向軍區廣大群眾宣佈了中央這個八條，當時回應他的有軍區的肖應棠，也是副司令員吧？作了檢討。可是其他人的態度曖昧得很。因為這樣使騰海青同志就很難行使職權，受到反中央八條決議的群眾的圍攻。這個地方可以單獨分析的，帶頭的，一定有壞人，使廣大群眾受蒙蔽，受欺騙，就使騰海青同志不可能執行職務。軍區的門，過去你們不讓人家進嘛，好，現在把軍區的門四門大開，不僅軍區的軍事人員，就是非軍事人員也可以出出進進、穿堂若市，根本不可能辦公了，使騰海青無法執行職權。所以，現在騰海青同志他的工作地點只能在呼和浩特鐵路局，因為那個地方軍管了。所以這個情況就說明內蒙古軍區的一部分領導人還採取兩面的態度。不僅是到北京的人受他們蒙蔽，受他們欺騙，在內蒙古也有一小部分人，是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跟你們講清楚，軍區機關嘛，中央的命令嘛，等一下子由肖主任講一講。事實證明，處理這件事情在軍區的領導人中是有些阻力。有些繼續搞兩面派的態度，我們必須揭穿。中央和軍委這個決定必須執行！（鼓掌）

第三個問題，「成立以劉賢權、吳濤同志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可以參加籌備小組。自治區黨委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等同志經過革命群眾同意也可以參加籌備小組。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負責籌備建立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領導內蒙古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負責處理善後問題，並且組織抓革命促生產的班子，把工農業生產和財貿工作管起來」。

這一段是說今後的工作。就是軍區改組了，那麼內蒙古的工作怎麼領導呢？我們決定要成立以劉賢權和吳濤兩個同志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

員會的籌備小組。因為現在內蒙古通過大批判、大聯合馬上成立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條件還不成熟，所以，開始先搞一個籌備小組來推動這個工作。這個籌備小組，由劉賢權、吳濤兩同志負責來組織的。首先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可以參加籌備小組，因為過去受了壓迫，受了打擊嘛，證明他們是革命的左派嘛！無產階級革命派嘛！他們應該參加。次之。比如現在很多的保守組織，它的基層群眾，我們相信絕大多數還是要革命的，是受了蒙蔽，受了欺騙。只要你們覺悟起來，跟反革命的頭頭，上層組織割斷關係，你們又站到革命方面來，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來，有革命的表現，那麼仍然可以參加革命的組織（鼓掌）。這樣，你們也是有可能，在你們改變了立場、態度，承認錯誤以後，將來相應的有可能產生你們的代表，這是將來。至於你們這個前途，我們不堵死，我們應該幫助你們，告訴你們，要爭取這個前途。（鼓掌）

關於革命幹部呢？領導幹部呢？自治區黨委，我們認為高錦明、權星桓、康修民，這幾位同志只要經過革命群眾的同意，那也可以參加籌備小組。因為他們回去，還要給他們創造條件，給群眾見面，進行必要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然後經過群眾的同意，他們也可以參加籌備小組。籌備小組成立了就負責籌備革命「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當然要有步驟的。所以現在首先決定的關鍵要跟第二個問題結合在一起，就必須把軍隊的領導機構改組好。現在中心一環是這個問題。今天，不是來北京的人裡頭還有一部分軍事同志嘛！等一會兒肖主任還要專門講這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對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組織，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釋放，包括軍隊內部被打擊的革命幹部和戰士。對韓桐事件的兇手要依法處理」。就是說，由於二月五日前前後後的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是錯誤的嘛！所以應當給予平反，恢復名譽，被捕的，被打傷的應當立刻釋放，還要給他們治傷嘛！剛才說了，也許還有個別的地方沒完全釋放，我們還是讓軍區繼續審查。因為內蒙古範圍很廣，東邊一直到海拉爾，西邊一直到接近新疆，許多軍分區的地方，還有縣裡頭人民武裝部管的地方，也還有一些被捕的，我們還要繼續清查

這件事情。對韓桐事件的兇手，要依法處理。兇手已經查清了，我們所以沒有在決定裡寫，因為人是個別的人，事情是軍區指導思想、立場所引起的，所以人名字不要在這公佈，實際上我們要從嚴處理這件事。

第五個問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問題，要在內蒙公開揭露，王逸倫實行隔離反省，王鐸應停職檢查，交給群眾鬥爭批判」。（鼓掌）

剛才已經說了，我們在全國要集中力量，澈底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那麼在內蒙古就要聯繫烏蘭夫了，要聯繫王逸倫、王鐸這夥人了。烏蘭夫我們要在內蒙古公開的揭露，要在群眾中公開的講這件事情，不僅在呼和浩特，要在所有的盟旗裡頭講，要在所有縣份裡頭講，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因為我們一定要懂得，內蒙古這個隱患揭發出來了，但是還沒有完全消除啊！我們北邊蒙修、蘇修他們還在那個地方企圖挑撥，企圖利用。烏蘭夫領導內蒙的工作差不多近二十年，日本投降以後他就到東蒙去了這樣長的時候不會沒有他們的一小撮人跟著他們。這一次把王逸倫、王鐸揪出來了，在這個揭發中還會繼續揪出一小撮人。所以澈底的批判，公開的揭露烏蘭夫的資產階級當權派，對鞏固我們內蒙古的無產階級專政，鞏固我們人民的團結十分必要，應該作為我們內蒙古大批判運動中首要的工作（鼓掌），同時也要檢查我們過去的一些保守組織廣大的群眾，你們是不是參加，認真的參加這次對烏蘭夫，王逸倫，王鐸的批判運動，你們要想革命的話，這是最好的考驗！（鼓掌）（長時間呼口號，打倒烏蘭夫，打倒王逸倫，打倒王鐸！）同志們，這也就是你們拿這個問題，澈底的批判內蒙古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這幾個頭子，烏蘭夫、王逸倫、王鐸這一夥人，就是成為你們跟欺騙你們的，蒙蔽你們的那些壞人，那些反動的頭子，跟他們劃清界限的一個最好的機會！（鼓掌）並且王逸倫，因為他是一個特務，叛黨分子，所以對他的事情還要繼續挖掘，還有可能挖深一些，王鐸不僅他本人，他老婆也在活動，很可能你們回去對他批深一點，批透一點，還會揭出很多事情來。

第六個問題，「說明革命組織恢復和發展，說明他們活學活用毛主

席著作，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組織，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引導他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保守組織的群眾要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擊報復。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無產者革命造反聯合總部這樣的跨行業的上層組織應當解散，有條件參加群眾組織的人，應回到本單位去參加，一律不許武鬥，不許打、砸、搶、抄、抓」。（鼓掌）

同志們，你們好好讀一段就曉得了嘛，中央是各方面都想到了的嘛，（鼓掌）一方面說明革命組織恢復和發展，說明他們整風，這樣推動革命派大聯合，並且告訴他們，鬥爭的矛頭是要向上，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至於對保守組織應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擊報復嘛（鼓掌），我們在開會的時候跟「三司」的同志、學生同志、工人同志、也還有幾個農民同志、機關同志，我們再三說，你們回去無論如何不要打擊報復，要好好的團結他們，你們相信，他們裡頭負責的人，革命的會響應中央的號召嘛！（鼓掌）至於你們的上層組織，那個工農兵委員會，那個無產者革命造反聯合總部，那個跨行業組織，現在在全國都不適用，我們都勸他們解散，有的上層組織都勸了，回到本行業，回到工人裡頭。你們不能又是工人、又是學生、又是軍隊、又是服務性行業、又是機關，這不就變成革命委員會了嗎？有革命委員會，底下再有跨行業組織，這不是二重政權嘛，那怎麼允許，那不對嘛，許多跨行業組織，我們現在在奪權這個階段不要搞這個，運動初期，不懂得，搞了一些，只要沒有做壞事，有些還做好事了我們也勸他們取消。現在對內蒙古也是這個辦法，並不是專門對你們的，而且這裡頭確實有些壞人，操縱了你們，蒙蔽了你們，欺騙了你們，應該把他們抓出來。至於許多工人、學生、機關同志還要革命的話，回到本機關，本學校，本工廠裡頭去，在那裡參加他們革命組織還是許可的嘛，所以，這些辦法都想到了，而且我們主張，我們勸他們不要武鬥，不要打、砸、搶、抄、抓。這件事情是要大家互相勉勵。

第七個問題，結合給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革命幹部平反，釋放被捕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進行擁軍愛民，加強軍民團結，

嚴防壞人挑撥軍民關係。要向廣大革命群眾宣傳毛主席關於相信和依靠群眾，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相信和依靠幹部大多數的指示。

這個問題，我們照顧了軍民關係。在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上，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講了這個問題，也解釋了軍委的八條命令和「十條」命令的相互補充作用。一邊說擁軍，一邊說愛民，結合在一起就對了。軍區少數的領導人指揮、批准武裝的人對革命的群眾壓了一下子，只要他們真正的認識了錯誤是允許他們改的，而且只要改就行了嘛！因為我們整個人民解放軍還是偉大的，光榮的嘛！可靠的嘛！（鼓掌）我們可以說真正地保衛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我們國防的，真正的勞動人民的子弟兵嘛（鼓掌），所以不要因為一兩個或者兩三個領導人犯錯誤就把我們整個解放軍看成是不好的，那是最大的錯誤了。這個問題，凡是革命的組織、革命的群眾一說就懂得。至於個別的人提的不適當的口號，我們勸他要把口號拿掉。這種事情在呼和浩特也發生過，在別的地方也發生過。只要我們把問題講清楚，是講得通的。許多同志，軍隊來的人，過去受上面蒙蔽犯了一點錯誤，廣大群眾不會責備。你們只要領導承認錯誤，這個彎子就轉過來了，你們不要扭在這個地方。我們知道，青海那個事情，經過劉賢權同志回去以後，「八一八」的組織跟軍隊的同志互相融洽得很，軍隊走出來，他們歡迎他們，軍民真正像魚水一樣，所以，我們相信內蒙古的人民和軍隊一定會搞得這麼好的（鼓掌）毛主席最近講的三個相信和三個依靠，就是我們偉大領袖特別強調的，就是我們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一定要依靠什麼人把這個大運動掀起來，使它蓬蓬勃勃的前進呢？首先靠廣大群眾，次之靠人民解放軍，勞動人民的子弟兵，也靠大多數好的，比較好的幹部嘛！我們幹部中犯錯誤的是一小撮嘛！

第八個問題，廣泛深入地宣傳中央關於青海問題決定的原則。青海問題在這一次解決事情以前中央就有了決定，那一共是九條規定，原則上是要責成軍隊他們回去、革命組織去回宣傳。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和批語，當時都給他們交代了，中央軍委的「十條」命令，中共中央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中央軍委八條命令。這四個文件，當然還有

其他的中央文件要廣泛宣傳。這四個文件和內蒙古直接有關的，就是一個八條命令，一個「十條」命令，一個青海問題決定原則，那裡數目字不要去宣傳了，還有安徽問題的決定。這些文件中規定的原則同樣適用於內蒙古。所以要求內蒙古廣大的群眾，廣大的幹部，我們人民解放軍也要堅決地貫徹執行。

這就是我今天向大家解釋的八條決定的精神（鼓掌）這個決定發表以後，內蒙古就來問了，說這個決定是不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副帥林副主席決定的，批准的？後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作了一個回答。我們現在請陳伯達同志講一講。

### 陳伯達同志講話

剛才周總理已經把中央關於內蒙問題的決心重新作了清楚的說明。中央關於內蒙問題的決定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經過林副主席同意的，（鼓掌）這是不能夠懷疑的！是不能懷疑的！（鼓掌）完全正確的，是完全正確的！（鼓掌）決定以後在內蒙所發生的事情同樣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這個決定基本精神就是支持內蒙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鼓掌），反對那一小撮堅決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一邊的那些壞人（鼓掌）烏蘭夫、王逸倫、王鐸是一小撮，他們是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鼓掌），跟他們走的，那是走錯了！（鼓掌）回過頭來站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來，（鼓掌）這樣作那還是及時的。希望一些不瞭解情況的人，今天聽了周總理的講話以後，趕快回過頭來（鼓掌）。剛才開會以前和開會以後，有少數人公然地煽動一部分人退出會場，採取惡劣的手段，吹口哨，等等，這是公然的破壞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公開的對抗黨中央的行動，這是絕對不許可的，（呼口號）後來開會以後，有些人覺得不對，又回來了，我們還是歡迎他們這樣做的。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還是給那些犯錯誤的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鼓掌）。我感到今天這個會還是開得很好的（鼓掌）。在中央決定以後，鑒於內蒙古還有一小撮反抗中央的活動。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同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為了讓那些被蒙蔽的人懂得事情的真相，能夠回

頭，所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和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就打了電報給呼和浩特各個群眾組織，批了三條。這個三條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現在來宣讀一下，由王力同志宣讀。（王力同志宣讀三條；略）（鼓掌）

這個文件還可以發給大家。同志們！你們是從內蒙古來的。內蒙古是我們國防的最前線，在內蒙古那裡，蘇聯修正主義者，外蒙古修正主義者正在千方百計的破壞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干涉我們的內政，烏蘭夫、王逸倫這一類人就是他們的代理人，所以，要高度的警惕，要百倍的警惕，不要上烏蘭夫、王逸倫、王鐸這些壞人的當。你們因為是站在國防北部的國防最前線，所以，你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人民解放軍和人民群眾要緊密地團結起來，保衛我們的國防，我們要緊緊地團結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導下團結起來，過去參加過保守組織的群眾，他們進行自我批評，歡迎他們進行自我批評，只要他們能夠這樣做，他們仍然是革命群眾，要同他們合作。我們相信毛主席的號召下，壞人終歸是會孤立的，是會很孤立的，他們不過是一小撮人，只要群眾的眼睛擦亮了，他們就無所作為了，他們就會被群眾所唾棄，他們就會一敗塗地的。

我最後一句話，還是希望同志們回到內蒙去！

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下緊密地團結起來！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 肖華同志講話

同志們。我完全擁護剛才周總理，伯達同志的講話，擁護中央關於內蒙問題的決定。（鼓掌）內蒙軍區的個別領導人在支左的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支援了內蒙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所操縱的保守組織，內蒙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中央四月十三日發佈的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指出了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所犯錯誤的性質和糾正錯誤的一系列的措施。中央決定下達以後，立即得到了內蒙地區廣大的革命群眾、內蒙軍區廣大指戰員的熱

烈擁護。但是，也有極少數的人堅持錯誤的立場，對抗中央的決定，有些人因為受了欺騙，上街遊行，上北京告狀。這完全是錯誤的，我們軍隊同志更應該注意到這一點，這是嚴重的違犯軍紀的行為。中央四月十三日關於內蒙問題的決定是經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批准的，一切擁護毛主席，擁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同志，必須自覺地堅決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決定（鼓掌）因為解放軍是最聽毛主席的話的，林彪同志再三號召我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鼓掌）毛主席已經批准了這個決定，中央通過了這個決定，我們就應該不折不扣的，堅決擁護，堅決的執行！（鼓掌）我們宣傳這個決定，我們執行這個決定，我們人民解放軍和廣大的革命群眾就捍衛這個決定。聽不聽毛主席的話，擁護不擁護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在口頭上，而是要在行動上，（鼓掌）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是真聽毛主席的話，還是在行動中違背毛主席的話，執行這個決定，就是一個行動的考驗。（鼓掌）

內蒙的事件主要的責任是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的代理人王逸倫、王鐸等人負責，內蒙軍區個別領導人的錯誤也是嚴重的。但是他們同王逸倫還是有區別的。王逸倫是壞人做壞事，是叛徒，是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軍區的某些領導人犯錯誤是上了他們的當，是好人犯錯誤，是受了騙，站錯立場，只要他們迅速地把立場端正過來，公開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堅決改正錯誤，我們還是歡迎的，還是好同志。（鼓掌）那些受欺騙，蒙蔽的幹部，他們也是因為不瞭解情況，也是受了矇騙，受了壞人的挑撥，但是，只要認識清楚，我們是可以原諒他們的，他們是沒有罪的。當然，這些同志應當從思想上，提高警惕性，接受經驗教訓，把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大大地提高一步，用毛澤東思想來改造自己，來武裝自己，使以後不要再重犯錯誤，再不要上他們的當。

我們軍隊是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培養的，我們軍隊是有高度的自覺性和覺悟的人民軍隊，我們必須時刻牢記毛主席的教導，一切行動聽指揮。在當前內蒙地區階級鬥爭極其尖銳複雜的情況下，內蒙軍



區的全體指戰員，必須進一步加強組織性，紀律性，一切軍隊的調動必須嚴格遵守軍委的規定，參加地方集會和上街遊行，示威必須經過軍區的批准，不得擅離職位，不得擅自行動。一切內蒙軍區的同志不要受二人挑撥，受壞人利用。這一點同志們在政治上失去警惕性，在組織紀律上是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我們堅決不同意，我們堅決不允許，堅決反對！（鼓掌）人民解放軍應當最遵守紀律，應該成為遵守紀律的模範，任何違犯組織紀律和行為都是削弱我們軍隊戰鬥力。你們上街遊行對抗中央決定，這都是對文化革命不利的，對保衛國防不利的。內蒙地區是處在一個反修鬥爭的最前線，階級鬥爭是非常的複雜，內蒙軍區擔負著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國防的這麼一個艱巨的任務。為了更好地擔負這個任務，執行這個政治任務，所以中央在決定上就決定了要改組內蒙軍區的領導，加強內蒙軍區的領導。剛才總理說過了，就是調劉賢權同志任內蒙軍區的司令員。劉賢權同志是一個很好的同志，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很堅決的一個同志。所以，他到內蒙軍區，對內蒙地區的文化大革命，對內蒙軍區的工作一定會得到大大的加強。軍區的吳濤同志，他也是一個很好的同志。他過去長期在東北，在林彪副主席所領導下的第四野戰軍工作，一貫做政治工作，他是擁護毛主席的，是擁護林副主席的，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在同烏蘭夫的鬥爭中，他也是挺身而出的，鬥爭得最尖銳的一個戰士。在劉賢權同志還沒有到達以前，中央決定由騰海清同志去代理內蒙軍區的司令員。騰海清同志是由中央軍委決定的，中央軍委派去到內蒙軍區代理司令員的。在劉賢權同志沒有到達以前內蒙軍區同志應該服從騰海清同志的領導、指揮。希望內蒙軍區的部隊，內蒙軍區的同志要團結在以劉賢權、吳濤同志，在目前是騰海清同志，吳濤同志軍區黨委的領導下，共同努力去完成毛主席所賦予的一切任務。

當前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決戰的關鍵時刻，人民解放軍擔負著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的光榮任務。我們希望內蒙軍區部隊的幹部、戰士同志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團結內蒙地區的廣大革命群眾，堅決支持

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澈底摧垮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指向內蒙地區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王逸倫等，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鼓掌）把內蒙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取得完全、澈底的勝利！（鼓掌）讓我們高呼：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康生同志講話

同志們，剛才周總理、陳伯達同志、肖華同志講的話，把毛主席的路線，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決定和軍委的命令，已經簡單明瞭講得很清楚了。我想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我希望我們全體到會的同志尊重我們的這個會議。我們的這個會議是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指示召開的，（鼓掌）是向同志們傳達毛主席批准的、林副主席批准的，黨中央的關於內蒙問題的決定的一個會議。（鼓掌）是要我們大家一起堅持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個會議，（鼓掌）為此，周恩來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黨中央，陳伯達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組，肖華同志代表軍委以及軍委文革小組的同志。全體同志，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江青同志，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全軍文革小組的副組長肖華同志，關鋒同志，楊成武同志，還有謝富治同志都出席了。你們看，我們這個會是多麼盛大的一個會議呀！（鼓掌）

同志們可以冷靜地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工作這樣忙，繁忙的中間來召集這麼一個會呢？這麼多的負責同志出席這個會議呢？為什麼？是不是因為呼和浩特有多少人在街上示威，甚至還有幾個部隊的幾個人參加，是不是因為這樣子把我嚇得不得了，跑這來開會了？不是的！是不是因內蒙古自治區來了這樣多的，好像是幾千人吧，三、四千人的同志跑到北京來，那就把我們嚇住了，噯，趕快見見你們，開一個會吧，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也不是的！那麼是不是因為同志們到中南海門口去靜坐，把我們嚇的不得了，所以，就來召集你們來開會呢？也不是的！同志們好好地想一想，不是因為這個東西，那麼為什麼呢？就是我剛才講的，為的要貫徹，為的要宣傳，為的要執行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路線，為的要貫徹執行毛主席批准的對內蒙的八條決定，也為的使同志們真正的瞭解內蒙是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同志們，你們以為我們不瞭解內蒙的情況，我這一點明確的告訴同志們說，我們瞭解的情況比每一個同志多。這一點請你們相信我們（鼓掌）。是為了使很多的受蒙蔽的同志覺悟起來，站在毛主席的路線方面來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會對於同志們來說，是上了一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大課的一個會議，（鼓掌）。也就是周總理所講的，使我們有些同志受蒙蔽的同志向一小撮烏蘭夫、王逸倫、王鐸等人劃清界限的最好的機會的一個會議。所以我希望同志們很珍視這個會議，在你們的政治生活中召開這麼一個會議，記得這個會議，因為毛主席關心你們召開這麼一個會議的，（鼓掌）但是，在這裡邊，我向同志們說一下，就在這個會議中間，有的同志還不瞭解，還有這樣的想法，那樣的想法，有的人還要退出這個會議，那麼，這當然是不對的了，好好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當然了，青年人，一時的衝動是難免的。所以，我看到了同志們在這樣一個會議上有那樣的行動的時候，我覺得很難過，替你們難過。所以，我就講了，你們不願意參加你們就回去，當然，看到了你們還是願意聽周總理的講話，願意聽毛主席的聲音的。所以，這一點可見同志們犯錯誤的時候是可以改正，是容易改正的。我們歡迎同志們改正錯誤（鼓掌）。

我講第二個意見，內蒙古發生什麼問題，剛才周總理講了的，我們人民解放軍個別的人開槍打死革命的人民。打的這一槍是從內蒙軍區開始的。同志們，要嚴肅的對待這個問題。我們人民解放軍什麼時候曾經開槍打死革命的人民？這個周總理講過的。內蒙發生什麼問題？中央文革小組，《解放軍報》派了記者去，這是中央派的記者嘛，竟然被內蒙古軍區逮捕，內蒙軍區逼供，毒打，甚至我們打電報還是押解到北京來。押解中間，他們的筆記一直到最後才交給我們。你們想一想。同志

們，有沒有這樣的情況。還有了，一些同志不知道的，內蒙軍區擅自派了武裝進入到我們毛主席住在的首都北京，派部隊帶槍在北京的街上抓人，就在那裡呢？就在甘家口街上抓人。你們想一想，哪一個省，哪一個軍隊敢於這樣作，他們可以派武裝進入我們的首都，自己可以自由在北京市上抓人。同志們，你們想一想，這樣的事情嚴重不嚴重！長期以來，內蒙軍區個別的領導人，總起來一句話，就是下壓群眾，上抗中央，下邊鎮壓群眾，上邊抵抗中央。周總理講的，他們把中央召集他們來解決內蒙問題，他們把它看成是「重慶談判」，看成是共產黨和國民黨談判的。你們想一想，說這種話的是怎麼樣的錯誤，實在不是革命的話，是反革命的話。怎麼這麼一個共產黨員，對待中央能夠說出這樣的話來，同志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這樣的問題嚴重不嚴重！他們慣於用兩面派手法的，表面上說執行中央、軍委，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的，但是呢？在內蒙地區的時候，他們按照他們那一套做，甚至於他們公開的可以打這樣的電報給周總理，給中央軍委，給中央文革小組，給全文革。什麼電報呢？三月九日內蒙古軍區來的電報。他的電報怎麼說呢？他們說：最近呼市三司在所謂的傳達「中央精神」的口號下，（中央精神打著括弧的）竟然製造謠言，進行一系列的蠱惑人心的反動宣傳，在大街上大量地張貼大幅標語，散發通告，發表聲明，繼續煽動群眾反對解放軍，妄圖再次煽起反革命逆流。他們講的反動宣傳，大量張貼標語，什麼樣的標語呢？在這個電報上公開地寫著，我念念同志們聽一聽，什麼標語。這種大幅標語內容：第一，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鼓掌）同志們鼓掌了，問問同志們，這是反動標語呢？還是革命標語？（群眾：革命標語。喊口號聲：「用鮮血和生命保衛中央文革！」）好，第二，誰攻擊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鼓掌）第三，誓死與中央文革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鼓掌）第四，誰攻擊中央文革小組就砸爛誰的狗頭！（笑鼓掌）第五，保衛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鼓掌）這樣的革命標語，竟然使內蒙軍區能夠向軍委發電報說這是反動宣傳。同志們，你們看這個問題嚴重不嚴重？（群眾：嚴重）這有電報為證，空話無憑，有電報為

證。所以，同志們冷靜地想一想，內蒙發生這樣的問題，所以剛才肖主任講了，有些部隊還上街遊行，反對中央的這個決定。我覺得責任主要不在他們，而是在過去的內蒙軍區個別的負責同志。同志們，我們可以嚴肅地問為什麼中央軍委改組內蒙軍區，你們就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了。所以，今天這個會，周總理詳細細地把問題和同志們講清楚了，這是對同志們非常必要的，使同志們從受蒙蔽中間覺悟起來。

第三，希望同志們，要知道，現在在內蒙地區，我們的敵人活動相當猖狂。什麼是我們的敵人呢？蘇聯修正主義，外蒙古修正主義，美國帝國主義，臺灣的蔣介石匪幫以及在我們內蒙的地富反壞右和屢教不改抱著階級仇恨的分子，如烏蘭夫、王逸倫、王鐸就是他們的代表。在內蒙地區散佈了許許多多的反革命謠言，同志們千萬識別一下，千萬不要受蒙蔽。比如開始的時候有這樣的謠言，說是中央對內蒙古的決定是假的。這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製造的，是欺騙群眾的，你們想一想，這樣的決定怎麼能夠從北京發出不經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准呢？這樣的決定怎麼能不經過毛主席的批准呢？問題不是這些，問題就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利用這些謠言欺騙人民，目的是反對中央這個決定，是這麼一回事。這種謠言是很惡毒的，甚至於挑撥中央同志的關係，甚至於造周總理的各種謠言。同志們，這一點應該提高階級的警惕。內蒙階級鬥爭是最複雜的一個地方，是國防最前線。內蒙，我告訴同志們，內蒙今天發生問題，明天，後天莫斯科就可以報導的，今天發生問題的時候，明天，後天香港就報導的。我相信同志們大多數是革命的。但是，要革命，就必須要提高階級的警惕，因為有事實，我可以告訴你們，王逸倫就是一個特務。在我的看法，王逸倫不僅是蘇修特務，也是日本特務，也是國民黨的特務。所以，這一點同志們千萬要站穩階級立場，千萬對問題要有一個階級的分析，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千萬不要忘記敵人在內蒙古的破壞活動。因此我想，同志們必須分清敵我，什麼是敵人，什麼是我們的同志，什麼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點是革命者首要的一個問題。同志們，你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像這幾天

內蒙古呼和浩特那種混亂情況，敵人高興不高興？蘇修、蒙修、蔣介石匪幫、地富反壞、烏蘭夫、王逸倫、王鐸等人他們高興不高興。同志們要記得主席的話，敵人高興的事我們就不做，敵人反對的事情我們就擁護，所以，希望同志們千萬不要忘記了。希望同志們千萬不要忘記了階級，階級鬥爭，千萬不要有階級仇恨、階級警惕。這是第三點，從這一點我就要介紹一下。因為同志們要我介紹一下王逸倫到底是個什麼人？

我不認識王逸倫，但是在中央一次接見的時候，我左看、右看，我看這個人不像共產黨。因為什麼呢？不管人家講什麼話，他就好像敵人的特務在我們的法庭上的那麼一種態度，不管人家怎麼批評，不管人家講什麼話，他就把頭一搖，造謠，造謠，造謠。因此我就問他，你到底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嘿，一下子問住了。他說共產黨。我說你在哪裡加入共產黨？他說在北京。我說在北京。那個組織加入共產黨？他糊裡糊塗說不出來。以後他說到莫斯科。我說那更怪了，凡是中國同志到莫斯科去，首先要經過我審查，我怎麼沒有看到過你呢？（笑聲）他說他認得我，我說你認得我是一回事，我可不認得你呢。我說你在什麼學校學習，他七講八講，講一個什麼學校，我根本不曉得那麼一個學校。會後，我才知道他到了熱河，他從莫斯科回來的時候中央組織部歷次介紹這個人黨籍不清楚，那麼最後怎麼到熱河去的？是現在北京市黑幫劉仁把他派去的。到了那怎麼樣？到了那投降了敵人，後蘇軍到了赤峰，因為他會俄文，他俄文講的不錯，就替蘇軍做政治工作。蘇軍撤走的時候他和土匪搞到一道。就這樣騙了黨，並且好像他是一個抗日的，我只舉一個例子同志們就知道。一九六四年他在黨校學習的時候還同北京的一個女特務發生關係，直至現在這一次開會的時候還同女特務發生關係。同志們，你們看一看應不應該警惕呢？應不應該警惕呢？

另一方面，比如王鐸，到底是個什麼人呢？我從前知道他是在延安民族學院，是經常同烏蘭夫一道，替烏蘭夫做秘書的，是烏蘭夫的親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間，他實際上是地主、資產階級代表。最近我們看到了香港特務來信，要同他發生關係。那麼到底這個事情我們還不敢斷定王鐸一定是特務。但是，這個人是什麼呢？是王鐸的學生，名字叫潔生。

另外一方面，你們曉得王逸倫他的親戚，他的外甥是什麼人？當他在北平的時候，就是此人也是他的家鄉人，此人叫李鐵忠，國民黨特務調統局在北京地區的負責人。這樣一些壞人，這樣一些牛鬼蛇神，被我們軍區認為是極左派，結合他們成為「三結合」的對象，還到處亮相，把王逸倫的報告錄上音到各地方放，到連隊放，北京也放了，所以，同志們受蒙蔽很久的，他們放毒，到處放毒（有人插話：今天消毒）現在消毒。我們這個會也就是一個消毒會議（鼓掌）。所以，忘掉了階級，忘掉了敵人的時候，不把敵我分清楚的時候，我們非犯大錯誤。所以，這一點我們應該記取教訓。我這裡有一大羅王逸倫的材料，你們看他和裸體特務睡覺的照片我們都有的。這一點我們要做為教訓，要提高警惕。因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過去沒有把他揭露出來嘛！他還是自治區的副主席嘛，那麼，同志們相信他也是有理的。但是，他已經長期混在革命隊伍裡邊還沒有揭露，那麼，同志們受蒙蔽，這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點，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有些保守組織，有的受蒙蔽的同志，在內蒙文化大革命中間犯了這個錯誤。犯了錯誤只有用自我批評的精神，敢於承認錯誤，敢於改正錯誤。我想，同志們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人，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人是有雄心壯志的，絕大多數的人，青年人是這個抱負的。既然這樣，有錯誤我們也等，我們有錯誤，勇敢的承認錯誤，有錯誤就同錯誤劃清界限嘛，改正錯誤，不是奪權嘛，要把自己錯誤的權奪掉。這一點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要歧視他們。毛主席的辦法就是一看二幫。一看是怎麼樣呢？要看他自己是不是覺悟，看他自己是不是改正錯誤，是要看了。那些堅持錯誤，甚至屢教不改的，個別也有了，但是大部分同志，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所以要看。第二條，要幫，要幫助他們，說明他們改正錯誤。所以，這一點，只要同志們承認錯誤，不要抓他這樣的小辮子，那樣的小辮子，應該在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下團結起來，向著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向著內蒙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王逸倫，王鐸等人作鬥爭。無論是造反派，無論是沒有犯錯誤的

同志，都應該採取這樣一個態度。比如現在還有人抓三司衝擊軍區，現在中央不是講了嘛，那個不要追究，人家犯了一個錯誤，允許人家犯錯誤嘛，你們現在不是有些保守組織，出入軍區，出出進進那不是比三司還厲害嗎！（鼓掌）到中南海門口靜坐，你看是不是已經比三司高明咧！一時的錯誤，我們不責備，不責備的，你們沒有犯這個錯誤也不要抓人家的這個小辮子。隨便我講一句話，我鄭重地講一句，在呼和浩特，在內蒙，有這樣的標語：打倒康生！不怕這回事，不要抓這個辮子，不要抓這個辮子。打倒周總理的也有了（周總理：這個辮子不要去抓啊！）這個辮子不要去抓！（鼓掌）如果說我們違反毛澤東路線的，不執行毛主席路線，執行劉鄧路線，不要你們打，他自己會倒的，如果我們堅決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你怎麼打，也打不倒的！（鼓掌，呼口號）所以，你們去抓這個辮子幹什麼？不要抓。

最後一點，就是許多同志講過的，希望同志們堅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方面來，這一點希望同志們注意，總理、陳伯達同志、肖華同志講過話了，時刻想到我們對執行毛主席的路線是不是言行一致，同時觀察是真擁護毛主席，還是假擁護毛主席，現在這本書差不多誰都有一本的，地富反壞也去買一本去，保守派也去買一本去。這裡面你們不能單看外表了，不能單看講的，要看行動，要看實踐，要區別打著紅旗反紅旗。這是當前的反革命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個手段，大家要善於區別這件事情，善於區別這件事情，話是要聽了，聽其言，但是要看實際行動，要觀其行，講話、讀語錄是一回事，做事情，實際行動是另外一回事，這就不行了。所以，這裡有個真擁護毛主席，假擁護毛主席的問題，對內蒙當前來說什麼是一個標準呢？擁護毛主席批准的內蒙決定的人，是真擁護毛主席的（鼓掌）是一個標準，當然，一個時候不大瞭解，一個是還沒有弄清楚，一個是還有點懷疑，你不能給人家立刻戴上一個反毛主席的帽子，那個恐怕也不好，但是，這是一個標準。這裡面我也講到了，恐怕對內蒙三司的同志我也講幾句話。三司是一個革命組織，但是，革命組織逐漸擴大的話，必然就可能混進一些不純的成分在內。你看看吧，我們共產黨還混進來彭，羅、陸、楊、劉、鄧、陶



鑄。有人提善意的批評，三司應該很好的檢查。相反的，你那個無產者就那麼無產呀？我看也不見得吧！反三司的人組織就那麼純了，不是吧！那個軍區裡面他們就那麼純？他還結合王逸倫呢。每一個組織中間都會有，必須隨時在這方面整風，自我批評，清理組織，鞏固組織。另外一方面，三司的同志，也不能因此驕傲起來，也要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所批准的內蒙問題的決定，而且要做模範。這裡面不是講嘛，反對打、砸、搶、抄、抓嘛，這一點，三司的同志一定要注意，你們自己要首先遵守，你才能去說服人嘛！所以說，執行毛主席路線一定要見諸實踐的，見諸實踐中間不可能沒有這樣的、那樣的錯誤。有錯誤的就改。我相信，我們大多數的同志，以及受蒙蔽的、不瞭解情況的同志，經過我們的這一次會議會瞭解的，會覺悟起來的，會堅決地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去反對那些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反烏蘭夫、王逸倫、王鐸等等壞分子、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這一點我們相信是這樣的，所以我很贊成。內蒙是我們國防的前線，我們有權利要求，同時也有義務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面，在毛主席的號召下面，在毛主席的批准的決定下面，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搞澈底，把烏蘭夫、王逸倫、王鐸等人鬥垮、鬥臭，實現我們的革命的大聯合！（鼓掌）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 周總理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

同志們！

我們講的時間已經很長了，我們已經把毛主席，我們偉大領袖委託我們的任務，已經在這個地方實現了，把毛主席的聲音傳達給你們了（鼓掌）。許多從內蒙古來的一些同志，你們口口聲聲說日夜的想念毛主席，我也相信你們這一番好的心意。那麼，我們大家就是把毛主席的聲音傳達給你們了。（鼓掌）我相信你們絕大多數是要革命的，只要你們聽毛主席的話，趕快回到內蒙古去，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

同蒙蔽你們的，欺騙你們的，使你們上當的，跟那些反動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鼓掌）你們堅決的，跟其他同志一道來鬧革命。同時也希望站在呼市三司的觀點的一切同志，你們要響應剛才康生同志的號召，你們也懂得過去你們受壓迫，所以你們成為革命派，堅定的左派，那麼現在你是平反了，你是革命了，你們可不能像執行反動路線那樣，轉過來去壓迫他們，那就不對了。（鼓掌）所以，你們雙方都應該把決定的第六條，第七條好好地讀一讀，我們大家站在一起，把矛頭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批判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烏蘭夫、王逸倫、王鐸這一夥人，團結起來鬧革命力量就會更大。希望你們聽到了我們傳達毛主席的聲音以後高高興興的，除了極少數挑撥者以外，大家攜手一道回內蒙古去鬧革命！（鼓掌）

讓我們結束這個會議，讓我們高呼：

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我們堅決地站在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

澈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澈底批判內蒙古的反動路線的頭子烏蘭夫、王逸倫、王鐸！把他們批倒、批臭、批垮！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好！散會。

附件：

劉華香的檢討

周總理、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並中央軍委、中央文

革、全軍文革以及到會的全體同志們：

自從三月十八日以來，中央負責同志，軍委負責同志以及內蒙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小將們，對我們進行了耐心的幫助和誠懇的批評，使我們受到了極為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四月十三日中央發佈了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以後，使我們對所犯的錯誤，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完全擁護中央的英明決定（鼓掌），我們一定不折不扣地，堅決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決定（鼓掌），按照中央的決定來處理內蒙問題。近一個時期，毛主席、林副主席把「三支」任務交給軍區，我們沒有完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辜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重托和信賴，給內蒙地區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我們萬分的慚愧。

這期間我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革命群眾，指向了呼市三司等革命群眾組織，我們沒有很好的調查研究，沒有進行階級分析，沒有看他的大方向，只看到他衝擊了軍區，便認為他們不是革命組織。我們把一時的現象當成了本質，把支流當成了主流，用感情代替政策，把呼市三司這個革命的群眾組織當成了反革命組織，對他們實行了分化、瓦解的方針，反而支持了保守派，把事情完全搞顛倒了。

這個期間我們違背了毛主席關於「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教導，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逸倫當成了「三結合」的對象，把鬥爭鋒芒指向一些站在革命群眾方面的高錦明、權星桓等同志，非法地給他們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帽子，顛倒是非，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我們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的界限，大批逮捕了革命群眾，甚至開槍打死了韓桐同學，進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帶槍桿子的劉鄧路線的錯誤。

這個期間，我們還犯了一系列的嚴重的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我們驕傲自滿，自以為是，對中央很尊重，執行中央指示很不堅決。中央派去的記者，我們私自扣留，呼市黨委、人委奪權我們不請示報告，沒有經過中央批准就決定召開幾萬人的慶祝大會，總理指示不要召開大會的

時候，我們還想延期召開大會。我們沒有經過中央批准就把吳濤同志當成了三反分子，抄了家，封了文件，停止了他的工作。這也是政治上和組織紀律上的錯誤。三月十八日以後，中央首長三令五申讓我們釋放被捕的同志，我們沒有採取有力的措施貫徹執行。這是我們執行中央指示不堅決的表現，這是非常錯誤的。我們所犯的錯誤是極端嚴重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線錯誤，是喪失了無產階級立場，立場站錯了，站在了資產階級立場上，鎮壓了革命群眾，犯了帶槍的劉鄧路線錯誤，實際上是目無中央，目無軍委，奪權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對中央指示採取兩面態度，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在思想上自以為是，驕傲自滿，主觀片面，絕對化，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

這些錯誤的產生絕非偶然，我們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沒有政治掛帥的必然結果，我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必然結果，是主觀片面、驕傲自滿的必然結果，這個時期所犯的錯誤，值得我們作為深刻的教訓，我們對黨的事業造成了損失，我們有罪於黨，有罪於人民，我們向黨中央請罪。以後我們一定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努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階級鬥爭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堅決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我們一定堅定不移的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堅決支援革命組織呼市三司。我們一定要加強組織性、紀律性、加強請示報告制度，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八條指示，軍委的「十條」命令和八條命令，作好部隊的思想工作，作好群眾工作，搞好軍民關係，妥善處理善後問題，說明革命組織發展壯大，對保守組織進行分化、瓦解、教育、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眾一律平反，貫徹主席三個指示，三個相信，三個依靠，停發工資者一律補給，不同觀點的人不准打擊報復。槍殺韓桐的兇手一定要依法懲辦。

我們改正錯誤，和呼市三司革命小將，全區革命群眾，在毛主席、黨中央英明領導下，在中央文革、中央軍委、全軍文革領導下，把內蒙古自治區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內蒙古自治區建設成堅強的反修前線，完成黨中央給我們的各項任務。

以上沒有檢查的地方望批評、幫助、教育、我們繼續檢查，今後堅決改正錯誤。

此致

敬禮

劉華香、肖應棠、劉昌、黃厚、王良太<sup>38</sup>

## 周恩來、康生接見國際關係學院代表時的講話 (1967.4.28.)

### 【摘要】

總理：對幹部考察不但從上到下，而且從下到上，結合起來，要全面看幹部，過去不大注意下面的呼聲，所以不全面，現在發動群眾就全面了，所以主席發動這次文化大革命。

康老：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本身就是分析，材料有真有假，半真半假，要學會分析，幹部的材料也是這樣，要調查，要分析核實，文化大革命中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一個東西就相信了。有的看來問題不大，但一調查就有問題。

（關於所謂「二月兵變」）

康老：我順便插一下，說「二月兵變」，有些我不曉得，開始我有些曉得，現在傳遍全國，外國記者傳遍全世界。「二月兵變」具體怎麼來的，為什麼在二月，說法很多。二月事情很多，彭真的二月提綱也是二月，彭真曾下命令在北大駐一個團，人大駐一個團。這件事軍委曉得，解放軍確實到北大，人大去看過房子，陸平當時收拾房子，北大有些師生不大同意，以後又到人大去看房子，

<sup>38</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以後不曉得為什麼沒有去駐。（軍委考慮不大合適）六月一日聶元梓大字報出來後，北大同學懷疑，是不是彭真有陰謀？華北局也傳出這件事，說彭真要作軍區政委，原政委是李雪峰。這件事傳到師大去了，譚厚蘭當時一派很少，十多個人，把北大的大字報搞到師大去了，再和去年主席寫的五·一六通知聯繫起來也懷疑彭真了，要在學校駐軍為什麼，師大孫友漁工作組利用這件事鎮壓革命派，說譚厚蘭一派有意造謠，挑撥人民同解放軍的關係，打擊左派，一挑動就挑動起來了。當時打的很厲害，好像還出了一個簡報，我後來到師大去，反對孫友漁，講起這件事，說確實有解放軍去北大看房子了，為什麼師生懷疑一下彭真不行呢？他們完全不是造謠，而且北大有人看到解放軍了，我在會上講了這件事，為的是揭露孫友漁，講完了後師大又貼了一張大字報《郭影秋是什麼人？》傳至人大，當晚把郭影秋揪到人大，問郭有沒有這回事，郭說「有」。後來革命師生來問了，為什麼彭真要搞政變？這時正是鄧、陶到人大去，那時鄧、陶的問題還沒有揭開，他們說哪有政變，他們是保郭影秋。其實北大、人大也沒有說是政變，是懷疑這件事。這事當時過去了。鄧、陶問題揭開了，革命師生一想，咳，這一定是大陰謀。彭真要篡黨、篡軍、篡政，是一回事兒，不能從這件事是「二月兵變」，後來事情又發展了，後來陸平又到南口去搞民兵，吹牛說他在那裡打過遊擊，六五年羅瑞卿到雲南，六六年初鄧小平要到××去，彭真到××去，也聯繫起來了。有人在大會上問彭真，彭真冷笑，打得不准，你問他，他很高興，助長敵人的威風。

總理：據我知道沒有這件事，革命群眾懷疑是許可的，備戰備荒為人民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提出的方針嘛，是執行主席的命令嘛。

（關於批劉、鄧）

康老：軍訓主要是學政治囉，學毛主席的思想，活學活用，當前主要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用什麼批判呢？用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著作作武器來批判。林總講帶著問題學主席

著作。是否先定性後批，或先批判後定性，這是具體問題，更主要的是帶著問題學，而且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用毛澤東思想批判劉、鄧路線。

富春：批判劉、鄧同本單位結合起來，這是毫無問題的，先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鄧的路線搞清楚。十幾年也好，廿幾年也好，這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指定了題目，要從劉、鄧言論中來對照，看出黨內存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把這兩條路線搞清楚，就不是政治掛帥。現在大方向就是這個東西，使每個同志懂得，解放後就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從總的方面，解放後，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劉、鄧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每個關鍵時刻，劉、鄧同主席唱對臺戲，一個代表無產階級，一個代表資產階級；一個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這個武器，也難同本單位、本地區結合起來。<sup>39</sup>

---

<sup>39</sup>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4）》，1967年5月。

## 康生研究文獻

1. 褚靜宇.康生的「繼續革命論」必須批判[J].社會科學,1980,(5).
2. 時進.康生要「重建」一個什麼黨——駁所謂「三黨六論」兼評「五十字建黨綱領」[J].社會科學,1980,(5).
3. 蘇國榮.«俺這一門卻是誰人制下的?»——駁康生對所謂「妓女戲」的謬論[J].人民戲劇,1980,(11).
4. 孫雪天.康生的一筆帳——憶高麗生同志之死[J].新聞戰線,1980,(12).
5. 鄭廣智.林彪、康生、「四人幫」是如何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的[J].內蒙古社會科學,1980,(4).
6. 齊平.階級是一個歷史的、經濟的範疇——兼評康生在劃分階級問題上的唯心史觀[J].社會科學,1980,(4).
7. 徐鴻武,李濤.評康生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篡改[J].東嶽論叢,1980,(4).
8. 章學新,黃展鵬.康生對我國教育事業的破壞[J].人民教育,1980,(9).
9. 施平.批判康生對教育、科研工作的破壞[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0,(6).
10. 王關興.多行不義必自斃——清算康生一貫陷害革命幹部的罪行[J].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4).
11. 李公天.康生和所謂「建國以來哲學戰線上的三次大鬥爭」[J].學術論壇,1981,(1).
12. 楊成琦.馬克思主義建黨文獻的光輝是不可磨滅的——批判康生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誣蔑[J].青海社會科學,1981,(1).
13. 蘇克塵.康生和王明路線[J].近代史研究,1981,(1).
14. 趙長峰.極左路線的一塊「理論」基石——評康生的所謂「批判唯生產力論」[J].東嶽論叢,1981,(1).



15. 劉國元，鄭生壽，胡民新，王克榮. 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J]. 理論導刊，1981，（4）.
16. 馬德太，張中雲，周錫榮. 評康生對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的篡改[J]. 教學與研究，1981，（6）.
17. 杜文煥. 「二戰」時期在工運問題上劉少奇同志與康生的鬥爭[J]. 蘇州大學學報，1982，（2）.
18. 牛崇輝. 晉綏土地改革運動中的康生[J].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4）.
19. 陶瀛孫. 被康生殺害的兩位共產黨員[J]. 北京黨史，1987，（5）.
20. 朱文顯. 抗日戰爭時期康生對於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破壞與共產國際[J].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5）.
21. 康生是圖書文物大盜[J]. 湖南黨史月刊，1989，（5）.
22. 苗長青. 權術與康生的政治生涯[J]. 理論學刊，1991，（6）.
23. 師哲. 我所知道的康生[J]. 炎黃春秋，1992，（2）.
24. 康生在上海的一段秘史[J]. 齊齊哈爾社會科學，1993，（5）.
25. 星辰. 康生其人[J]. 春秋，1994，（1）.
26. 康生的恐怖報告[J]. 黨的生活，1994，（3）.
27. 朱仲麗. 平凡的故事（七）玩弄權術的康生[J]. 人民論壇，1995，（6）.
28. 圖們，祝東力. 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刊授黨校，1996，（1）.
29. 圖們，祝東力. 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刊授黨校，1996，（2）.
30. 圖們，祝東力. 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刊授黨校，1996，（3）.
31. 圖們，祝東力. 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刊授黨校，1996，（4）.
32. 張佐良. 康生抖落江青、張春橋的老底[J]. 中國民政，1996，（5）.
33. 圖們，祝東力. 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刊授黨校，1996，（5）.
34. 穆欣. 陳伯達和康生的明爭暗鬥[J]. 紅岩春秋，1996，（3）.
35. 圖們，祝東力. 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刊授黨校，1996，（6）.

36. 圖們, 祝東力. 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刊授黨校, 1996, (7).
37. 馬仲揚. 康生殘酷迫害楊獻珍紀實[J]. 炎黃春秋, 1996, (9).
38. 《康生殘酷迫害楊獻珍紀實》讀後[J]. 炎黃春秋, 1996, (10).
39. 馮建輝. 試析「康生現象」的歷史條件[J]. 炎黃春秋, 1996, (12).
40. 「康生現象」的歷史條件[J]. 毛澤東思想研究, 1997, (2).
41. 王超北寫詩鬥康生[J]. 黨史博采, 1997, (11).
42. 李非. 不能遺忘歷史的這一頁——讀《康生與「內人黨」冤案》[J]. 博覽群書, 1998, (1).
43. 羅繼祖. 康生將死之哀鳴[J]. 社會科學戰線, 1998, (3).
44. 凌雲. 從康生製造「謀殺蘇枚」冤案引起的聯想與思索[J]. 炎黃春秋, 1998, (9).
45. 陳複生. 怒打康生——一位老紅軍的自述(之一)[J]. 人民公安, 1998, (19).
46. 凌雲. 康生為何製造「謀殺蘇枚」案[J]. 人民公安, 1999, (2).
47. 文物大盜康生[J]. 黨政論壇, 1999, (2).
48. 趙健民. 康生相面造冤案[J]. 春秋, 1999, (1).
49. 林青山. 誰向康生開第一「槍」的[J]. 炎黃春秋, 1999, (4).
50. 陳烈. 無德自大的康生[J]. 瞭望新聞週刊, 1999, (17).
51. 廖蓋隆. 趙健民冤案的教訓——《康生與趙健民冤案》序[J]. 炎黃春秋, 1999, (8).
52. 曾彥修. 關於康生有意製造所謂「六十一人叛徒」假案問題的補充說明[J]. 廣東黨史, 2000, (3).
53. 許人俊, 春秋筆. 從「新疆叛徒集團」案看康生的翻雲覆雨[J]. 炎黃春秋, 2000, (7).
54. 李喬. 康生、師爺筆法及其他[J]. 百年潮, 2000, (9).
55. 李莊. 想到康生的作惡[J]. 炎黃春秋, 2001, (6).
56. 于光遠. 我知道的有關康生的幾件事[J]. 黨史天地, 2001, (6).
57. 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J]. 百年潮, 2001, (9).
58. 龔兵. 1977年, 誰向康生開的第一「槍」[J]. 湖北檔案, 2002, (3).

59. 康生對楊獻珍的迫害[J]. 黨史博采，2002，（3）.
60. 李東朗. 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J]. 百年潮，2002，（5）.
61. 沈友志. 被康生整死的紅色翻譯家王實味[J]. 湖南檔案，2002，（5）.
62. 劉明綱. 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的起因[J]. 文史精華，2002，（6）.
63. 夏從本. 康生製造的楊明軒《悼詞》風波[J]. 紅岩春秋，2002，（5）.
64. 何方. 康生一生中的三次政治投機[J]. 文史精華，2002，（10）.
65. 李東朗. 康生與「五人反黨集團」冤案的形成[J]. 黨史博覽，2002，（11）.
66. 王效挺，黃文一. 康生曹軼歐與「第一張大字報」[J]. 世紀，2003，（1）.
67. 何方. 讀有關康生的兩篇文章所想到的[J]. 文史精華，2003，（2）.
68. 納新. 黨內大奸的無恥嘴臉——康生其人其事[J]. 福建黨史月刊，2003，（3）.
69. 康生補書《醒世恒言》[J]. 湖南文史，2003，（3）.
70. 王珺. 康生在中央社會部[J]. 百年潮，2003，（5）.
71. 何方. 康生投機革命的一次「表演」[J]. 文史天地，2003，（6）.
72. 曾彥修. 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J]. 炎黃春秋，2003，（7）.
73. 孫佳. 毛澤東對康生錯誤的幾次批評[J]. 福建黨史月刊，2003，（7）.
74. 沈友志. 康生整死王實味[J]. 黨史文苑，2003，（4）.
75. 李維民. 康生、饒漱石在山東土改中大搞極左鐵證如山[J]. 炎黃春秋，2003，（9）.
76. 曾彥修. 關於《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的一點檢討[J]. 炎黃春秋，2003，（9）.
77. 馮文耀. 康生與山西臨縣土改試點[J]. 百年潮，2003，（11）.
78. 李維民. 康生、饒漱石在山東土改中的極「左」錯誤[J]. 春秋，2003，（6）.
79. 李晉. 《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讀後——兼致曾彥修、李維民同志[J]. 炎黃春秋，2003，（12）.
80. 錢伯城. 康生與毛岸英的關係[J]. 湖南文史，2004，（4）.

81. 樂夫. 康生與劉少奇冤案的產生[J]. 福建黨史月刊, 2004, (5).
82. 曾彥修. 關於康生殺害王實味事[J]. 同舟共進, 2004, (5).
83. 譚紅星. 中國第一陰謀家康生[J]. 檔案時空(史料版), 2004, (11).
84. 煥然. 康生是怎樣逐漸取得毛澤東信任的[J]. 黨史博采(紀實), 2005, (2).
85. 閻明複. 從我親歷的幾件事看康生[J]. 炎黃春秋, 2005, (5).
86. 劉之昆. 王明、康生加害李立三始末[J]. 出版參考, 2005, (14).
87. 程儀. 硬骨錚錚鬥康生[J]. 黨史天地, 2005, (5).
88. 張伯駒與康生的「借」畫之仇[J]. 黨史天地, 2005, (5).
89. 霞飛. 康生是怎樣逐漸贏得毛澤東信任的?[J]. 黨史縱覽, 2005, (10).
90. 熊坤靜. 康生投機發跡三步曲[J]. 黨史文苑, 2005, (21).
91. 霞飛. 康生是怎樣誣陷陳雲的[J]. 黨史縱覽, 2006, (5).
92. 霞飛. 康生的人生浮沉(上)[J]. 黨史天地, 2006, (6).
93. 張榮久. 康生鮮為人知的「罪惡史」[J]. 文史天地, 2006, (7).
94. 霞飛. 康生的人生浮沉(下)[J]. 黨史天地, 2006, (7).
95. 梁紅伍. 康生死前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J]. 百年潮, 2006, (9).
96. 梁紅伍. 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迫害林楓的[J]. 百年潮, 2007, (1).
97. 閻明複. 隨康生參加華約首腦會議[J]. 百年潮, 2007, (4).
98. 胡尚元. 毛澤東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並非因康生的密報[J]. 湘潮, 2007, (4).
99. 王學亮. 康生為何急於簽署處決盧福坦的命令[J]. 黨史文苑, 2007, (9).
100. 魏小蘭. 「我信天總會亮」——康生秘書談「沙韜事件」[J]. 百年潮, 2007, (9).
101. 郭省娟. 康生與延安「三大特務案」[J]. 文史天地, 2007, (9).
102. 閻明複. 康生如何回到權力核心[J]. 椰城, 2008, (5).
103. 萬理, 趙國江. 康生憑「相面」定案二例[J]. 黨史縱橫, 2008, (9).

104. 郝在今.延安時期的康生[J].椰城,2008,(9) .
105. 王學亮.康生簽署的一份祕密處決命令[J].黨史縱橫,2008,(10) .
106. 馮錫剛.康生是如何迎合毛澤東的[J].福建黨史月刊,2009,(1) .
107. 曾彥修,李晉西.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J].炎黃春秋,2009,(2) .
108. 於繼增.康生扼殺同人刊物《探求者》[J].文史精華,2009,(2) .
109. 李海文.第一張大字報與康生、曹軼歐的關係[J].炎黃春秋,2009,(3) .
110. 康生為何臨終前揭發江青[J].共產黨員,2009,(10) .
111. 許人俊.從「新疆叛徒集團案」看康生[J].黨史博覽,2009,(6) .
112. 曾彥修,李晉西.有才無德的兩面派康生[J].人民文摘,2009,(6) .
113. 霞飛.康生怎樣騙取毛澤東信任[J].共產黨員,2009,(18) .
114. 梁紅伍.康生為何揭發江青和張春橋[J].報刊薈萃,2009,(10) .
115. 葉永烈.康生臨終前為何打「直線電話」告密[J].報刊薈萃,2009,(12) .
116. 滌生.陳雲批評康生的老婆[J].文史博覽,2010,(1) .
117. 李暉.康生墨蹟三幀[J].東方收藏,2010,(5) .
118. 羅燕明.陳雲、康生與延安幹部審查[J].黨史博覽,2010,(8) .
119. 丁東.康生幫鄧拓渡過《瀟湘竹石圖》風波[J].文史參考,2010,(16) .
120. 閻明復.我看康生[J].領導文萃,2010,(19) .
121. 程冠軍.康生問題被揭露始末[J].同舟共進,2011,(1) .
122. 散木.關於所謂「藏書家」和「書法家」的康生[J].源流,2011,(1) .
123. 王中天.陳賡與康生的一次鬥嘴[J].紅廣角,2011,(1) .
124. 楊銀祿.我所瞭解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J].同舟共進,2011,(12) .
125. 陳徒手.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J].炎黃春秋,2011,(12) .
126. 楊銀祿.秘書眼中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J].共產黨員,2012,(2) .
127. 曉蔚.趙健民遭康生迫害始末[J].黨史縱橫,2012,(3) .
128. 康生延安整風「以貌取人」定案[J].中外文摘,2012,(5) .
129. 霞飛.中央文革小組主要人物的浮與沉之二——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J].黨史博采（紀實）,2012,(4) .

130. 郭影秋,王俊義.康生誣陷彭真的所謂「二月兵變」[J].百年潮,2012,(5).
131. 凌雲.讀《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來的話——康生與山東土改整黨及其他[J].炎黃春秋,2012,(8).
132. 李維民.康生、饒漱石在山東解放區製造冤假錯案[J].黨史博覽,2012,(9).
133. 凌雲.康生與「謀殺蘇枚」案[J].百年潮,2012,(11).
134. 張建功.康生與「新疆叛徒集團案」[J].文史精華,2012,(11).
135. 孟慶春,陳冠任.康生軼事[J].雜文月刊(文摘版),2012,(11).
136. 閻長貴.康生的秘書談康生——黃宗漢談話瑣憶[J].炎黃春秋,2013,(2).
137. 宋希於,周汝昌、康生交往抉隱[J].書城,2013,(6).
138. 楊銀祿.我所知道的江青與康生的關係[J].文史博覽,2013,(6).
139. 馮錫剛.詩詞:康生迎合毛澤東的媒介[J].領導文萃,2013,(11).
140. 藍英年.康生在延安——俄國人眼中的康生[J].領導文萃,2013,(14).
141. 顧保孜.康生,一個政治場上的高級投機商[J].中外文摘,2013,(16).
142. 沈寶祥,胡耀邦關於支持揭露康生的講話[J].黨史文苑,2013,(17).
143. 趙建民.康生相面造冤案[J].文史精華,2013,(11).
144. 張一水.他壓下了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小冊子——抗戰時期羅榮桓領導的115師整風運動[J].紅岩春秋,2013,(6).
145. 劉暢,王肖瀟.原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王世英之子向本刊講述父親與康生、江青鬥了一輩子[J].環球人物,2013,(34).
146. 陳楚三.康生相信特異功能[J].炎黃春秋,2014,(1).



##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贛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溱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舉，《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 48.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 49.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 50.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 51.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 52.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3.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54.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 55.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 56.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 57.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9.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0.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61.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2.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80. 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1. 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82. 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83. 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4. 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85. 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86.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87. 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88.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89. 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90. [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1. 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92. 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93. 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94. 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5. 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96. 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

- 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 112.Ross, Jatnes R. (James Rodtn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 11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14.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 115.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 116.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7.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18.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9.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20.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21.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122.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 123.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 124.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125.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 1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7.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 128.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 129.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 13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14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42. 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143. 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144.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145. 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146. 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147. 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148. 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9.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50. 《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151.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152.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3.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1.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62.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3.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164. 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5. 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166. 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167. 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17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5. 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176.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7. 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

- 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0.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1.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19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3.張志明，《走出迷穀——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

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元元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0.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 212.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 213.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4.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5.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6.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217.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 218.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 219.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20.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 221.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 222.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 223.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 224.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 225.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 226.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227.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28.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

-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權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

- 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

- 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81.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 282.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3.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 284.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5.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6.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 287.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 288.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289.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290.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 291.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5.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

- 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

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sup>1</sup>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sup>2</sup>他在

<sup>1</sup>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sup>2</sup>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董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sup>3</sup>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ld/ljld/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ld/ljld/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sup>3</sup> 董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資深獄吏：康生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6.05  
冊；公分 -- (文革風雲叢書；11-14)  
BOD版  
ISBN 978-986-92955-0-5(第1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1-2(第2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2-9(第3冊：平裝) --  
ISBN 978-986-92955-3-6(第4冊：平裝)

1. 康生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03902

文革風雲叢書11 PC0482

## 資深獄吏： 康生與「文革」（I）

---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責任編輯 / 李冠慶、洪仕翰  
圖文排版 / 周政緯  
封面設計 / 文菲亞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5月 BOD一版  
定價：54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978-986-92955-0-5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恰恰是背道而馳的。他不是主張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不是主張進行武裝鬥爭，不是主張去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而是迷戀大城市，引導無產階級放棄政治鬥爭，在城市工會工作中實行經濟主義。他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實行投降主義，放棄黨的領導。他不是像毛主席所說的，把統一戰線看成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是要把人民的武裝交給蔣介石去統一領導。

康生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7. 4. 13, 節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共分為四冊，詳細收集資深獄卒——康生在1966至1970年間的現場講話內容。僅在這短短的四年間，康生所留下來的談話紀錄就高達一百二十餘萬字，主要內容涵蓋其歷來對各級機關與幹部的演講，以及對「反黨反革命」對象的批判。透過本書所收集的詳盡一手史料，讀者當能對康生在文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更深刻的理解。